

方励之选集

第三卷



谨以此书纪念方励之先生

方励之选集

(第三卷 共六卷)

(第一版)

《方励之选集》编译校者

二〇一三年四月五日

版权声明

《方励之选集》所用文献以写作时间为序，不能确定写作时间的则以其公开出版的时间为序编入。编入的文献以原初出版者为据，校订则按照下列规定：

-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出政发【2010】11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版物文字使用的通知》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11年《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GB/T 15835-201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 GB/T 15834-2011》

凡属记者采访类的谈话，本选集只采集双方对话，采访者的背景材料放入编者注释，文章的出处及发表时间收于附录中；对网络出版物还进行了史实校对，并增加照片与注释。编辑《方励之选集》用于研究和个人阅读，任何商业应用都将受到追究。

《方励之选集》编译校者

二〇一三年四月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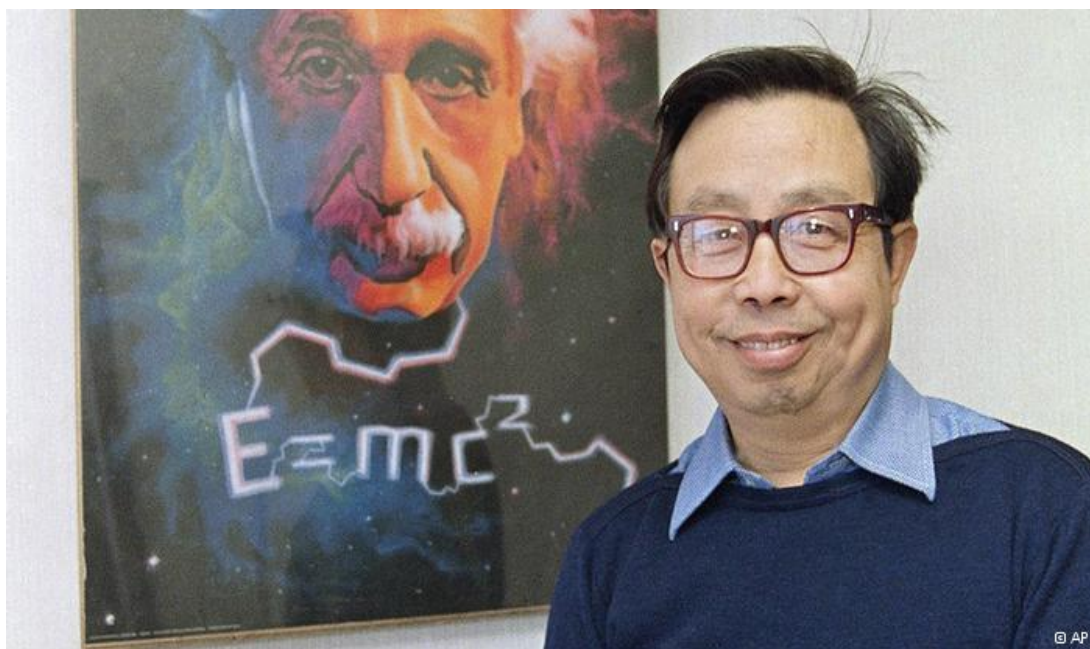
方励之(1987 年~1989 年)照片



照片 1 1987 年 1 月方励之被迫调离中国科技大学,但在 1987 年夏的黄山会议间,科大学生及同事仍主动亲近方励之,一同在黄山脚下屯溪小镇的河中游泳、戏水、聊天,有人留下这张照片,后寄给方励之。



照片 2 1987 年 9 月 23 日方励之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北京)。学生们争着索要签名：您还是我们的校长！（王树军摄）



照片 3 方励之在爱因斯坦画像前。（美联社图片）



照片 4 1988 年 5 月 4 日，北大建校 90 周年，一群北大学生，热情地围住方励之，邀他发表演讲。



照片 5 1989 年早春，在刚装修好的新居中，其乐融融，可惜几个月后被迫离家，至今不能回。



照片 6 这是方励之在大使馆时的“研究室”，桌上是一台早期的苹果电脑，可执行 Pascal 语言。电脑原属一位在大使馆工作的外交官，他有数学 Ph. D. 学位。该外交官于 1989 年 7 月奉调回国，将电脑送给方励之。该机的性能，不如方励之家里的计算机，后者被抄家的警察抄走了。虽然不够理想，但还是能用来研究宇宙学。

个太阳塔，也在树丛中，也是白色的，肃静极了，似有一种类似式的崇高。我想，在这里工作的德国天文学家一定时常想起康德的墓誌銘：

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所唤起的那种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大地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繁星密布的苍穹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因为星期日，我们没有遇到德国天文学家，只有一位看守人在。他不懂天文学，但很殷勤地领着我参观，尽管他所知地向我们介绍，包括这里的设施，工作和生活条件，也包括他告诉我们，那天文台很近的一家乡村式旅馆，是整个卡普里岛上第一流的。

当我仙在那个多雾就步时，多雾就放在树荫下，周围是草莽，还有草莽中的飞出，一位意大利朋友不无心地说：“卡普里的一切都很友善，你看，这里有許多种小动和，小昆虫，但其中没有一种是有害于人的，这里有各种草木，也没有一种是有害的。”我不由得作出了我的评价：卡普里天文台也许不具有太特别的学术价值，但它可能是最能体现天文学的精神的一个天文台了。天文学中有許多研究領域，但没有一种是有害于人的。天文学不追求世俗的虛

(CH11-257-1-5007)

世界科学出版社

第 3 页

给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用的誊清原稿手迹第 3 页

荣，不追求出名，的声势。它只追求对真理的理解，接受来自真理的直接启示。在整个科学中，天文学就是卡普里岛，纯净、崇高，令人神往。

当然，天文学并不是出世的超脱。相反，越多的理解越多的启示，就会有越多的坚定，一种用其他途径都不能获得的信念的坚定。就如同经过卡普里的风和水的洗涤之后，心中的道德律有一种升腾。当你站在卡普里的高峰——安娜峰向下看时，你会发现，原来的波浪变小了，海面成了越来越理想的平面，地底、无边、无边。整个世界上都存在着这样的理想。地底、无边、无边。这时，在你的心里，对于那些因循的赌咒，未开化的野蛮，对谎言的嗜好，对不存在崇拜，不再仅仅厌恶、轻蔑，而且有一种可惜，对愚昧的可惜。我懂得了，伽利略在喃喃地说出：地球还在转动啊。时的心境，那是一种对世间万物如此多的愚昧的可惜。一个清醒、慧，他知道地球如何运行，宇宙如何演化的人，对那些坚持原始教义的愚昧，除了可怜他之外，还能有什么呢？伽利略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但还没有完全过去。

入后，我的这些想法更强烈了。一则因为，夜的上普里，更静，更自然，你除了感到你的思想外，其他都消失

给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用的誊清原稿手迹第 4 页

了。也因与·钱伯下榻在一个位置很特别的旅馆里。旅馆在羊山的一个小巷中，巷名是K. S. 30。直译是山罗胡同。旅馆隔壁有一个拥有考究的别墅，门前有一块大理石板，上面刻着：

马与西姆·高尔基于一九一一年二月至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居住于此。

高尔基曾在我们隔壁住过近三年之久！似乎太不协调了。在我的印象中，高尔基的形象应当是在喀山的流浪鬼中，在伏尔加河的滩头中，在父母亲的红旗中。他怎么竟会在这里没有红旗、没有呐喊的卡普里山中也前流连？

其实，二者是可以协调的。使人摆脱流浪、摆脱拉纤的苦难的，主要是什？当然是那些昨天的呐喊，但并不是无知和愚昧的呐喊，更不是以“不怕流血”对自由的恫吓。给人带来美好和自由的，首先是智慧，冷静里透出理性的智慧。有什么比卡普里更能使人感受到这种智慧的呢？静的美，有什么比卡普里更能引起人们对自由天地的向往！高尔基是对的。

但更深了，卡普里已经睡去。钱盼着有机会再来卡普里。

看这海洋多么美丽，

CHINESE-CHINESE-CHINESE
世界科学出版社出版
第一版

给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用的誉清原稿手迹第5页

多么激动人的心情。
看这大自然的壮丽，
多么使人陶醉！
下一次一定要唱着这首歌归苏连托，再来享受对自由的追求！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一日记于
胡升翠·康塔梯诺山莊

给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用的誉清原稿手迹第6页

(原稿由胡升华提供)

方励之原稿手迹：对民主和安定的理解

(全文见本卷第 62 页)

对民主和安定的理解

方励之

民主和安定是社会现代化的两个标誌，是
推动经济、科学、文化发展的两个必要条件。
民主和安定一有也同，又是互为表里，或互为
因果的。一方面，只有在安定的环境下，才能
保证人人享有民主的权利，另一方面，只有在
民主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安定环境的健康与久
长。

年纪长几岁的人，容易回想过去。特别，
对“文化大革命”的记忆，不能不使人感到，
动荡的环境，是难以保证人人享有应有的民
主的。因此，心目中的顺序是：安定之中的民

主。

年轻人，则更关心未来。特别，开放所带来的信息，不能不使年轻人感到，如果缺乏民主的不断扩大，就难以保证他们所向往所追求的繁荣稳定社会的建成。因此，心目中的顺序是：民主之上的安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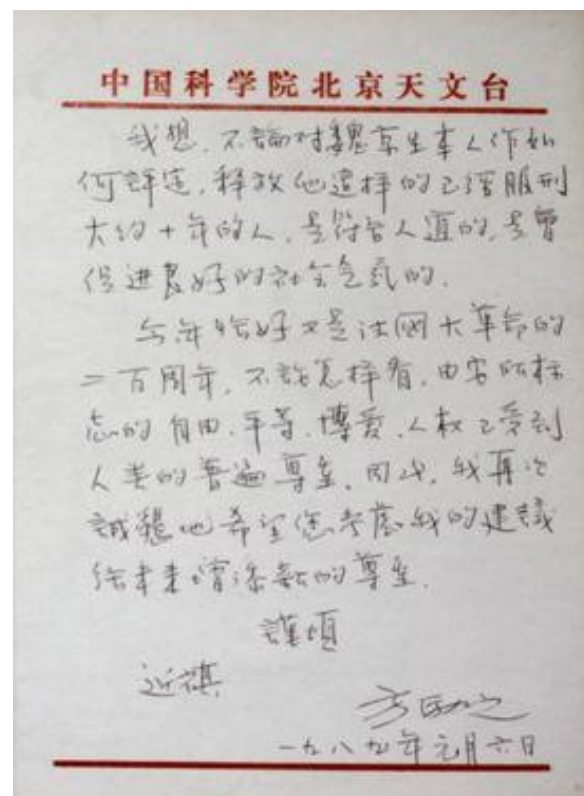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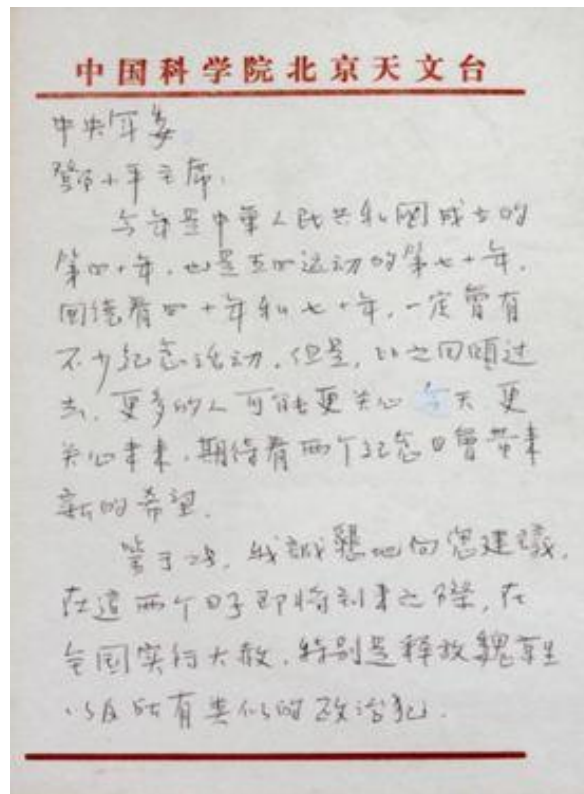
两代人之间对民主和安定这一理解上的不同侧重，也许是当前事件的一个社会认识上的原因。如果不是全部原因，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是需要两代人努力相互理解的时候了，就像民主需要安定，安定也需要民主一样！

手迹第2页

(此原稿手迹由李平瑾提供)

方励之给邓小平的亲笔信手迹

(全文见本卷第 283 页)



《方励之选集》第三卷目录

[我的祝贺——为王淦昌先生八十寿辰而作](#)

(1987 年 5 月)

[“现在还是主张科学和民主”](#) (在罗马接受香港《百姓》陆铿电话采访的报道)

(1987 年 5 月 23 日)

[方励之和温焯、明蕾的对话](#) (在罗马大学接受香港《争鸣》温、明采访)

(1987 年 6 月 18 日)

[重访卡普里](#)

(1987 年 6 月 21 日)

[马克思主义已过时了](#) (在的里雅斯特接受西德《明镜周刊》邓天诺采访)

(1987 年 6 月 21~25 日中的 3 天)

[民主改革和开放](#) (在的里雅斯特接受《信报》特约撰稿人陆铿电话采访)

(1987 年 6 月 25 日)

[我的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1987 年 7 月 5 日)

[对民主和安定的理解](#)

(1987 年 9 月 1 日)

[让中共、台湾、香港三家来竞争](#) (在北京接受台湾《自立晚报》李、徐采访)

(1987 年 9 月 15 日后, 9 月 19 日前)

[天文学思想史片断](#)

(1987 年 10 月)

宇宙为何不热死

(1988 年 1 月 10 日)

两岸竞争有好处 (在北京接受台湾《联合报》社长张作锦从美国电话采访)

(1988 年 1 月 15 日)

知识分子是受剥削最重的阶层 (在北京中科院新居接受《镜报月刊》沈琦采访的报道)

(1988 年 1 月 20 日)

给黄雨川先生的一封信

(1988 年 2 月 17 日)

“阶级斗争”是谁先提出来的？ (在北京中科院新居接受西德作家关愚谦采访的报道)

(1988 年春，2 月 4 日立春)

暴力革命必会带来暴力统治 (在北京中科院新居接受西德作家关愚谦采访)

(1988 年春，2 月 4 日立春)

我对美术的感受

(1988 年 2 月 21 前)

《方励之自选集》序

(1988 年 3 月 2 日)

《天体物理学前沿鸟瞰》序

(1988 年 3 月 17 日)

对统一的想法

(1988 年 5 月 12 日)

[两岸应先实行现代化再谈统一](#) (在香港与台湾大学王作荣教授座谈)

(1988 年 5 月)

[现代化的问题与出路](#) (在北京中科院新居中接受梁硕华采访)

(1988 年 6 月 1 日)

[李淑娴：风雨中的励之和我](#)

(1988 年 6 月 5 日)

[中国应当先有常识性的民主](#) (在北京中科院新居接受香港《镜报》林文采访)

(1988 年 7 月)

[评《爱因斯坦文集》](#)

(1988 年 8 月 7 日)

[对谈民主与改革](#) (接受叶知秋采访，结果发表在香港《信报》)

(1988 年 8 月)

[比较邓小平与毛泽东](#) (在澳大利亚接受前澳洲广播公司记者钟海伦采访)

(1988 年 8 月)

[我不再入党了](#) (在澳大利亚接受香港《争鸣》记者澳华的采访)

(1988 年 8 月 20 日)

[在香港中文大学新生辅导营与学生对话](#)

(1988 年 9 月 1 日)

[不能只看领导层的变化](#) (在香港与《争鸣》编辑部人员座谈)

(1988 年 9 月 7 日)

[大专会堂座谈会答学生问](#)

(1988 年 9 月 7 日)

[中国要解散？](#)（在香港接受《九十年代》月刊社李怡采访）

(1988 年 9 月 8 日)

[多党制可能在大陆出现](#)（在香港接受中华电视公司陈月卿电视采访的报道）

(1988 年 9 月 8 日)

[我为我说过的每一句话负责](#)（在北京家中接受台湾《联合报》驻美国记者电话采访）

(1988 年 10 月)

[悠闲自在地磨吧！](#)

(1988 年 12 月 11 日)

[爱国主义不应放在第一位](#)（接受《九十年代》记者采访）

(1989 年 1 月)

[方励之给邓小平的信](#)

(1989 年 1 月 6 日)

[《方励之自选集》\(四\)前言](#)

(1989 年 1 月 20 日)

[“第一推动”丛书总序](#)

(1989 年 1 月～2 月)

[中国的失望和希望](#)

(1989 年 2 月)

[论中国人权](#)（电话采访录音）

(1989 年 3 月 22 日)

从北京天文台看中国民主进程——纪念“五四”70年

(1989年4月4日)

李淑娴：离家

(1989年6月4日以后)

我的祝贺^[1]

我和王淦昌^[2]直接接触极少，没有过任何个人的交往，但他却是我心目中敬仰的一位长者，一位学业上的长者，一位为人上的长者。因此，当他的80寿辰这一令人高兴的日子到来的时候，我愿献上我的怀着敬仰心情的祝贺。



图1 为王淦昌祝贺80岁生日后的合影

前排左起：周培源、严济慈、王淦昌、赵忠尧、钱学森

我敬仰王先生的学业和为人。1980年初，由于中微子静质量问题的的发展，我开始研究中微子宇宙学。有一次，当我向钱临照先生谈起中微子宇宙学之后。他向我讲了一段中微子研究在中国的历史。原来，在抗日战争年代里，

钱先生曾参与主持中国的《物理学报》。有一回，编辑部收到王淦昌先生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送审之后，没有被发表，而被“退稿”处理了。过后不久，美国的《物理评论》发表了这篇文章[3]，它就是王先生那篇有名的讨论探测中微子的方案的论文。钱先生说，至今他还为《物理学报》当时未能接受该文而感到遗憾。然而，王先生对这一场曲折，却一直是坦然的、不介意的。这一段历史，不仅使我感到十分亲切，原来我今天的研究领域也有着中国前辈的贡献，而且，更使我看到王先生在对人对事上的豁达胸怀，这些，在今天也还应当是自己工作上的规范。

我敬仰王先生的正直、高尚和对后进者的关心。1985年底，我曾遭遇到某种非难，起因是自己对社会现实发了几句不能纳入“正统”的议论。这类的非难，是人人熟习的，是二三十年来“舆论一律”论下的常规。所以，非难尽管有表现的“压力”，其实是无效的，不会令人动心的。然而，在那“压力”的几天里，我的确常常地动心，这就是当悄悄地传来相识的或不相识的朋友的关心和问候的时候。有一天，一位朋友告诉我，王淦昌先生也对我的境遇表示关切。我深深地被感动了，对于与王先生并无交往的我，也得到他这样的关切，更使我感到这种关切的真挚和力量，我所敬仰的人愈加使我敬仰了。

每当心中有一丝心灰意懒的时候，常会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中微子，能量动量也许多少有一点点，但对社会却只有弱相互作用的力量。王先生的关切使我有了进一步的想。也许就单个知识分子来说，作用的确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如果大家都能像王先生那样，对于那怕是“与己无关”的事情，也明确地表示出关心和好恶，那么，知识分子的作用就会像是宇宙中的中微

子了。宇宙中的中微子，就单个来看力量是不足道的，但是只要每个中微子都具有很小的静止质量，中微子就成了宇宙中的主导成份，宇宙的命运也就决定于这些不足道者了。

愿王淦昌先生的学识、胸怀、正直、高尚和关心后进的品德，在我们这一代中传扬！

(1987 年 5 月为王淦昌先生 80 寿辰而作)

编者注释

[1] 原载《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胡济民、许良英、汪容、范岱年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 年。

[2] 王淦昌(1907 年 5 月 28 日~1998 年 12 月 10 日)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原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江苏常熟支塘镇人。1929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 年入德国柏林大学，1933 年获博士学位。1934 年 4 月回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授。

1949 年 5 月参加革命工作，197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现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九院副院长，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核学会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第三届、四届、五届、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在北京中国原子能科学院院内立有王淦昌的雕像。

[3] Kan Chang Wang (王淦昌), A suggestion on the detection of the neutrino, Phys. Rev: 1942, 61(97).

[\(返回目录\)](#)

“现在还是主张科学和民主” ——在罗马接受香港《百姓》陆铿电话采访的报道^[1]

中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教授本月 23 日在罗马接受《百姓》记者长途电话访问（香港时间晚 11 至 12 时）。

“自 1978、1979 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国家已取得了进展，人民看到了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要使改革和开放倒退是不可能的。”这是方励之教授对《百姓》记者问关于他本人对中共这次准他出国有何看法的回答。他说：“这个问题外国记者也问过我了。”

记者问他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如何？他说：“据我所知，学生的动机是支持改革和开放，目的是使国家发展得更快些。不过，我曾劝过学生不要游行。到了罗马后，外国记者问我，学生为什么现在不游行了？我的看法是，他们正在思考更好的方式促进社会的发展。”

方励之教授 5 月 13 日到达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就设在该地。14、15 两天参加了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年会。16 日到了罗马，在罗马大学物理系做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工作将在狄港和罗马两地进行，所以他说要两边跑。此次在意大利总共工作一个半月，预定 6 月底回北京。

记者问方，是否会去伦敦出席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三百周年纪念会，他说，还没有定。

记者通过意大利新闻同业的帮助，找到了方教授。据意大利同业介绍，他抵达罗马的当天就接受了意大利国家电视台的访问，当晚于新闻节目中播出。接着又接受了美国合众国际社和罗马《星期六周报》的访问。大家对他

都表示敬重。

记者告诉方励之教授，他的夫人李淑娴女士已被北大学生提名为海淀区人民代表候选人，问方有何感想？他说：“听到后很高兴。”

记者又告诉他，李远哲教授（去年诺贝尔化学奖得奖人）最近访问北大，说方励之是个很好的科学家。不过说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李说，社会改造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需要一步步努力。方表示完全同意李远哲的观点。他说：“这是一个常识性的方法论。我曾向科大的学生强调过，中国的事不能像翻烙饼式地一下子翻过来，得一步步来。”

记者问他，他的基本观点有无改变？他说：“我过去主张科学和民主，现在还是主张科学和民主。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者，深深体会到，科学需要民主，没有民主，要发展科学也是很难的。我对中国科学发展前景一直充满了信心。”

（原载香港《百姓》1987年6月）

编者注释

[1] 陆铿，号“大声”，云南保山人，生于1919年。曾任《中央日报》的副总编兼采访部主任，是资深的名记者、美国华文新闻界著名老报人，也是中国自有广播以来的第一个电台记者。“二战”时陆铿曾去欧洲进行过战地采访。他一生从事新闻，直至85岁仍然执笔书写他生平最后一本书《大记者三章》，以培养和教导新一代记者。2008年6月21日晚，旅居美国的陆铿因肺栓塞导致呼吸困难在旧金山病逝。

陆铿早年即因新闻报道开罪于蒋氏，晚年则又因采访胡耀邦而引发轩然大波。

1985年5月11日的《人民日报》以“胡耀邦会见陆铿”为标题登出短讯：

“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了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美国《华语快报》发行人陆铿及其亲属。胡耀邦就陆铿提出的广泛问题同他进行了坦率的交谈。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陆铿是应中国新闻社邀请于5月2日到达北京的。”

一年半后，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在任6年11个月。当年的中共中央8号文件中这样指出：“胡耀邦同志……不与政治局其他同志商量，就接受包藏祸心的陆铿的访问，泄漏了国家的机密，并听任陆铿肆意攻击我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本文由陆铿署名发表。此处只将原文“本刊”二字改为“《百姓》”。

[\(返回目录\)](#)

方励之和温焯、明蕾的对话

——在罗马大学接受《争鸣》温焯、明蕾采访^[1]

访问时间：1987 年 6 月 18 日上午 9 时许至 12 时许（约 3 小时）

访问地点：意大利罗马大学物理学院方励之教授办公室。

访问者：《争鸣》总编辑温焯、巴黎特约记者明蕾。

录音整理：明蕾

温焯（下称温）：方教授，我们头一次见面，事实上我们很早便认识您。您作为自然科学家，我们之间也许横亘着若干光年的距离，因为我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但您作为思想家，作为民主运动的号手，我相信我们之间的距离便缩小，甚至等于零。

我看了过去您在同济大学、北大、交大、浙大等校的演讲记录，对您提出的观点和看法十分欣赏，从全盘西化、政治改革，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问题，我都觉得您的见解很有新意。在当前中国的形势下提出这些问题和看法，我觉得对中国民主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冲击力，我们都很敬佩您。

《争鸣》杂志的读者很多，遍布五大洲，仅仅是直接订户在全世界有 60 多个国家。读者普遍认为，您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他们非常敬仰您，也很关心您目前的处境。自从您从合肥调职到北京后，人们一直担心您在人权、民主权利方面会受到限制。至于开除党籍倒没什么，海外认为是次要（在国内当然很重要，因为有了党票就有许多方便）。重要的是生活和工作方面。听说很多香港记者到北京采访，首先点名采访的对象便是您。有些记者回来后反映，他们登了您的“堂”，但您却“入”了“室”，谢绝访问，由

您的夫人接待。在我们看来，这有两种可能，一个可能是上面不许您接受访问；一个可能是您要保护自己以利再战，这是策略，无可非议。这样，在海外人士的印象中，您现在受到的压力一定很大，大家就更不放心。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对您的访问，让海外人士了解您今年以来的情况和未来的动向，包括这次当权者批准您来意大利，是不是演给海外看的一出戏。

目前处境和社会责任

对批判只有认错自由，没有反批评的自由。我没写过检讨。压力不能说没有，但我自己的感觉要比外面估计的要少……我认为科学研究同样对推动民主化有作用，会对人的价值观和方法论都有影响。

方励之（下称方）：对于我目前的处境，坦率的说，压力不能说没有，不过就我自己的感觉来说，可能比外面估计的要少一点。

温：您受到批判，这也是一种压力吧。

方：他们不叫批判，说这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只搞批评。其实批评必须有反批评的自由，当然也可以有接受批评的，这次只有认错自由。这就不是批评，而是批判。

温：您需要写检查报告吗？

方：我没有写，没有写过检讨。

温：我看过他们搞的您的言论集，是供批判用的，有没有断章取义？

方：那个大厚本的，有的部份是完整的，有的是取了讲话的一部份，《世界经济导报》的没有删掉，在科大的讲话也没有删，有一些是有所删节的。

温：有没有歪曲原意？

方：在化工学院讲话没头没尾。这本来是一个小的座谈会，不是正式的讲话，是饭后聊天时随便讲的，大概有人给录了音，但没有录别人的话，录得很不完整。

温：当时您谈的是什么？

方：内容跟交大和同济的讲话是一样的，还是讲关于党的不正之风，表示应该改造。

明蕾（下称明）：您是否感到精神上的压力不算小？

方：按照物理学的说法压力是有两方面的：一是外来的压力，二是对压力的承受力。有些人可以对压力不在乎，无所谓。我对自己有这么个看法，有些事情对我的影响不是那么大。从生活情况说，我不当副校长后反而自己工作的时间多了，事实上我最大的兴趣还是搞自己的研究工作。外界可能不知道，原来我并不愿意当副校长，我已经跟很多人说过我喜欢搞研究，不想做行政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现在更好了！

温：是“宽松”了？（方笑）

方：可能你们也了解国内那些行政工作，例如什么分房子之类，什么都要我来管……这些行政的事情实在令我头痛。然而，我在学校工作了快 30 年，对学生倾注了一份感情，而且学生的确是未来的知识分子，离开学校对我是个遗憾。当然我现在还是有一定的机会去接触同行和知识分子的，但毕竟同学生的关系不如以前了。

关于社会责任，如果我有副校长的职位，当然可以多做点事。西方的知识分子也经常想到这个问题。比方，刚刚上个星期在这儿就有知识分子讨论研究遗传学的问题，要不要研究，研究的效果是不是对生物和人类社会有破

坏性的影响。这相当于当初研究核物理时，会考虑到是不是会造成核弹对社会的破坏性。这些都可以说是社会责任问题，虽然不能说是全部的责任，但可以说是一部份责任，或者最少说明你的研究结果是对社会有责任的。我们研究天体物理的，不像研究核子或遗传学有那么直接的影响，但是天文学的研究可以引起观念性的改变，这种观念性的改变是社会的财富，需要我们向社会普及，这也是自己的社会责任。社会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的条件，我们研究出的结果应当是大家共同享受。事实上天文学研究所带来的改变在历史上可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或是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最有名的是哥白尼研究的成果对整代人智力的开发起着很大的作用，不单在智力方面，并包括整个观念方面，观念又会影响着社会方面，所以研究工作和社会是紧密接合在一起的。譬如说，宇宙的有限和无限问题，很多人都感兴趣，研究的结果会令很多人得到新的认识，会对旧的观念引起很大的冲击，对一个人整个的价值观和方法论都有影响。从这个角度说，也是一种社会责任。我之所以对学生讲那些问题，最早便是从这些观点出发的。

温：假如宇宙证实是有限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是很大的冲击，对辩证唯物论的时空无限论是一个修正，从而给人以启迪：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要重新探讨，而不能以“句句是真理”的态度去对待。

方（笑）：但是这个问题就是没有解决，我们并不能证明宇宙是无限的，当然也没有证明它是有限的，这个问题我们叫它开放问题[Open Question][2]，既然是开放问题就可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方面的结论并没有证明什么。作为天文学家，我们不会相信宇宙一定是无限的，要有证明才行，而我们至今还研究这个问题。

温：这是科学的态度。相信马克思如果还活着，也许不会反对这个研究，但胡乔木却坚决反对研究这个问题，这是典型的僵化、僵化的典型。

方：所以我们无法接受，因为这是我们的本行，根本无法接受这“观点”。

温：对您刚才所说的社会责任问题，相信一般海外人士很感兴趣，而且会给予肯定，因为这是对人类生活有很大贡献的。但是，恐怕更多人关心的是，在当前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知识分子，包括方教授，能否像过去一样起那些作用？怎样起作用？

方：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以直接地谈谈私人的看法。我觉得要广义一点看知识分子起作用的问题，而不要太狭义地看问题。从广义的说，中国的整个文化不仅需要再改造，而且要从多方面改造。当然政治是非常关键性的，有些地方的确能快速见效，但是没有一个准备也是不行的。我现在经常做的事同样是对民主化有推进作用——我的意思是说科学的问题同样对推动民主化有作用，因为我觉得科学的发展没有民主是不行的，这是很关键的一点。没有一个民主的环境和气氛，科学是不可能发展的。在西方，特别在意大利这个文艺复兴的起点，他们是民主和科学共同平行发展的。最明显的例子是伽利略，他的观点的发展和当时的意识形态是有关联的。伽利略对社会的冲击的贡献不少于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对民主的推动。

温：胡乔木之流反对搞这种研究，实质上是干预学术自由，破坏科学实践。

方：学术自由是发展科学的一个基本要求。要推动科学必定跟不赞成学术自由和不民主的观点发生冲突，而这种推动作用却是很根本的。

温：这个观点是符合实际的，从宏观的角度看，推动文化科学的发展，

加上推动经济的发展，会触动反民主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根，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根本性的实践和变革。现在的问题是，从微观的角度或政治角度着眼，该怎样办？您是不是说过人权是推动民主的基本条件，解决人权问题后便能进一步争取民主？

关于人权和民主

民主的观念在于人权，然后是民主的方法。我目前还没有具体想法，我只是看到中国的一些问题。国外有人希望组织政党，但对国内影响太少。你很难叫老一代改变看法，只有等他们死光再说。

方：是的，民主的观念在于人权，然后是民主的方法。

温：问题在于在现政权下不允许有充分的人权。

（明蕾插话：方教授以前说过这是个敏感的问题……）

方（笑）：是的，我在报告里说过这是个敏感的词汇。

温：他们不许有充分的人权，他们害怕人们享有充分的人权。他们不讲法制，这本身就是践踏人权。虽然宪法（尽管缺点很大）是摆在那儿，但很多事情他们有法不依。因此怎样能争取到人权，就成为一个大问题。

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经常说，社会主义有这个那个优越性，其中一个优越性是人民民主，比资本主义国家多百万倍的民主。但现实却是资本主义国家有一定的民主自由。这次来罗马，我就在街头到处看见意共竞选和讽刺政敌的海报，有些墙壁竟成了“红海洋”。执政党政府就是让反对党的共产党有这样的自由。难道这也是假民主假自由吗？反观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连持不同政见的人也要批要斗要整要投入黑狱，哪里说得上人权、民主、自由？

明：我们希望知道您认为有什么具体的做法可以争取到中国的人权和民主。

方：我觉得这个提法就是如何做的问题。老实说，这个如何做的问题我自己还没有真正成熟的观点，到现在一直是这样。

明：我们看过您在国内的演讲，你提的很多关于民主化的观念，得到很多人、包括学者的共鸣，他们都希望这些观念能够变成现实，但是似乎还没有人找到具体的办法，这也是由于共产党政权的特点。这不独在中国如此，纵观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国家也如此，您认为怎样可以找到一个突破口？

方：是的，这是一个我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事实上，我很多次作演讲的时候，很多学生也递条子问：“民主到底怎样才能实现？”与您现在提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也老实地对他们说，要问我怎么做、要我给中国设想一个模型，我目前还没有具体想法，我只是看到中国的一些问题。

不过我有一个想法，要达到民主，您必须用民主的方法，不能用非民主的方法。用非民主方法争取来的也不是民主。好像我说过的，上边给你的不是民主，我们要用民主的方法去争取民主，或者等他们这代人死掉，或者等民主选举之类终于实现。如果简单地把他们杀掉，最后也会走上非民主的路。我们不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温：大陆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为了改革，为了挖妨碍改革的一个根——封建主义，传播民主思想是很重要的一着。他们采取的方法可以叫作“架空法”。您在某些演讲中也提到这个办法，就是对共产党提出的意识形态上的名词照搬，但把它们“架空”，“四个坚持”我们也说“坚持”，实际上却是另搞一套。但是这不容于顽固的当权者。

您也会提议知识分子入党去改造党，但您的好意受到当权者的歪曲、抹煞，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受到批判。我相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改造党的效果会接近零。你们可以入党，一百人，一千人，甚至一万人，但是你们在缺乏民主的党内必须听家长的话。在老人党的性质不改变，家长制、一言堂体制不改变之前，你即使雄心万丈，也无能为力。除非这一百个、一千个有志之士都当了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以至常委。但我担心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有些人会腐化变质。

方：困难当然是有的。国外有人或者希望组织政党，但对国内的影响太少。否则的话，怎么做？如果说什么彻底革命的事，没有牺牲的必要，做事要讲效率和策略。当然这么做很难，确实要等时间。在物理学上也要等时间。物理学有个名词叫普朗克效应，现在这普朗克效应是社会上的。普朗克是提出 20 世纪新观念量子论的第一位德国人，他说过一句话：“现在大家都主张新的观念量子论，原因是老人都死光了。”对于这个，物理学家都叫它作普朗克效应，实际上对社会也很适合。你很难叫老一代改变他们的看法，只有应用普朗克效应，等他们死光。

关于学生运动

我认为否定学生运动意义是不对的，害怕学运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学生运动绝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们动机是支持改革的，行动是符合宪法的。特别是合肥游行，事先通知了公安局，一切合法。

温：几个月前全国规模的学生运动，应该是争取民主的无可非议的行动。海外有人说学生运动“帮了倒忙”，“乱了改革派的阵脚”，“导致胡耀邦下台”，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一般群众运动都可能同时具有正面的和负面的后果。学生运动揭露了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表达了支持改革、要求彻底改革的意志，对人民的进一步觉醒，以及激发同官僚主义，专制主义斗争的勇气，都起了催化作用，其影响是深远的。这个正面效果远远超过了负面效果。保守力量借机倒胡，但这是迟早一定发生的事，而从此保守派面目尽露，这对他们是很不利的。保守力量把学生运动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百分之百的诬蔑。

方：我也认为否定学生运动意义的看法是不对的，这次学生运动是用民主的方法去争取民主，当然不一定说要上街，我一开始也劝他们不要去游行。但是他们的游行是合法的。学生运动绝对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既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定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那学生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学生是游行嘛！怎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游行是要求更好地执行选举法，我觉得这从动机到行动都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的动机是好的，是支持改革的，行动是符合宪法的。特别是合肥游行，事先通知了公安局，一切合法。

明：您在鼓励学生争取民主方面作了很多努力，科大的选举经验是很先进的。您在中国各地大学向学生发表的演讲中都贯彻了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思想，席卷全国的学运受到这种思想推动，成为声势浩大的学生民主运动，您事前有想到这个效果吗？

方：学生民主运动不单是受我一个人的言论影响，也有其他人和社会因素，不过它发展的迅速和规模庞大，确实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温：学生运动一起来，中共某些大人物就害怕得要死。

方：这是没有信心的表现。

温：把学运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是捏造罪名。什么是反党？什么是反社会主义？没有界定，也不可能界定。连什么是社会主义还在研究阶段，怎能随便把“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强扣在别人头上？！

关于“四个坚持”

问题是要坚持的事并没有坚持，譬如说四个坚持，或者是三个半坚持（因为毛泽东思想本身值得讨论），是否按马克思主义去做？巴黎公社原则是普遍选举制，但我们一直没有实行普选。

方：从理论上说，什么叫资本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我们国家那些理论家也没有清楚地搞好这定义。

温：1980年我曾写过对社会主义要提探讨而不要提坚持的文章，我主张把“四个坚持”改为“四个探讨”（方大笑），中共大人物为此大动肝火，马上打击《争鸣》，想方设法把这个小刊物捏死。全国性党报还制造借口向我点名攻击，中共中央还批发了广东省委对我点名污蔑的文件。最近中共中央第11号文件再一次说《争鸣》“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其实我从小就迷信社会主义，并且要投身社会主义事业中去。

方：那我们都是一样了。

温：我从不反对理想中的或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只是提出要探讨。因为在错误的时间搞错误的“社会主义”是失败了，必须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重新探讨，找出正确的通向理想国的道路。但他们提的“四个坚持”实际上是坚持错误，坚持封建，坚持专制，坚持教条。

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搞什么党领导一切、以公有制为主、计划经济为

主的、“社会主义”是错误的，但还要坚持搞下去，就是坚持错误。

搞什么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一党专政），事实上就是坚持封建，坚持专制。

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里面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他们实用主义地坚持（有些正确原则却不去做），往往流于坚持教条。

我曾经担心“四个坚持”会被使用为四条棍子，而不幸地果然成为现实。

方：我在报告里也这么提出过：到底这 30 年搞的是不是社会主义？因为如果你的社会主义是理想的，大家都愿意，那我不反对，问题是怎么去做。譬如说四个坚持，或者是三个半坚持（因为毛泽东思想本身值得讨论），到底又是怎样做？是否按着马克思主义做？马克思主义中有一条是普遍选举制，这是巴黎公社原则，我和学生都谈过这个问题。现在是基层选举，不普选，按步做。但总应该走到直接选举，对吗？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原则，你要坚持吗？如果要坚持的话便要做。问题是要坚持的事并没有坚持，这是谁不坚持呢？这种角度还可以往前推几步。

温：科学实验有成功也有失败，是不是？相信这里有一个主观努力的问题，还有一个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是否统一、科学家有没有按照客观规律和科学法则去工作的问题。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社会主义是一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实验，也可以说是社会科学实验。但和失败的自然科学实验一样，这个社会科学试验失败了。我认为现在是共产党人宣告这个试验失败的时候。如果说中国只搞了 30 多年，未能定论，那么苏联搞了 70 年，难道还不可以下结论？苏联的经验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违反客观规律去搞社会主义，只能搞出个鬼样子，跟北欧、西欧、南欧、美国、日本相比，除了武

力和军事科学之外，有什么优势？有什么“优越性”？共产党人老不承认自己的实验已经失败，还要继续下去，不知他们的心态是怎样的！究竟是迷信马克思主义还是迷恋自己手上的权力或面子？我想应该是后者。马克思主义认为搞社会主义有一个前提的，就是社会生产力水平很高很高。他们歪曲了、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观点，不肯修正错误，一直要坚持下去，这给人类（至少一半左右）造成多大的损害！

关于社会主义

在中国，人们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理想社会，但问题出在实践上。其实北欧是最典型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国家。我犯了马可波罗式的错误。当年马可波罗介绍东方见闻，而我是介绍西方的 ABC，同样被斥责。

方：我想这个所谓“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很多人都有的。好像西方有些总统要承认自己犯错误也是很难的。但是在民主化的国家对改正错误有保证，如果他真的犯错误，可以把他换掉。如果某个政党做得不成功，也可换掉。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民主是很关键的一步。现在大家争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这个原则还是好的，只是做得不好，对这方面当然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关于“社会主义”这个词汇大家的理解不一样。在中国，大家经常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理想社会，是个完美的[Perfect]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失业，生活水平很高的社会，如果这样理解当然谁也不会反对这个原则。问题出在实践上。是不是能够实践，或者实践出来后是什么样的社会，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到底什么叫失败呢？如果您要跟他们辩论，他们可以说我们的原则怎么会失败，人人都赞成了，只能说没有做好，而不是原则不好。

明：但是原则有时是很危险的，好像毛泽东的理想社会主义，要把全中国人民尽快带进一个他主观地空想出来的理想社会去，让全体人民为他的原则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他不承认失败而只是说做得不好，那全体人民也要坚持蛮干下去，这是很危险的原则。

方（笑）：是的，就是这样了，因此我们先要知道应该讨论什么问题，这就是我们这样走或是那样走才是对的。更具体地说，我们 30 年所走的道路是不是行的，或是，大家是否都愿意到理想社会去？我想，谁不愿意到理想社会去！

温：我去过 20 多个国家，如果有人问我，社会主义究竟在哪里？我的回答是：在西方先进国家，比较容易找到社会主义因素，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却很难找到。

方：我也有——这个感觉。

温：美国被称为“头号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它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当然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北欧和西德等国，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高，福利好，如果邓小平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对的，就应当承认这些富国的社会主义因素。

方：北欧是最典型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国家。我在这儿和一些越南人谈过，他们说如果我们越南是社会主义的话，瑞典便是共产主义！

温（笑）：真是非常先进。越落后的国家越要搞共产主义。

一提起这个我便马上想起波尔布特，他搞的没有钞票、没有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在“共产世界”中走在前头，不过碰历史的墙壁也碰得最厉害。跟这些唐吉珂德式的盲动主义者辩论是没有用的，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

他们实在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原则。落后的、封建的国家以至资本主义并不高度发展的国家，要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充其量只能搞出封建官僚社会主义，穿着共产党、共产主义外衣的统治阶级，代替了封建阶级、资产阶级，这个被吉拉斯称为“新阶级”的统治阶级实际上是官僚资产阶级。在他们的统治下，经济的发展很有限度，政治的民主化更说不上。中共大人物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要搞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要开历史倒车”。但事实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比乱搞的“社会主义”优越得多。香港比大陆，西柏林比东柏林，从历史角度看，究竟谁进步，谁“开倒车”？

方：有些人问我犯了什么错误，我说犯了马可波罗式的错误。马可波罗当时把东方所见的东西在意大利写成一本《东方见闻录》，后来被人骂是胡说，哪来这些事，谁都不相信他。其实我回国只是介绍了这儿（西方）的 ABC，是些生活的感受而已。他们就说是胡说八道，哪有这样的东西！现在很多人还不知道西方，还相信马克思所说的时代。

温：是的，那是 19 世纪的英国。现在有些人到了欧美国家，看到一些街头露宿者便夸大这个阴暗面。

方：他们有些是非法移民，不是当地的工人，当地政府也不好轰他们，其实是人道的。

关于“全盘西化”

我是欣赏“全盘西化”，即是“全方位开放”，并不是说连鼻子也是高高的好。我曾说过不一定要枪杆子干革命。以波兰团结工会为例，波兰朋友说，如果不是苏联的影响，波兰早就变了。

温：情况实在很清楚，不是条条大路都可通罗马，有些道路罗马会向你关门，就像理想社会向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门一样。我注意到一件事，中共虽不承认搞错了社会主义，更不承认“社会主义”使中国陷入了死胡同，但也像东欧一些国家（后来苏联也跟上来）一样，提出了改革，不过如果经济改革只是把小鸟笼经济改成大鸟笼经济，如果只搞经改不搞政改，如果所谓政治改革不是实现真正的政治民主化，这样的改革，虽有一定效果，但我相信不能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迅速富裕起来，不能拉近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现在搞中国式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各方面都遇到很多矛盾，这些矛盾都很难解决。在经济方面，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矛盾怎么能够解决呢？科学家发明了各种万能胶，但是没有一种能把这两种经济粘合起来。（方笑）我访问了东欧国家五次（其中匈牙利去了四次、南斯拉夫去了两次），除了阿尔巴尼亚外其他国家都观察过了，我发现所有这些国家在经济上都有许多矛盾和弊病，包括生产起起伏伏、物价不断高涨、工资相对下降、劳动生产率低、外贸经常逆差、外债负荷过重、外汇储备日减等等。南斯拉夫自由经济比较活跃，但是许多问题解决不了；匈牙利是两种经济结合，但是搞来搞去都搞不好。中国现在要搞两种经济混合，最多只能像匈牙利一样。那么匈牙利是不是就是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我认为不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的矛盾更大。一党终身制（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这个词）即共产党永远执政，这体制跟人民民主之间的矛盾永远解决不了。

在意识形态上，大约十天前我看到薄一波一次讲话的报导，他解释什么叫开放，真是怪论。他说开放就是引进外资，那就是向外面要钱！他唯恐除

了钱之外，还有其他的東西，如西方的文化、艺术、意识形态引进来。这是不能解决的矛盾。我想假如按照僵化的观念去进行改革，是走不出死胡同的，最后只能把中国变成匈牙利化，或者是匈牙利加南斯拉夫化，如此而已，不可能再往理想国前进。这是一条永远到不了理想国的道路，所以我对这样的改革虽然不反对，但不寄予厚望。

但是，对于另外一种改革，即彻底的改革，也就是您欣赏的“全盘西化”却是历史的正途。您说的“全盘西化”，是要全方位开放，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接受外来的冲击。您还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旧的东西，假如是好的，当然要保留下来，不好的就不要。”我觉得这样很对，这是一个按照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的做法。他们都是以主观主义、主观随意性，片面地、形而上学地思考问题的，都不科学。现在我想起了陈独秀。对于这个中共第一代领袖人物不能完全肯定，也不能完全否定。他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一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我想，他当年的这个构思和主张，原则上是对的。后来毛泽东批判了这个两步论，而提出“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步论却是错误的，既违反社会发展的客观法则，也和马克思的基本观点背道而驰。现在要使中国从死胡同走出来，全方位开放的确是一个好方法。但是，共产党人是不允许全盘西化的，他们还把您的“全盘西化”论歪曲了，把您的观点和过去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之间划个等号，说成是中国的什么东西都不要，外来的什么都好。

方（笑）：说连鼻子也是高高的好。

温：对您的“全方位开放”主张，我认为“老一辈革命家”不能接受，第三梯队上去的人也不能接受。您曾经说过不需要用枪杆子干革命吗？我很

赞成和平演变（方笑）。但是您一步一步地搞，走不了几步，他们便要您煞车、倒退，这便接触到革命的问题。当然革命也不一定要枪杆子。

明：波兰团结工会便是个很好的例子。

方：波兰的问题不一样，在这里认识一位波兰人，他经常跟我讨论这些问题。波兰的问题主要是苏联的影响。如果没有苏联干预，肯定一下子就可改变政制。他们现在的地下刊物之类很活跃，很受社会欢迎，禁也禁不了。我们常常说中国缺乏民主素养，波兰却不缺乏。

温：前年我旅行波兰，华沙一群士兵打起团结工会的手势向我致意，可见团结工会运动很得人心。我同意，如果不是苏联干预，瓦文萨他们（甚至是瓦文萨的前一代）早就取得胜利了。不单是波兰，还有匈牙利，1956年由纳吉领导的大改革运动终于失败，也是因为苏联军事干预的结果。五年前我在巴黎和捷克的流亡作家梯格利谈过，他告诉我，假如不是苏联干预的话，捷克一个晚上便会改变制度。

关于改革前景

中国现在要发展科学、发展生产，必然要改革。这样理解的话，改革是有意义的。我对前景还没有完全失望，反复总是会有的，需很长的时间。如果中国改革搞得好的话，其影响不亚于革命。

方：至于刚才温先生提到的改革到此为止的问题，我觉得改革这个词最早是出现在西方，他们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这个影响绝不亚于革命。当时文艺复兴有三方面，第一便是科学，由科学走向民主。我想这是一个历史，宗教改革并不一定比革命要小，但一定要真正地了解宗教改革，而不是只要

外资便是改革。虽然当时的改革只在宗教范围内，但是在这个影响下，当时整个社会的观念和价值有很大的改变。这样对比历史，我认为如果改革搞得好的话，和四百年前这里的宗教改革可能是一样的意义。中国现在要发展科学、发展工业，同样要改革。这样去理解的话，改革的意义是有的，并不一定是停止[Stop]。我的看法还不悲观到温先生看法的地步。从更长的历史来看的话，可能一个阶段只能做这一步事情，特别是中国现在。

温：刚才我说的停，并不是说人民要停，人民要求改革是永远的。问题是当权的到了一定程度便煞住。不要说全方位，就算意识形态上稍微开放一点，突然就来一个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便停了。这几年，就是放一阵，收一阵，又放一阵……

方：是这样，我想反复总是会有有的。例如在西方的宗教改革，赞成改革的加尔文后来也是很专制的，他在日内瓦是非常的专制，他开始时赞成改革但后来却制止了。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背景。

温：对，恐怕至少要几个年代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由于不断有反复，结论便是我们要忍受相当长的时间。表面看来东欧有苏联的干预，中国却没有。因此中国的问题没有东欧那么复杂。但事实上，中国却有来自自己国土上的干预，这比苏联干预更可怕。苏联坦克开进来，中国人可以马上反击，但来自自己国土上的干预，包括专制的体制和无数秘密警察，真难呵！

明：刚才方教授讲到知识分子问题。从您的演讲报告中可看到您认为知识分子是历史前进的主导力量，但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只是占很少数，不足以构成一股社会和经济的力量，您想过知识分子应该和工人结合起来行动

吗？

关于知识分子力量

现在知识分子有了可以不说话、不表态的自由。他们思想是独立的，虽然在政治经济上没有力量，但慢慢社会的背景会变化，必然会形成一股力量。现在如有知识分子搞工人运动，命运是非常危险的。

方：我想主导就是主导，没法再进一步解释，大概中国的概念是……当然这概念不一定是特别严格的，就等于是说他们（知识分子）是起了主要的作用。我想中国工农还是占大多数，应该关心他们。如果说知识分子形成力量的话，是会慢慢发展的。但是有人非常害怕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如果有知识分子在工人群众中间搞工人运动，他的命运是非常危险的。

温：我非常赞同您对知识分子的看法。目前生产力的发展，最先进的代表不是工人，不是农民，而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科学技术和知识的化身，他们本身代表了科学技术这个伟大和尖端的生产力。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迫切要求改革、要求政改与经改同步进行，他们虽然很难有所作为，但毕竟和过去有分别。对于专制主义、反资运动，他们不但心里不服，连口也不服。现在新的发展已经不是过去的“口服心不服”，而是心不服口也不服。可以说这是一种进步，不小的进步。当然，当前的改革需要知识分子有新的突破，虽然困难是不小的。

方：我想不是绝对没有路可走的。温先生刚才说了，知识分子以前是口服心不服，事实上是说假话，因为都要表态。现在已经到了假话不愿说了，或者说中国人已经有了不说话的自由。原来是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你必须说

话。在文化大革命中，你不表态就斗你，要表态就得说话，现在可以不表态，不说话。

明：也就是说以前你对政治无兴趣，政治却对你有兴趣，现在可以有对政治无兴趣的自由。

温：现在有沉默的自由。

方：刚才说过现在知识分子的情况有了进步，可以不说话。但尖锐一点的还是想说话（当然不是说假话），例如我便想说话，也有一些人也想说话。一些知识分子虽然不说话，但思想上是独立的，虽然在政治和经济上没有力量，但慢慢社会的背景会变化，必然会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力量。中国知识分子很少经商或办企业，我想慢慢会有一批，特别年轻一代，我就发现他们并不看轻这一方面，而且很多人愿意干。这种企业也是独立的，这样慢慢独立起来，在经济上也将有一批独立的力量，那时社会背景就会更近乎变了。现在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是独立的，尽管有时不愿意说，但是经济上他没有力量，不过，慢慢的将会从舆论、从思想乃至经济越来越独立。我想社会民主化是一个必定的进程，就像西方一样，他们是出来一批所谓第三等级，当时贵族那些第三等级，实际上就是一批企业家。如果有一部份人成为企业上经济上独立的人，我想这将会变成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温：不过这些企业家富到一定程度，情况就……

方：这就像欧洲历史一样，不让第三等级富起来（笑），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你是想不让他富也不行了。

温：新的资产阶级（非官僚资产阶级）的出现，对中国只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经过真正的改革，经过经济结构上的变化，从一批知识分子转化

过去的企业家群体，会成为一股政治经济的力量，并将排除各种阻力，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这也许是中国希望，走出死胡同的希望。另一方面，全国人民已经觉醒，而且必然进一步觉醒，他们任由别人摆布的时代会逐渐过去，这是中国命运能够转机的保证。从长远看，我还是乐观而不是悲观的。

明：在这个变化包括民主化的进程中，海外“中国之春”组织会担当一个什么角色？

方：我不赞同“中国之春”的做法。他们同执政方面正面冲突。

温：把您这次谈话和过去您的演讲相比，我没有发觉您的基本观点有什么变化，是吗？

关于反资运动和倒胡

不论从改革派或保守派方面看，倒胡都是错了，反资运动也有正面作用，它使保守名誉扫地。人们能更清楚地看到制度的实质，非下更大决心改革不可。我的观点不变，只是不再过份乐观。

方：只有一点变化，就是过去对形势的估计太乐观了。前几年我说过，现在中国已经到了“东风吹，战鼓擂，现在谁也不怕谁”的地步，实际上这地步还没有到。

温：海外人士对胡耀邦被迫下台感到很惊讶。老人党贬了胡的总书记职，在海外非常不得人心，国内也这么说。胡耀邦在台上时不见得有高的威信，但是下台后威信却非常之高。这说明人们对老人党、对保守派是持反对态度的。

方：对于胡耀邦的事情，国内的看法和海外是一样的。大家原来对他请

那三千个日本人来，都很有意见，现在觉得这事当然办得不对，但觉得这是小事情，是小事了（笑）。

温：原谅他了。

方：对，这是小事情，他在大的政治问题上还是……

温：最高决策人难道不知道把胡耀邦打下去，改革的力量就削弱了吗？

方：是啊，反正国内的看法，是不论从哪派来看，从改革来看还是从保守来看，怎么说，这个事情都是做错了。大家的意思是说，左中右三派都认为这事情做错了（笑）。

温：保守派还没有想到……

方：保守派就是那几个了。稍微有一点保守观念的人，也认为这样做反而使保守的威信一下子就没了，名誉扫地了。

温：保守力量搞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海内外也很不得人心。这个运动显然冲击了改革。

方：不过也有它正面的作用，它帮助学生们更清楚地看到制度的实质，不能太乐观，它帮助改革派人士下更大决心去进行政治改革；它让那些原来对改革觉得不是那么迫切的人，现在感到非改革不行。

温：这观点是科学的，辩证的。让保守力量出来尽情表演，他们就作了反面教员，有好处。

方：对，大家看清楚了中国社会不简单，看清楚中国必须得改，按照现在去发展，不行，非让你下决心搞改革不可。

温：对于中共内部的改革派——不管是谁，只要他搞改革，搞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即使不是那么彻底，我们也应该支持他。

方：对。

明：您目前还是不是合肥的区人民代表？

方：不是。选举法里面有这么一条，到了另一个地方，原来地区的代表资格就取消。

温：您离开合肥后，科大学生一直惦念着您，他们对您很有感情。

方：我对他们也有感情。

温：《动向》二月号首次发表过今年一月群众在合肥到北京铁道线上对您一送一迎的消息，但又听说您在这之前去了北京，一直没有回合肥，我想趁这个机会核实一下。

方：这消息有一部份是误传。当时学生是要送我，但是我已经走了，就是发表那公告之前我就已经走掉了，叫我开一个学术会议，去了之后，就通知我不要回合肥了，我再没有回去过。那天只有管惟炎上京，不过标语上也有说是送我的。管惟炎也没有送到，管买了火车票，但当局用小汽车把他送到蚌埠，坐杭州——北京的火车到北京。学生去送我们两个人，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北京市还有好多人去接车，那天北京火车站非常紧张，但群众也没有接到，因为不是那班车。

关于方励之夫妇动向

我夫人原来就比我厉害。1958年她当了“右派”，我不是，两人都被开除党籍。现在她仍是党员。我不做“萨哈罗夫”，他是孤立的，而我每天都收到四面八方的来信。官方没批准我去英国开会。国内需要我，我不会留在外国。

明：您夫人在北大当选人民代表的事情您一定知道了，她在有官方人员在场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现得很好，相信您也知道了吧？

方：她跟我在电话里说过。

温（笑）：她的形象并不比你低一点点。

方：对，她原来就是比我什么的，她在作学生时比我厉害，我们是同班同学，她比我厉害，她所以当右派，我没有当上。

明：她招待记者以后，您跟她通过电话吗？

方：我跟她通过话。

温：她是中国先进妇女的代表人物，是一面旗帜。她当右派时对你冲击大了吧！

方：对，她戴了右派帽子，我没有戴，我是开除党籍，她也开除党籍（温插话：你是不是不叫“右派”的右派？）我是开除党籍的这样的右派（笑）。

明：您夫人是什么时候摘帽的？

方：她摘帽还算早，1959年就摘了。1979年我们都恢复党籍了。

温：您离开那一段党的生活了。不过，您的夫人还是党员……

方：她现在还是党员。

温：那很好（笑），她会给你方便（方笑）。

明：一些外国人称您是“中国的萨哈罗夫”，您有什么意见？

方：我不做萨哈罗夫。他是孤立的，和我的情况不一样。自从我被开除党籍后，我收到四面八方、各个阶层的许多来信，人们都向我表示……

明：如果海外有人请您留下来……

方：不，国内需要我，我不会留在外边。

明：英国剑桥大学邀请您参加“牛顿万有引力理论发表三百周年纪念会”，还有美国加州大学……你会应邀而去吗？

方：没有批准。

温：希望您回国后再有机会出访外国。

方：（笑）

温：您是中国觉悟性最高的知识分子的旗帜，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相信您会坚持为科学事业及民主事业献身。在目前政治低气压的情况下您接受了我们的访问，我们感到特别可贵，也使我们，使海外人士，加深对您了解。您非常坚强，没有改变您原来的正确观点，方励之还是方励之，这对于海外人士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我代表《争鸣》、《动向》杂志全体工作人员再一次向您表示敬意，并请代向李淑娴教授问好。对您接受访问，我们衷心感谢！

（原载《争鸣》1987年7月）

编者注释

[1] 《争鸣》创刊于1977年11月1日，总编辑温辉，总部位于香港的杂志。一年后温辉又创办《动向》，这两份姊妹刊物分别于每月1日及15日出版。本文由明蕾署名发表。编者只将“本刊”二字改为“《争鸣》”。

早年的《争鸣》与《动向》均可进入中国大陆，但三中全会后，因温辉对中国大陆的批判（如批邓小平的《评四个坚持》）导致中国大陆的封杀，从此不能进入大陆。

[2] 方括号内的外文为作者所括。

[\(返回目录\)](#)

重访卡普里

卡普里是那不勒斯海湾中的一个小岛。在意大利人心目中的卡普里，也许就像中国人心目中的世外桃源，自然、幽静、没有尘世的污染。



图 1 意大利的卡普里小岛一角 [1]

我两次访问过卡普里，一次是 1983 年，一次是 1987 年。

1983 年的初访，目的纯粹是旅游。那次观光，原本只限于那不勒斯。两天里我们几乎走遍了整个那不勒斯的名胜。从那不勒斯王国时代的宫廷、歌剧院，到托马斯·阿奎那撰著《神学大全》的修道院，到维苏威火山脚下的废城庞培……许多人就此尽了兴，决定结束旅游，返回罗马。但一些人执意再去卡普里。我就属于后者。当时我之所以这样选择，可能是下意识地感到精神需要平衡。因为看了许多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东西之后，不免令人

紧张，哪怕那些东西都只是古代纷争的遗迹。为了寻求紧张之后的松弛，我们来到了卡普里。

卡普里的气氛，的确完全不同了，虽然它距那不勒斯港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船程。这里没有黑黑如血迹的古堡，没有太大太沉重的十字架，没有庞培的疯狂的淫逸，没有总是俯视你的刀剑出鞘的英雄雕像。这里只有风、水和阳光，只有阳光之下彩色的帆，静静的，似动不动。一切声响都隐退了，甚至游客也不再多说，似乎不忍用任何声音去打扰这透明的空气。只有浪的节拍和着远处的歌。隔海隐约可见的一片红房绿树，就是苏莲托，就是《我的太阳》、《桑塔露齐亚》的故乡。



图2 远望苏莲托，就是《我的太阳》、《桑塔露齐亚》的故乡。

1987年再访卡普里，并不是为了寻求平衡。虽然，按时间说，这也恰是在太多的意识形态“观光”之后，而且是当代的意识形态“观光”。我们来到卡普里，是为了天文学。原来，卡普里岛上有一个很小的天文台，是研究太阳的，因为这里的太阳更明亮，也更容易看清它的明亮中的黑斑。天文台属

于德国天文学家。由于管理上的不便，德国人准备关掉这个天文台，卖掉它所属的地产。意大利教育部有意买下它，为此，先请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评价一下这个天文台。作为该中心的成员之一，我参加了这一评价。

卡普里天文台，像卡普里的整个环境一样，小巧、精致、引人玩赏，它没有高大的望远镜圆顶，也并不设在山颠。它就在一座临海的别墅中。同周围的别墅一样，有很大的树林、草地、和散在其中的白色小楼。天文台有一个太阳塔，也在树丛中，也是白色的。肃静极了，似有一种墓地式的崇高。我想，在这里工作的德国天文学家一定时常想起康德的墓志铭：

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所唤起的那种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大地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繁星密布的苍穹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图 3 坐落于意大利著名的度假胜地卡普里，占地 5 英亩的这栋优雅小屋其前身是一座天文台，坐享优美的阿马尔菲海南、地中海美景。

通过设计改造，将这栋研究实验室转换成了私人的生活空间。

因为是假日，我们没有遇到德国天文学家，只有一位看守人在。他不懂

天文学，但很殷勤地领着我们参观，尽他所知地向我们介绍，包括这里的设施、工作和生活条件，也包括他告诉我们距天文台很近的一家乡村式餐馆，是整个卡普里岛上第一流的。

当我们在那个餐馆就餐时，餐桌就放在树阴下，周围是草丛，还有草丛中的飞虫。一位意大利朋友不经心地说：“卡普里的一切都很友善，你看，这里有许多种小动物、小飞虫，但其中没有一种是为害于人的，这里有各种草木，也没有一种是有毒的。”我不由得做出了我的评价：卡普里天文台也许不具有太特别的学术价值，但它可能是最能体现天文学精神的一个天文台了。天文学中有许多研究领域，但没有一种是为害于人的。天文学不追求市俗的虚荣，不追求咄咄的声势。它只追求对苍穹的理解，接受来自苍穹的直接的启示。在整个科学中，天文学就是卡普里岛，洁净、高尚、令人神往。

当然，天文学并不是出世的超脱，相反，越多的理解，越多的启示，就会有越多的坚定，一种用其他途径都不能获得的信念的坚定。就如同经过卡普里的风和水洗涤之后，心中的道德律会有一种升腾。当你站在卡普里的最高峰沙来罗峰[2]向下看时，你会发现，原来的波浪变小了。海面成了越来越理想的平面，坦荡、无边。是啊！整个世界都应当是这样的理想、坦荡、无边。这时，在你的心里，对于那些图腾的赌咒、未开化的野蛮、对谎言的嗜好、对不存在的崇拜，不再仅仅是厌恶、鄙弃，而且有一种可怜，对愚昧的可怜。我懂得了，伽利略在喃喃地说出“地球还在转动啊”时的心境，那是一种对世间还充满如此多的愚昧的可怜。一个清清楚楚地知道地球如何运行、宇宙如何演化的人，对那些坚持原始教义的愚昧，除了可怜他们之外，还能有什么呢？伽利略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但还没有完全过去。

入夜，我的这些想法更强烈了。一则因为，夜的卡普里,更静，更自然，你除了感到你的思想外，其他都消失了。也因为，我们下榻在一个位置很特别的旅馆里。旅馆在半山的一个小巷中，巷名是 Via Mulo，直译是山骡胡同。旅馆隔壁有一个相当考究的别墅，门前有一块大理石板，上面刻着：

马克西姆·高尔基于 1911 年 2 月至 1913 年 11 月居住于此。



图 4 卡普里的山骡胡同[via mulo]，A 是该胡同路上的一个旅馆

高尔基曾在我们隔壁住过三年之久！似乎太不协调了。在我的印象中，高尔基的形象应当总是在喀山的流浪儿中，在伏尔加河的纤夫中，在《母亲》的红旗中。他怎么竟也会在这没有红旗、没有呐喊的卡普里山水中流连？

其实，二者是可以协调的。使人摆脱流浪、摆脱拉纤的苦难的，主要是什么？当然有那些昨天的呐喊，但并不是无知和愚昧的呐喊，更不是以“不怕流血”对自由的恫吓。给人类带来美好和自由的，首先是智慧，冷静里透出理性的智慧。有什么比卡普里更能使人感受到这种智慧的冷静的美！有什

么比卡普里更能引起人们对自由天地的向往！高尔基是对的。

夜更深了，卡普里已经睡去。我盼着有机会再来卡普里。

看这海洋多么美丽，
多么激动人的心情。
看这大自然的光辉，
多么使人陶醉！

下一次一定要唱着这首《重归苏莲托》，再来享受对自由的追求！

重 归 苏 莲 托

1=G $\frac{3}{4}$
稍慢

[意]库尔蒂斯 词曲

6 7 1 2 3 1 | 3 3 - | 2 3 4 2 4 2 | 6 6 - |
看,这海洋多么美丽! 多么激动人的心情!

6 7 1 7 6 7 | 3 3 - | 2 3 2 1 7 1 | 6 - - |
看,这大自然的风景, 多么使人陶醉!

转1=E

1 7 5 6 7 5 | 6 6 - | 7 6 5 6 7 5 | 6 6 - |
看,这山坡旁的果园, 长满黄金般的蜜柑,

3 4 5 3 2 1 | 4 4 - | 5 6 7 6 5 7 | 3 - - |
到处散发芳香, 到处充满温暖。

1 7 5 6 7 5 | 6 6 - | 2 1 7 1 2 7 | 1 1 - |
可是你对我说“再见” 永远抛弃你的爱人,

1 2 3 2 1 2 | 5 5 - | 4 5 4 3 2 3 | 1 - 0 |
永远离开你的家乡, 你真忍心不回来?

1 2 7. 6 | 1 - - | 0 7 1 2 7 6 | 5 5 - |
请别抛弃我, 别使我再受痛苦!

4 6 1. 1 | 3. 2 1 | 1 2 7. 7 | 1 - 0 ||
重 归 苏 莲 托 你 回 来 吧!

图 5 重归苏莲托

1987 年 6 月 21 日

记完于翡冷翠[3]，康塔梯诺山庄

编者注释

- [1] 所有图取自互联网，天文台的照片 2012 年 4 月 9 日贴于 lp 地标网。
- [2] 意大利原文为 Monte Solaro, 国内现翻译为索拉罗山。
- [3] 据李淑娴告诉此为原译名，现译为“佛罗伦萨”，意大利原文 Firenze。

[\(返回目录\)](#)

马克思主义已过时了^[1]

——在的里雅斯特接受西德《明镜周刊》邓天诺采访^[2]

DER SPIEGEL 31/1987



Betr.: China

Datum: 27. Juli 1987

Die herrschende kommunistische Partei "hat in den letzten 30 Jahren nichts Gutes geleistet"; der Marxismus "ist wie ein abgetragenes Kleid, das man ablegen muß"; ohne umfassende Demokratisierung "hat China keine Zukunft" - starke Worte des "chinesischen Sacharow", Fang Lizhi, in einem SPIEGEL-Gespräch.

Der Astrophysiker und Regimekritiker, Idol der chinesischen Studenten, die um die Jahreswende in fast allen Großstädten der Volksrepublik für mehr Demokratie rebellierten, durfte trotz seines Parteiausschlusses jetzt an einem Physiker-Seminar in Triest teilnehmen. Dort traf ihn Tiziano Terzani, SPIEGEL-Korrespondent in Tokio, der aus früheren Pekinger Korrespondententagen mit Fang befreundet ist. Er erfüllte den Wunsch des bekennermutigen Wissenschaftlers, ihn zu einem Galilei-Denkmal (in Padua) zu führen; drei Tage war Fang Gast in Terzanis toskanischem Landhaus.

Im SPIEGEL-Gespräch äußerte sich der Professor, von dem Reden auf Tonbandkassetten unter Chinas Studenten zirkulieren, so systemkritisch wie vor ihm öffentlich noch kein anderer chinesischer Dissident: "Es genügt nicht, ein paar große Computer einzukaufen. Um uns wirklich zu modernisieren, müssen wir den Geist der westlichen Wissenschaft in China einführen" (Seite 102).

图 1 德国《明镜周刊》1987 年第 31 期关于采访方励之情况的报道^[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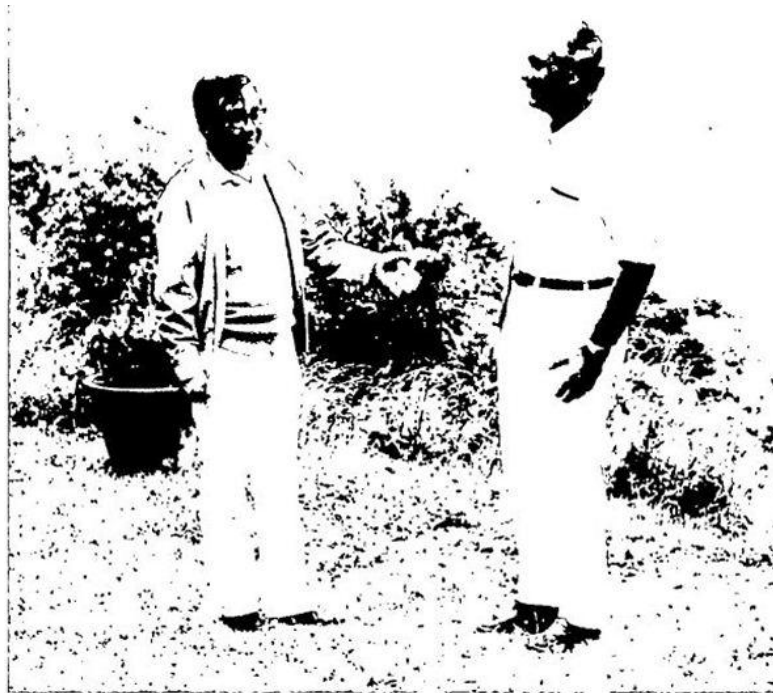
记：方教授，对大陆学生来说，您是个英雄，国际舆论把您捧为中国的“萨哈罗夫”，而邓小平却说您是“坏分子”，中共声称您是中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毒”，您到底为何物？

方：都沾点边儿。但我主要是个天体物理学家。我奉自然科学为宗教，爱因斯坦说过类似的话，以前我还不能理解，现在可就明白了：我们科学家都有信仰和目标，对社会也有责任，如果我们发现一项真理，而社会不承认，我们就会不平则鸣。伽利略也是如此的。作为科学家我得干预。我要背负这种使命，在社会上发挥作用。

记：您在中国担负了什么使命？

方：民主化。没有民主就没有发展。不承认个人的人权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在中国，人们对民主连最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我们得教育人们去了解

民主，我们得明白民主不是统治者能赐予我们的。由上而下的民主，只能说明控制松懈了，并不成其为民主。民主的获得要通过艰苦而不可避免的斗争。



Dissident Fang (L.): „China kennt nicht einmal das Abc der Demokratie“

图 2 中国甚至不知道民主的 ABC。

记：您先向地方干部开火，接着是北京市党委，最近又是政治局。您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是什么？

方：如果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对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批评。

记：您相当过份嘛！

方：马克思主义不管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作为科学家我可以提出证明。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论点大部份已过时，有些地方甚至是错误的，这根本无容置疑。它对自然科学的某些解释源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那本书。而那本书每一页中都可以挑出过时和错误的地方。

记：请举例说明。

方：60 年代时中共和苏俄多次抬出马克思主义来批判现代自然科学的一

些论点，如生物的遗传学，物理上的相对论，甚至批判了宇宙论和计算机的发展。这些批判没有一次是对的。马克思主义指导自然科学，这类话今日还能站得住脚吗？这种说法是全盘皆错的。

记：这只限于自然科学的领域吗？

方：不。回顾中共文革期间发生的种种，可说马克思主义在社会问题的领域中也威信尽失。我是首先公开提出“马克思主义异化”的人之一。



Kommunismus-Begründer Marx, Engels
„Ein abgetragenes Kleid“

图3 共产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

“一件磨损了的旧衣裳”

记：您曾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

方：那还消说！从1949年开始，到50年代间我曾笃信这个思想。我1955年入党时深信马克思主义可以在一切领域中作主导，而共产党亦是绝对完美的。1958年反右我被清除出党，那时我还诚意地检讨，作自我批评。我那时相信对党作了不公平的批评。这一回党第二次开除我的党籍，但这回我确知错不在我，因此我拒绝作自我批评。

记：1979 年按照中共宪法，邓小平要求每个国民坚守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方：马克思主义已属过去。要了解上个世纪的某些问题，它可以起些作用，但绝不能适用于今日。牛顿 300 年前发现的理论至今还有价值，但却不能用来解决今天计算机技术上的难题。马克思主义属于一个已成既往的文化阶段，正如一件磨损了的旧衣裳，该丢掉了。

记：听您这番话，会有人认为党这次把您开除出党是作对了。您想自己组织新党吗？

方：我不是没想过。但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也许 30 年以后，也许那时候我们就像台湾今天的情况一样，可以有多党制。

记：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束缚中国，使她达不到民主的紧箍咒？

方：如果这四项原则僵化不变，民主就无望。我逮住了领导登在《人民日报》上的一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是必须不断发展的。如果这四项原则能发展，依循它也无妨。

记：在今日的权力架构之下，怎能有彻底的改革？

方：偷梁换柱，即采原来的形式而更换其内涵。基督教以前革了天主教的命，但还继续使用圣经。中国也可以这么作，这就叫“挂羊头卖狗肉”。

记：您认为共产制度是可以改良的，但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还没有成功的先例呢，

方：是很难。但是如果哪个共产国家有点指望的话，那就数中国了。

记：能比戈尔巴乔夫掌政的苏联还有希望吗？

方：那当然！简单地说，我们居优势。苏联的共产党在国防及科技方面

作出了些成绩，他们的知识分子享受的自由比我们大得多。中国共产党 30 年来乏善可陈，没作出多少像样的事儿来。所以每一级的干部都在反省。甚至最高级的干部中也有人承认他们没做过像样的事儿。这种话在苏联可就说不过去了。

记：中国真的没有任何成就吗？

方：您所谓的成就是指什么？不错，乒乓球和排球咱们打得出色，除此之外，一无是处。所以社会各阶层对改革政策的呼声这么高。一般人心目中，特别是年轻一代，党的威信已经扫地出门了。

我有一个老友，亦是物理学家。他在解放前就入了共党，参加地下工作，1958 年被打成右派，他也没有怨言。不久前他公开地说：“我一辈子坚信共产党，如今终于明白了，这只不过是春梦一场而已。”不少知识分子心情跟他雷同。

记：您把知识分子理直气壮地说成是社会的前卫。这种思想背后隐藏了柏拉图式那样以哲学家治国的意味。

方：知识分子并非太上皇，但他们是驱动社会的主力，由于他们的责任重大，所以更应该独立而自由。

记：党老是决定知识分子的命运。文革时他们被打成社会最低层的“臭老九”。在邓小平掌政之下，他们现在又升到第三位，仅次于农民和工人。可是他们仍然缺乏独立性。

方：对。毛泽东曾经对知识分子的依附性说过“毛是依附于皮之上的”这句话。这种情况至今还没有改变。知识分子今后会被当成工具来驱使。知识分子展现他们强有力的一面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不再受吓阻，这就是民

主。如果这不成功，中国就很难成为一个先进而现代化的国家。

记：1978 年也有过同样的声音。当时一个工人魏京生在北京“民主墙”上写道“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为此他得坐 15 年牢。方教授，您还是自由之身，因您是有名的科学家，不像魏京生只是个电气工人。

方：是的。中国的事就是如此。不听话的工人容易对付。工人暴动极易处理，政府不必伤脑筋。目前有不少这种骚动，外界全不知道。在外国更没人知道，因为这些人没有国际关系。

记：知识分子的情况两样，是吧？

方：学生示威，政府就头大了。对付学生他们不敢掉以轻心，我因而敢说，知识分子的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大。我总是对学生说：“谁有知识，谁就有影响力。”政府不敢忽视这点。我劝我学生先别开口说大话，好好读书。谁以优良的成绩念完书，就可以开口发言。魏京生十年前开口说了话，今天我步他的后尘。再过十年也许会有更多学者张开嘴说话。让人无所恐惧地批评当政者，这是民主的体现，就因为胡乔木是政治局委员，我就不该批评他吗？他们上面自己说过，毛主席是人不是神。

记：胡乔木是怎么回事儿？

方：1986 年我写过一篇关于宇宙量子论的文章，胡乔木批评这篇文章，并给我戴上“主观唯心主义”的帽子。根据马克思理论，他攻击我文章中指出宇宙有极限这个论点。因为恩格斯曾在一本书的初稿中提及宇宙是无限的。我接受有根据的批评，但胡乔木懂什么宇宙论？如果他真懂，我倒愿意跟他讨论，不然毫无意义可言。可惜他没本事，插不进一句嘴。

记：中国的人权问题如何？

方：谈人权问题有点危险，它在中国是个禁忌。在我们国家情况比苏联还糟。魏京生是众所周知的例子，但还有成百成千的类似个案，我们连他们的名字也说不上。在苏联至少还有个黑名单，咱们连这也没有。

记：民主真是发展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前提吗？像台湾、南朝鲜、新加坡及殖民地香港等地，虽没有真正的民主，但经济的繁荣是惊人的。

方：第一，您举的这些国家中的民主比中国大得多。第二这些地区都受到美国的保护。美国希望这些国家经济发达。中国不同，在中国政治的民主和经济的民主是特别难以区分的。

记：邓小平可不这么看问题，他对中国人说：“大家发财吧！富裕是体面的事儿，其它的一切交给党来办”。

方：我们的党不光管政治，它什么都要控制，包括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工厂当前由经理负责管理，但党依然有控制权。农民可享受 Libreville（利伯维尔场[4]）的政策，可是干部对他们说：“你们需要我们盖章子，乖乖上缴吧！”这里面就埋伏了新的腐败贪污的根源。要在中国建立真正的经济民主，就得摆脱政府束缚，这刚好又是党最惧怕的。

记：随着经济改革政策，邓小平不是已把潘多拉的宝箱打开了吗？难道他就不要民主吗？

方：不，邓的改革只是要短时期地稳定政权。他要逃避政权的瓦解。党现在进退维谷：它要改革，就得压缩自己的权限，它若不肯改革，就会更快地失去既有的权力。

记：邓小平是西方人眼中的英雄。1985 年美国《时代周刊》选他为那一年的“杰出人物”。西方世界把他看成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同盟者。

方：我认为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是十分肤浅的。

记：邓难道没有一个全面改革中国的锦囊妙计吗？

方：没有。邓没有整体的计划。中国人当前就如同一个瞎子，站在一条大河面前，摸着一块块石头前进渡河。我们不熟悉这条河。这就存在摸索半天又走回起步点的危险。

记：邓能走改革政策的倒退路吗？

方：我相信不能。这样做经济会崩溃。党也要瓦解。1962 年错误的经济路线导致数百万人成为饿殍，当时只靠了毛泽东的威信才支撑过来。今天谁也没有这种威信。

记：不少人说邓小平的改革政策已见效了。

方：在外国很多人认为如此。中国农村经济已达到产量提高的效益，而城市里工业改革还未真正开始，工资制和奖金制没有起作用。

记：您不能不承认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比以前好多啦。

方：冰箱和电视多起来了，通过改革财富增加了，而财富却又投入消费品。

记：这不算进步吗？

方：当然算。社会的进步是多方面的。经济是发展上的一个重要但不是唯一的指示器。阿拉伯国家很富有，但社会并不进步。我认为教育和文化水平是一个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中国这么穷一个国家，吃喝固然是大事，但一个人明了他是一个人，这也是头等重要的事。

记：那您对中国当前努力追求在公元 2000 年每人每年平均收入达到 800 美元这个目标不表赞同了？

方：富比穷好，但这不算总目标。

记：中国进口西方的科技以建立本身的现代化，您以为如何？

方：这当然对，但点缀式地引进西方科技，买进几台大型电子计算机那还不够。要其实行现代化得把西方科学精神引进中国。中国文化层次虽深但理络不明，为要发展，就得吸收西方精神。

记：党指责您中了西方思想的毒，主张全盘西化，您意下如何？

方：我们必须向外四面开放，会有各种有益的东西涌进，但我们本身的价值并不会因而丧失。我从没说过我们应该抛弃固有优良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封建关系是恶劣的，必须遗弃。西方道德观念跟我们的不同，但并不亚于我们。

记：您要求共产党人改革制度，这不等于让党自杀？

方：我们无法要求他们交出权力。共产党抱住了他们的牌坊不放。该考虑绕道（共产党）而行。也许有一天那种牌坊不攻自破。

记：牌坊砸了，中国会产生另一种权力结构，会产生军人夺权的混乱局面吗？

方：这种危机在中国向来就潜伏着。

记：邓小平去世后会有什么变动？

方：短时间内局势会转劣，长远看来反而看好，邓死后毛泽东思想可能就撑不下去了，大家可以重新检讨这 30 年来的历史，这是今年一月下台的总书记胡耀邦所想做的事。他说，在中国不要再挂毛的像了，现在天安门前还挂着那全国绝无仅有的一张毛像。但毛泽东思想还盘据在我们脑中。

记：将来军人会扮演重要角色吗？

方：军队在我们社会有吃重的角色，但他们并非顽石一般，军队里不同阶层的人也有不同的观点。比方我会收到不少来自军中给我打气的信。

记：收到多少封？

方：数千封。其中不少是写上寄信人姓名和住址的明信片，这在中国真是需要勇气的。有张明信片上写着：“如果这张卡投递不到您手中，就证明中国没有民主”。当我出国在验关时，边境的警察搁下手中的工作走过来问我：您不是方励之吗？您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吗？您能出国，真棒！

记：您有把握回国以后不会被拘捕或放逐到远方？

方：我已作了心理上的准备。

记：您可以当移民嘛！

方：以前我认真考虑过，现在不行了。如果我现在一走了之，就背弃了国内的朋友和学生。国内有些高干点名批评我，但我还是要留在中国。那些高干子弟既不受批评，又能在外国留学。

记：学运时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现在命运如何？

方：就我所知，名大学的学生没有被逮捕，但我们知道他们被照了像，并登记了名字，以后他们会挨整的。

记：“资产阶级自由化”依然方兴未艾。

方：这次运动向我们显示，改革政策的阻力多大，我们多么低估了对手的力量，我们太过于乐观了。但运动使得愈来愈多人相信改革的必要性。我们不要革命，因为它既困难重重，后果又未必佳。中国只剩下改革一条路。民主、教育和知识界的自由是先决条件，没有这些，不论中国有没有共产党都是没有前途的。

记：方教授，感谢您接受这次访问。

（原载西德《明镜周刊》1987年7月27日）

编者注释

[1] 1978年31期《明镜周刊》发表的这次采访的题目为《“中国必须接受西方思想”——中国物理学家兼不同政见者方励之谈中国的改革进展》，由邓天诺署名，同时该刊发表了这次采访的报道。

[2] 邓天诺(Tiziano Terzani, 1938年9月14日～2004年7月28日)是一位西德记者和作家，时为驻东京记者。

[3] 《明镜周刊》的报道说，执政的共产党“在过去的30年里没做什么好事”，“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必须抛弃。”“没有完全民主化，中国就没有未来”——言辞激烈的“中国的萨哈罗夫”方励之在《明镜》采访时说。

该报道还说，尽管被开除出党，他现在在的里雅斯特参加一个物理研讨会。在那里，邓天诺遇见了他，并在托斯卡纳的乡间别墅做客三天。

该报道还说，方励之用卡式录音带对采访进行了录音。

[4] 法语：Libreville，即自由贸易市场。

[\(返回目录\)](#)

民主改革和开放

——在的里雅斯特接受《信报》特约撰稿人陆铿电话采访^[1]

中国著名天体理论物理学家方励之教授应邀赴意大利出席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年会，并在佛罗伦萨举行的牛顿万有引力理论发表 300 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演说。本月 26 日在的里雅斯特搭机返回北京。

临行前 25 日深夜方氏接受《信报》委托陆铿先生发自纽约长途电话访问。问答如下：

问：听说你就要回北京了？为什么不能就便应邀作伦敦之行，去出席剑桥之会？

答：是的，我马上就要动身回国。赴伦敦出席剑桥召开的牛顿万有引力理论发表 300 周年纪念会，国内没有批准，理由不明。所以我不能去了。只有向英国朋友抱歉。

问：有一个问题，希望你别见怪。北京这次批准你出国，而不批准刘宾雁出国。会不会因为你是学自然科学的，他是学社会科学的。在北京领导人看来，科学家比艺术家较为保险？

答：可能有这种情况，以我们中国的标准来说，西方的科学技术是需要学习的，西方的文学艺术是不需要学习的。

问：你对你夫人李淑娴女士当选北京海淀区人民代表怎么看？

答：这表明了大学生的选择和判断——渴望民主。他们用投票来表示哪一种路向是正确的，哪一种路向是错误的。

问：但这只是个区的人民代表，在我看，象征的意义，大于实际的效果？

答：我同意，实际的效果是不大的。

问：如何扩大实际效果？

答：这主要靠人们去争取。我有一个一贯的观点——民主不是赐予的（按：方氏自选的政治言论集即以《民主不是赐予的》为书名，不久将在香港出版）。现在，很多事跟宪法的精神抵触，譬如称游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结果，就不对。游行是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北大学生这次积极投入选举，也就是为了促进民主权利的实施。

问：过去在校园里当选的学生，例如胡平被穿小鞋，依你看，你夫人会不会同样也被穿上小鞋？

答：有这种可能。不过事情总是会向前发展的。当然不能忘记，中国有“秋后算账派”。

问：最近，邓小平先生接见外宾时已经指出，对中国的威胁，左比右大，你能不能够作一评估？

答：邓这话讲到点子上了。事实，是符合中国的国情。过去 30 多年来，中国一直反右，直到现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反右。而事实上“左”才是中国社会停滞的主要原因。邓小平曾指出中国社会停滞了廿年。为什么停滞？还不是因为“左”。

问：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反右非常方便，而反左则阻力重重？总是想反而反不掉？

答：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政治体制没有改变。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左”的温床。

宪法高于政策是常识

问：你个人认为中国大陆现在主要的问题在哪里？

答：中国存在三种东西，一是封建传统；二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是发达国家的一些影响。而这三种东西 1949 年以来起着支配作用的，还是苏联那一套僵化的思想和政经模式。从 1917 直到现在，究竟对中国社会造成多大弊害应引起人们的反思。

问：中共把你开除出党的主要理由是说你主张“全盘西化”。而我看了你的政治言论集，发现你是主张全方位的开放，请问这与“全盘西化”是不是一回事？

答：说我主张“全盘西化”是有意误导。全盘西化，本来是历史上的一个名词，从“五四”时开始提出，在当时是进步的。当时有人提“全盘西化”，乃针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言。

我提倡全方位开放，绝不是提倡全部照搬西方。而是鉴于我国既然实行开放政策，就应该有让自己国家的文化与别的国家的文化互相碰撞的勇气，在世界范围内碰撞的结果，我们的好东西得以保存，坏的东西受到淘汰，有什么不好呢？

问：照这样说，你的主张被扭曲了？

答：确实是被扭曲了。有些揭发完全不是事实。如有的问题是在我演讲时，同学们递条子提问，条子上的问话，也被说成是我的主张。有的批判极为庸俗化，如问是否鼻子也应跟外国人一样地高起来？非常低级，不值一驳。

问：中共不是一再强调实事求是吗？难道就偏听偏信不负责任的小报告？

答：做到兼听则明，并不那么容易啊！我再举一个例，我谈到全方位开放多方面地向西方学习时，特别提到不能绝对化。就拿吃饭来说，我们中国人的美食西方都称赞。世界上著名的城市，无一没有中国餐厅，这是经过撞击后仍能保持下来发挥优点的例证。

问：你一再强调知识分子应该形成一个独立的力量。你看，在中国，这种力量什么时候才能形成？

答：这很难预计，不过，趋势是在向前发展，北大学子的选举就是一个标志。知识分子的独立的力量是会慢慢形成的。

问：努力的方向如何？

答：首先要争取实现宪法保障的自由，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人身不受侵犯的自由等等。言论自由更是打破“一言堂”，实现多元化的具体保证。

问：问题是，中国有的人连法大、政策大都说不清，你怎么办？

答：当然是法大，宪法高于政策，这是常识。怎么政策又大起来了？宪法规定的各项条款是不应加上定语的。硬要加上定语，那就是违宪。

问：有一种意见，认为民主是西方的东西，中国现在还没有实行民主的条件？你作为一个科学家，怎么看？

答：从自然科学来说，根本无东西之分。拿物理学来讲吧！东西方是共同的。就以天文学来说，中国最初的历法或许有所不同，到后来还不是一样？一个太阳系，一个日历，这是人类共同的创造。在社会科学的发展上，东西方即使有差异，但民主是人类共同的要求。譬如保障人权，包括生存权、生活权、居住权、结婚权，不管西方东方都是共同的。文化其他的层次或不同，保障人类的基本权利都是一样的。这不存在条件够不够问题，而是愿不愿的

问题。

问：你对中国民主的前途如何估计？老实说，我是比较悲观的，我今年68岁了，我估计有生之年不可能看到中国真正的民主。

答：我在演讲时，我的学生也说我不一定能够得见中国实行真正的民主，但人总要有一点理想，并为理想而奋斗。在中国大陆多元政党的出现看来很难，不过，宽松的气氛将会逐渐形成，这些将有利于真正民主的发展。

问：话说回来，也不能太悲观，台湾不是正走向多元化吗？

答：是的——台湾正向多元化发展。台湾原来也是实行专制，由于经济发达，教育发达，现代政治也有了多元化的倾向。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多元化，值得庆幸。

问：你是否到过台湾？

答：到过一小时，从东京到香港在台湾桃园中正机场停留。

问：你对香港前途怎么看？

答：香港前途系于经济繁荣，系于国际投资，包括本地投资。现在有中资托市之说，如果单靠中国把香港资产买下来，是不容易维持繁荣的。香港是个自由港，又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有她的特色。这种特色如果不能保持，前途是堪忧虑的。

问：你曾到香港多少次？感受如何？

答：我到过两三次，香港人的生活水平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差不多，但在精神上似乎没有英国人在英国、美国人在美国愉快，这也难怪，他们中不少人对大陆有恐惧感，对英国殖民统治在心理上也会产生自卑情绪，不像发达社会的人民，有一种主人翁感。

香港应该有直接选举

问：香港人现在希望在香港实行直接选举，这就是主人翁感的反应。偏偏中共不表同意，你的观点如何？

答：既然提倡“一国两制”，香港就应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不能用社会主义的标准去要求它。直接选举没有什么不对。要使香港人对香港有责任感，归属感，主人翁感，就离不开直接选举。

问：你这次到意大利，感受如何？

答：意大利这几年经济发展很快，在资本主义世界已与法国并列第四名了。第一、二、三名是美、日、西德。意大利人在其他国家的人看起来比较懒，同时他们很讲享受，但因为实行的是民主制度，自由经济，所以还保持一定的生命力。他们认为我们中国人的问题是太努力，意思是有些事干预太多，最好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发展。他们这个意见可以供我们参考。

中国吃官僚主义的亏太大，官僚主义就是什么事都要管，什么事也管不好。像长白山兴安岭大火，救火紧急措施，如果要层层上报层层批准，火已不知烧到哪边了。

问：你看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按数字管理？

答：这是一个定量分析的问题，现代经济政治的问题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差别不是特别大，没有一种东西比其他东西绝对好。因此定量分析就很重要。

定量评估是发达社会不可缺少的。譬如投票就是一种合理的方式，它不是每一种指标都先进，但综合起来比较强就行了。中国要想按数字进行管理首先要进行政治改革，否则是不行的。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政治改革。

最后，记者告诉方励之教授，他和许良英先生、刘宾雁先生在大陆发起的“反右运动 30 年历史学术讨论会”因故不能举行，在香港已由李怡先生、徐东滨先生和记者本人约集一批朋友于 6 月 8 日举行过了，有 132 人与会，情况热烈。他表示，这对他来说是个值得欣慰的消息，因为历史总是要进行总结的，科学家对历史事件更有研究的兴趣，反右运动这件事，关系到中国近 30 年的命运，甚至今后还会有影响。有人出来进行总结，总是好事。他一定把这个消息带回给许良英和刘宾雁，让他们也同样感到欣慰。

（原载于香港《信报》1987 年 6 月 25 日）

编者注释

[1] 本文由陆铿署名，以《民主改革与开放》发表。这儿仅将“本报”改为“《信报》”，并参照德文原文修改个别文字以适合大陆读者，其余原文照录。

[\(返回目录\)](#)

我的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按《新中国一日》稿约规定，本文应记录自己在 1987 年 5 月 21 日这一天的活动、见闻和感受。对于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定义 5 月 21 日？是用北京时限定，还是用其他时？由定语“新中国”，显然应当用北京时。可是，那期间我正在意大利。怎么办？为了不致全盘欧化，还是用北京时保险，尽管北京时也并非祖制。因此，下面记录的事发生于北京时间 5 月 21 日 0 时到 24 时，即意大利时间 5 月 20 日 17 时到 5 月 21 日 17 时。

在这 24 小时里，我正在的里亚斯特（简称 T 市），主要工作是在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进行研究。根据日记，这一天并无值得特别描写的事。按时间顺序，有以下的活动：

5 月 20 日

17: 00~18: 00 在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与 Z 君谈

18: 00~22: 00 应邀去 Sh 饭店晚宴

5 月 21 日

09: 00~10: 00 找 Ms. Tussa 办协联协议

10: 00~17: 00 研究宇宙弦与分数维度

10: 30 电话，英国剑桥大学 C 君

14: 30~17: 00 以下来自美国的电话

纽约长岛 MC 君

纽约布法罗大学 W 君

加州大学 C 分校 Ch 君

加州 L 市 S 君

加州大学 S 分校 H 君

按道理，本文是一日之历史，一切人及地点应具真名，以便后世之参考。但在上述时间表中，除了地道的洋人 Ms.Tussa 之外，其他的人名及部分地名都隐去了。恕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新中国一日》稿约中没有述及如何保证这些真实的材料不被非学术研究的调查所利用。

找 Ms.Tussa 的目的是申请签定一个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与北京天文台之间的协联协议[Federation Agreement]，以便以后可以派北京天文台的年青人来国际理论物理中心。Tussa 马上接受了这一申请。因为我是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国际学术委员会唯一的中国委员，所以，她向我反映：最近中国人来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很不准时，有些人说要来，实则没来，或推迟很久。她问：“是不是你们现在出国比以前难了？这里报纸说中国又开始了政治批判运动。这几个月我们都很担心你的处境。”我当然首先感谢他（她）们的关心。同时，心里也想，外国人实在也不太懂，新中国的 38 年，如果减去所有被政治运动占掉的年份，还剩下多少呢？几乎一无所有[Almost nothing]。因此，何必太担心？没有运动，也就没有我们这些新中国里成长的人了。

这场不是运动的批评给我带来的实惠之一，是 Sh 饭店老板执意要请我吃饭。虽然我来 T 市已有 12 次之多，但同这位老板并不熟，他之所以请我，只是因为“这一时期意大利报纸上你的名字比×××还要多”。臭名远扬到亚得里亚海了，奈何！

席间谈的最多的是温州的非法移民潮。原来，意大利的华侨百分之九十都是温州人。最近几年有上千的温州人非法进入意大利，以致惹恼了意大利

当局，不仅现在意大利签证很难办，而且，一些非法入境者及非法入境的参与者已被抓，将被审判。这一事件，使在意华人都感到丢脸。因为，在中国人眼里，犯法，哪怕犯的是洋法，总是不光彩的。

尽管如此，仍然止不住移民潮。如今仍有不少温州人逗留在南斯拉夫或奥地利，等待越境机会进入意大利。原因很简单：为谋生。在温州，没有考上学校的青年人，工作都不容易找，更谈不上前途；在意大利，虽是异地他乡，并不舒服，但至少有个奋斗的场所。以 Sh 饭店为例，它是个很普通的中国餐馆，其日收入为 200 万里拉（相当于 1,500 美元），最高可达 500 万里拉（相当于 3,800 美元）。这种内外差别到底有多大，是没有学过数学的人也会计算的。所以，甚至一些连中文都所识有限的温州姑娘，也敢只身远渡重洋“闯”进意大利。至于“闯关术”之奇之妙，往往令对付黑手党颇有经验的意大利警探也一筹莫展，惊叹中国人的“聪明”。谁说中国人，特别是当今新中国的人，缺乏“开拓”精神呢？

W 君及 H 君则是另一类的想开拓而不得。前者已在美国做了三年的博士后，J-1 签证已到期，准备今年底回国工作。后者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准备回国探亲，他已有六年没有回国了。在今天的电话里，他们分别告诉我，由于国内目前形势的变化，他们都取消了原来的回国计划。W 君准备到第三国去工作几个月或一年，然后再到美国。H 君则径直去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做博士后。从电话里多少也可以感到他们那种有家不敢归的心境。

Ch 君的电话是类似的问题。他说，他们已被告知，×委×××即将访美，将与美国当局商讨如何处理在美留学生的滞留问题。还被告知，×××将在中国学生集会上发表演说，介绍国内形势之大好，越来越好，批评资产阶级

自由化思潮之成功，越来越成功。该处的留学生们正翘首以望，洗耳以待！
三呼万岁！

Mc 君及 S 君都已是美国籍。所以，与他们打交道都应格外谨慎，假洋鬼子嘛！特别 S 君在电话里直接询问我，是不是干脆在国外留下来，这样照旧可以进行科学研究，而且工作条件更好些。听到这里，我忙不迭说，这可不能考虑。其实他倒并不是第一个问我这个问题的人。我一到罗马，就有意大利同行劝我，长期留下来，在意大利安心做做研究，他们可以聘我为教授。我也立场颇坚定，婉谢了。这倒不是为了回国之后有一条新闻：“×××婉谢外国聘请，如期回到祖国”，对于政治上只有“认错自由”的我，当然也不可能有这种新闻。实在说，这种常见的新闻，在原则上也是不合逻辑的。因为，按照标准论断，西方是危机重重、精神空虚的世界，新中国才是最优越的地方，那么，从西方到中国，就是避危机而拿优越，这有什么值得登报的大惊小怪呢？至于我为什么那样抉择，茨威格已说过了：

如果一个被压垮了的敌手一声不吭，但仍拒绝侧身于暴君的倭幸和奴才之列，那么，此人的继续存在就成为一个烦恼的来源。

英国剑桥大学 C 君的电话，不好在这里多写。因为，它涉及英国皇家学会，剑桥三一学院及有关教授给赵紫阳总理及中国科学院写信的事。按照中国传统，无论是古代的，还是新中国的，言不涉上吧！

今天电话虽多，但研究工作也有进展。进一步考虑了分数维度非均匀分布中的固有速度问题。在这种知识领域里，我是从来不回避涉上的。譬如，我的这些属于现代宇宙学的研究每一个结果都表示，写在一些最高教科书中的所谓“宇宙必定无限”的论断，只不过是未被证明的一种教义，并不比 500

年前“地球必定是宇宙中心”那种论断更高明的教义。这个问题上要说的话还很多，但看来已大大超出《新中国的一日》的范围。

好了，一天的活动已写得够多。至于这些记实是可以属于新中国的一天之列，还是应予开除出列，那就不得而知了，阿门！

应《新中国的一日》编委会邀请作于 1987 年 7 月 5 日，北京大学蔚秀园

[\(返回目录\)](#)

对民主和安定的理解

民主和安定是社会现代化的两个标志，是推动经济、科学、文化发展的两个必要条件。民主和安定二者之间，又是互为表里，或互为因果的。一方面，只有在安定的环境下，才能保证人人享有民主的权利；另一方面，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安定环境的健康与久长。

年纪长几岁的人，容易回想过去。特别，对“文化大革命”的记忆，不能不使人感到，动荡的环境，是难以保证人人享有应享有的民主的。因此，心目中的顺序是：安定之中的民主。

年轻人，则更关心未来。特别，开放所带来的信息，不能不使年轻人感到，如果缺乏民主的不断扩大，就难以保证他们所向往所追求的繁荣稳定社会的建成。因此，心目中的顺序是：民主之上的安定。

两代人之间对民主和安定这一理解上的不同侧重，也许是当前事件的一个社会认识上的原因。如果不是全部原因，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是需要两代人努力相互理解的时候了，就像民主需要安定，安定也需要民主一样！

（原载台湾经济与生活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7 年 9 月 1 日出版的《我们正在写历史——方励之自选集》P.135～P.136）

[\(返回目录\)](#)

让中共、台湾、香港三家来竞争

——在北京接受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采访^[1]

（注：本访问稿中，“方”是方励之先生；“戴”是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女士；“娴”是方励之夫人李淑娴女士）

李、徐：我们觉得很荣幸能访问你，听说许多外国记者想访问你都被阻止了。

方：大概因为他们没有把你们当成“外国”记者，而是“国内”记者吧！（笑）

在你们访问之前，我要主动向你们提一件事，就是台湾替我出版的那本书的事情。

李：这也正是我们想请教你的问题，我们在台湾看到你否认你会授权的消息，我们不晓得事实究竟如何？是不是你受到什么压力？

方：不是，不是！我确实没有授权！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大概是什么状况，因为我今年一月被开除党籍后，就想该做些“准备”，于是，我就把自己的演讲稿大量影印，四处散发给我的朋友，散发的很多，有人要，我就给；所以可能是某位朋友自己的意思！不过，我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那本书中的“自序”不是我写的！我不敢掠美；不过，要我还真的写不出“天地之悠悠，独叹梅花瘦”这样的句子呢！（笑）

未委托港台书商 出版方励之选集

香港也出版了一本我的书，书名是《民主不是赐予的——方励之自选集》。这本书也不是我委托出版的，不过，它保留了我讲话的原貌，你们的那本《我们正在写历史》就动了一些手术，把我谈到台湾的一些话都删掉了！

李、徐：哦？删掉哪些？

方：其实并不是什么严重的话。在同济大学那篇演讲中，因为有人问我，“如果，1949年国民党没有被打败，今天会是什么局面”，我说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同时，我也谈到了我对国民党的印象，我念给你们听：“在我是小孩的时候，国民党逃跑（到台湾），我的印象国民党都是大兵，戴着头盔，特别是他们占了我们中学，把中学弄得都是炮”。这段被删掉了。还有一些标题也改了，像原来是“不同意钱伟长先生的意见——也谈高校学生与教师的比例问题”，到了你们的书上变成了“吃草挤血，累死白搭”。

我那时候看了，就想说你们的言论尺度也不怎么样嘛！（笑）

徐：有没有人表示要拿版税给你？

方：没有啊！（笑）

李：这本书听说销路很好。

徐：所以，你应该争取版税，不少啊！（笑）

方：其实，我也不介意别人私自出版我的讲话内容，但是，我从来没有要出版自己的书，而且因为序文不是我写的，所以，我才要向你们说明一下。

徐：你对台湾的印象是什么？

方：我曾经在你们的中正机场过境，在机场听到你们的广播，那个话和这里完全一样：“你们不能带照像机，不能向下照相……”，那个话完全一样，就是那个“中华民国”不一样而已。

李：（大意）我们在台湾从小就听说共产党的一些暴政，我们长大了，我们就想实际地用脑袋去想想。从人性来讲，如果这是一个暴政的话，绝对不能够维持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个体制，对整个中国的建设，路线是不是正确的？

三十年来走错路 大陆落后人皆知

方：这点是个大问题，是中国的大问题，当然大家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中国现在是落后，需要发展，这点海外我也碰到，左中右派都不反对，这点是肯定的。

另外，我想对共产主义，在中国，各人理解很有差别。如果就一般的理解——从最左到最右都有——如果你从一般来讲，就是争取大家有个理想社会，也不是不可以，也是一个目标。从大同社会出发，是人人都有饭吃，都生活水平很高，这说法也类似。

就大家争取一个理想社会这一点，没有人会反对。道德水平很高、生活水平很高、人的关系比较好，这样一个和谐的社会，我们都希望这样——问题就是怎么走向这个目标，这个我就觉得大陆在至少 30 年来走的路不成功。如果这就叫做共产主义，那这个是不可取的，我一向是这个观点。

知识界地位低微 王若望传被抄家

如果有人将 1949 到 1976 年，或者是 1977、1978，定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那绝对不对，完全不对。文化大革命大家都同意当然不是共产主义，当然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大家都承认，现在连我们都承认。我觉得文化革命

以前也不是，如果那是共产主义，那么为什么会，打个物理说法，那是“初始条件”，你们懂得意思吗？这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初始条件，如果一个社会的初始条件导致文化革命，这个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个肯定不是。这有因果关系。

我觉得我们这个讨论，只能够就这个定义弄清楚。如果说社会主义的定义为理想社会，我不反对，我非常支持，而且我赞成，我就是希望有个理想的、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谁都希望如此。但是说解放后从 1949 年到 1976 年是社会主义，是完全错误的。

李：现在知识界在中国大陆的地位很低？

方：对。

李：请问现在还有没有抄家这种情况？

方：王若望据说是被抄家。

李：一般知识分子的心情呢？

方：当然有恐惧感，老实讲，确是如此。

李：对你说的话，是不是令中共十分不快？

方：有这种可能。就算我们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我想没有一个人说他自己说的话是全对的，我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应该一切都是透明的，公开出来。我到底有什么被认为不对，可以公开出来，这没关系，我要是觉得这不对，可以改善。

现在呢，就是，我觉得恐惧感就出在这个地方，你不知道谁去给你汇报什么事情，你不知道。也不知道上面收到什么讯息，这个讯息是不是真的你说的。第一、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说的；第二、他所认为对呢？错呢？

本来这种事情是可以公开讨论的。他们也不说，反而一副“我手里有你的东西”，就是这个恐惧感。

戴：我们的法律第一条就是反革命罪，如果严格按法律办事的话，我们也可以知道什么样子叫犯罪，什么样子叫不犯罪。可是他们在量刑的时候，可以有很大的弹性。

方励之被除党籍 邓小平实违党章

方：就像我这次开除，首先是邓小平表示的，邓小平在中央表示要开除我。

李：公开的谈话吗？

方：登了，注销来了，文件已经有了，文件已经注销来了，他是第一个表态的。

李：对于你这个事情，邓小平没有一个民主进程吗？

方：他说他听到我的讲话，他说我不够资格做共产党员，当然我觉得他可以发表他的意见。但是，问题是他听到什么人的汇报，我可以——当然我不能完全确定——但我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自信度，他绝没有看过我全部的讲话，他是不是听过全部？没有，我估计是没有。他单看的是一种汇报，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汇报，截出你的某种话来给你汇报。因为他这个年纪这么大，他也不可能听耳机，不可能看很长的东西，只能听别人说什么东西。像这个样子，当事人就不再能申辩，不能澄清，也没有一个民主渠道。

像邓小平这种表态，就连党章也不符合。根据党章，先要支部来讨论，认为你不够做党员，核实你材料，确实不够，那才上报，应该是这样。现在

没有，就是从上到下。

李：这些事情都是党在做，还是有什么特别的情治单位？

方：这当然是党在做这些事情。

李：大陆前一阵子学生运动，好像搞的很大，但是突然就没有了，最后是怎样收起来的？

方：我想是控制住了。

李：怎么样的控制法？搞的这么大，一下子能压下来，这个控制非常有效率。

学生运动促改革 惜缺乏具体目标

方：第一，我想这样说，学生的运动，目的绝不是反政府，包括我，我们的心里一点都没有这样想法，只是促进你赶快改革，同学们的目的或者我们当时讲话的动机是这样，觉得现在开始改革是好事情，应该快一点，完全是这个目的。所以并没有想搞乱，并没有想破坏安定团结，绝对没有这种想法，只是想快一点。

所以，学生运动，在还没有开除我的时候、已经完了，并不是后来才完的，已经完了，已经不大动了。

戴：我补充一点。学生运动一开始时，实际上是补充官方改革所没有的东西。目前官方的改革只限经济领域，在意识形态范畴他就一点不敢动，但是，学生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学生要求民主和自由，但是学生非常天真，本来，学生运动都应该有一个很具体的目标，譬如说要争取出一份学生报纸或是什么的。但是，他们太天真了，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就是“要民

主自由”。

李：就走到街上去了？

戴：就走到街上去了。学生认为要选举，就要按照宪法的程序来进行选举，不要背后搞一套，这都是学生一开始那个想法。

后来学生运动之所以搞得那么大，一方面是全国的学生都有这么一种心愿；另外一方面，就是最后的冲突所引起。最后冲突会达到这么大的程度，是反对派有意激起的，我是这样看，完全是反对派暗中激起的。

方：我也是这样看。

戴：就反对派立场，他们认为“要学生闹起来才好，我们正好整他们，有机会整他们。”像方励之算是思想界领袖，一旦学生闹起来，他们正好有理由找思想界领袖开刀。

方：实际上，到12月27号，我最后一次讲话，就是“我们在写历史”那次讲话，那时学生已经平静了，我也告诉学生，要珍惜我们的环境，同时学生也都已经准备接受考试了。当时，党也没有处理我们。

反对派搞起冲突 社论更激发怒火

在这次学生运动中，学生的口号并不太清楚，就是民主，就是希望除了经济要改革，还要思想方面、政治方面、意识方面都要更开放，学生把意思表达，便进入考试，这是正常的事，但是反对派们正好抓住这个机会。

所以，后来到了元旦前后，他们的一些做法就很不正常。当时，学生在元旦那次的活动已升高到要退党，但是，这个完全是北京市挑起的。

李：北京市？

方：北京市。

戴：一开始时，是别的城市先发动的，北京率先起来的是清华。清华距离北大很近，他们到北大来游行，请北大的学生一起去，北大学生不去。当时我的孩子也在北大读书，大家从宿舍里出来看他们，说：“暖，暖，干嘛啊？你们干什么啊？”他们说：“要民主，要自由。”北大的学生只觉得很好笑，就回自己的宿舍去了，没有人跟他们去。

后来，一直到他们的同学被抓起来了，北大学生是为了救同学才去的。

李：北大自己的同学被抓起来的？

戴：也有清华的同学，在那次游行，北大也有学生加入。就为了救同学，他们才去的，还是小规模，一直到北京市开始镇压了，那么才哄起来了。

李：北京市挑起来的？

方：社论激怒了学生。

戴：学生被激怒了，大家就烧报纸，但他们没有什么事情，没有什么游行，也不想去游行，他们还说：“清华是我们的小兄弟，我们不能说，他们先游行了，我们要跟着他们一样。”（笑）

徐：哪一间报纸的社论？

戴：北京日报，不是人民日报，完全把这个大学生说得特别坏。然后学生们就生气了，就自己买了报纸来烧，烧北京日报，后来烧出情绪来了，没有报好烧，就把其他报纸都一起烧了。（笑）

学生好意被曲解 对改革灰心丧气

李：像这样的事情，国内报纸有没有报导？

方：没有报导，这个不可能报导。但这个事情大家有眼都看得见。特别对《北京日报》，《北京日报》据说故事多得很。在一般记者招待会上，《北京日报》的记者都不敢说他是《北京日报》的，在记者圈子里都不敢讲。在一般人的眼里头，《北京日报》大概就跟《中央日报》一样。（笑）

徐：现在校园里经过这么一大挫折，有没有些副作用？倒退？

方：现在学生的情绪变得很灰，他们心里想，我们完全都是为了国家好，为了政府更好，没有任何推倒政府或者什么的，怎么会这样看待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大家很灰心丧气了。

另外可能这一代人又回到我们那一代所经历过的心情。我们当时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当时对解放、对毛泽东、对共产党，都非常信任，绝对的相信。即使在反右以后，受到打击以后，我们也自以为是是我们自己错，并不认为是党的错误。可是到后来文化大革命，接触的事情多了，看出上面怎么这个样子，并没有把我们的真心当作好心。

我们这些东西，年轻一代都不太懂，觉得反右的那种事情是不可理解的，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事情；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他们不太相信，至少不太接受。现在他们也了解了。

“我完全是好意，他说我是坏意”，这个使学生一下子变得很冷。

现在学生的心情是你说什么我都不信，但我也不去行动，因为我要作举动也没有什么好处。以前学生对开放改革还是有点信心，还有改革的热心，大家去游行是说明，大家都还有信心，觉得你——我游行以后你会听我的，你会有点接受。现在觉得呢，我好担心你也不会接受我。

戴：北大游行时，第一个标语是“小平，你好”，第二个标语是“支持以

邓小平为主的改革”，……然后才是“我们要扩大社会主义的民主”。

第一个标语是“小平你好”，这个是受到表扬的。平常游行都是严格按照上面的布置的，每次挂什么颜色的花，非常严格，步子怎么走，都是有规定的——那次，几个学生准备了一些标语，让上面不知道，忽然到天安门打开了，就是“小平你好”。那是35周年大庆，后来记者也拍了，当时是受表扬的——一等奖。

那时大部份人都觉得极好，都觉得学生心里拥护邓小平，但没把邓小平当作“万岁”的样子，而是说“小平，你好”，上下都欣赏。

学生有两种情绪 消极及打算做官

戴：北京大学有个三角地，就是大字报墙，买报纸什么的都聚在那边是学生每天必须经过的，那是北大的“圣地”。镇压下去之后，那块三角地就变成了什么呢？那些大字报都给撕掉，全部变成什么“征求女友”（笑）、“卖牛仔裤”、“卖自行车”，还有“舞会”，还有大型乐队伴奏，还请来什么第一流的迪斯科大师来普及摇摆舞……

嫻：这时的学生有两种情绪，一种呢就是说，“我什么也不管，接着不就是选举吗？选举我们都弃权，总之它是个很虚伪的东西，谁都不选。”

戴：后来就选她了。（笑）“指选了李淑嫻为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

嫻：再有一种呢，就是有一批学生本来是打算好好的做学问的，这时候就想，唯一的路是做官……

嫻：在北大的三角地，你一看就看得出北大现在干什么。

方：对，一看就看得出北大学生在干些什么，有什么潮流出现了，最早

就在那个地方。每次都是。（笑）

反右整数十万人 大陆人权比苏差

方：经过这次事件后，有些外国学者认为我们的学生太软弱了，比起一些国家我们当然是软弱的。但从这次运动中也可看出、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已有点进步。

在反右的时候整了几十万人，有的到什么地方去了都不知道，很多家破人亡，有人死了，有的至今下落不明。所以我说中国这种人权问题比苏联差，苏联绝对没有这么多人，苏联的记录也没有这么多人。但是，现在大家不敢去讨论这个问题。

至于我在这几年来是业余搞的，业余说一说：我从来未专门做过政治方面的研究，确实没有，只不过出国看一看，听过人家讲一讲，我就把听到的东西都讲。（笑），其实很多人私下也对我说：“你这些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不愿意提。”就差这一点。所以，在知识分子中，像我这种看法是相当普通的，但是大家都不敢讲。不但不敢讲，像文化大革命高潮时候，每个人还必须讲假话。

李：必须讲假话？

方：你不讲都不行，大家连不讲话的自由都没有。譬如说：斗，大家要斗争谁，你不斗，或不发言，就斗你。“谁不斗，斗谁。”这是当时的典型的口号。

嫻：1967年斗邓小平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到了大家都很厌恶的情况，领导说：“发言。”大家就拿一张报纸，报纸上有文章嘛。我念一段，他接着也

念一段，还是念同一段。大家把那段念完，也算是了，就是形式上过去了，虽然大家非常的厌恶，但是谁也不敢在行动上反对。

知识分子有进步 取得不说话自由

方：现在跟文化大革命大概比较，我觉得还是有点进步。不要跟你们来比，跟你们来比还差得多。可是跟历史来比，以前是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现在可以有不说话的自由。至少知识分子已争取不说话的自由。像现在我们出了事情的话，不单是老朋友，当然也有些人是怕事的，但大部份都敢来找我，而且还有很多不认识的人也照样找我，照样照相，现在要跟我一起照相的人很多。（笑）

娴：仅仅一个月就有 1,033 封。

方：而且是公开的信，还有明信片。像明信片，学生说，是他们的一种表示方式，因为现在不准贴大字报，我们不贴，明信片总可以寄的吧。明信片上就写“我们支持方励之什么，支持你的观点。”什么都写。明信片，他们说，这个很好，寄出去都是明的，至少邮差，邮递员都可以看，也有一些经手的人可以看得到。后来我的明信片到了北京天文台或者什么地方，很多年轻人都会先去看，今天有没有方励之的明信片，看看什么明信片。

李：邮局还寄得到吗？

方：寄得到，有的邮递员很好，他们说：“我就要给你送信。”

李：如果这样，这点比台湾好，台湾有的信，邮局会扣掉，或者延迟给你送。

方：可是检查是肯定有的，肯定是有的。

徐：我们看你的演讲稿，有一点很感兴趣，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环境里头，为什么你在过去的演讲里头，会有这么大的乐观，能够说“现在是个谁也不怕谁的时代？”

现在谁也不怕谁 根本还没有达到

方：这个，我想，我是讲错了这句话。（笑）现在外面有人传说方励之做检讨了。我说：我也说错了话，就是这个“谁也不怕谁”我说错了，就是这个“现在”错了。因为现在根本还没有达到，而我说“现在已经达到了谁也不怕谁”。

我承认我是太乐观了。我起初批评学生也是说他们过份乐观，特别学生游行的时候，我曾劝学生不要去游行，因为我觉得整个条件还没有这样乐观。我说：你们游行有点危险。

嫻：他那句话，本来完全是一个戏剧性的效果。为什么？这个戏剧效果有个背景，背景是毛泽东曾经讲过一句：“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后来这句话变成了歌，小时候，这样唱：（唱）“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我们小时候全部都唱这歌。现在他（指方励之）变成了“谁也不怕谁”，非常好玩，有戏剧性效果……（笑）。

李：中国共产党对一般老百姓的思想掌握的情况大致如何？给他们的空间有多大？

方：关于掌握思想这点，我可以告诉你最新的消息，最近党内有个意见，就是对学生要加强思想工作——这当然早就说了——而且在学校里要设立专职的思想工作人员，这种人员要有教授一样的待遇，甚至要有教授头衔，这

是最新的消息，我们觉得这是种政治倒退。

徐：我们学校党部已经要撤销。

方：你们国民党党部要撤离校园？我倒不知道这个消息。

嫻：评定教授职称，以前我们是学术委员会开会讨论，现在这里面也要加入这些思想工作人员，一齐进到职称评定。就是“我可以不给你教授，我可以不给你讲师”的这个团体里面。

方：现在是有点向回走。

嫻：还有一个标志是，成立出版总署……

方：检查，对新闻进行检查。

李：过去没有？

方：过去没有，不是没有新闻检查，是没有明显的一个机关负责这个事情，只是由中宣部负责这个事情，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没有一个专门的谁谁来看你这个报纸的，解放前不是有挖天窗什么的，现在又开始有这样一个机构了。

改革不可能太快 思想上须走前边

徐：方先生，还有一点，我们来之前，跟一些从美国来的学者，在这里也跟这里的知识分子谈一下，他们对你有一个评价，他们认为你的民主观念和想法非常正确，可是你在中国大陆发表这种意见，只是你一个人跑在前面？

方：我自己也听过这个评价，有人说：“你这样说，太站在前边啦。”怎么说呢？一个社会当然是，你要在一定的基础上从事改革，不可能太快，尤其是经济上，这个我同意，但是，思想上你要走在前边，特别是知识分子更

应当走在前边，就是领导人也应该走在前面。要不你怎么叫领导人呢？对不对？你应当走在前面，至少容忍这些东西，知道这些东西，知道我们实际情况确实有哪些不对的，但一时没法改，那大家也可以谅解，但你要说清楚，而且特别是你不但要走在前面，而且要建立理论，你到底想以什么模式去改变。进行改变，我们的计划经济怎样改变到利伯维尔场[2]怎么怎么样，思想领域怎么样做，意识形态怎么怎么，都应当有。

我谈这些问题，虽然我讲的最多，但是许多知识分子也开始有兴趣讨论了，这事实上有好处，至少可向政府提供各种看法，一种可能性，这是友好的，应当可以容忍。……

我的事情后来起了这么大的风波，当然也可能是我说理方面走得太前，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是领导人处理得太没有风度了。第一，我们也不想打倒你，第二，我们也不想去占你们的权。有学生说方励之想做总理，这我说，我才不去做总理，我说我做物理还很好呢。（笑）第三，不想夺他们的权，只是想提供这些自己的看法。所以这个时候呢，最好的办法是领导人下来，听听我们谈些什么东西，还有学生谈些什么东西，认为好的，可以接受，一时有困难的，可以解释。可以谈谈我们现在的经济不可能明天就到台湾的水平，或者到美国的，不可能的嘛，这个有知识的人都会相信不可能的嘛，你可以说清楚，对吗？你有什么困难。中国古代的“宰相肚里能撑船”，这是应该的。但是我觉得领导人太没有这个起码的风度。

敢讲话者被打光 举手捧场机器多

方：刚才你们说的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拿西方与中国比较，双方对知识

分子的概念并不一样。什么叫知识分子？应当自己负担社会责任，不一定是做官，但是你要承担责任，从你的专业、从你的技术，你有你的看法。

在中国，我觉得是完全没有这个概念，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我们领导人眼里的知识分子，就是一个工具。或者现在好一点，当你不是工具，尊重你。但是，你也是做技术性工作，别的你不要管。就是你只要去划船就行了，我来掌舵。

这个和西方的概念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次我到欧洲，六月份我到意大利去。他们说：“这次运动里看出你们中国有一点知识分子了。”就是说，你有点自己独立的说法，学生也能独立的表示自己的意愿到底是怎么样。

嫻：在三四十年代，像清华、北大，知识分子是非常活跃的；在这个 35 年的过程中，所有的有思想的、敢讲话的，全部在一次一次运动中完全被打光了，那么剩下来的现在一批人确实是世界知名度非常高，但是都是举手和捧场的机器。像这次反自由化这么不合理、这么违背民心的东西，就有这么一批著名的知识分子出来拥护。

大陆要向香港靠 台湾何必惧三通

李：反自由运动搞得怎么样？

方：搞不起来了，除了几个人为了表态，表示政治态度以外，这些人其实已经是脱离知识界，已经不属于知识界代表了。

嫻：那时候几个著名学者，比如钱伟长，他们一出来发言拥护讲什么“我们很拥护党中央什么反自由化”，学生就说：“又牺牲了一个。”

徐：费孝通有讲过这样的话吗？

嫻：是，他们都讲过，费孝通、钱伟长这些人都讲过。

徐：现在台湾经济比较强，民主意识也比较进步，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大陆反而像方先生所说的，在很多方面都在慢慢后退，那么，如果两岸开放观光以后，你觉得对中国大陆会有什么影响？

方：当然有很大的影响，我早就说过，不用怕三通。

徐：你是说谁不用怕？

方：我是说台湾不用怕。最明显的例子是香港，从意识形态，从老百姓的观点来看，香港实质上是比大陆进步。所以并不是香港要向大陆靠，反而是像现在的形势，是内部向香港靠。

香港虽然很小，只 500 万人，但是对大陆的影响大到这么的地步。现在，北京很多小孩都要学广东话，这当然是不太好的现象，但是这也表示影响多大。

现在台湾人数也很少，2,000 万人，可是因为它跟中国大陆是同一个文化背景，像香港一样，很容易打通，台湾的话跟大陆更接近，更容易打通，这个影响是更大的。我觉得一个社会的影响并不在于大小，的确要看谁才是先进。到底谁先进，那就看影响，只有你追上先进，你才不会害怕，你要是落后，一定害怕。

嫻：毛主席的话：“到底谁怕谁？”（笑）

反精神污染运动 免深受香港影响

李：中共领导阶层对香港对大陆的影响，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心理上的反应怎么样？

方：心理上当然有些紧张，像这个反精神污染运动，就是反映这种情绪，免得这个影响太厉害了。

李：在政策上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干涉吗？

方：当然是采取，尽量控制不允许意识形态污染。

李：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是用运动或是什么样？

方：运动。包括这一次也是一个小规模的运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运动，反精神污染也是一个运动。虽然现在他们的宣传是不运动，但实际上还是不断有小小的，不是运动的运动，不定义为运动的运动。（笑）譬如说在科技大学，学生每人必须就这次的反对自由化写一篇感想，感想里面必须要说坚持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化，每个人都必须要写，这实际上也是运动。

李：连司机都有，我们坐的车子，就是张春男的司机，张春男你知道吗？从台湾过来的，我所看到他的位置上怎样有两本书，一本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嫻：昨天才刚发的。

李：昨天才刚发的？你们这些知识分子都要学习？

嫻：都要学，而且每人一本。到时候呢，叫大家念，当时我们大家都想出一个办法，把那个发给我们的书都搁在我们学校，死都不带回来，我们带回来没地方放，到念的时候才把它找出来。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许他们以为这次压制了反动思想，其实我觉得这对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伤害，是很大的。

昨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一个统计数字，挺有意思的。这个朋友正在搞

一些统计，高校的统计，他们做了一个统计表，就是看这些学校——大陆和台湾都属于中国啦！整个中国，给这些学校排一排名次，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个质量的标准呢，大概是理科看得比较清楚，就是看在国际上，某一科在某一级水平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多少，来统计哪一个学校第一，哪一个学校第二。他们从 1981 年统计到 1985 年，在前两年第一名是北大，第二名是台大，第三名也是台湾的一个什么……

论大学北大首位 清华排行第十七

方：清华，台湾的清华。

嫻：第四是科大，科大很年轻啊，是 1958 年刚成立的，第五名也是台湾的一个大学。然后，现在中国这个教委啊，吹得顶厉害的清华，排到第十七名，根本就排不上号。

他说今年还没有统计，今年一统计大概更惨。我那个朋友就觉得，北大、科大实质上都是中国大陆上最有名的自由化学校，所以中国现在是一个反的相关。就是说愈搞自由化厉害的地方呢，学生的水平就比较高。

还有现在，现在你们不要看学生，不要以为事情已过去了，其实学生窝了一肚火，因为他想不通。去年北大学生游行，因为有些学生跟我关系很好的，他们就跟我们讲：我们觉得非常委屈，我们一点都不想反对我们的政府，我们更不反对那个改革，我们游行的时候，有些老百姓，有些居民就跟我们一块儿走，说：“我们也游行去。”一路问这些大学生说：“你们的口号是要什么？”他们答说是要自由要民主，“自由民主有什么用？你们要反对物价的上涨，我们就跟你们一块儿游行”。（笑）北大学生不是不知道，一讲物价的话，

那么煽动性就很强，他们就是为了爱护政府，爱护现在好不容易得来的一个局面，改革开放的局面，他们不愿意提物价，一提物价就把老百姓弄乱了。尽管物价上涨以后，学生生活也受到影响，但学生们都讲好了绝对不提物价，所以后来说他们反对改革，他们就非常委屈，所以有的学生就灰了，有的就走上美国那种颓废派。像去年年底我们处理了一些学生，有的被开除了，就是因为宿舍内公开同居，现在北大已经不是一、两个了，刚刚处理了几个，同居是怎么样处理？

学生窝了一肚火 颓废作风竟同居

嫻：以前是没有处理的，现在处理了几个，就有学生代表学生跟我反映，说这个处理太重的，有一个我们觉得没问题，他因为以前又有，已经给他察看了，他又犯。那么另外两个，一个 19、一个 20 岁，他们以前也没有不好的行为，一下子就开除了，你看是不是必须要反映反映？我就跟另外一个学生，学生代表去找校长问了问事情，后来我们还是同意他们的决定，我觉得处理得还是对的，因为他们的情况很恶劣，而且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情况，现在有相当多，尤其是文科的，有的文科的男同学就是这样讲，“我们这儿的女同学已经被我们占领完了，我们要向外系进攻。”校长跟我讲了这个情况，他说：我们的处理也不是开除，是勒令退学，他要是改正的话，那么过一年还可以再考，再考进来。

我听了他讲的情况，我也觉得有道理，因为你这么一个高等学校弄得这个样子，也同时反映了青年一代这种，这种灰，我觉得他们自己也应该有责任。但是我也给校长提出了意见，我说，我们北大的传统就是特别喜欢讨论

问题，经常有讲演，可是现在一般都不让学生搞讲演，经常搞那个扭摆舞，搞那个什么现在歌星来唱。

学校出钱开舞会 不让学生搞演讲

戴：学生运动之后，用舞会来代替了讲座，官方来主持舞会，以前官方是禁舞会的，现在改了。

娴：我觉得很好笑。

李：台湾的情况也差不多了，台湾的制度，是想用物质来麻醉、迷惑学生。

娴：他们开舞会，要租那个舞厅，要花钱的，这个钱都是学校给的，学校很穷，现在很多刊物都停了，却让学生去跳舞。我就跟校长讲，我们是做教育工作的，我也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我就觉得不应该这么样的领导学生，学生在学校里面主要是学习。我统计了那三角地带，那是北大的灵魂那个地方，你去看看北大里贴的是什么东西，如果说北大有很多讲座，那么偶然也有一两个舞会，我也不一定反对，这个很自然的，年轻人跳跳舞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很喜欢跳舞，每次这个星期六舞会我一定跳到最后一个。（笑）

戴：我想补充一下他刚才谈的一个题目一些内容，就是对台湾和香港在心理上的恐惧性。这种恐惧是非常笼统的，对整个西方世界，都非常笼统，就像“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虚伪的民主”这类的、笼统的。

台湾三条解禁令 大陆绝对不放松

我觉得，如果能够引起中共当局的真正的恐惧的，是你们台湾 1987 年以

来一路传过来的讯息。一个是取消党禁，取消文禁，还有把党部从大学里搬走。这三条，这里是绝对放松不了的。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三条完全是震动性的消息，那么他们就会想办法来专门对付这个了。

此外呢，就是别的宣传，譬如说：他刚才不是讲过这个影响是吗？最大的影响是广东，现在你们到广州去看，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很厉害的。从那里可以看得出来。就从这次的反自由化。整个广东省啊，简直是无动于衷。在内地还有些省有点恐惧，甚至还能够掀起来那么一点点小波浪。整个广东无动于衷，但它主持思想意识的省委书记，就是管文化的，本来是想动一动的，后来看到实在动不了，省长都不理他，省长根本不管这个事情啊，

后来他看看算了，算了，也就不动了。所以，这个潜移默化影响是很重要的。

还有他们在国际新闻上的处理上也常发生一些有趣的情况，最明显就是对南朝鲜学生运动的报导，南朝鲜的学生要求民主化，反对专制，是吧？可是呢，他们觉得，他们的思想方法，我可以告诉你，就是，他们是反对南朝鲜当局，而南朝鲜当局是和北朝鲜作对的，北朝鲜和我们是朋友，所以我们要报导南朝鲜的学生反对政府的这些新闻。（笑）就是这个逻辑。

亲友往来符人道 不能用政治限制

还有一次是报导波兰的团结工会，它反对波修，因为波修是苏联的小朋友，我们应该支持它吧！所以报导了很多，后来一看又觉得不太对头。（笑）

还有，像现在你们那一边封锁得很严，我们这一边讲三通，因为你们那边不敢讲啊。（笑）愈是这个时候，他为了表现自己的姿态，愈是叫得很响。

一旦你们这边不是说老兵可以探亲了吗！哎哟，你们那一边开了，这一边就开始焦急了，不信你看，下面的形势一定是这样发展。

方：像我们刚刚去广州，最近一次反自由化运动有人提出来要封锁或控制广州接收香港的一些电视，因为广州很容易看到香港的 TV，他们觉得这个影响太厉害，想把它们控制三不准接收。可是却受到相当的抵制，根本弄不了，连很多干部都反对，他们说：如果你说香港不好，你大陆 TV 才是好的，那么就来竞争啊！从这一点来看，我倒觉得这个作为一个中国人有点好处，三家，竞争竞争，有点好处。（笑）

嫻：对老百姓最好。

方：对老百姓至少可以稍为舒服一点，香港、大陆、台湾这个竞争，都是华人社会，这个有好处。

李：所以，我们就认为像统一的问题，在目前来讲可能不是主要问题，应该先把自己搞好，把三通搞好。

方：亲友可以互相来往。

李：这个人道的东西，不能够用政治来限制。

方：对，对。

徐：我个人很想了解，像你们这样观念的人，对统一是持什么样的看法？因为现在整个大陆对统一，好像已经到了一种强烈，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情况，那，你呢？你对统一，对台湾的前途这些问题有什么看法呢？

方：从中国文化的这种特点来说，我大概是倾向于统一的，可能是有这种情绪，就包括从家庭来说，再怎么矛盾最后大家还是认同，我觉得确实是有这种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也同意，现在中国首先的问题是现代化……

李：不是搞统一？

方：不是。首先解决现代化，在这个基础上，大家慢慢来。

李：水到渠成？

方：水到渠成。

嫻：我特别希望统一不是政治家们导演的一出戏。

安徽至淮北农村 吃饭问题未解决

方：特别是不要这个。我觉得中国的执政者总是说代表人民要怎么怎么的，中国历史上一贯强奸民意太厉害，说我代表谁谁谁今天一定要什么。

首先，今天中国老实讲是吃饭问题。像民主自由，我提出最多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吃饭第一，吃饭更重要。特别在农村，从安徽直到淮北那边，老百姓吃饭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苦得很啊！

真在这种情况下，你说现在不要民主要给他吃饭，我也会支持的。

李：实际的冲突也不是很大。

方：我就是说：如果真是为了吃饭，而有必要我先缓一下民主自由，我也可以。一个人要有良心啊。

戴：还有一个讯号，就是，1984年，我们的革命博物馆出了一本书，叫做《抗日战争时期的正面战场实录》，就是从那个时候，中国人才开始承认抗日战争是两家打的，就是除了八路军新四军之外也有国民党的正面战场。

这本书出了以后呢，接着就有很多研究出现了，其中包括，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写的是你们马树礼的岳父，他是1937年牺牲的一位将军，可是呢双方都不承认，这边不承认，因为他是国民党，我们因为根本不承认正面战场，

所以不承认他，你们也不承认，因为他是东北军，这很有意思。

两部电影受批评 骂共党亲国民党

后来的就慢慢比较冷静客观的看待历史了，于是就出了像《血战台儿庄》这样的好片子啦。的确很好，的确不错，但是呢，这个又遭到批评：“把国民党写得比共产党还好！”（笑）“抗日战争都是他们打的啦？”

去年下半年有两部电影，一部是《血战台儿庄》，一部是《芙蓉镇》，《芙蓉镇》就是把从解放以后历次运动怎么整人都写了，所以有的反对这样比较开放的人就说：“好，你们电影界搞了一部电影是骂共产党，一部电影是亲国民党！”（笑）这两部电影都非常叫座。（笑）

李：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我们这次来，我们说不搞政治，我们是旅游探亲，所以当我们要求访问方教授时，他们说：“方教授跟探亲没有什么关系。”（笑）我们就索性告诉他们，他在台湾出了一本书，主要是版权问题，台湾的书商说获得他授权，他说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想了解，书里面写的那么一些东西，我们也蛮有兴趣，希望他们帮我们联系。

其他的大陆学者，我相信他们不会跟我们安排。

徐：他们有没有跟你讲，中新社有没有跟你说，什么什么问题不要谈？

方：他们倒没有，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已经不可控制了。

徐：他们建议我们不要跟你谈中国政治的问题。

李：而且他甚至是温和的警告，他说，“你们跟方教授接触，就你们要求的领域啊，这个我们已经跟你安排了，方教授也同意了，但是，我建议你们，最好不要谈到现实政治的问题，这样恐怕对你们比较好。”

徐：其实，像你这样子，我们最谨慎是要给稿子给你看一下，但是很抱歉没时间，万一有什么，我们可以负担责任，我们文责自负。

（原载台湾《自立晚报》1987 年 10 月）

编者注释

[1] 李永得、徐璐：台湾《自立晚报》记者。1987 年 7 月 15 日，国民党当局宣布解除实行了 38 年的戒严体制，《自立晚报》社长吴丰山决定抢先派记者抢滩赴大陆。1987 年 9 月 14～27 日李永得，徐璐“抢跑”到大陆采访。9 月 14 日～19 日在北京采访，包括采访方励之，19 日赴杭州。吴丰山、李永得因“破冰之旅”被以“伪造文书”之名告上法庭，徐璐因持“观光护照”未被起诉，官司历时两年如愿胜诉。李永得 2008 年出任高雄市委副书记。徐璐现任台湾好基金会执行长。本文由李永得、徐璐署名发表，此处原文照录。

[2] 法语：Libreville，即自由贸易市场。

[\(返回目录\)](#)

天文学思想史片断

天文学是最古老的科学之一，几乎在各民族的早期文化中都可以发现天文学的痕迹。在天文学思想史中不仅可以找到许多重要的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的起源，而且可以看到许多社会思想的种子。甚至，在有的时期里，天文学思想的发展起着社会思想变革的先锋和主导的作用。

启蒙时期

埃及的金字塔，亚述的石碑、中国甲骨或古籍中的记载等，是可兹稽考的最老的天文文献。它们都可追溯到四、五千年之前。因此，天文记载当出现在比这些遗迹更为久远年代。

最早的天文学思想可以说是自然神论。在巴比伦、埃及、印度及中国等古文明中，都或多或少有关于天象的神话和传说。公元前 9 世纪，希腊诗人荷马的名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就记载不少在其之前的神话和传说。当然，就这些神话和传说本身而言，还不能称之为天文学。但是，这些神话和传说的存在证明：那时人类已开始不满足于被动地受治于自然，而且企图去说明自然。说明自然这一企图正是科学的发端。

原始时期的人类，意识初开，感到自然环境对自身生活的密切作用，但还不能分清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的异同，只笼统地对整个自然界有期望、有恐惧。在这种水平上，试探着去说明捉摸不定的世界，出现自然神论思想，是极自然的。至今在某些文化蒙昧地区还可以看到对天的自然神式的崇拜。

农业生产兴起之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天象变化中的一些周期性。日升月

落、春去秋来，周而复始。最早的天文科学——历法出现了。例如，公元前 10 世纪，印度就已有阴阳历，《梨俱吠陀》中把一年分为 13 个月，《鹧鸪氏梵书》中将一年分为春、热、雨、秋、寒、冬六季。这些结果使得“自然界是有规律的”这种思想发萌了。代替自然神论，规律观相信，天体的运行并不决定于神的自由意志，而是可以用规律加以描写、加以预测。这种信仰，是科学活动的第一的也是最基本的动力和动机。科学的目的是寻求事物的普遍规律，支持这种追求的最基本的信念是：世界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由理性来了解的。应当说，这种信念首先来自天文学的研究。

在启蒙时期，人类寻求规律的方法还是十分简单的，也许开始只有分类方法。首先是把经常所见的自然现象分成不变的、有规则变化的以及不规则变化的。一个最早被注意到的不变的图景是天和地之间存在确定的交界——地平线。因此，在各种原始文化的宇宙观念中都首先来讨论地平线的原因，即天地二者的构造。埃及人把地看做是田野一样的平坦的方形，漂浮在海上。中国和希伯来则以为地立在支柱上。印度是把地负在大象上。这些说法，都可以算做最早的宇宙模型。

和谐的宇宙

如果说上述的宇宙模型属于最粗浅的现象论，则古希腊天文学有明显的唯理论的色彩。对古希腊天文学有突出贡献的有爱奥尼亚学派（公元前 7～5 世纪）、毕达哥拉斯学派（公元前 6～4 世纪）、柏拉图学派（公元前 4～3 世纪）以及亚历山大学派（公元前 3～公元后 2 世纪）。

毕达哥拉斯学派首先发展了宇宙和谐观。最初，他们发现音乐的和谐是

由琴弦长度的比例决定的，此后，他们又企图把音乐与天体运动结合起来，用音乐的和谐来理解宇宙的运动，形成了天球和谐等观念。毕达哥拉斯学派首先把宇宙称之为 COSMOS，其本意是一个和谐而有规律的体系。

对于毕达哥拉斯学派，天文学首先是追求宇宙的和谐，而不是狭义地去拟合观测，亦即符合理性原则比符合经验更加重要。由此，思辨方法产生了。这种对理性的追求被称为“希腊人的奇迹”。它不仅影响了整个西方天文学随后的发展，而且是西方整个科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柏拉图是用这种方法来建立天文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例如，“为什么星体都绕着圆形轨道运动？”，对这一问题，柏拉图不是从任何宇宙模型出发来寻求回答，而是依据下述的论证：宇宙的本质是和谐的，和谐的体系应沿着绝对完美的路径运动，绝对完美的路径是圆形，因此，星体都按圆形轨道绕地球运行。这种柏拉图式的论证的要点是，从理性原则出发，用逻辑方法得出结论。他认为，只有用这种方式建立的体系才能称之为理论，才能说我们有了理解。这就是说，理论的价值标准是普遍性，普遍的理论比个别的现象更加可信。例如，有少数星体的运动并不描绘出圆形，而是走相当复杂的轨道。柏拉图学派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并不说明和谐这一理性原则错了，相反，是这些现象值得怀疑，应当去“拯救现象”。

本轮均轮解释就是“拯救现象”的一个结果。这种解释所坚持的仍然是宇宙的和谐，仍然以圆作为最完美的图形，之所以有的星体轨道不是圆，是由于这些星体一方面完成均轮圆运动，一方面完成本轮圆运动，二者的迭加使得看起来的轨道不是简单的圆了。这样，现象就被拯救了。这种追求和谐的方法对近世的科学研究也是有影响的，狄拉克曾说：“一个方程的美比之它

能拟合实验更加重要……因为，（对实验的）偏离可能是由于一些未被注意到的次要因素造成的。似乎可以说，谁只要依照追求方程的美的观点去工作，谁就确定地走在了前进的路上。”

亚里士多德天文学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但他并不像柏拉图那样轻视感觉，认为只有理念才是实物的原型，而实物仅仅是理念的反光或不完美的复本。亚里士多德曾说：“除了可以感觉到的天空、太阳和月亮以外，必然还存在着某一个天空、太阳和月亮，其他的天体也是如此。但怎么能够使人相信诸如此类的论断呢？”

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中包含三部份内容，一是宇宙结构模型，二是宇宙运行所遵循的规律，三是宇宙构成的本原。当然，后两部份也是他的物理学的重要内容。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体系，成为西方天文学的基本框架。

亚里士多德所采用宇宙结构模型是九层天，即地球处于宇宙中心，天层如水晶般地透明，里面的七层分别“居住”着月球、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及土星。第八层是众恒星“定居”的恒星天层。在这之外的第九层是作为宇宙边界的原动力天层，它以一定的速率转动着恒星天层。这一运动（因摩擦而有所减弱）逐个传给各外行星天层，然后传到太阳和各个内行星天层上。

对于宇宙构成的本原，亚里士多德发展了著名的“四元素说”，即土、水、气、火是宇宙物质的基元，每一种基元都具有达到它原来静止的“天然位置”的趋势。土在最底层（即宇宙的中心），然后依次是水、气、火。

关于宇宙运行的规律，亚里士多德注意到柏拉图的完美轨道论证是不完美的，因为，地球上的物体并不沿着圆轨道运动，而是以抛体或落体方式运动，这种轨道也不可能用本轮均轮方法加以“拯救”。为此，亚里士多德发展了两界说。月亮以下的区域是世俗的世界，在其中才能找得到四元素，世俗世界的物体的天然位置是在宇宙中心，因此，物体的运动最后都是趋向地球的中心。另外一方，月亮以上的区域是神界，其中的基本成份是以太。以太是纯净的、永远不变的，它们只能完成一种天然的完美的运动，即圆形。

亚历山大学派在思想上并没有超越亚里士多德，但在与观测对比上做得更加仔细和完整了。这个学派中最著名的代表托勒密，一方面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体系，一方面又根据喜帕恰斯等的详尽观测数据发展了这一体系。他采用偏心圆和本轮的新概念，圆满地解释了行星视运动中的顺、逆、留等现象。从此奠定了地心体系。时至今日，地心体系依旧为航海计算所使用，在大部份细节上都可以在最早的地心体系中找到其渊源。可以说，托勒密的地心体系在当时有浓厚的实用色彩，在思想上的价值并未超出亚里士多德，后来，反而是由于神学对它的利用，使它成为经院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的依据。

中心观和阴阳观

东方的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与西方有平行和呼应，但也有许多不同。一个重要的不同是西方的中心观和东方的阴阳观。

中心概念在古希腊天文学中是贯彻始终的。宇宙有中心，因此，在古希腊很早就有了地圆观，只有大地是球状的地心才可能是宇宙的中心。崇尚圆

形轨道，也因为它是中心对称的。再则，古希腊人总把宇宙看作有限的，只有有限的体系才可能存在中心。

在古代中国，阴阳说是自然观中的主导。它认为任何自然事物都是由相反相成的两方构成的，两方的地位对等，作用互补。沿用这种观念，很自然地把天和地看作构成整个宇宙的两方。“天地”和“宇宙”二词含义相近就是语义学上的一个证据。由于把天和地看成对等的两方，所以，古代中国的天文学中与地圆观的同时，还流行天地对称的平天说。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型主要有两种：盖天说和浑天说。二者没有真正地突破地平观念。唐代天文学家一行依据天文大地测量来检验浑天说及盖天说两个体系，虽然他可能已怀疑到大地平面说的正确性，但他终未明确地否定浑天说中的大地平面观。

因为不拘泥于宇宙是否有一个中心，所以中国宇宙观念中并不强调有限性，宇宙无限思想一直是存在的。宣夜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种宇宙无限观。它主张：“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深无极”，亦即宇宙的空间是无限的。

中心说着眼于次序，阴阳说着眼于相互的关系，所谓相生相克即是它的典型表述。所以，在宇宙的基本构成上，中国的传统也不同于希腊，中国的五行说的要点之一在于强调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从而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的体系，这在四元素说中是没有的。

不变观和演化观

东方和西方天文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差别在于：东方天文学认为天体是可变的，演化的，而西方则主张天体是永恒不变的。

西方的观点来自亚里士多德。因为，在他的天文学中，月上的天体都是神界之物，是完全理想的东西，故是不会变化的。只有地面附近的東西才是可变的。所以，在西方天文学里，把一切变化的天象，像彗星、陨石等等都归入大气现象，而不算作天体。也正是受到这种不变观的约束，西方天文学中从来不去研究星体的变化。除 AD1006 超新星之外，在西方古代文献中找不到任何有关新星或超新星的记录。

在古代中国，很早就有宇宙演化观，即认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宇宙是逐渐生成的。早在两千多年前老子的《道德经》中即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还只是一种哲学观念而已。《淮南子·天文训》中则有一套相当完整的天体生成观了：“天坠未形，冯冯翼翼，洞洞漏漏，故曰‘太始’。道始于虚霫，虚霫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

天体可变的思想使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有极丰富的变化的天象的记录。当然，这种记录的另一个动因是占星术。例如，早在公元前 13 世纪的殷墟甲骨中就有新星记录。可以说现代天文学兴起之前的所有关于超新星的记录，似乎都出自中国。

对宇宙的空间，西方主张有限，东方包含无限观，对宇宙的时间，东西主张正好反过来。

理性神学的作用

中世纪的欧洲对于天文学以至整个科学都没有可以称道的建树。科学都沦为神学的奴仆。对这一时期的思想，值得一提的也许是理性神学。

理性神学往往是用一些科学论断再用逻辑方法去证明神学教条的正确。这样做的结果，有时是从反面向科学提出了问题，即它往往是利用科学体系本身的弱点、困难或不足之处作为神学的根据。

例如，神学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曾以下述方式证明上帝的存在，他称为宇宙学证明，即：“在世界上，有些事物是在运动着，这在我们的感觉上是明白的，也是确实的。凡事物运动，总是受其他事物推动。……如果一事物本身在动，而又必受其他事物推动，那末其他事物又必定受另一其他事物推动。但我们在此决不能一个一个地推到无限。……所以，最后追到有一个不受其他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这是必然的。每个人都知道，这第一推动者就是上帝。”这个论证的前一半完全出自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后一半的结论恰是由于缺乏科学的宇宙起源说而给上帝留下了位置。

又如，托勒密的地心体系曾被神学家奉为正统，是宗教的宇宙观的基础。这主要是因为，《圣经》上说，人是上帝的子民。因此，人应当生活在宇宙的中心。地心说正好体现了这种宗教的人类中心观。人类中心思想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远古。因为，人的观察总是以人为出发点的，所以，出现人类中心观并不值得奇怪。但是，神学把人类中心作为它的一块基石，也正是因为对人类中心观缺乏科学的研究，从而为神学提供了方便。

天文学的复兴

近代天文学的兴起是随着文艺复兴一起来的。因而，那一阶段的天文学思想，像整个文艺复兴一样，具有浓厚的古希腊精神色彩。

哥白尼说，他推翻地心说，倡导日心说，其动机是追求宇宙的和谐。首

先，宇宙和谐要求自然界具有统一性，即如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中主张的“多种现象归于同一原因”。然而，在地心系中，为了解释行星的运动，不但要假定许多的均轮和本轮，而且不同行星的本轮和均轮又以不同方式运动。这就不符合现在应有“同一的原理和假说”这种和谐观。

其次，宇宙的和谐认为自然界应当具有“最完美的形状”和“令人赞叹的对称性”。而在地心系中，却要用复杂的迭加才能说明行星的运动，这就破坏了整个体系的简洁，圆满和均衡。这些就形成哥白尼认为地心说不合理的主要根据。

在日心体系中，地球是一颗普通的行星，和别的行星一样，都绕着太阳而旋转。这一观念的问世，使人类从自我为中心的沉湎状态中清醒，也使人类从宗教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因此，哥白尼的日心论著作《天体运行论》，被恩格斯誉为“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同年，即 1543 年，意大利维萨留斯也出版了《人体结构》一书，这一年在科学思想史上是中世纪结束和近代科学时期开始的标志。

随后，日心体系差不多经过一百多年的反复和曲折才最终取得成功。在这一时期里，天文学一方面是进行越来越多的观测和分析用以检验日心说、发展日心说，另一方面，则是在思想上以至政治上对宗教的压制进行抗争。因为，日心说不见容于神学教义，所以，日心观与地心观两种宇宙体系之间的思想论争，直接地具有了社会进步力量对保守力量进行抗争的政治含义。因此，日心说的成功，对西方文化和思想发展的作用，远远超过了科学领域。可以说，这是天文学思想对人类进步的一次最大的贡献。

完整的因果链条

哥白尼建立了一个正确的宇宙模型，即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三部份内容中的第一部份。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等工作则完成了第二部份，即宇宙运行的规律。

从思想上说，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的主张是逐渐从宇宙和谐观转向动力学的因果论。和谐观的基本框架是：“宇宙为什么这样，因为这是和谐的”。因果论则是：“宇宙为什么这样，因为过去是那样”。从研究方法上说，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是逐渐从思辨方法转向实证方法。

开普勒曾在最原始的含义下使用宇宙和谐观，即认为行星的运动应具有音乐那样的和谐旋律。根据这种信念，他建立了一个正多面体宇宙模型用来说明行星轨道半径之比。这种宇宙模型虽已被证明并不正确。但这种观念使他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条定律，为牛顿力学的建立提供了最关键的基础。

伽利略是第一个用望远镜观测天体的人，由此开始了望远镜天文学时代。伽利略的观测为日心说提供了新的证据。更重要的是，伽利略发现，月上的世界并非理想的，行星并不具有绝对完美的形式，太阳上也有黑子。这就动摇了亚里士多德的两界说。此外，伽利略还用思辨的方法证明亚里士多德的论断“重物下落得快，轻物下落得慢”是错误的。这样，整个亚里士多德的宇宙理论被证明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天文学需要新的理论为基础。

牛顿的万有引力及力学体系就是在上述的背景上产生的。牛顿反对两界说，认为天体和地上的物体没有质的差别，它们都遵循相同的规律。牛顿力学就是这样的规律，它给哥白尼的日心说、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以及伽利略的落体规律找到了统一的动力学基础。特别地，后来依据牛顿力学预言

海王星存在而且立被证实，使从哥白尼日心说到牛顿力学这一段科学历史中的思想和方法成为整个近代科学的规范。爱因斯坦曾这样总结这一段历史：“古代希腊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坚持主张：一切物质事件都应当归结为一系列有规律的原子运动，而不允许把任何生物的意志作为独立的原因。而且无疑笛卡尔按他自己的方式重新探索过这一问题。但在当时它始终不过是一个大胆的奢望，一个哲学学派的成问题的理想而已。在牛顿之前，还没有什么实际的结果来支持那种认为物理因果关系有完整链条的信念。”

宇宙的完整因果链条的一节既已被找到，天文学就逐渐进入现代时期。

现代时期

19 世纪以来，天文学又有飞快的发现。像古代的天文学一样，现代天文学也总是不断发现人类的一些习以为常的观念是不对的，是由于生活范围窄小造成的。因而，天文学中产生的思想总是有强的社会意义。近一个世纪以来产生于天文学研究思想和观念有：

- (1) 宇宙空间并不一定是欧几里得无限的，也可能是有限而无界的；
- (2) 宇宙在大尺度上并不是静止的或周期运动的；
- (3) 恒星有有限的年龄，宇宙间各种物质都有有限年龄，不是永恒的；即宇宙在时间上可能有限；
- (4) 宇宙间总的演化趋势是从简单到复杂，宇宙万物可能都是从宇宙极早期最单纯对称的状态演化来的；
- (5) 两界说不正确，但天体上的确有极端不同于地上的物质形态，如中子星及可能存在的黑洞；

(6) 人类中心论不正确，但必需考虑到我们研究的宇宙必定是人存在着的宇宙，即人择原理。

(与赵良庆合著，原载《科学史论集》1987 年 10 月)

[\(返回目录\)](#)

宇宙为何不热死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一个宇宙学结论是：宇宙整体将从有序向无序演化，最终处于热死。然而，大爆炸宇宙学表明，迄今宇宙的演化方向是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从无结构（混沌）到有结构。宇宙演化方向之所以不同于热死说，关键在于宇宙是膨胀的。在膨胀的背景中，物态有可能从热平衡变到非热平衡。更进一步说，引力会对热力学带来一系列根本性的影响，如存在负热容物体，不存在热平衡等。

科学的“恐惧”

有一种公认或默认的看法，科学越发展，知识越多，就会使人在面对大自然时越具有信心，越具有安全感。因为，科学是造福于人类的嘛！然而，认真说，也有相反的现象。有时候，科学知识反而会引起无知状态时所没有的恐惧感，比如，当今流行的核恐惧，不能不说与核科学的发展和普及有关。一百多年前，也有过一次科学的“恐惧”，即热死恐惧。

热死恐惧是由热力学带来的。1854年，当时热力学第二定律刚刚确立，亥姆霍兹([H. F. Helmholtz], 1821年~1894年)在一次演讲中就谈到：热力学第二定律意味着整个宇宙最终将处于温度均匀的状态，并且，“自此以后，宇宙将陷入永恒的静止状态”，即热死状态。

从热力学第二定律推论到宇宙热死，是很直截了当的。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一个孤立的体系，如果原来其中各部份的温度不同，演化的结果一定是温度均匀化，即处处一样；相反，如果体系的温度已经处处一样，绝不会

自动演变成温度不一样。一杯放在房间中的水，无论原来是冷是热，它的温度最后一定与室温一样，而相反的过程，是不存在的。总之，一个体系会自动地从非热平衡（温度不同）演化到热平衡（温度相同），但相反的演化是不可能的。把这个结论用到整个宇宙上，结论就是宇宙各处的温度处于相同，走向热死。

热死说一出，震动很大，因为它是基于严谨科学而预言的“世界末日”（fin de Siecle）。由热死而引起的悲观情绪一时竟成了社会问题。不仅自然科学家关心，人文学者同样地关心。以致斯诺（[C. P. Snow], 1905 年～1980 年）在他的著名演说《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中曾提到：一位对热力学第二定律一无所知的人文学者和一位对莎士比亚一无所知的自然科学家同样地糟糕。甚至诗人斯温伯尔尼（[A. C. Swinburne], 1837 年～1909 年）也有描写热死宇宙的篇章：

不论是星星还是太阳
都将不再升起，
到处是黑暗一片，
没有溪流的潺潺，
没有声响，也没有景色
没有冬天的枯叶
也没有春天的嫩枝
没有白天
没有白天劳动的欢乐，
甚至没有夜晚，

因为没有夜晚的梦幻。

从此，热力学第二定律被视为堕落的渊藪。因为它断言，一切都不能免于从有秩序走向无秩序，从整齐走向混乱。或者，像美国历史学家亚当斯([H. Adams]，1850 年～1901 年)所概括的：“这条原理（指热力学第二定律）只意味着废墟的体积不断增大”。甚至有人更引伸说，热力学第二定律表明人种将从坏变得更坏，最终都要绝灭。在 19 世纪末期，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由它导出的热死说，是社会声誉最坏的科学定律。

因此，从上个世纪开始，就不断有人提出各种方案或假说，用以证明热死只是一个佯谬，证明宇宙是不热死的。这些努力都十分值得钦佩。因为，它们若成功了，不仅拯救了物理学的名声，而且也“拯救了整个人类”。

运动不等于发展

有一种简单的“拯救”哲学，认为只要运动不灭成立，就不会热死。一种典型的表述如下，“既然粒子都是永恒地运动的，那末，就不可能设想由这些粒子所构成的体系反而会处在绝对不变的状态之中”云云。

这种“拯救”是错误的。

错误的关键是把运动和发展两个概念混同了。运动有两种类型，一类是非发展的，一类是发展的。所谓非发展的运动即循环往复的，重复的，可逆的。例如，钟摆的振荡，行星绕太阳的旋转等等。发展式的运动是非循环的，非重复的，不可逆的。生物物种的演化就是一种发展，它是从低级简单到高级复杂的不可逆的变化。运动不灭原理只保证粒子将不停地运动，并不保证这种运动是发展的。

运动不灭原理并不能推翻热死说。热死是一种有运动而无发展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粒子不停地运动，而整个体系却是不发展的，不变的，它不与运动不灭原理矛盾。这就是运动和发展二者的不同。可以说，热死说正是由于对运动和发展二者的认识深化而带来的“灾难”。

在热力学中，运动和发展二者的性质分别由热力学第一定律及第二定律所规定。热力学第一定律就是运动不灭原理。热力学第二定律则是关于发展方向的规律。利用第一定律并不能排除第二定律的热死结论。

宇宙的演化方向

我们生活的世界，不但是运动的，也是发展的。不但有周期的运动，也有不可逆的变化。整个的宇宙，也是运动的，发展的。问题是，宇宙演化的方向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预言正好相反。如前面讲的，第二定律预言，一个孤立体系的演化或发展方向是从温度不均匀变到均匀，从物质分布不均匀变到均匀，从复杂变到单一，即这种发展必定是退化式的。宇宙整体是孤立体系，所以，按理它的发展也应是退化式的。

这个结论与日常经验矛盾，也与现代宇宙学矛盾。宇宙是进化的，即从温度均匀状态演化到非均匀状态，从物质分布均匀状态演化到非均匀的有结构的状态，从混沌演化到复杂。

在肉眼可见的天空里，物质分布显然是不均匀的，在星球上物质密度很高，在星球际空间里只有少量的物质。密度高低之比可达十倍、百倍，甚至千倍以上，这就是物质分布的非均匀的度量。

1965 年发现宇宙中弥漫着分布均匀的辐射，它的温度大约是 3K，即所

谓微波背景辐射。因为这种辐射来自宇宙早期，是宇宙早期的遗迹。所以，背景辐射的均匀性直接证明了在宇宙早期物质分布是相当均匀的。从 1965 年到现在，已 20 多年了，越来越多的观测证明微波背景是高度均匀的，今天已知它的非均匀性不超过 10^{-5} ，即十万分之一。

宇宙为什么能从温度密度非均匀性不超过 10^{-5} 的状态演化到非均匀性高达 $10 \sim 10^3$ 的状态？这是不是同热力学第二定律矛盾？

更进一步，从微波背景辐射的存在还可以断言，宇宙早期的物质成份也是简单的。今天的自然界中存在着几十种化学元素，各种天体都是由它们构成的。但是，在早期宇宙，这些元素都不存在，它们是在宇宙演化过程中逐一生成的。这又是一个从简单向复杂演化的例证。

热大爆炸宇宙学所描绘的宇宙演化图景，从整体说，就是从简单到复杂。今天宇宙里存在的万事万物，原来都是没有的，都是在宇宙演化过程中形成的，都是从原初的简单均匀的状态生成的。所以，不仅热死说，甚至整个热力学第二定律似乎都与宇宙学不相容！

膨胀宇宙的热力学

热力学和宇宙学相容的关键是宇宙膨胀。热力学的结论——发展应是退化的——是在静态空间下证明的。若空间是膨胀的，则可以证明，进化式的演化是可能的，亦即：



现在我们来证明这个关系。

考虑一种简单情况。在一定的空间里有两类物质，比如，一种是辐射，一种是粒子。如果两类物质的温度是不一样的，辐射温度 T_r 不等于粒子温度 T_m ，即

$$T_r \neq T_m$$

显然，按照热力学，经过一段时间后，两种温度必定变得一样，即

$$T_r = T_m$$

这就是退化式的演化。

可是，如果上述空间是膨胀的，结论就完全不同了。膨胀将使各类物质的温度降低，一般说，不同物质的温度随着膨胀而降低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辐射温度随膨胀降低得较慢，而粒子较快。也就是说，随着宇宙的膨胀，辐射和粒子的温度变化方式是不一样的，不是时时相同的。这样，哪怕最初 $T_r = T_m$ ，由于宇宙膨胀也会造成

$$T_r > T_m$$

即产生了温度差。这同静止空间的热力学结论正好相反，温度从均匀变成非均匀了！

有人会反驳：膨胀所产生的两类物质的温度差，并不能保持，它们将由辐射与粒子之间的碰撞而消失，最后仍达到热平衡，各种物质的温度都一样。的确，辐射与粒子之间的作用会导致温度均匀化，但是，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达到均匀所需的时间比宇宙膨胀的时标还长，则辐射和粒子之间就永远不可能达到热平衡。在这种条件下，宇宙总体的演化是从热平衡变到非热平衡。这样，进化式的演化，就成为可能。

宇宙膨胀是引力理论的一个结果。因此，归根结底，我们可以说，考虑引力相互作用后，就可能避免退化及热死。表 1 中概括了整个问题的逻辑关系。

表一 演化的理论根据

理论基础	能否说明进化的演化
纯引力	不能（循环运动）
无引力的热力学	不能（热死）
引力+热力学	有可能（免于热死）

表一告诉我们，引力相互作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引力的热力学与无引力的热力学会有十分不同的结论。

加热则变冷，放热则升温

现在我们更仔细地看看引力对热力学的作用。

先从太阳说起。太阳与地面物体不同，它是靠引力维系的，太阳之所以成为一个整体，不会散掉，是由于太阳中的物质之间的引力。由自身物质引力而维系的体系，称为自引力体系。宇宙间的天体或天体系统大多是自引力体系。例如，星团是由许多恒星构成的体系，星团是靠其中的恒星之间的引力而维系的。又如，星系团是许多星系构成的，星系团是靠其中的星系之间的引力而维系的。

当自引力体系在稳定状态时，也具有确定的温度，按照热力学，温度是由体系中的粒子的平均速度决定，速度越大，相应的温度越高。太阳的温度取决于构成太阳的粒子的平均速度；星团的“温度”取决于构成星系团的星

系的平均速度。自引力体系有个非常特别的性质，即：

给自引力体系能量，则其中粒子的平均速度变小；由自引力体系取能，则粒子平均速度反而变大。

所谓“给自引力体系能量”，相当于向该体系加热，而“由自引力体系取能”相当于从自引力体系取热。另外，“粒子平均速度变小”相当于体系温度变低，“粒子平均速度变大”，相当于体系温度变高。所以，上述性质可以改写成：

向自引力体系加热，则体系变冷；从自引力体系取热，则体系变热。

这个性质与日常看到的物体是完全不同的。日常经验是：加热则升温；放热则冷却。而自引力体系却是：加热则变冷，放热则升温。太阳是个典型的自引力体系，所以，如果让太阳内部的核反应停止，即没有能源，则太阳将由于辐射而失去能量，结果太阳不但不变冷，反而温度会升高，变得更热。

没有热平衡

回想一下物体的热容量的定义。一个物体若吸收了热量 Q ，它的温度升高为 ΔT ，则它的热容量就是

$$C = \frac{Q}{\Delta T}$$

一般的物体，都是吸热 ($Q > 0$) 则升温 ($\Delta T > 0$)，放热 ($Q < 0$) 则降温 ($\Delta T < 0$)，所以，热容量 C 是正的。相反，如果物体是吸热 ($Q > 0$) 降温 ($\Delta T < 0$)，放热 ($Q < 0$) 升温 ($\Delta T > 0$)，则它的热容量 C 就是负的。

负热容物体的存在，对于热力学有根本性的影响。我们考虑一个体系，其中包含有正热容物体，也有负热容物体。例如，物体甲具有正热容，物体

乙具有负热容。若整个体系处于热平衡，则甲和乙的温度相同。热平衡都是动态的平衡，即甲乙之间有能量交换，但交换的数量相等，相互抵消，维持平衡。更仔细些说，甲的辐射被乙吸收，乙的辐射被甲吸收，二者数量相同，所以总的效果为零。

甲乙之间交换的能量，总不免会有小的起伏。譬如，甲辐射给乙的能量有时可能略大于乙辐射给甲的，总的效果是乙多吸收了一点能量。如果乙是正热容物体，则多吸收能量会导致乙温度升高，从而乙的辐射也增强（因辐射强度比例于温度），结果抵消了多吸收的能量，又回到平衡。这就是说，如果甲乙都是正热容物质，小的起伏并不会破坏热平衡。

如果乙是负热容的，情况就不同了。这时，它多吸收了一些能量，反而使它的温度下降，辐射变小，即更加不能抵消甲多给乙的能量。如此恶性循环下去，乙的温度将越来越低，破坏了原来的平衡。

总之，由甲（正热容）乙（负热容）所构成的体系的热平衡是不稳定的，稍有起伏就会彻底破坏平衡，出现温差。更一般地说，只要有自引力体系存在，原则上就不存在稳定的热平衡。

热平衡的存在对整个热力学是至关重要的，热平衡是热力学的出发点。而对于引力起决定作用的体系，实际上不存在热力学意义上的热平衡态，而是不稳定的状态。因此，对于这种体系，一些热力学的推论失效，是不奇怪的了。

结构的生成

最后，我们再讨论一个对宇宙学有价值的例子。

一箱气体，其中包含许多分子。如果气体分子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即有的地方密，有的地方稀。演化的结果是气体分子分布变成均匀的，没有结构的。所有的不均匀，有结构的特征都将被抹平。这就是说，热力学第二定律所决定的演化方式是：

有结构→无结构

还是考虑这箱气体。如果气体分子之间的引力作用不能忽略，而且起主导作用，结果将完全不同。假定气体分子的分布开始是均匀的，无结构的。在没有引力时，这是平衡态。而在引力主导的条件下，均匀分布状态并不是稳定的。因为，只要在某个局部区域内，由于起伏，密度变得稍高一点，则这个区域的引力就变得更强烈些，也就会吸收更多的物质，形成更高的密度，从而破坏平衡。相反，若某个区域里，由于起伏，密度减低了一点，则其引力变弱，就会有更多的物质逃离这个区域，形成更低的密度，也破坏了均匀。总之，小的密度起伏就会彻底破坏均匀状态。可见，在引力主导的体系中，演化的方向是：

无结构→有结构

在宇宙范围，引力是主导的，所以，哪怕宇宙开初是均匀的，无结构的，它也会生长出非均匀的，有结构的状态。各种尺度上的星体或星体体系，就是依靠这种非均匀化的过程聚集而成的。从早期的均匀的宇宙到现在的非均匀的宇宙，就是这样演化的。

至此，我们可以从相当原则的高度来回答整个的热死问题了。

为什么世界并不像热死预言的那样，从复杂到简单，而是从简单到复杂？因为有引力。

为什么世界并不像热死预言的那样，从有序到无序，而是从无序（混沌）到有序（有结构）？因为有引力。

为什么世界并不像热死预言那样，从非热平衡到热平衡，而是从热平衡变成非热平衡？也是因为引力。

当然，可以进一步追问，引力为什么得以有此“回天之术”，保证着宇宙的进化？有了引力之后，热力学应如何重整？引力会不会带来新的“世界末日恐惧”？应当承认，这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至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引力理论。不过，无论如何，这些未尽之业已不再属于热死说，而是新的一章了。在物理学中，热死说的一页，已被翻过去了。

参考文献

[1] 方励之，鲁菲尼. 相对论天体物理的基本概念.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2] 温伯格. 引力论和宇宙论. 科学出版社，1980.

[3] 方励之，李淑娴. 宇宙的创生. 科学出版社，1987.

[4] Henry Adams. The degradation of the democratic dogma.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Putnam.s), 1958.

[5] B. Gal-Or. The crisis reversibility and time anisotropy// Science: 1972, 176(11).

[6] E. Hiebert. The uses and abuses of thermodynamics in religion// Daedalus: Fall, 1966, 95(4): 1046--1048.

[7] F. O. Foenig.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of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 H. M. Evans. Men and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e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9.

[8] I.Prigogine. From being to becoming. NewYork: Freeman&Co., 1980.

[9] G.Marx. Irreversibility of the cosmological expansion. H.Sat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 A: 1987,2(133).

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88 年第 1 期

[\(返回目录\)](#)

两岸竞争有好处

——在北京接受台湾《联合报》社长张作锦电话采访^[1]

在美国打国际电话诚然方便，但是打到北京找方励之教授可不容易。

“北京天文台”接电话的人总说他不在。打到他宿舍需要总机接转，也费周章。但台北时间 15 日晚上 9 时，记者经过 10 多次努力后，终于和他联络上了。

我们谈话主题是蒋故总统经国先生辞世、台湾和大陆间未来的关系、大陆的改革及青年活动等。

为了怕长途电话因“线路影响”中断了谈话，所以，记者的问题较为简短，讨论也许不够深入，但是，这位“中国的萨哈罗夫”，仍然提供了我们一些有代表性的意见。

问答摘要如下：

问：蒋经国总统在台湾过世了，这件事大陆上大概知道了吧？

答：已经知道了。

问：您觉得蒋总统逝世，对整个中国局势的发展，尤其和平统一，影响如何？

答：对蒋经国先生个人，我不够了解，不过在共同的中国文化之下，中国人有要求统一的趋向，至于政治上的困难，那就要靠双方面领导人去解决了。我自己，对台湾的经济发展，印象深刻。

问：除了经济方面，您对台湾还有什么了解？

答：根据我们在大陆上得到的消息，虽然不够全面，但知道台湾的民主

化颇有进展，如开放党禁、报禁、准许探亲，作为中国人来说，是很高兴的事。

问：台湾的这些作为，对大陆是否有影响？

答：一定是有的。大陆和台湾在一个文化背景之下，大陆上很多人的亲友在台湾，对那边发生的事当然关切。

问：除了这些之外，在政治意义上，对大陆是否有影响？

答：目前中国是由两个政党在（海峡）两边分别治理，彼此竞争总是有好处的——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彼此竞争，我想都有好处。

问：台湾有些人主张独立，您对这一点看法如何？

答：如刚才我所说，中国文化，使中国人趋向要求统一。我去欧洲次数较多，就拿欧洲来说，他们有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之后，出现了经济共同体，现在西欧几乎没有国界了。中国经济发展到一适当程度，统一就更容易。

问：从您发表过的言论中体会，您好像是认为，中共体制如不改革，其他改革似不可能。在“十三大”之后，中共说明仍继续追求革新，您对大陆革新前途的看法如何？

答：改革不是很容易的事。中国（大陆）的改革，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现在也快十年了。实在说，中国倡导改革，已经 100 多年了……（听不清楚）如把中国放在世界潮流上看，在这个意义上，我很乐观。特别现在东亚各国，经济上、政治上都有很好的发展，也可增进仿效。当然，大陆在实际改革的过程中，我相信（强调）一定会有相当的曲折。

问：现在您还是认为若制度不改，其他改革都很困难吗？

答：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看法，而是一般人的理解，也许个人理解的深度

不同。譬如“计划经济”，现在就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好方法了。从这点看来，很多地方已从根本上改了。

问：您在大陆上对青年甚有号召力，您对他们近年活动的评价如何？

答：中国大陆的青年人，像历代青年一样，关心国事。中国的青年，尤其近一百多年来的青年，有多次表现，每一次表现都出于一种责任感，都代表一种觉醒与努力。从这长远来看，大陆青年们的活动，当然会发生一定的影响。

问：大陆留美学生杨巍，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两年，您对此有何评论？

答：由于审判不公开，我不了解详情，以后遇有这种事，应公开审判。

问：您不久前回到合肥（中国）科技大学演讲，受到学生热烈欢迎，他们对您的遭遇有何表示？

答：（笑）他们很关切我。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事不重要，他们关心的是比较全面的。

问：您最近有什么计划？

答：我仍旧继续做研究工作，还是很忙。

问：最近您出国，未被核准，以后还有机会出国吗？

答：我只是前两次未出去。最近还有别的国际会议要开，不过尚未接到核准通知。

问：在国外，尤其是外国新闻界，把您称为“中国的萨哈罗夫”，您的想法如何？

答：（笑）外国记者也这样问我。其实就是不同政见者[Dissident]；我告

诉外国记者，这是中西文化不同，中国自然在政治上有持批评态度的人，不过没有把他们叫做“持不同意见者”，那太罗嗦了。

问：您有一本自选集在台湾出版，如果台湾或国外其他地方要出版您的书，您同意吗？

答：事实上，我在国外已出版过 6 本书，多数都是专业性书籍，不过也有不太专业的。最近，新加坡要为我出版一本哲学方面的书。

（原载台湾《联合报》1988 年 1 月 16 日）

编者注释

[1]张作锦,台湾《联合报》顾问,《联合晚报》副董事长。张先生是台湾受人尊敬的意见领袖及“文胆”,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以专业记者为终身职志,认为身为新闻从业者,面对吾土吾民,应该有谭嗣同“愿将此身化明月,照君车马渡关河”那样的责任和抱负。张曾历任《联合报》采访主任、总编辑、纽约《世界日报》总编辑、《联合晚报》、《香港联合报》和台湾《联合报》社长。

本文以张作锦署名发表,原文照录。

[\(返回目录\)](#)

知识分子是受剥削最重的阶层

——在北京中科院新居接受《镜报月刊》沈绮采访的报道^[1]

方励之、李淑娴迁新居

记者（编者注：沈绮）最近在北京会见了一些科学文化界人士，交谈话题，无不涉及知识分子的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和物价上涨等社会问题。中心思想是：目前政府虽然调整政策，强调要重视教育，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改善知识分子待遇，但落实这些政策仍有很大距离。实际生活中，仍是“知识不值钱”，高级知识分子工资低于体力劳动者工资；或者只重视知识分子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而并不重视知识分子在以时代为背景的精神文化建设方面所起的作用和发生的影响。在这些科学文化界人士中，赫赫有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仍然特别强调知识分子本身的社会责任，同时还针对目前存在的学术论著稿费低廉的问题，尖锐指出知识分子正受到剥削。

方励之和他的夫人、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李淑娴刚从他们住了十几年的蜗室，搬到中国科学院新建高层宿舍楼的一套四室二厅新居。每个房间都用米色或淡洋红色凸花图案墙纸装饰，配以精致的吊灯和拖地白纱窗帘，陈设着新制红木色书桌、书柜和衣柜；宽大的会客室的地毯、沙发全属高档；厨房、盥洗间也全是白磁砖墙，整套居室色调柔和、雅致，显得舒适、宜人。这样的住宅，在国外不足为奇，而对北京的知识分子来说，则已相当高级了。我不禁惊喜，向两位学者祝贺。李淑娴告诉记者：文革中，中国科技大学被迁往安徽合肥，方励之随同前往，一去 18 年，而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留在北

京，执教北大物理系。去年方励之被开除出党，调离科技大学副校长职位，回到北京天文台当研究员，这才结束了他们长达 18 年的两地分居生活，而且在各方关怀呼吁下，根据方励之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科学院分配给他们这套住宅，真可谓因祸得福。

装电话索百万“电缆费”

李淑娴说：原来这套居室也都是普通白色粉墙，是经过他们自己倾多年全部积蓄加以装修，才有今日面貌。方励之说：“如果中国的科学家、教授都能住上这样的房间，则很不错了”。看得出来，两位学者对自己的新居相当心满意足。唯一的缺憾是没有电话，据说市电话局向中科院索要一百万元电缆费，才能为这栋 12 层新楼安装电话，科学院拿不出这笔巨款，只好让住在这里的科学家们耳目不灵了。

记者访问方励之夫妇那天，恰逢方励之被开除出党一周年。去年 1 月 20 日，中国新闻媒介统一发布了中共中央根据方励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而将其开除出党的消息（另外两位著名知识分子王若望和刘宾雁也在这前后几天内被开除出党），引起海内外的震惊和疑虑。现在事过境迁，风平浪静，记者问方励之是否有所思、有所感。方励之说：“当时不少朋友来看我，一方面表示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一方面又劝我今后不要再说这些话了，因为说了没用，反惹来麻烦，我并不以为然。今天，经过一年的反复思考和实践检验；我仍然认为：关心社会进步，对社会现象和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提供决策者参考，是每个有觉悟的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至于说的意见对不对，说的时机、场合、对象不符合形势要求，是否有利于安定团

结，则完全可以研究讨论。如果说共产党员是有觉悟的先进分子，那么他们必然是有头脑的，就不应该限制他们只能按照一种模式去思想、去说话。而有觉悟的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也不应该因为想了不能说，说了也没用，便不去想，不去说，凡事保持沉默，采取逃避责任的态度，当然更不应该专说好听的”。

方励之现在“里通宇宙”

记者去到方家时，会客室中已有几位朋友在座。这时一位画家朋友幽默地插话：“关心社会问题，必须学会走钢丝。方兄没有学会这种本领，便从钢丝上掉下来了”。引起一阵笑声，方励之也笑着说：“我是掉下来了，但我并没泄气。我仍然坚持知识分子是一种独立的力量，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观点。因为知识在今天的社会发展（包括文化、经济等方面）中，越来越占有决定性的地位。虽然随着“向钱看”的潮流，有些知识分子也陷入了重财轻德的泥坑，有所堕落。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整体概念，知识分子肩负着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重任，而且也总在起着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因此，有觉悟的知识分子应该敢想敢说，既做决策者的待命战士，又作决策者的智囊参谋”。他根据不少知识分子至今还存在怕挨整的心理，是由于现在虽然不提“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了，而实际生活中却仍然存在不少当年阶级斗争的做法，颇有解嘲之意地说了自己是怎样考虑这个问题的。他说：“我现在除了‘教授’这块牌子，已没什么好整的了。一是我的工资比北京平均消费线人均 89 元的标准多不了多少，总不能再扣发这点工资而不让我吃饭；二是我 50 已过，按 50 以上不再下放劳动的规定，大概不会再将我下放农村劳动改

造了；三是我研究的学科理论是公开的，绝对扣不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因此对我也没有什么好整的了，也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画家朋友再次幽默插话：“你不是里通外国，却是里通宇宙”，又引起一阵哈哈大笑。室内谈话的气氛十分轻松，有记者在场也并不拘束。虽然这是一次初访，但从方励之的言谈、气质、心境，记者发现这位学者性格开朗、善良、不工心计。也许由于他是研究天体的，因而胸怀也应足容宇宙、忧乐天下。他宏观展望人类发展前景，微观窥透社会前进的暗礁。他以学者的执拗脾气，坚持知识分子阶层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应予以重视；又殷切期望社会能理解知识分子，实事求是地对待知识分子的优缺点。当然他也会有被某些歧视知识或不尊重知识分子的现象和问题激怒的时候。最近，他就为自己写的一本科学著作翻译出版的稿酬问题发了火。

知识分子正受到剥削

方励之曾经写过一本介绍物理科学基础知识的书：《从牛顿定律到爱因斯坦相对论》，受到海内外读者的欢迎。除大陆一家出版社一版、再版外，香港也翻印出版了这本书，并在封底上介绍此书：“1987年出版的10本好书之一”。新加坡也出版了此书的英译本。大陆这家出版社通过出版方励之的这本著作，确实赚了不少人民币和外汇，其全部收入不清楚，仅据新加坡出版商说，他们一次就付给大陆出版社五千美元。但作者方励之本人得到了多少稿费报酬呢？实在少得可怜。除国内出第一版和香港翻印出版时各给了500元外，新加坡出版英译本时，竟只给了196元8角人民币。即使按照出版社的算法，提供的稿纸和样书都应折价200元算作稿费，也一共不过400元，折合美金

不过 100 元。加上译者的翻译费（当时方励之没时间自译，由出版社另请译者，方励之为之校订）1,000 元人民币，折合美金不到 300 元。其余 4,600 美元便全部成为这家出版社的利润收入了。但是，无论是香港翻印，还是新加坡出版译著，这家出版社除签一纸合同，做些组织工作外，并未花多少成本。而其远远超过作者稿费几十倍的手续费收入，难道不都是剥削作者所得么？方励之谈到这一情况时，按捺不住心头的不平而大声疾呼：“我们知识分子已成为受剥削最重的阶层了，可还有人说我们搞科研工作不产生经济效益，只值这点钱”。他一气之下，郑重宣布：今后他的外文译著将直接拿到国外去出版，以示抗议。他说：“我不是为了钱，我也不怕有人说我不爱国，我只是为了抗议这种稿费政策，抗议这种稿费政策对知识分子的超重剥削”。

知识分子应敢讲真话

可能就是这种敢想、敢说、敢干的勇气，使得方励之虽然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而开除出党，他却仍然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和崇拜。去年，他去广州出席“引力物理国际会议”，被邀请在某宾馆作学术报告时，报告一结束，为了避免被群众包围提问、签名、握手，他当即被保护着坐上汽车从地道溜走。他应邀去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作纯学术报告时，也由于同样的考虑，只为他安排了一个最多能容纳百人的楼上讲堂，以致向隅者挤满了走廊、楼梯。方励之不得不同样内容再讲一次，再讲一次，连续讲了五次，还是不能满足听众要求。据说有关方面不得不派出数十名“工作人员”前往保护和维持秩序。为不让学生迎送，学校当局特派专车将方励之从无锡市直接接到合肥。当他准备乘机返京时，机场为之戒严，无机票者一律不许进入候

机楼。方励之风趣地说：“人们都说我们知识分子说话不起作用，我看作用不小，我只不过说了几句真话，便受到如此重视。因此我们知识分子还是应该敢讲真话”。

（原载香港《镜报月刊》1988年3月号）

编者注释

[1] 本文由沈琦署名发表。

[\(返回目录\)](#)

给黄雨川先生的一封信^[1]

雨川先生：

元月十九日大札收读，后来又收到贵会^[2]员陆铿先生、杨力宇先生的电话，十分感谢你们的盛意。对贵会给予的奖励，我感到很高兴、很欣慰、很光荣，然而，请恕我不能亲来三藩，参加盛典，其原因我已在电话中告及陆、杨二位先生了。

为了表示谢意，趁此机会，芜词几句，谨作为对盛典的一点贡献。

贵会倡导民主教育，我认为极是，对中国它是更必要、更有价值的。

民主一词在中国已有不短的历史，我记得，我参加的第一个政治性组织，就是以民主命名的，即民主青年联盟。虽然，那时候（1949年初）我还只是一个不到13岁的初中三年级学生，对社会、对政治，所知尚少。但是，至少已经明白，民主是社会进步所必需的，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标志。

有趣的是，38年后的1987年，这个初中学生都懂得的道理，竟被堂而皇之地批判。我做了一个小统计，1987年在中国公开出版的报刊（指大陆范围）中，批判民主、自由的文章的数目，远比批判独裁寡头的文章要多，似乎前者比后者对社会更有害。再举一个小例子，去年11月我去合肥回科技大学，在朋友们欢迎我的茶会上，一位同事唱了一首苏联十月革命时的流行歌——《光明赞》。此事后来受到有关方面的查问。据说，查问者的理由是，歌词中有“自由”一词，即“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这就是“民主”、“自由”在今日的遭遇之一。可见，目前还多么需要那怕只有初中水平的民主教育ABC。

另外，还有不少关于民主的高论，在去年被广泛地重复。例如：中国的

大学生不懂什么是民主、自由，老百姓更不需要民主；现在是搞经济，独裁政治更有效；从文化背景看，中国人有了民主也不会用……。总之，民主是不适用于“中国”的西洋货。

这些高论，使我想起一段历史。大约 300 年前，当近代天文学开始闯入中国的时候，有人极力反对基于近代天文学而制定的历法，仍然主张沿用宋代理学家邵雍先天象数的“皇极经世”来制历。他们的理由是，西方的科学不适用于中国。现在，这些人已经绝迹了。因为，普遍承认了，科学无东方、西方之分，科学规律是普适的。

我相信，主张“民主不适用于中国”论者，将来也同样会绝迹。因为，民主观念，也无地域之分，是普适的。我还确信，这一次的绝迹，用不到 300 年。根据是，1987 年的中国十大新闻（民间流传版）之一——邓力群落选已经表明，中国人并非完全不懂民主，并非完全不需要民主，并非有了民主完全不会用。

去年的事态还表明，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我认识的朋友，大多是专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就是在这些知识分子中，也开始接受了爱因斯坦如下的知识分子责任观：

“就‘知识分子’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他则负有更大的责任，因为，由于他受过特殊的训练，他对舆论的形成能够发挥特别强大的影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力求把我们引向独裁政治的人们特别热衷于要恫吓知识分子，并封住他的嘴。因此，在当前这样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认识到自己对社会所负的特殊责任，也就更加重要了。这应当包括拒绝同侵犯宪法上的个人权利的任何措施合作。”

的确，在去年的批判民主、自由的恫吓中，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拒绝了合作。因此，我觉得，民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有希望的。

谨以此献给盛会，并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今天正逢旧年正月初一，值此时刻

敬颂

万事如意

方励之敬上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七日

编者注释

[1] 黄雨川(1919年～2003年)，字鸿辉，原籍广东台山潮境。五十年代初期，响应北京的号召经香港回中国大陆参加建设。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流放到北大荒劳改。到六十年代中期回到香港。七十年代初期移民美国。是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创办人及前任会长。

[2]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

[\(返回目录\)](#)

“阶级斗争”是谁先提出来的？

——在北京中科院新居接受西德作家关愚谦采访的报道^[1]

今春返国，到北大去看老友，他正好要去看他的同事方励之，约我同行。我以为不妥，因为我与方励之从未相识，冒冒失失地去访问他，会不会令他不高兴。可是，我从心里真想同去，看看他到底是何许人也，怎么能有这么大能耐，弄得国内“鸡犬不宁”。这位老友懂得我的心理，即刻打电话问对方，是不是可以带一个从西德来的朋友，他一口应允了。

方励之前年因说话、演讲闯了祸，被撵出共产党^[2]。可是，去年仍被批准参加国际会议，并出国搞学术研究。他在意大利时还是有啥说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使我肃然起敬，同时也为他捏一把汗。谁知，他回国后，不但没出事，反而在评职称时晋升两级^[3]，如果在西方国家，还算不了什么，毕竟政治学术是两回事，可是，在中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密切多了。我还记得我在国内当俄文翻译时，和我同时、同一个学校出来的同学，在业务上、能力上，以至担任的翻译任务上和我几乎一样，就因为他在政治上比我好（他是共产党员），人也听话，就在评职评薪上，他被提了，我则原封不动。可见，政治是很重要的。这次提升方励之两级，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我真想摸清楚。无论如何，中共在最近几个月在处理方励之这一问题上，是比过去漂亮和慎重得多了。

方励之新分配到房子了，我去看他时，家还没完全搬好，还必须在老房子吃饭。他的新家座落在北大的一个新楼区，他住的楼号与前后楼号都不是紧挨着的，整整让我俩找了 20 多分钟，才在路边另一角找到了。这对我这北

京朋友是毫不稀奇的，北京的社会主义式大楼几乎是千篇一律，有的楼号不按街道成排顺序，而是按先后造成的顺序编排的，混乱不堪。来访的人只好到处乱闯、乱摸，这又怕什么？在中国，一个人的工作，三个人干，人们有的是时间。可是，我在北京只能逗留几天，三天的事要一天内办完，这时间就耽误得太可惜了。

方励之的家住在一幢高层楼最后一单元的最高层，上下有电梯，各单元有通道，比起老的社会主义式大楼是改善了。

中国必须有一个突破

方励之待人非常随和、大方、好客，一看就知道他对国外生活很熟悉，没有那么多客套话。我先请他陪我转了他那没完全搬过来的新家。这套公寓房子原来是两套打通成一套的，很宽畅，房间也不少。最吸引我的是他家客厅、书房新刷的墙纸和地毯，非常漂亮，予人一种柔静感，其质量俱可与西德家的墙纸地毯相媲美。我惊讶地问他，这是国产的吗？哪儿都可以买到吗？他点头说，这些东西到处都可以买到，墙纸则是大旅馆装修完剩下的余料。这不得不承认这些年的改革成绩，它毕竟比过去好多了。在十年以前，谁还敢想到墙纸、地毯，有钱也无处可买啊！

这次访问我是突然袭击，不速之客。我喧宾夺主地向方励之提出了不少问题，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这方面他和刘宾雁的文人作风很相似，但在气质上截然不同。和刘宾雁谈话，他有时激动，有时伤感，有时悔气，有时大笑；而方励之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四平八稳，一加一就是等于二，然后解剖，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的道理。他内心充满了感情，但他表面上

毫不动声色，甚至连身子都不动一下，说话滔滔不绝，口齿清楚，逻辑严谨。

我开始和他谈我去美国和苏联的感受，然后向他谈到苏联改革中的困难和问题，以及与中国改革相比有何不同，我想知道方励之对中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些什么想法。

方励之表示，他现在谈的一些观点，基本上可以代表中国一批知识分子的观点，即目前很多人都觉得很彷徨。去年前年是呐喊，今年是彷徨。对中国到底如何走？存在什么问题，存有一种恐慌感，也就是缺乏建设理论、社会分析的恐慌感。但是，他觉得对中国改革寄予希望有两个因素：

一是经济自由化成分的发展——主要是个体化和城镇企业，而不是那些“倒爷”（指倒卖分子）。

二是中国知识分子队伍形成阶层，形成一独立意识。

方先生同刘宾雁一样都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我的印象是他脑子里所想的一切都是如何使中国富强起来，他颇有愁思地说：“什么样的模式才能适合中国呢！这很难说，但是，中国必须有一个突破，突破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当我向他谈及我对当前中国相当一部份人中素质下降而担忧时，他赞同地表示，这与上面有关：“自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来以后，后果是给党的不正之风开了绿灯。上面的素质下降了，其他阶层的人也就充分表现出来。本来是礼义之邦，现在使社会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动物，甚至比金钱动物更难看。其实，原来的领导层中不乏这种人，只不过被‘非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包着了，现在则赤裸裸了，这并不是坏事。”

应算在毛泽东的账上

我们在谈话中，一致认为，中国非改革不行。但是改革一直不能正常进行的原因，方励之认为，光是从上而下的改革，那就是没有独立成份的。十年前，人们只认为在党的领导下，恢复党风，真正实行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又出来掌权，一切都会好的。现在大家已觉得，这并不行。这套对共产党没有监督的制度，必须去掉。不然，新上来的人还是老一套，这个体制必须根本彻底改变。我接着问方，人的素质、领导层的素质到了这个地步，改革会不会贯彻不下去，而走上了歪门邪道？方立刻很严肃地回答说，他对改革的前景很难预料，人的素质不正，会导致外来势力的潜入，以至经济瓜分。他一再强调人的素质和领导人素质的重要性，这一说法，使我回忆起腐败的满清政权和战后的国民政府。它们的贪污舞弊，几乎把中国葬送。目前的中国当然不能与当时相提并论，但不得不引起警惕。我们的领导层中不是也有人为了肥己而引进国外的废品、旧设备！我还从一个当工人的亲戚口中亲自听到，某些工厂的年轻工人为了不想干活，可以偷偷地把工厂的国家设备破坏掉，岂不可怕！

方励之继续表示，领导层中的一股邪气及人民的素质下降，其根源并不在邓小平那里，而是应算在毛泽东账上。毛泽东的统治术就是愚民政策，而且他是自觉地运用。现在不少的年轻人之所以如此道德败坏，是文革没受教育的结果。他们缺乏做人的自尊心，没有一点社会道德，这与过去整知识分子有关。知识分子受教育，讲道德，批臭知识分子，就等于伦理、道德都是虚伪的、无用的。当前社会上的表现，实际上是积毛泽东统治 30 年的极左政策的恶果。当然，个人也不是一点责任也没有。方励之认为，苏联他虽没去过，但东欧国家他去过，东欧的执政人对知识分子思想也有压制，但不像中

国这样，至少他们还尊敬知识分子的职业和知识。

我们继而从人的素质谈到了毛泽东、斯大林和列宁。我向方表示，中国要想起飞，如果不彻底地把毛泽东的种种错误观点拿出来批判，是办不到的。其次，也必须联系到斯大林的错误，他的理论给中国的建设也带来极大的危害。方励之支持我这一想法，并且还补充说，列宁的一些学说，也是有研究余地的。至少在批自然科学上，是列宁首先发起的。例如，列宁在谈到辩证唯物主义时，就向知识分子开刀了。

当我向他谈起，中国 1949 年革命以后，百分之百的学苏联，实际上是完全把斯大林战后总结出来的统治经验全部搬过来了，并再加以发挥。

是检讨马列的时候了

现在在苏联，人们已开始怀疑斯大林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我们中国更要从根本上好好地整理一下过去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方励之表示，这种想法，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圈中，是很普遍的，即中国完全影印了苏联的体制。方表示，中国有很多包袱，如孔夫子的老传统，上千年的封建传统。但更应该注意到的是近 100 年来，自十月革命以后，马恩列斯的书造成了一个新的传统，这对中国影响不小。方甚至觉得马克思提出的平等观，从动机上来看也许是好的，但其结论是错的，是有空想色彩的。因为，他指马克思所提的平等是要求结果的平等。不管能干不能干，穷和富，都要求有一样的平等。这就是拉后腿，推迟社会的发展。美国的社会要求动力平等，机会平等，刺激你向上发展，最后结果当然不一样。结果平等是向下看齐，机会平等是向上竞争。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涵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对的。但

对社会主义的想法，结论是不对的，是一种乌托邦的想法。

当我们谈到，阶级斗争倒底是谁首先提出来的问题时，方励之说马克思提过阶级矛盾、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但它表现在生产力的被剥夺上。而整人、杀人、整知识分子是从列宁开始的，整人、杀人只是消灭生物的肉体，不属于阶级，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应是从列宁开始，而且是有理论基础的，即是把阶级斗争作为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包括所有的领域，甚至自然科学，这简直是胡闹。自然科学有什么阶级斗争呢！这就是以后斯大林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则什么都是阶级斗争，什么都要消灭了。这就是一脉相承。

我们的讨论越来越深入，它已经开始涉及到一个触及四项坚持的根本问题，可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嘛！“马克思主义”倒底是什么？在中国，在苏联，在东欧，当把一个主义肯定时，就把一个人说的话都当作真理，这就太危险了，动不动就以反马克思主义或反列宁来压人。

在中国，如果对毛泽东不敬，不是曾发生过被处死、入监狱的吗？现在“四项坚持”仍像尚方宝剑，镇住敢想的爱国者，难道马克思生下来就没说过错话。方励之说：“目前，在中国，随着批判斯大林、检查毛泽东的错误，不少人已逐渐从根本上认识过来，必须全面检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一系列言论。”我听了以后，非常同意，是时候了，我们必须总结革命后这三四十年来的教训，彻底改造中国。

（原载香港《信报》1988年6月3日）

编者注释

[1] 关愚谦（1931年～），上海人，德国汉堡大学退休讲师。

原任职于财政部，反右运动期间曾下放至青海劳动，后回到北京，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1968 年时持偷拿日本人西园寺宫一之子西园寺一晃的护照从北京首都机场搭机逃离中国至埃及，辗转到达联邦德国，并获汉堡大学入学许可。1972 年、获德国汉堡大学语言学硕士学位，1977 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当年开始在汉堡大学任教至退休。1998 年曾为中国浙江大学客座教授、欧洲华人学会理事长以及香港《信报》、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专栏作家，迄今出版著作十多部。临退休前一年，大学赐给“教授头衔” 2006 年汉堡市长代表汉堡市授其《科学与艺术》勋章。本文由关愚谦署名发表，此处原文照录。

[2] 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网络版）1987 年 1 月 12 日，“周光召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及中国科学院党组的委托在全校党员干部会议上宣布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彭佩云任中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滕藤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免去管惟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职务，撤销方励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职务。”“管惟炎调北京物理所任研究员，方励之调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1987 年 1 月 16 日中共安徽省纪委决定开除方励之党籍。”

[3] 方励之原任四级教授，升任二级研究员。

[\(返回目录\)](#)

暴力革命必会带来暴力统治

——在北京中科院新居接受西德作家关愚谦的采访^[1]

方励之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为什么这么大胆，敢于说出自己的思想，难道他不怕给自己找麻烦？不怕再次受到政治迫害？这次我（编者注：关愚谦）和他接触谈了几个钟头以后，发现他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一个求实的科学家，为了摸索一个新的论证，一个新的规律，就不畏惧一切，不怕鬼、不怕神，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方此罢休。他企图寻找出真正的真理来，令我肃然起敬。

今天，我用另一种对话方式记录我们的这次谈话，由于内容涉及很广，录音也不够清晰，很可能与原话有出入，如有不实之处，应由我承担一切责任，此文已来不及请他校对了，请读者原谅。

关：你这几年来，走访了不少国家，一定有不少印象。欧洲去了哪些国家，北欧几国也去了吗？

方：都去了，几乎整个欧洲都走遍了。

方：正是这样。

关：我看中国在 1954 至 1956 年时，形势最好，大家信心都很足，精神面貌也很好。

方：四人帮打倒后的这十年开始形势也不错，直到 1986 年批资产阶级自由化迅速变坏。

关：可是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间并不长啊？

方：批了以后，下面的人都被怔住了。连上面的人也发毛了。他们也不

知道，下面的步子该怎么走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从一开始就受到自上到下的抵制，越批大家越看得清楚，对上面更不信任了，特别是年轻的人，当然年纪大的人也一样，连话也不愿说，意见也不想提了。

关：我这次回中国，看到人们的素质比 1986 年降低了，使我很难过，尤其是年轻的一代，有不少人就想到钱，想到自己，连尊严都不要了。

方：社会上不良现象的发展，在自然科学上叫做指数上升，即上升得非常快。

社会主义失败已成定局

关：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认为这是好事，可有什么弊病呢？

方：好的方面是指共产党正式承认了这 30 年所搞的社会主义是不成功的，现在又走回头路了。坏的一面是，十三大以前某些不正之风，污七八糟的事，理论上、原则上还受到谴责，可是，一提出“初级阶段”，这意味着，允许资本主义，那些不正之风可以正大光明地在台上面搞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实际上根本没有过，马克思主义原则从来没有实现过，说得明显一点，实质上就是承认毛泽东思想的失败。至今，仍然还是躲避一些错误的原则，例如，阶级斗争，只是说目前提阶级斗争不合适。而实践证明，这一理论应根本否定。

关：你这意见我不太苟同。中国实际上曾经贯彻过社会主义，如国有化、集体化、消除个体经济等等，但是，这社会主义并未给人民带来好处。

方：那只是一些社会主义形式而已。从整个世界的观点来看，20 世纪的

一个大成果，是人们通过实践得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所总结出的理论，在人类的社会中是行不通的，是失败的。

关：你知道吗？你这一大胆的见解，可能是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提出来的人。不太可怕吗？

方：我想，如果你单纯呆在中国或呆在苏联，你不会得出这样的见解。因为你无比较。但是，当你到欧洲、美国去看看，这感觉就太明显了，这个失败已成定局。你可能也常常听说这一理论，就是中国的特定条件，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已经做了多次试验，都没成功。可是，你回想一下，中国真正做了多少次试验？清朝是封建的，然后是军阀混战，直到北伐。1937年日本人又侵略我们，真正的实验只不过是自1927年至1937年这十年时间。你说它“都没成功”，那么，1949年革命后至今做了40年实验，成功了吗？那么，哪一个“不成功”更不可信？

关：苏联革命胜利至今已70年了，现在戈尔巴乔夫还要提出改革，已说明了很多问题。

方：就以东德和西德相比，南朝鲜和北朝鲜比，中国和日本比，上海和台北比，甚至非洲国家，凡是执行社会主义制度的都比不上搞资本主义的国家，这可不是我的话，而是专家做经济调查的结果。

只有彻底批判才能起飞

关：给你这么一说，使我想起了世界移民潮，只听说由社会主义国家往资本主义社会跑的。

方：这也是一个证明。我们不能总是说，原则是对的，做法是错的。既

然结果是错的，就说明，你的原则有问题，至少有很大的缺陷。如果你现在还一直重复你的有问题的原则，人们当然就不会信任你。这也是人类发展的趋势。起初，人们对马克思主义都很向往。我曾在英国呆过一段时间，30年代，许多西欧的知识分子都很相信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包括剑桥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可是，随着时代的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在西方，现在再也难找到敬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了。现在是一个不信任马克思主义的潮流，很难阻挡。尤其是中国发展到目前这种样子，还有何信任可言！

关：我看，这不是什么潮流，还是一个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给人们带来最高的境界和最美好的远景，可是，它并不适合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比它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现在我越来越觉得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乌托邦。如果用它的理论去指导实践，事实上也在做了，必然会造成很多脱离社会现实的东西。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在理论上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在哪些问题是脱离实际的，而执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领导人及他们的学说根本的错误表现在哪些方面。只有彻底认识和批判了，中国的改革才会起飞。

方：是这样，不涉及这些问题，不可能起飞，我认为，共产党就是在下一世纪仍然会存在的，但从整个历史观来看，它不会永远的存在下去。

关：共产党存在多长时间取决于它对待社会，对待人和事物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是很吸引人的，它将来可以变成一种道德上的象征，就好像基督教的圣经一样。共产党在将来也许会发展到只具备一种道德形象，而不去参政。有的人提出，共产党将会通过暴力被另一政党取代，我认为这不可能，也不现实。即使另一党上了台，满脑袋仍是封建主义，照样治不好中国。一个执政的党只允许独党专政，没有监督，是不可能把国家搞上轨道

的。

要用民主手段取代专政

方：我也不认为，暴力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如果再来什么暴力革命，其结果还是暴力统治。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暴力循环，老百姓则遭了殃。宁愿让痛苦的时间长一些，多用民主的手段来取代专政，使今后社会更民主化，用民主促进社会的变革，改变共产主义的体制。

关：你所谓的共产主义体制，指的是什么？

方：就是指的苏联、中国所执行的一党专政，一党专政是很难使社会有所改革的。共产党这套组织原则，实际上是从欧洲搬过来的，说得难听一些，是从一些欧洲的独裁帮派中借取过来的。关于欧洲黑手党的组织，你有所了解吧！

关：了解一二，意大利黑手党的组织非常严密，他们没有什么政治纲领，但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个人的一切，连命都属于组织的，要经常向上级汇报，收集周围可疑的情况。如果发现有不顺眼的人就干掉他。进入这秘密组织时，必须宣誓忠心效劳，不能背叛。至于道德准则，他们是没有的。

方：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则是另一种样子。他们只要你在政治上赞成该党的政治观点，不须向他们交什么心，如果你不同意该观点或政策，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其他一切，都是属于你个人的，而不是党的。

关：当然也不完全如此，他们也有党的纪律，如前两天西德在荷州一个部长委任了一个人接受某重要职务而未事先向他的党（基督教民主党）请示，结果二人都被开除党籍。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党员确实是自由得多，他们

可以今日入党，明日退党，甚或从这个党跳到另一个政党去。要是换了黑手党，早就把他们干掉了。

方：今天和你说话，互相在观点上很近似，和你谈得很舒畅。

关：今天你的一些看法，我感到比过去你的说话，更深了一步，提出了一些更发人深思的问题。我们好像还有很多话要谈似的，希望以后再和你见面。你最近在研究些什么？还有出国打算吗？

方：要读、要想、要写的东西太多了。最近，我想静下来、多看些书，做些研究。最近我没有出国的计划。

关：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

（原载香港《信报》1988年6月4日）

编者注释

[1] 本文由关愚谦署名发表，原文照录。

[\(返回目录\)](#)

我对美术的感受

对我这样只懂物理学的人来说，美术似乎全然是另一个世界，既隔膜，而又感到它的存在。

隔膜的是，几十年来，只有偶尔的机会来美术馆看看什么中国的或西洋的画。至于像这一次，接受《走向未来画展》组织者的邀请，正式参加一个开幕式，的确还是头一回。

感到它存在的原因是，我粗略统计了一下竟发现，尽管我在非中国的地方逗留时间不长，可进美术馆的次数却比在国内还要多，甚至以正式身份参加画展开幕式，也不只一次了。

之所以如此，并非我对洋画廊有什么偏好，而是环境使然。原来，在那些地方，科学和美术之间，远不像在中国这样绝少往来。喜欢美术的科学家，喜欢科学的美术家，在那里都不十分少见。这就迫使我也不得不去接触这另一个世界。

在法国不用说了，到了巴黎，如果不去卢浮宫，就会被天文或物理的同行看作对他们的文化的大不敬。美国被认为是“缺乏文化感”的地方，可是，有一次美国科学院院士 V·鲁宾陪我游华盛顿，我们刚刚在宇航馆看了一半，她就急着说要去广场对面的国家艺术宫买票，因为那里正展出苏联收藏的法国印象画派的作品，是非要让我去看不可的。至于意大利，本身就是个大画廊，我前后 12 次到意大利，其中约有十次同美术家或美术评论家有过交往，或者是被请到画家个人画室去喝咖啡，或者去逛西班牙广场的画市，或者是被带去看一般并不开放的拉斐尔的壁画。有时候，画家、艺术家也直接参加

我们的纯学术活动。记得 1985 年在罗马召开广义相对论讨论会，其中有一项活动是在紧靠西斯廷小教堂的一个议事厅里向教皇呈献一件艺术品，因为该作品是由参加了我们讨论宇宙学和黑洞的艺术家获得启示而创作的。

参加这类活动的结果，老实说，并没有使我在美术上有什么长进。美术有美术的语言，对于熟悉物理语言的我，是太难了，但是这些活动，使我强烈地感受到一种不同的文化气氛，一种科学和美术间并不那么隔膜的文化气氛。也许当面对着格拉齐修道院墙壁上的《最后的晚餐》时，最能想到这一点了。列奥纳多·达·芬奇是画家？是科学家？看来都不是，科学和艺术都不过是他的统一追求中使用的手段。就追求就崇尚来说，科学和美术几乎是一样的，美术追求美，科学也追求美。二者也都崇尚真，崇尚创造，崇尚对束缚的解脱，崇尚自然和人，崇尚对自然和人的超越。

法国物理数学家彭加勒[1]说过：“科学家并不是因为大自然有用才去研究它，他研究大自然是因为他感到乐趣，而他对大自然感到乐趣是因为它的美丽，如果大自然不美，那它就不值得认识，如果大自然不值得认识，就不值得活下去。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谈那些打动感官的美、性质的美和现象的美。我并不低估这些美，而是它仍与科学毫不相干。我的意思是，那些更深邃的美来自各部分和谐的秩序，而且它能为一种纯粹的智慧所掌握。理性的美对自身来说是充分的，与其说是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倒不如说，或许是为了理解，为了理性美本身，科学家才献身于漫长和艰苦的劳动。”

我想，这也许才是在那种文化圈中不乏喜欢美术的科学家的原因。

在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伽利略楼中，挂有不少埃舍尔的版画。它一方面表示物理学家多么喜爱这些怪圈画所刺激的联想，另一方面好像象征着科学

与美术之间的“怪圈”。在我们这里，科学与美术“各安职守”，没有“怪圈”式的联系了，然而，是否正因此也太多地失去了孕含在这种“怪圈”中的活力和动力？

（原载《中国美术报[2]》1988年第8期）

编者注释

[1] 彭加勒又译庞加莱(Jules Henri Poincaré, 1854年~1912年)，是法国数学家、天体力学家、数学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他的研究涉及数论、代数学、几何学、拓扑学、天体力学、数学物理、多复变函数论、科学哲学等许多领域，被公认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领袖数学家，是对于数学和它的应用具有全面知识的最后一个人。

[2] 20世纪80年代与现代主义运动同命运的《中国美术报》，是中国大陆第一份全国性的美术专业报，4开4版，彩色胶印，每周一期，1985年7月6日创刊，1989年底终刊，历时四年半，共出报229期。

[\(返回目录\)](#)

《方励之自选集》序^[1]

编辑和出版现在这个文集，是始料所未及的。

我的职业范围是物理学，我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讲授和研究物理学中渡过的。对人生，对社会、对政治、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我没有做过系统性的考察，更少参与过有关这些方面的系统性活动。我所做的仅仅是：对自己直接看到、感到或接触到的一些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公开地表示了意见。其实，就这些意见本身而言，并没有多少独到之处。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也都有类似的想法。甚至在我的这类文章、演讲中不少就是直叙朋友或同事的观点。因此，这些公开的言论，与其说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特别见解，不如说简单地就是为了并不特别的见解的公开。也许是像爱因斯坦早说过的：“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

正因此，我从来没有把这类的文章，讲词等列入我的出版清单[list of publications]，它们不是论文、更不认为有编辑成册的必要。然而，1986年底大学生的游行，198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使这些本不在清单[list]的言论受到非同寻常的注视。一些注视者是为了进行政治批判，更多的注视者则是出于关心。许多国内外相识或不相识的人都曾关心我到底发表过那些言论。一些报刊书籍也曾介绍过我的言论，甚至还有几本代编的我的文章的专集出版、其中绝大部分如实地介绍了我的讲话及文章。对所有这些编者和译者，我愿趁此机会表示我的谢意。同时，也有伪托之文出现，尽管为数极少。鉴于这种情况，我觉得已经有必要提供一份更完整更准确的我近年的社会政治哲学的言论材料，供关心的朋友们更好的了解。当然，也可供批判者

批判。就是编辑这样一本始料未及的文集的动机。

我强调“始料未及”，并不是想减轻我对这些言论应负的责任。相反，我对所有我发表过的言论负责，无论它们是被批判过的，还是被支持过的；无论是即兴的演说，还是推敲过的文章；无论是出于道德和良心的冲动，还是出于独立思考的结论。总之，无论它们是已被认为或将被认为是对的，还是错的，我都乐于承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科学和宗教或准宗教的价值观十分不同。后者价值的基点是对教义正确性的坚持和崇拜。而科学则认为，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占有更有意义。

的确，追求和探索真理，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任何一种理论、一种意识形态，无论多么重要，多么辉煌，也没有任何权利去限制对它本身的思考，否则就是宗教。如果说在我的这些零星的文章中有什么共同性，我想其中之一是表明：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像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有权去研究自己专业领域中自己认为应当研究的问题；有权去思考自己认为应当思考的社会政治问题；有权去怀疑那些自己认为应当怀疑的圣人。

作为人权内容的研究、思考、怀疑，像作为科学内容的研究、思考、怀疑一样，都是在对社会对自然的美和和谐的追求中发展起来的。一年多来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有一位朋友说，近来的形势也许可用法国 18 世纪哲学家霍尔巴赫的一段话来描写。它是《袖珍神学》中对“开除教籍”一词的注释，即：

开除教籍是教会牧师对其羊群中的癞皮羊所作的宗教上的惩罚。过去开除教籍的消息能使国王吓得目瞪口呆，甚至突然中风而死；现在这一措施不会产生如此显明的印象了。这证明信仰的衰落。

确实，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间常见的“目瞪口呆”“中风而死”，在近年极少有了。“宗教惩罚”的效果只是使信仰进一步衰落。一个时代正在过去。我想，当这种衰落更进一步完成之后，我的这些本不被受到过度注视的言论应当再回到它应有的状态；被人忘掉。希望忘掉这种言论的时代，在中国更快到来！

收集在这里的文章、讲词、谈话共约 60 篇。根据世界科学出版社的建议，分成三册出版，即 1、赞美我主之后；2、危机感下的责任；3、哲学和物理学。在编辑、整理这些文稿过程中，前后得到过几十位同学和朋友的帮助，没有这些帮助，成书是不可能的。为了不至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里不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了，在此谨表示我出自心底的深深的感谢和祝福。

方励之

1988 年 3 月 2 日，北京

编者注释

[1] 这是方励之为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1989 年 4 月出版的《方励之自选集》作的序。

[\(返回目录\)](#)

《天体物理学前沿鸟瞰》序

“天体物理”一词，现在变得相当普及，特别是 1987 初之后，知道“天体物理”的人更多了，因此，许多非科学工作者，常问我：“什么是天体物理？”一些物理同行但不从事天体物理研究的人，则常问：“最近以来天体物理有什么成就？”第三方面的问题来自刚刚走入天体物理领域的研究生，他们的的问题是，“目前天体物理前沿有哪些问题？”

本书的目的，就是回答上述三个问题。显然，这三个问题属于不同的层次，很难统一作答。一种妥协的安排是，对第一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请重点读第一章，其后各章可依兴趣选择。想了解天体物理的新成就的人，可主要读第一章的后几节，以及第二、三、四章的前几节。对于天体物理研究生，或者，对于希望了解天体物理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整个全景的人，则请读全书。正因为如此，本书命名为“前沿鸟瞰”，也尽量作到是一本全景的鸟瞰。

因为是鸟瞰，不能不在许多方面采用粗略的描述。特别熟悉天体物理学的人都知道，天体物理的领域应包括：

理论天体物理，

观测方法和手段，

恒星天体物理，

星系天体物理，

宇宙学。

对比本书的目录，就会看到，没有专章讨论以下问题：

非引力的理论天体物理问题，

非高能恒星天体物理问题，

星系天体物理问题。

事实上，有关这三方面的问题，在二、三、四、五章中都多次述及。至于太阳物理学，或太阳系物理学，本书极少讨论，现在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太阳和太阳系问题属于天体物理，一种则认为它已经属于空间物理，或者已成为像地球物理那样的独立学科，本书采取了后一种观点。

当然，不必讳言，本书之所以只列引力、宇宙、高能天体，观测这几章，是因为作者认为，这几方面是天体物理学前沿的重点，是最活跃的方面。其实，在估计一个学科之未来时，从来是见仁见智的，因为，科学之所以有未来，正是由于充分包容着每个个人的见解(insight) [1]。

方励之

1988年3月17日

于北京天文台

(原载名家科普丛书《天体物理学前沿鸟瞰》方励之著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编者注释

[1] 本卷中圆括号中的外文，为编者将正文中的外文翻译后留在括号中。

[\(返回目录\)](#)

对统一的想法

我已经多次被问到对统一的想法，不论居住在什么地方，倾向于什么政治的中国人，都离不开这个问题，好像每个中国人都要在这个问题面前表明自己的态度。

统一[unification]，对物理学也不陌生。实际上，300 多年的物理学历史，就是不断得到统一的历史。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是物理学上第一次大的统一。在牛顿之前，一般认为天上与地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天上的星星不会掉下来，而树上的苹果则会掉下来。然而，牛顿发现，星星和苹果的运动都是由同样的引力规律支配的，这就达到了天界与世俗二者的统一。

第二次大的物理统一，是 19 世纪完成的，这就是电、磁、光三者的统一。电、磁、光这三种表现看来完全不同的现象遵循相同的规律，即电磁规律。

今天物理学的主要目标之一，仍然是寻找统一，寻找更大的，更基本的统一。十多年来弱电统一的成功，正刺激着大统一、超统一的研究和发展。

可见，统一是物理学家的一个最基本的信念和追求，因为，统一总是和物理学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的。统一的成功，一定意味着我们对自然界有了更普适、更本质的了解。或者，只有超越了旧框架的束缚，认识达到新境界时，才会有成功的统一。

我想，社会意义下的统一，也完全是类似的，统一是离不开社会进步的。统一的成功，应当意味着社会达到更发达的阶段。或者，只有超越了旧体系的束缚，社会重组于新水平时，才可能有成功的统一。

在物理学中，不成功或不完全成功的统一，常伴随着“鬼态”及“反常”。

同样，我们所期望和所接受的中国的统一，也不是充满“鬼态”和“反常”的“统一”，不是固守愚昧和落后的“统一”，不是在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原则上的“统一”，而只能是促进中国繁荣、昌盛、民主、自由的统一。

（1988年5月12日～13日，首发于台湾的《中国时报》）

[\(返回目录\)](#)

两岸应先实行现代化再谈统一

——在香港与台湾大学王作荣教授座谈^[1]

有“中国萨哈罗夫”之称的方励之教授，自去年被中共当局开除出党之后，成为大陆民主呼声的主流，声望日益增高，方励之教授夫妇今应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来港访问，经中国时报香港办事处的安排，方励之教授与台大王作荣教授举行了一场历史性的对谈。

汪素惠：二位教授都对中国的前途十分关注，同时在两地也都有代表性，这是难得的机会能在香港见面，可对海峡两岸的问题坦诚地交换意见，让我们能在认识中求了解，请王教授先提问题。

王作荣：我看到一个报导说，您认为苏联的改革从政治开始，大陆的改革从经济开始，从政治改革着手较好，从经济方面着手改革要差些，这究竟应从政治开始或从经济开始，我认为这可能与当时的环境有关，1978年大陆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时，当时大陆的经济制度处在崩溃状态，所以非从经济改革开始，那么经济改革进行到相当程度时证明政治的改革也受到影响，方先生的意见如何？

方励之：我的见解是一样的，中国大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很自然。相反苏联因为没有多少农业，它不可能做中国式的改革，它一进入改革就进入工业，进入城市，而工业跟城市的改革一定是跟政治有紧密关系，所以这就是苏联不得不有政治倾向，坚持他的政治改革。

王：现在大陆上从事政治改革，在国营企业上搞政企分离、党政分家，你看有多少可能性？可进行到什么程度？

方：这在局部份是可行的，但是党政分离是行政性改革，不是政治性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共“十三大”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讲了以后很快在教育委员会说：党政分离在高等学校不宜实行，高等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党的工具、党的干部，所以党的领导不是要分离出来的。

王：中共在政治方面的改革没有什么进展，它实际是一党专制，今后是否如此？

方：对的！

王：如果是坚持一党专政，对民主的推动就很难了。

方：中国大陆的民主政治推动从来不能只视察党的行动，而且应视察在党外的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农民行动，这几方面有相当强的推动力，这在中国大陆不是很强，但已开始推动。

王：在此情景下我要向您请教的是，学生、工人的推动，他们没有政党组织，也无政纲，而能喊中共的一套口号，要求中共改进，在此情况下即使能推动中共的改革，结果还是共产制度下的改革，不会是很大的。外国的政制要有反对党，有投票的群众，如此民主政制才有保障。如果说，光靠工人、学生推动，中共只能在某些地方让步，能否真正改变共产体制或改变为民主政党？是否可起什么作用？

方：当然是有，不过距离较长，看这个问题不要只与已经民主化的国家相比，更好的比较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不安定，中国、苏联、东欧国家，他们有共同的问题，他们现在走的路也大概类似，我想最终是要达到多元化状态，但是并非一蹴即可，但这一步总是要跨出的，甚至现有人说游行没有用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不具备初步条件，下一步就不能走了。这是在东欧

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的状况！

王：以中共这么强大，组织相当严密，在这情况下要求民主政治有几条路，一是推翻它，一条路是新的政党产生，另一情况是共产党本身的变化，促进其成为民主政党，你认为中共可能采取那种方式？

方：中国的民主化只能采取民主的办法，这在国内是很多人赞成的方法，因为采取暴力的方法，得到的结果是非民主的，这是一个经验。所以大家都不赞成，我认为反对党的概念与敌对党的概念是不同的，反对党是相互存在的。

敌对党是相互推翻，所以我们赞成反对党的概念，不赞成敌对党的概念，这有很大的区别，当然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但是这样得到的结果比较稳定，也不会走回头路，所以我们大多采取这样的态度，现国内的教育水平很低，所以要经过的是一代人的时间，至少是 20 年到 30 年。

王：照您的意思，大陆上对民主政治的追求，要等中共体制的改变，一步步地走向民主，但中共领导层老的不放手，下一代也不放手，终究必是极权专政，一党专政，大陆如是继续维持这种情况，30 年也难改变了。

方：那倒不见得，今早听广播波兰的情况现已发生变化，外人的理解对共产党的概念理解与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概念理解同样是固定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往往是不对的！资本主义不断地在发展，共产党也是一样地不断地改变发展，上世纪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不一样，共产党也是在发展，也是不一样，比如毛泽东的时候和邓小平时期就不同，现在的控制力量就比那时弱得多了，我不赞成暴力方法、打倒方法，我是反对的。

王：中共政权取代国民党当权就是用暴力方法，也就是以暴易暴，当然

各国的情况不同，在一个独裁专政的政权之下，时间久了总是会有所腐化，腐化之后，控制的权力是会慢慢地放松，刚才您说邓小平对年轻一代的控制比毛泽东时代放松了，不知是邓小平一代的思想较为趋向民主，还是共产党内部确已腐化掉了，没有力量再有严密的控制。

方：我刚刚已说了，观察中国的政治，不能只是单方面的观察，中国的事有时是不愿这样做但不得不这样做，如最近邓力群落选了，这是党内不愿意的，但事情已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不能不接受这个现实。

王：在政治学理上有一有趣的问题，毛泽东时代控制十分严密，共产党当时说话算数没人敢反对，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学生也提倡民主，是否中共领导人的思想转变，中共可以容忍民主的气息起来，而当初毛泽东的时候就不可以，我们在外面的中国人研究这个问题得不到一个结论，您的看法如何？

方：我认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潮应从全世界来看，不单单只是中国，人们意识到自己一定有一个过程，而不是单单个人的问题，共产主义在 30 年代兴起，到了末期就走下坡了，这个发展是一个很有规律的变化，有时事情的发展并不决定于他本身怎么做，而是有的不得不这样做，这就是因为整个形势的发展使然，中国大陆所以有今日这一个地步，也是属于这个发展观察而来。

王：台湾近些年的发展有了强大的中产阶级，因之，在生活优越下，就开始有了参政的意念与需求，今日中国大陆的政治民主化之推动，是否也应等待中产阶级的兴起呢？但目前看来，只有你的反对声音及民主呼声，也是孤单的，是否求政治民主化的呼声还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方：不完全是这样，我举个例子，我在开除党籍以后收到的信有来自学

生、知识分子，也有工人、农民，甚至还有干部，这表明自由、民主的呼声来自多方面的，当然这些人还不是强烈到可以形成一个阶级。我完全赞成只有出现中产阶级、更多独立的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才可能出现真正的多元化政治。因此，不要以为是不可改变的。

王：现在人们对你的支持大都是个别的，就大陆来说，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阶级。

方：所以我说需一代人的时间，这是有理由的，因为现在中国的教育比较差，从现在开始经过一代的时间，教育水平才能提高，经济水平也才能提起来，到那个时候多党或多元化的政治才能实现，我认为二三十年是很乐观，我是研究宇宙学的，一研究就是几十亿年，所以二三十年对我们来讲也不是太长。

王：我也是中国人，我希望这乐观的情绪能感染大家，我希望 30 年后能见到真正的民主政治局面，从五四运动起至今已 70 年了，再加 30 年是 100 年了，应该可以搞成了吧！

方：我也希望搞成，只有抱持着乐观的情绪，才会对现实有积极态度，太悲观了会采取老子、庄子的“超脱”，大家都“超脱”不管那就更糟了！

王：请教方先生，大陆的经济改革，从大陆报章看来，是资本主义化，因为它承认私有财产之在共产党是不可可以的，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现中共不但如此做还强调要更大的开放，经济走向了资本主义，他们不好意思说，就称这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是他们自己下的定义，方先生认为大陆的资本主义化究竟会到什么程度？是否保守派有相当的阻力，或是官僚系统，如中下层干部不执行呢？

方：我想大概不只是上层、中层的阻力，现在改革的关键是农业完全私有化了。工业面临所有制的问题，实际上想做但不太能做，现在实行了承包制、租赁制，但发行股票就行不通了。

我觉得阻力一方面是认识的问题，大家理论上不清楚，另外一部份是政治因素——一党制，中央计划经济和意识形态逻辑上有密切关系，所以要改变经济，必须要冲击意识形态上及行政上的中央控制。要缩小党的控制，这是很大的阻力。私有化是一个潮流，肯定会发展，但在近期内不会大发展，例如说，安徽一个“傻子瓜子”发了财，个体户一赚钱成功那就要派一个党支部书记进驻，去控制，或者合营掉了。

王：方先生会说，中共实行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可解决一切问题呢？

方：我也同时讲过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这两点不矛盾，有些领导人根本没有念过马克思主义，连一个世纪前的古典马克思主义也不懂，至少我是认真念过马克思主义哲学。

王：我还想请教方先生有关统一问题及香港问题，在香港问题上，我认为中共对香港的自由经济体制不会有什么改变，政治上还不大允许太多民主政治，香港人应该争取生活上的自由，但民主和自由是连在一起的，民主是自由的保障，你的看法如何。

方：香港问题我没有仔细考虑过，但香港 97 年后能否保持现状？什么叫“保持现状”如果说保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我想大概没问题，但现在香港是亚洲的金融中心，这地位是否能保持我就很怀疑，先不用谈政治，保持这样的地位主要原因是它是英国的殖民地，有很多外面的投资，但是这种投资

和经济活动是至少要对政治有信心，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如果大陆不改革，大家没信心，香港金融中心的信心也会减弱。

统一问题我的观点是，作为中国人，文化心理上都倾向统一，但目前来看，台湾和大陆都面临现代化和民主化的问题，所以要现代化，把中国赶快变成一个发达的社会是首要任务，到了现代化以后，统一是很自然的，现在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政治。

王：我也是主张统一的，但统一之后的政权在极权控制下是不恰当的，但台湾一定要划入中国版图，我不愿意台湾独立，我希望统一还是长期的目标，当前希望海峡两岸能发展民主，在同样的民主政治之下，生活方式一致，就没有隔阂，在民主的基础上双方就可统一了！

（原载《中国时报》1988年5月）

编者注释

[1] 座谈主持人汪素惠祖籍福建，出生于台湾高雄，台湾中兴大学法律系毕业，历任记者、作家、时事评论员。担任电视台记者期间，曾获选亚洲杰出女电视从业员。后加入《中国时报》，成为《中国时报》香港特派员及香港办事处主任。1984年赴大陆访问，成为最早赴大陆采访的台湾、记者之一。本文由汪署名发表。

[\(返回目录\)](#)

现代化的问题与出路

——在北京中科院新居中接受梁硕华采访

梁硕华先生长期钻研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问题，今年6月1日，他在北京与方励之教授就广泛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这场对话对我们了解神州的发展甚有帮助。

方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天体物理学家，且以大胆敢言、倡导民主而赢得中国萨哈罗夫之名。他居住在中国科学院新建的摩天大楼的高层，该处上接苍穹，挥斥八极，站的高，望的远，正是玉阙琳宫中放论古今的绝妙境地。

方梁对谈的话题包括：

- 一、中国大陆改革十年的新景象与新问题
- 二、马克思与列宁错在那里？
- 三、为什么大陆应向台湾及北欧等地区学习？
- 四、大陆长出民主幼苗
- 五、前瞻改革与统一之路

这次对话是这样开端的：

剥削与特权

梁：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何妨学习孩子们的天真无邪，不拘世俗，游目于天表，洋洋畅所欲言。

方：哈，哈……今天“童言无忌”，随便谈，随便谈。

梁：我有一个问题，这就是从一种社会体制转变到另一社会体制，是否

必然经过一个混乱阶段，那死去的魅影依然游荡？具体地说，在资本主义初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是对立的，产生了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剩余价值剥削。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所谈论的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家对童工的残酷剥削，今天在许多乡镇企业以另一种形式广泛出现。又如企业实行承包，所有权的性质不变，还是全民所有，但厂长有雇用工人和开除工人的权，有按价值规律决定生产方向和产销计划的权，他实际上已成为工厂主。他同工人的关系是否属于雇佣关系，这算不算剥削？公有制已经废除了剥削，为什么现在又允许剥削存在？

方：（朗然大笑）问得有意思。

梁：过去强调所有制问题而忽视分配和交换。分配亦即支配的问题，获分配者可就所分配的额度，取得使用权；占用的目的是为了使用，否则徒拥占有其名而无使用权，这个所有权还是空的。道理很浅显。譬如，我有一处房产，而房子被房客占住了，不肯搬，岂不等于房产名义虽归我，而我却无权支配它。北洋军阀、官僚过去在香山和八大处盖了不少私人别墅，宋子文在南京北极阁下也兴建了一座华丽的公馆，尽管他们钱的来路不正，毕竟还是从自己腰包中掏出的钱。苏联的大人先生们都可以在黑海公家的别墅度假，他们虽未拥有这些别墅，但长期归他们使用，甚至专用。这和他们的自有产业有何区别？在北戴河、在庐山、在青岛……也有类似情形。所有制的问题，在这里并非重要的。

方：在资本主义社会，当童工也是自愿的，没有人强迫他们。工厂主也是用经济吸引的手段招致童工的。

梁：《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资产阶级在凡是他们已达到统治的地

方……，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条条的利害关系之外，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出什么别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发的宗教虔诚、义侠血性和俗人温情一概淹没在利己主义计较的冰水之中。”我们今天已进入社会主义了，为什么以上种种现象有时还会出现？

方：（大笑）……

梁：当然，这是从现象来观察。今天事物的本质可能与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所指的当时的资本主义不一样了。《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历史文献，并未说明当今的问题。重读《宣言》，是不是要对它重新认识。《宣言》所写的是 19 世纪中叶的欧洲，而不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另外，当时提出资本主义制造了它自己的“掘墓人”——工人阶级。今天还能这样提吗？现在在西方社会即资本主义国家，大部份工人已上升为中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了，使得在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丧失了社会基础。那末，还能称他们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吗？

方：（笑）

马克思列宁错了

梁：现在有个不好的风气，“一切向钱看”。导致社会机能[social function]的衰退和人际关系的变化。说是运用价值规律进行经济改革，指导生产，而事实往往是被价值规律盲目的牵着鼻子走。现在有些厂，特别是乡镇工业，什么赚钱干什么，唯利是图。听说，除了纪检和司法部门不许经商外，军队大办贸易公司和宾馆，新华社也在香港搞外贸，大学理工科和科研单位可以搞技术咨询，中小学校除有条件搞校办工厂的之外，只好利用寒暑假开旅馆，

老师当茶房，上海有些小学老师在校门口摆摊卖茶叶蛋，几乎成了“全民经商”。这样搞下去很危险。物资就那么一点点，经不起轮番倒卖，商业环节越多，对消费者越不利，对生产也不利。讲到社会机能的衰退，事实显然，服务态度很差，职业道德谈不上，无论是上街买东西或乘公共汽车，都会遇到不愉快的事。

有人说，现在要想办成事，不走后门不行；托人办事，不给好处不干。社会风气为什么变得这样？过去那种温情脉脉的纱幕中的人际关系，已化为单纯的金钱关系了。你对这个问题怎样解释？

方：你的问题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这也正是人们所关心的。有些问题是已经清楚了，可以找到答案。说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历史证明这个说法是错误的。特别是列宁所指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腐朽阶段，事实并非如此。资本主义至今还没到腐朽阶段。问题是资本主义也在演变。现在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当年所描写的不一样了，它看到制度本身的一些缺点而进行了自我调整。自从经济大衰退、萧条以后，欧洲改变得很快。至少在这个论点上，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是过时的。马克思的理论并不能描述今天的所谓资本主义。他的有些经济基本概念，从理论言，很多是不正确的。

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

梁：在当时可能是正确的吧？

方：当时可能某些论点在一定层次上也许是正确的。特别是他的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如价值学说，很多人认为是错误的。这从物理学上很容易理解，价值是无法测量的。（笑）马克思的概念是和牛顿的力学相对应的。牛顿力学，

现在许多物理学家也认为存在很多问题。牛顿的基本概念是绝对时间与绝对空间，而二者是无法测量的。所以后来爱因斯坦认为无法测量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是虚假的概念。现在经济学家也在批判价值概念是不存在的，而价格是可以测定，然后作出判断。至于说以劳动时间的消耗来说明价值也难成立。牛顿会用水桶测量（编者注释：牛顿用水桶实验来测量“绝对空间”和绝对静止状态的假定，可参考《方励之选集》第六卷《牛顿的水桶 1687 年～2011 年》），但绝对的静止状态实际并不存在，所以也同样是不真实的。价值观念是亚当斯密的陈旧学说，经济学所涉及的东西应是能够测量和检验的。如果价值学说不成立，剩余价值学说也值得怀疑。

至于剥削，这牵涉政治性，又是一个问题。从中国现在的状况说，雇工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差别。雇用童工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没被认为是合理的。政府经常介入经济事务，实行控制，法律禁止雇用童工。英国法律规定儿童在十五岁以前必须读书，不上学而去当童工是犯法的，所以工厂也不能雇用童工。我们应当通过法律，儿童必须接受学校教育。儿童不受教育，下一代的素质将大为下降，这是很危险的。乡镇工业为了赚钱而雇用廉价劳动力，政府应予干预。

至于服务态度不好，工作效率低……，这绝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资本主义社会最讲敬业，市场经济特别讲求信用，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企业，一个服务部门，不讲信用，只靠坑蒙拐骗是不行的。

我们当前的不正之风，并非由于实行开放政策而刮进来资本主义的不良之风，反而是暴露了封建的遗毒、沉渣又泛滥起来了。麦克斯·韦伯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有些精辟的论点，它叙述欧洲资本主义经济

发展初期是先从新教国家兴起来的。新教反对教风不正，提倡纪律和信用感。纪律和信用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匹配的，不是像有的人所说：发展市场经济必定带来不正之风。这是“栽赃”，为他们实行垄断的闭关主义保守政策解脱。“唯利是图”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只要存在商品交换的条件，奴隶主也同样这样做，不是说只有资本主义才讲金钱关系。马克思讲的所谓道德、所谓宗教虔诚、所谓义侠血性等等，只不过是一层面纱，这个说法说得对。然而，所谓“雷锋精神”又何尝不是面纱？（笑）现在的面纱是比资本主义更坏的社会现象。面纱一旦揭开，他们又推托这一切坏的东西都属于资本主义。当然，资本主义有许多缺点，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对比，它是进步的。是的，资本主义讲赚钱，但牟取暴利不可能持久，因为有竞争的制约关系。地主、贵族们剥削来的金钱，绝大部份中饱私囊，而资本家必须将所得利润的极大部份投入扩大再生产，以获取更大的利润。这样，客观上使社会的生产力上去了。他们必然会这样做。看来他们的产业属于私有，但它的功能已经社会化了。这是进步的。资本家不能随心所欲想怎样就怎样，有社会的制约力管束他。

我怀疑是否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我认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是相当空想的。苏联今天所实行的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往往都是生产力不发达的落后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采取高度集中的极权主义。

梁：这岂非和马克思的预料完全相反？

方：完全是这样。马克思的预料很多，而真正实现的很少。他对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对工人阶级受剥削和生活痛苦的揭露，是符合当时情况的，但他的结论不一定正确，他的理论也是很粗糙的。

现代化的目标没有所谓中国特色

梁：据说你最近在北京大学“草地沙龙”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提法，有所评论。是吗？

方：（大笑）“草地沙龙”这个名词很妙，其实是不拘形式的露天座谈会。我在座谈会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种理论，因为一种理论必有一定原则，一定根据，从而对现在和未来的社会结构产生一定的看法。而“初级阶段”之说仅是一个词汇，没有更多的内容。如果将它称作理论，这个“理论”的进步性可能在终于承认中国是个落后的社会，没有多大进步，三十几年来未取得很大成果。

梁：50年代初期，苏联帮助我们搞了几十项重工业工程，我们也自力进行了许多开发，包括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十大建筑。这与旧中国相比，不应否认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方：对。那时看到一些，但后来停滞了，不去搞发展生产力，而去搞“阶级斗争”了。以可比较的社会论，东西德、北南朝鲜、上海与台湾，前者都是失败的，不但经济上失败，或许可以说在社会体制方面也不十分理想。现在自己承认失败了，认为还是“初级阶段”。而过去侈言“赶英超英”。这种态度比以前有了进步。说现在是“初级”，什么时候才能达到高级呢？自己也没说清楚。同时，也没个标本，我在北大草地上讲，我们经常有句口头禅：

“摸着石头过河”。好像中国的问题多么困难似的。其实并不难解决。我们的目标是现代化。现代化就是现代化。如今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很多了。第一个实行现代化的国家可能很难，第二个困难要少些，第三个就有“他山之石”可资依循。就像制造原子弹一样，第一个原子弹是获得诺贝尔奖金的

科学家生产的，而现在让一般高能物理系的学生也懂得制造原子弹的原理。原理有了，只要是共同的东西，重复别人的并不太难。现代化的问题也是这样，只要参考或重复别人的就行了。日本已经上去了，泰国慢慢上去了，新加坡正在上，连台湾也上去了。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可以为我们提供经验。

梁：我们要建立的不是一般的现代化国家，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方：我反对这种提法。当然中国做的事情必然有中国风格，但现代化的目标没有所谓中国特色[China character]的问题。现代化的标准，全世界是一律的，都叫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共性，也有其个性，这不用说。美国的现代化和日本的现代化，都有一个共同点，即 GNP（国民收入）达到每人 5,000 美元以上，受高等教育的人达百分之三十以上，再有是政治民主化，实行多党制。

借鉴北欧与台湾等先进经验

梁：我们是否将经济与政治割裂，经济上实行开放，而政治……

方：是呀！政治改革也非跟上去不可。现代资本主义本身在演变，在不断完善自己，容纳很多社会民主主义因素，尤其是北欧社会党执政的“福利国家”。我们没有必要把中国称作正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既然自己承认还处于初级阶段，为什么不向人家高级的学习。有什么拉不下来脸面的？

梁：社会主义的旗帜总不能卸。

方：有什么不能卸？事实上，招牌也卸得够多了。北大把××××（此处未听清。记者按）都拆除了。

梁：刚才我提的问题：在社会转型期，是否必然经历一个痛苦的困难阶段？联系小平同志最近说，现在要闯几个险关，是否也是指的这个？

方：有人是这样说的，认为从一个不发达国家到发达国家，有一个阶段难免发生通货膨胀。这确实有许多事例，巴西几乎是百分之百的通货膨胀，希腊、土耳其也膨胀得厉害，台湾省也会如此。不过，痛苦期亦有一定限度。痛苦程度如发展到人民饿饭、活不下去了，这不是痛苦期而是濒临死亡期。我们通货膨胀到什么程度，没公布。外国人问我，中国人对通货膨胀的承受力，到什么时候才是难关？我答，我们已经面临难关，只是还没闹事。如照通货膨胀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估计——已经是世界上少有的。我有一次在芝加哥开会，了解到所有国家在转型期都发生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但也有解决得好的。台湾对处理通货膨胀问题最好，使人民觉察不明显。

民主之苗遍地开

梁：现在有个好现象，就是民主气氛逐渐浓厚，人民敢说话了。我这次从上海来，在静安寺等电车，等了半小时也不来车。有两个退休工人模样的扯开了，说：“葛歇啥也乱了套。物价猛涨，电车工人拿葛两个铜钿弄勿好了，高兴开车子末，开开，勿高兴末，弗开。……”，我讲上海话，你能懂吗？

方：能懂，你说下去。

梁：话我侬现在还浪初级阶段。（方笑）已经快 40 年哉，还是初级。葛末到啥辰光算中级，又要到啥辰光达到高级？“美国到底算啥格级呀？”

方：美国或许算“超级”吧？（大笑）

梁：两个工人竟然在大庭广众这样讲而毫无顾忌，尽管有人眼睛盯着，

他们还照样讲。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说明现在有了一定的言论自由。两个工人提出的问题，我们经济学家也无法答复。

方：确实无法答复。

梁：去年有人告诉我一桩事：在软卧有两位老军官在大骂学生闹事，国家养活他们，还不安份读书。同车厢的一位青年问两位老军官：“二位老首长说完了吗？”老军官说：“你有话要讲？”青年答：“等你们讲完我再讲。”另一位老军人说：“我们讲完了，你讲吧！”青年讲：“既然你们讲完了，轮着我说几句了。国家宪法规定人民有游行的权利。这算不算闹事，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且不去辩论。试问：革命闹了几十年，国家弄成这样，你们这些老同志有没有责任，又该负多大责任？”（方插话：问得好！）一番话问得老同志哑口无言。要在“四人帮”时代，有人敢这样说吗？

方：我觉得民主的气氛增加的标志在于大家意识到自己有民主的权利了。不久前的人大和政协两会开得比过去活跃，因为有些代表和委员意识到自己有权利说真话，敢于表态。

物价飞涨与官员挥霍

梁：我想请你谈谈当前千千万万人所关心，也是涉及千家万户的物价问题。过去的物价体制不尽合理，有的商品靠国家贴补，实际也是增加人民的负担，这是人民能理解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认为物价改革是难度比较大但又不能回避的问题。近来提高四种副食品价格，固然可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了，但工资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在不同程度地下降了。干部和老百姓啧有烦言，形成社会不安定因素。一个矛盾解决了，另一个矛盾又产生了，似乎

“扶得东来西又倒”，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方：物价上涨不是实行开放政策的结果，我前面已说过。像波兰的社会不稳定，一部份因物价上涨，一部份因物资供应不足造成，很难说这是由于社会体制改革而产生的。我国近来物价上涨的原因到底为什么？部份原因由于调整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材料及燃料价格，但某些国家垄断性的事业也照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涨价，这对国民经济肯定无好处。财政赤字直接影响增加货币发行。我不久前从四川回来，印钞厂的人告诉我，那里的工作非常紧张，印钞机 24 小时日夜连轴转，连各科室的人都上阵了，他们都意会到物价要飞涨。财政赤字造成的因素，如果部份由于消费性的楼堂馆所，这种投资没有价值。

还有一个最敏感的问题：现在军费是多少？军备竞赛是消耗国力最大的支出。苏美都负担不起。我们是个穷国，更经受不起对外作战。有些仗打得没意思，干吗要这样？可能由于面子问题。因战争而造成的赤字，毫无意义。我们要调查一下物价上涨的实际原因。前些日子调整了四种农副产品的价格，大家会同意的。猪肉收购价格如不提升，市场上就看不见猪肉，但农副产品一旦涨价，其它东西必然全面提价。

梁：有个报导说，自从四种农副产品调价后，平均物价上升了 60%。这不一定精确，有的不到这个比率，有的远远超过。

方：一窝风的涨价是没有道理的。这需要经济学家进行翔实的调查研究。惊人的浪费现象也能造成物价飞涨。举个极端的例子，菲律宾的物价上涨原因之一是由于马科斯夫妇疯狂地挥霍国家资财和他的家族、亲信的贪污中饱，不管人民死活。他们的私囊是丰满了，而国家财政连年闹赤字。我国是否也

有一些类似这样的人？我不知道高层人物中挥霍浪费有多少？有的首长，他一家可以拥有六辆汽车，老头子上班是一辆，太太专用的是一辆，孩子们上学是一辆，保姆上街买菜又是一辆。这是他家的司机说的。司机们都了解内情，所以互相传开了。你说，国家这样穷，能受得了吗？

梁：这是哪一级的大干部？

方：那我就知道了。我没问。他们说得有板有眼。（笑）

梁：“奔驰”汽车还要讲是什么型号的，200号型嫌不够气派，讲究600号的。有的人还指定要“林肯”特级豪华汽车。

方：马克思著作中有哪一章说：领导干部，“奔驰”要坐600号型的？

（笑）又如从中央到地方领导人大摆宴席、公费请客，更不用说了。钓鱼台一桌燕翅酒席要好几千元，这够老百姓几年的伙食？现在提倡“四菜一汤”了，可是“佛跳墙”（在福建当地也卖250元以上）也算一只汤菜，十寸盘的溜海参算一样，清炒虾仁又算一样。这不是形式主义！我听新华社的同志讲，某某大首长去了一趟佳木斯，就花费20万元，为期不过一周。其他人出外一趟，花的也不会少。还连吃带拿，这都是花的老百姓的钱。美国国会批评里根的活动费花得太多是造成财政亏损的原因之一。中国领导人的活动费花多少钱，甚至不正之风的消耗又是多少，这笔帐只怕说不清楚。

梁：美国共和党的活动经费，是否列入国库开支？

方：党的活动经费应由自己党费开支，国库不拨款，否则在野的民主党和其它小党也向国家伸手了

梁：有人指出，中国党的活动，实际就是政府的活动，这和外国不能相提并论。

方：这就难说了。党政应该分开嘛。现在一谈节约开支，首先卡教育经费，因为教育经费中用于人头费的最多。财政部认为卡教育经费最见成效，稍为削减一点，一大堆钱出来了。

梁：现在贪污浪费的现象确实严重，而且比较普遍，中央领导同志也承认这是事实。

方：以前我们说，国民党有四大家族，把国家经济搞得稀里糊涂，现在不是四大家族而可能是四百家族了。我不知道，我们有些人在国外存款究竟有多少？

梁：指私人存款？

方：当然。有的存款是私人所得的佣金，等于贪污受贿。如果因此而造成赤字，将通货膨胀的灾祸转嫁给人民，这是犯罪的行为。

梁：中国没有合法的个人佣金规定。佣金必须上缴，连外商馈赠的礼品（在一定限额以上）都要交公。

方：本应如此。

国民党今非昔比

梁：你刚才讲资本主义必须讲信用，商品牌子创出去了，必须保证质量，不能以次代好、缺斤短两，更不能搞假货欺骗顾客。我看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商人也要讲究信用。同仁堂的虎骨酒，决不能用狗骨酒混充。（方笑）应用羚羊、犀角的名贵药品，决不能以山羊角、水牛角冒充。你说，目前的混乱现象，不讲商业道德，混水摸鱼，趁火打劫，很难理解。我问一位负责经济工作的同志，现在经济搞成这样，你们难道不想点办

法，他说：“事难两全，常常顾此失彼，病情是了解的，但能治百病的药方不易开，既要祛寒，又能败火，实在不好办。千家驹讲的情况，我们不是不知道。他看出了毛病所在，而所开的方子未必可行。”

方：他的话很含蓄。说穿了有一部份是政治心理障碍，好像我们的牌子不能丢。问题多是事实，事情困难也是事实，但不是不可解决的。道路有了，关键在是否肯放下架子来学、认真地学。今天上午我还对人讲，真理的标准现在更发展了，发展到生产力的标准。对，只要你给我一个原理，我们学物理学的就可以进行推论。台湾的生产力，硬是比此地高。这是明摆的事实。那末，为什么在这方面不学习台湾？你说按生产力的标准，生产力的标准就是这个。你说学美国、学欧洲是“全盘西化”，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领土，为什么不可以向台湾学习？当然，台湾并不理想，有些事绝对不理想，但他们搞经济就是比我们好。我们既然有魄力将海南岛划为比经济特区更开放的区域，为什么不更勇敢点，再划出一块地方，按照台湾模式进行实验？资本主义的美国是友邦，同属炎黄子孙的台湾难道是“敌国”？有的人宁愿讲美国好，而不愿讲台湾好。我们既然重新认识美国，重新认识苏联，为什么不重新认识国民党？这完全是一种政治心理障碍。向外国人学习不觉得寒碜，向自己同胞学习反倒寒碜？道理说不通的。凡事要讲实效，从效果检验真理嘛！台湾这几十年也在演变。国民党发行金元券时是它最腐败、最黑暗的时期，它那时很坏，但国民党也在异化，是向另一端异化，它在某些方面不得不将自己改变得好一些，否则它在那个小红岛上无法生存。现在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国民党。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说？

朝秦暮楚失信于民

梁：我也听过类似的论调。有位老区来的同志对我说：“看来，今天的国民党不是昔日的国民党了。”（方笑）不久前，有人自台湾来大陆探亲访友，说：“台湾有 760 亿美元外汇储备，由于美元贬值，受损失不小。台湾很想把外汇用出去，台商也有兴趣对大陆投资，但是有顾虑，怕共产党说话不算数。”

方：对我们不信任，怕钱被吞吃掉。

梁：是这样。他说：“台湾怕将来有一天，你修改宪法，台湾也要实行社会主义，一切产业将归国有，商人的血本全无。”总之，怕吃亏上当。

方：香港有些居民向国外移民，也怕将来话不算数嘛。我们说话不算数的事，实在数不胜数。原来我也是相信共产党说话算数的，经过几次政治运动，证明没有一次说话算数的。刚说不打棍子，言犹在耳，棍子又来了……

梁：现在不搞运动了。这是天大好事。

方：是呀，过去就是不讲信用。党和政府一旦失信于民，谁再来上当！

梁：一位北京的朋友告诉我，他每次到地方上去看看，下面总把他当“钦差大臣”伺候，热呼得受不了。有一次竟然大放鞭炮、钟鼓齐鸣，旧社会的官场恶习又来啦！我联想有许多老同志不肯从太师椅上下位，怕的一朝削职为民，手中无权，等于丧失一切。不做官，不体会当官的威风，所以有人有官瘾，不甘心退出官场。

方：当官除了精神上满足虚荣心，还有物质诱惑，一朝大权在握，以权谋私很方便，即使你自己不插手，下属也会揣摸意旨而行。做官最没压力。给荣誉、给钱都可以，问题在必须给他压力，规定他一定的责任。西方的公司经理都是这样，责任很重，企业亏本就下去。中国的干部却是“铁饭碗”，

渎职犯了错误，至多一纸检讨书了事，调到另一单位照样当头头。

通胀与加薪

梁：最近有位领导讲，物价不怕涨，只要工资涨得比它高一点。事实上，仅增加十元副食补贴。

方：如果拿这十块钱仅仅为了买这四样东西，可以够。问题是四种副食一涨，别的也跟着上去了。国家公布的物价指数，在品种选样方面和计算方法上，有一定之规。这种计算方法不尽合理，把钢铁、水泥、砖瓦，燃料……都计算在内，而且这些物资不是按市场议价而是按计划调拨价计算。试问人民日常生活中花多少钱买肉类、禽蛋、布疋……吃穿用上，又花多少钱买钢铁？

梁：前些日子还传达一个文件，这十块钱不是由国库直接支拨的，而由各单位自行负担，还不等于一码事，绕着弯说话。

方：外国通货膨胀率每年在 5% 以下是正常的，按每年 5% 提升，使生活水平不致下降。一般是 2% 至 3%，工资也是。

梁：英国工人的工资增加幅度超过通货膨胀率。姚依林估计今年物价上涨率将为 10%。

方：各人计算标准不同。研究生的感觉同我们又不一样。他们的几十元生活补助完全花在吃的上面，他们感觉的物价上涨率是 60% 而非 10%。我们有些物价比美国还高。在美国，装一部电话是 60 多美元，而在我国公家装一部程控电话要 4,000 元人民币，相当 1,000 美元有余，高出 15 倍。

梁：在上海，私人装一部电话要 500 多元，但要排队到哪天说不准，可

能是一年、两年。如果给电话局经手人“好处费”，马上就装。

方：北京一般是 2,500，程控式的是 4,000。这是垄断性的涨价，因为装电话非找电话局不可。装电话比美国还贵，没道理。

外汇储备低于危险点

梁：赵紫阳同志说：“现在我们具备了物价改革的条件，因为我们的经济情况不错。”你认为能否作出这样的判断？

方：我不知道赵是怎样理解的。今年一、二季度的工农业生产情况尚未公布，且不论及。今天上午的会上，有人说：“对所说的外汇储备有所改善”，我并没感觉到。知道内情的人告诉我，去年我们的外汇储备仅××亿美元，远远低于危险点，市面一有动荡，马上被消耗光。公布的数字，只是账面上的。

梁：目前我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运用价值规律指导生产。你认为和资本主义经济本质上有区别吗？

方：本质不同在所有制。所有制是最根本的，它决定了很多东西。我们实行的是所谓计划经济，即公有制，但这不等于老百姓所有制，至少老百姓没有感觉到，只有少数人所有，实质更私有，而且没有自由竞争。中国的所谓市场管理，基本上没有利伯维尔场，只有卖菜是开放价格，其它只要能赚钱的，都由国家控制。我们不是靠产品质量和技术来竞争，而是凭其它因素甚至要走门路，才能找到货源。这根本不是利伯维尔场[1]。

口号切忌脱离实际

梁：现在提出开发沿海地区经济，这会不会进一步加剧沿海与内陆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方：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看政策。它实际不是个理论问题。你愿意介入国际经济，自然有进有出。如今提“大进大出”，如果又是一个口号而无细致具体的内容，是危险的。口号不能说明问题，也不能令人信服。过去党的领导人常爱提口号，一会儿“农轻重”、一会儿“以粮为纲、以钢为纲”，都是带有片面性的提法，有的甚至是错误的。经济是综合性的，谈不到以一个口号概括一切。现在提“国际大循环”，又是一个口号。光是口号，非常危险。就连美国也决不敢笼统提出“国际大循环”。美国的纺织业决不“大循环”，绝对控制进口。我们实行“大循环”，和内地的关系如何处理？当然，内地资源多。如安徽的煤很丰富，上海的煤大部份由安徽供应，但安徽的煤生产越多越赔钱，因为运出的煤定价太低，而从上海输入的工业品却昂贵。这样，怎么谈得到沿海经济上去了就能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

梁：也有另一种情况，原材料价格涨上去了，而工业成品价格不变。上海也在叫苦。

方：有这种情形，两种情形都有。现在谁也骂谁，谁都觉得吃亏。不谈知识分子，当然不会舒服；工人也骂街，农民讲养猪不合算。根本在计划订得太死，每种人都觉得没有一个正常的流通渠道，没有一个自由竞争的机会。国家的计划安排你这样做，那样做，然后给你钱了事。我在浙大讲过，我们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确实不够协调。

改革成败的关键

梁：以沿海地区带动内陆，恐怕不能一概而论。有资源的，可作沿海工业的辅助工厂，制造初级产品，双方可以协作。有些地方如资源贫乏，特别是老区，解放以来经济基本没上去，人民生活也无显着改善，实行协作不免有困难。

方：这是一般规律。凡是老解放区，经济大都未上去。

梁：有的僻远山区，连简单的手工业也不发达，想象不到的困苦。粤北产毛竹，而当地老百姓还要从别处买进竹篾。真是笑话！有些地方有尚未开发的丰富资源，但缺乏资金。有资金的沿海地区，见投资后不能很快有经济效益，也踟蹰不前。所以，事情是复杂的，不是一句话就能办到。

方：所以不是提一句口号，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毛泽东时代也不是不想把生产搞上去，但提的口号脱离实际，什么人民公社、大跃进等等都是口号。

梁：我们现在搞经济改革，每每碰到和 40 年来的旧框框相撞，互不配合，窒碍难行，就是你所指的两种体制不协调。我们的企业办一件事要层层请示，盖上无数图章后，等到了基层已错过时机。而外资企业，凭洋经理一句话，是或否（Yes or No），问题解决了。这样，我们怎跟人家竞争？

方：在目前条件下，我们跟外资企业竞争，明显要输。

梁：经济改革而不触动政治，能行吗？

方：每个方面最后都触及这个问题。我国自从实行经济改革的十年，头五年是成功的，主要指农业方面，越来越少管就见成效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最近这五年不理想，无论城市改革、工商业改革都未见效果。这些改革必然牵涉政治，即最高意识形态问题。我觉得我们最高领导人，在经济上是想改，而政治上不肯放。从他本人看，是各自参半（half and half）。

他的表现非常明白，经济上改革开放，搞承包都可以，而政治上自一开始就不放手。从魏京生、王希哲、王若水、刘宾雁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条线非常清楚。现在到了矛盾不可回避的时候了。

梁：有人有这样一个看法：老的一代思想已经定型，要他们步子跨得更大，不太可能，但下一代或再下一代，从西方留学“洗脑筋”后，回国从政，会不会改弦更新？

方：有一定可能性。

人民力量与统一障碍

梁：这岂非应了杜勒斯的预言？

方：我们且不详论杜勒斯这个人。如果我们第三代是走向进步，有什么不好？改变颜色使社会发达，又有什么不对？我对国家前途是比较乐观的，因为已经实行开放，再想走回头路已不可能，即使短时间退回去，也决不能持久。像刚才讲的，老工人说话了，知识分子也说话了，要整人没那么便当了。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可以看出，尽管号召人写文章，却没人写了。这个运动只得不了了之，没人愿受控制了。政府最近两年进行的改革是处于被动状态，不得不如此。往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出来，都往前走一步，非这样不可。每次“反自由化”之后，自由化更前进一步。大学生现在指名道姓批评领导人，过去是不敢的，说明自由化的幅度更宽广了。这次人大开会，代表们对某省委书记的反对票加弃权票达 600 多张。他在省里没做出什么成绩。他在处理我们对待学生问题时，表扬过我们做得对。我们每件事都是通过他的，后来他看风声不对，中央对此表了态，他哗地一声变脸了。典型的政客。

（笑）

梁：最后回过头来，归结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问题。我们都希望祖国统一。但主要的障碍在哪里？

方：可能就是“四个坚持”。

梁：我们再三声明，台湾不实行社会主义。

方：“四个坚持”是普通性的原则。尽管我们讲这对台湾不适用，但台湾不会相信的。台湾如果这样想：“你现在是暂时容忍我存在，而不是以平等相待。”这一点不稀奇，他们很自然会这样想的。

梁：今天谈得不少了。谢谢你！

方：再见！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1988年7月号）

编者注释

[1] 法语：Libreville，即自由贸易市场。

[\(返回目录\)](#)

风雨中的励之和我

（《我们正在写历史》代序）

李淑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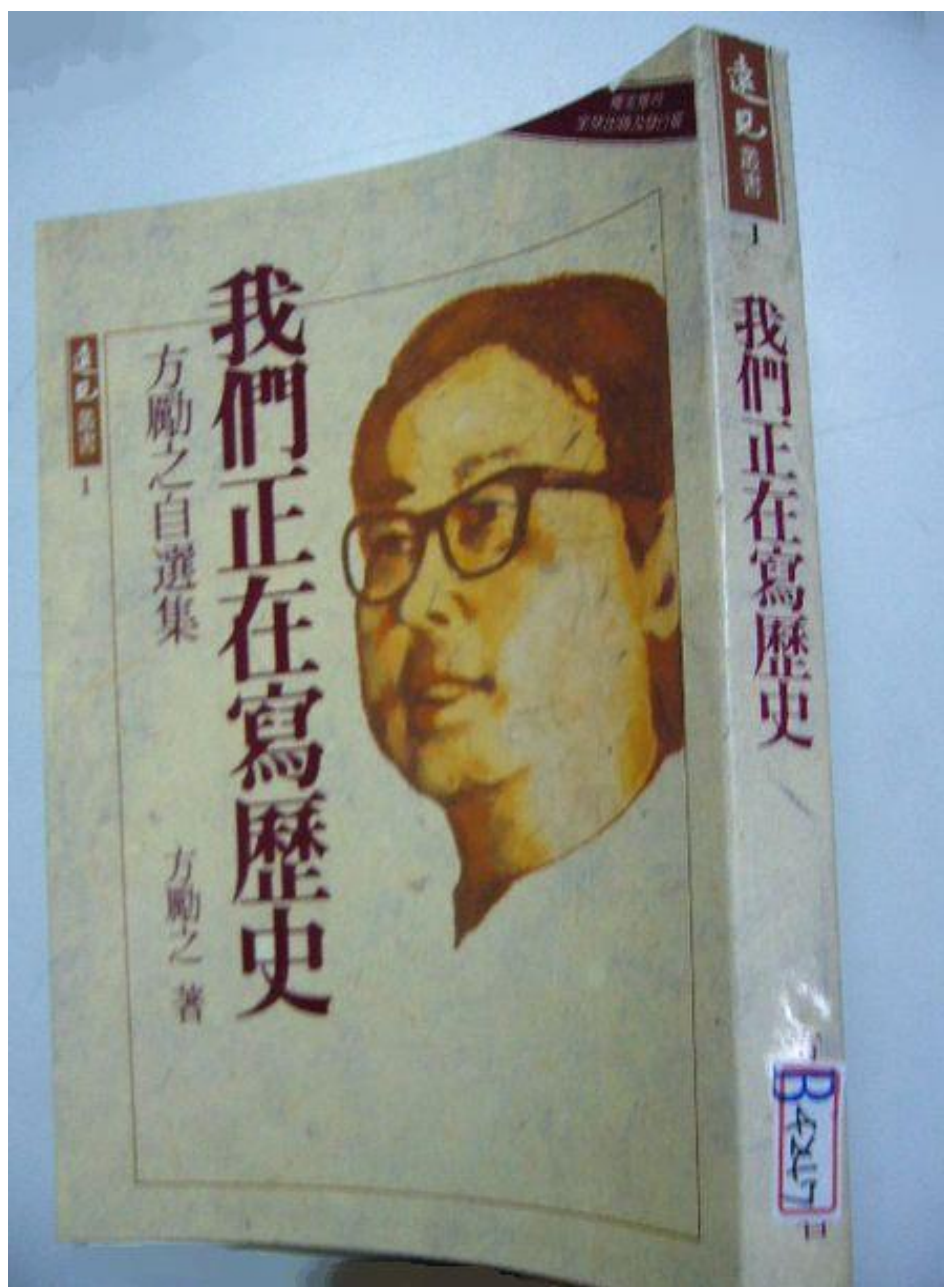


图1 《我们正在写历史》

有些事，是可以预料的；有些事却是始料未及的。

我的丈夫方励之终将会遭到批判、撤职、开除是我早有预感的。共同迎

接暴风雨的心理准备是早有的。而他的那些即兴讲话会在不同地区,用各种文字如此广泛地加以介绍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为此高兴,感谢所有认真、严肃地传播这些讲话、文稿的人们;感谢那些为倡导民主思想而冒着风险用各种方式收集、转移这些材料的朋友。

那是在 1987 年之后,励之的这些业余讲话引来愈来愈多的麻烦,同时也引来愈来愈多的听众,尤其是年轻的听众。他的直言而犀利的评论、风趣而幽默的比拟、科学的批判精神和严谨的逻辑推理所包裹的是一颗淳朴而诚挚的心。这种出自真心的话,在多年假话、套话、空话、大话的文风中犹如打开了一扇窗户,一股清流沁人心脾。不止一次,原来立意批判他或曾经批判过他的人改变初衷,真心诚意地成为他的朋友。每一次麻烦,使我们有了更多的朋友。有好几次,内部收集准备批判他的材料都变成了抢手货。也就是



图 2 1988 年 5 月 4 日,北大建校 90 周年,一群北大学生,热情地围住方励之,邀他发表演讲。

说在这风风雨雨之中，青年们、学生们出于爱好、汇报手们出于“整人”，一次次地整理了他的各类讲话，甚至包括科学内容的讲话。这些讲话早就或明或暗、或公开或私下地流传、转录、转抄。曾有人给他来信称：“……我们正躲在四面不透风的暗室里听你的讲话录音。何等好啊！我们要多几个方励之……”

励之始终处在危机之中。危机，催人更勤于思考，催人更奋发工作。励之的性格是：愈压愈出成绩，愈压思想愈深刻坚定。

从种种事件中，我意识到他讲话的份量，开始有系统地分类整理、收藏。

1987年初的事件虽为我所料，但似乎来得太突然了。在科大，励之从建校到调职，在近30个年头里吃尽了种种苦头，但他却深爱着科大。因为他把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科大，他在千难万苦中创立了他科学工作的基石。是在凑巧的各种机缘之下，主要由于科大师生的欢迎，他被任命为副



图3 1987年9月23日方励之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北京）

学生们争着索要签名：您还是我们的校长！

校长。他虽无心做官，却有意藉此机会为科大做更多的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并没有击倒励之，而是极残酷地割断了他与科大的血肉联系，他无法再为科大效力，没有了这种顾忌，他可以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心意了。

1987年初的几个月是极为奇妙的几个月。一方面，成千封支持及慰问的信飞向科大、飞向北京天文台，飞向北大蔚秀园。多少不相识的人寻找我们家里的电话住址、冒险打电话或来看我们，索取录音带及讲稿；另一方面，先是发材料批判，后是匆匆回收材料，又规定不得随便借阅，更不得流传。这种强烈对比的刺激，使人想到，应当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真正在想什么、做什么。为此，那时对朋友们索取材料的要求，我都尽量予以满足。特别当上海王若望被抄家的消息传到北京之后，散发材料给不相识的朋友的过程更加快了。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我们这个教授之家没有转录设备，而市场又已受命不得复印“不恰当的材料”。这样，只好用孩子听英语的简单录音机对录，或只好用手一份份复写，直至手指的磨泡殷殷渗血。

当时，一共散发了多少已经记不清了。直到消息反馈回来才知道：在美国，励之的讲话在不同报刊上用英文、中文发表，留学生手中甚至有录音带；香港有不只一本励之讲话集出版；台湾的远见丛书第一册《我们正在写历史》竟成了畅销书。

当然我想，传到世界各地的励之讲话，可能不止这一个途径。励之的各类讲话以及他自身，早已是敏感的题材、敏感的人。不少有心人早就在搜集有关他的资料。励之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对于一切忠实地、认真严肃地编辑、出版他的演讲及有关文稿的人们，都认为是做了一件有益的事。在如此曲折的过程中，少不了各种阴差阳错，更正了就好。



1991年9月23日方励之、李淑娴拜会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并向吴大猷赠送《我们正在写历史》一书。（林俊良摄，载该日《联合报》，李淑娴提供）

乘高希均教授来北大清华演讲顺便到我家做客之际，写下这点真实的过程，避免一些误传，以谢所有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

1988年6月5日于北京

[\(返回目录\)](#)

中国应当先有常识性的民主

——在北京中科院新居接受香港《镜报》林文采访^[1]

笔者月前在北京拜访了方励之夫妇，并在其新居对方教授作了专访。虽然恰逢方教授即将外出，不能多谈。但在有限的的时间里，他仍然爽快地回答了若干问题。方教授声如洪钟，思路敏捷，观点鲜明，直言不讳，以及他对民主政治的主张，都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特予整理刊出。内容未经方教授过目，如有错漏，由笔者负责。

因祸得福迁入老教授级新居

问：今天能到你们乔迁的新居访问你们，感到很荣幸。新居比原来的大吗？

答：比原来大一倍，共有 70 多平方米（注：约 800 多平方呎），四房两厅。

问：这样的居住条件相当于哪一级？

答：相当于老教授的待遇。像我这样年龄的，也少有这种待遇。

问：客厅很漂亮，自己装修的吗？

答：整个房子都是自己装修的，共花了 10,000 元人民币。

问：在这个客厅接待过外国朋友吗？

答：接待过，台湾记者也来过。

问：你们能住进新居，是不是“因祸得福”呢？

答：也许是。

问：方教授现在接待外宾、出国参加学术活动的机会似乎比以前多了也是“因祸得福”吗？

答：对外宾，当局实际上不希望我接待太多。

问：有所限制？

答：是的。接待台湾记者是当局安排的。不过，既然一向视为敌对的台湾的记者都可以接待，其他友好国家和地区的记者为什么不能接待？老的道路已被证明走不通了。

问：方教授，你对中国政局最基本的观点是什么？

答：概括地说，现在是处在对老体制、老道路的实质否定，但还没有到下决心建立新体制、走新道路的时候。中国现在从上到下都认识到老的道路不能走，斯大林、毛泽东体制的社会主义是不成功的。从前我们讲青年人有信仰危机，最近有些朋友跟我说，现在我们这一代也有信仰危机。因为大家看到的社会主义，就是斯大林、毛泽东的模式。过去只是接触外界较多的人士怀疑这种模式，现在怀疑这种模式的则更多了。

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能够反映实际吗？

答：这个理论值得给予好评的是，它实际上承认前 30 多年的做法是失败的。记得邓小平有一次对记者讲过，我们过去有 20 年时间没有什么进步。有一个顺口溜说：“辛辛苦苦 40 年，一觉回到解放前”，意思是现在说的初级阶段不是等于回到当年所提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了吗！所以初级阶段也不是什么新理论。

问：我也听到一个顺口溜，叫做：“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想往里装”。看来人们对这个新理论尚不敢恭维。

答：是呀，现在提“初级阶段”甚至还没有孙中山当年讲的“军政、训政、宪政”那样清楚呢。初级阶段的内容是什么，结束的标志是什么……都不清楚。对初级阶段的时间现在越说越长，一会说 50 年，一会又说一个世纪。从物理学角度看，这些说法都不合适。因为任何一个设想的提出都要有根据。甚至可以估计错误，但要有估计的根据。譬如可以根据经济的增长计算出大体要 50 年的时间。如果没有任何根据，那是极不科学的说法，更谈不上是理论。

民主最基本概念是人权概念

问：有人说方教授对中国民主的看法有许多超前的观点，你同意吗？你的民主观点在中国的可行性如何？

答：有人说我提的是超前观点，也有人说我提的是非常常识性的东西。我对民主问题没有专门研究，但我提的都是最基本的民主概念，如果这些东西对中国还是超前的话，那就说明中国的确需要有人出来讲一讲，那怕现在还没有切实的可行性。但是如果不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概念，那会更加危险。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我所讲的民主概念和毛泽东讲的民主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毛讲的民主实际上是一种民主作风，就是领导人要听取意见，或如现在提倡的对话。而我认为民主最基本的概念是人权概念，民主与人权不是一回事，但与人权密切相关，就是说，一个社会里的人应当有自己的思想自由权、言论自由权、新闻自由权和旅行自由权。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基本的权利。但因为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做到或没有完全做到，所以若说超前也的确是超前。其实，如果没有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就谈不上一个民主社会。民主社会首先要

有这些东西，然后才是民主的架构、民主的运作，后者可能有美国式的、加拿大式的等等。

问：那么你认为中国的民主进程应该是怎样的呢？

答：中国的民主要一步一步地走，首先要有这些基本的常识性的东西。应该说现在比十年前“四人帮”时代有了很大的进步。思想自由现在有了。文革时期搞所谓“狠斗一闪念”，连想问题都不行。言论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也开始有了，譬如可以在自己家里和那怕是香港来的记者交谈了。但在大的环境如学生的场合还不能随便讲。至于新闻自由，原则上还没有被接受。去年赵紫阳在记协讲得很清楚：中国的新闻是教育人民、动员人民的工具。没有说新闻是舆论工具。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后，自然会要求新闻自由。当然也不是要求马上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可以慢慢透明起来。像苏联现在实行政治透明化、公开化，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还有旅行自由、受教育自由，现在学生出国留学常常碰到困难，而像我们出国开学术会议，每次都要审批，审批也不要紧，但往往不批准，其实我们是一定会回来的，但也要受到限制。当然，如果有一定的规则，譬如教书要教多少年才准许出国，出国时间一般在假期等等，那是完全正常的，但现在有时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不让走。

马克思主义非不可逾越学说

问：你的政治观点在被处理前后有无变化？是不是现在的观点比以前更开放？

答：实质上没有变化，表达方法可能有些变化。以前我是共产党员，还负责一点行政工作，表达时要考虑要求。现在我不是共产党员，没有像共产

党员要和中央保持一致的义务，我只要求自己不违反宪法，表达起来就可能更自如一些。

问：你是学物理的，搞自然科学的，为什么会对社会科学有兴趣，而且有着颇为系统的民主政治观点呢？

答：我对社会科学从未系统研究过，虽然有兴趣时也看点政治书籍，但决不像我研究物理那样，花很多精力。但又的确对国家的民主政治问题很关切。原因是由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包括苏联）以前是很封闭的，社会科学只有一家之言，当时唯一能够了解到现代文化或西方文化的只有自然科学，而物理学又是国际化的，没有国籍的，通过研究物理，自然也受到现代文化的一些影响。这里我要强调的是科学和技术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总喜欢把科学和技术连在一起，其实，科学有两重性，一重是它的技术性，极强的应用性，另一重是它的极强的文化性。最近我在文学研究所作“物理学和美学”报告时指出，一般以为美学是文学专有的，其实，物理也很讲究美学。这也是说，物理学有极强的文化性。这是物理学的传统。所以，你刚才说我的民主观点很系统，其实我讲的都是相当常识性的。这些常识性的东西在学自然科学时自然会接触到。因此在关闭的社会里最了解民主概念、人权概念的往往是搞自然科学的人。人权概念最初就是从科学自由、学术自由开始的。学术自由对物理学来说是无论哪种体制的国家都要遵循的，否则无法进行研究。但社会科学当时不一样，仅仅一家之说。其实，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不可批评不可逾越的学说，那是根本违反科学的。

（原载香港《镜报》1988年9月）

编者注释

[1] 林文，20 世纪 50 年代北京政法大学毕业，香港《镜报》主编。本文由林文署名，此处原文照录。

[\(返回目录\)](#)

评《爱因斯坦文集》

《爱因斯坦文集》（以下简称《爱集》）由许良英、赵中立、范岱年、张宣三及李宝恒等编译，共三卷，于1974年至1979年间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齐。其中收有爱氏的论文、讲词、谈话及书信等共410篇，约130万字。它是第一本中文的爱因斯坦原著集。按出版年代论，它是世界上第十部爱氏文集，也是迄今已出版的各种文字的爱氏文集中，篇幅最大的一部。

尽管《爱集》出版已快十年了，但它仍然值得一评。因为，第一，时间并未使这套书的价值有所衰减；第二，时间也使我们看到，在哪些地方应对编译者提出批评。

《爱集》的价值，首先在于它有用，即具有书那样的用途。实在说，某些以个人命名的文集，并不具有书那样的功用，而只是书架上的非书性装饰。因为，这种文集之所以出版，简单地出于文因人贵，到了“准出文集”的级别。至于其中文章的可读性，也许曾经有过，而早已不再具有，或者过去也不会有过。《爱集》出版前，本打算用《爱因斯坦选集》作为书名，但被否定了，理由是爱因斯坦不够资格使用“选集”一词！“不够资格”，很好，这正表明《爱集》全然不属于那类人死书亡的资格出版物。

的确，爱因斯坦的影响，并没有因人死而变弱，反而更强了。爱氏后半生的探索，当他在世时，并没有得到普遍地理解和重视，晚年只有极少数的追随者，甚至被人认为是“活得太长了”。可是，在他逝世十年、二十年之后，却渐渐察觉，那些被冷遇的工作中含有重要的先知，恰如爱氏自己预测的。

果然，目前至少已有两项“被重新发现”了：一是统一场论，一是宇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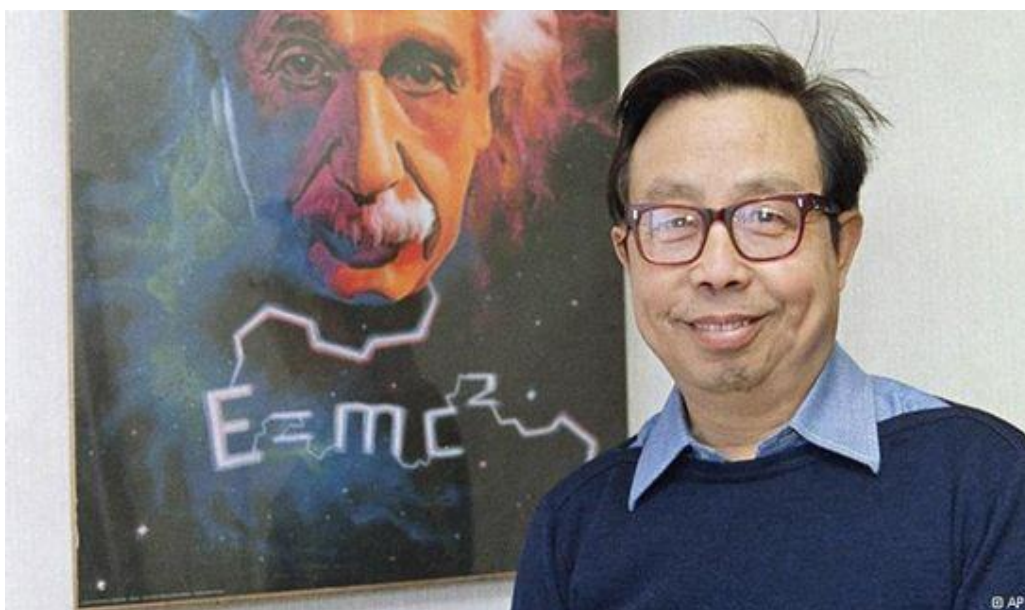


图 1 方励之在爱因斯坦画像前 美联社摄

学。爱因斯坦在最后的 32 年全心致力于建立引力场与电磁场的统一，当时被许多人看作徒劳；广义相对论宇宙学，也是爱因斯坦一直热衷的课题。在 50 年代，对宇宙学的评价比统一场论稍好，但也只是：宇宙学是很美的理论，但不一定是物理的理论。

今天情况则可用一个小数字来说明。一家以科学内容为主的出版社，在其 1987 年出版的物理学书籍中，以统一场论及宇宙学为主题的，约占百分之四十。还可以预计，下一个将“被重新发现”的课题大概是引力波，它有可能在下个世纪进入实验物理学的主流。可见，无论对于关心过去的人，或者关心现在及未来的人，《爱集》都是富有价值的。

《爱集》值得推荐的第二点，是其中兼收成功与失败。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中的地位，无需在此多说，只指出如下一点：近代物理学的三块奠基石，量子论、相对论、引力论，大约有两块是爱因斯坦的贡献。无怪有的物理学家戏称爱氏为“教皇”。因此，编选《爱集》，被不了解的人看来，多少有些像代圣人立书。尽管如此，编译者并未慑于“圣人”形象而采用“句句是真

理”的筛选原则，而是文章不论对错，照录不改。比如，《爱集》中 1911 年讨论光线弯曲的论文，早被证明是错的，爱氏关于宇宙常数先是引入后又排斥的做法，也被证明缺乏根据；《爱集》中还收有不少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的争论的文稿，现在看来，在这场著名的争论中，爱因斯坦有相当部分是输家。

编译者如此收录，不仅表明他们谨守着尊重事实的科学原则，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科学的价值观。科学的发展，逐渐确立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宗教的价值观。任何宗教或准宗教都无例外地宣称自己的经典的、至高无上的正确性。这等价于认为，正确性或正确程度是价值的基础。在科学研究中，价值并不完全依赖于正确程度。一篇被证明错了的文章，有时是颇有价值的；相反，一篇没有错误的文章，有时却是毫无价值的，被编辑退稿。因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提供新知，文章错了，有时却提供了新知，文章不错，却不一定提供新知。对真理的追求，比之对真理的占有更有价值，更不用说比那些对并不存在的真理的坚持了。《爱集》就是这样一部对真理的追求的记录。

《爱集》的第三个特点，是系统地收集了爱氏有关人生、道德、宗教、社会、政治等方面的见解。像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一样，爱因斯坦也是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人。他特别强调有知识的人对社会有更大的责任，他说：“就‘知识分子’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他则负有更大的责任，因为，由于他受过特殊的训练，他对舆论的形成能够发挥特别强大的影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力求把我们引向独裁政治的人们特别热衷于要恫吓知识分子，并封住他的嘴。因此，在当前这样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认识到自己对社会所负的特殊责任，也就更加重要了。这应当包括拒绝同侵犯宪法上的个人权利的任何措施合作。”的确，以这种科学独立精神对抗侵犯个人权利的独

裁政治，是科学家社会中的传统之一。《爱集》中涉及的著名事例即有：塞尔维特对加尔文教权的对抗；布鲁诺、伽利略对罗马教廷的对抗；斯宾诺莎对荷兰犹太教的对抗；奥本海默对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对抗。而爱因斯坦本人则是与德国法西斯对抗的代表。《爱集》使我们看到，他是如何实践着如下的责任观的，“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的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

最后，提一点批评。《爱集》中有不少注释，对读者理解原文很有帮助，这是应当感谢编译者的。但有一条不好。在《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意见》一文中，爱因斯坦说：“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指《自然辩证法》）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对此，编译者写了一条批判性脚注，最后说：“真正‘可笑的’恰恰是爱因斯坦的无知和他的顽固的资产阶级偏见”。首先，这种文化大革命语言出现在这种严肃的书籍上，很不协调；再则，用“无知”来描写爱氏在“当代物理学”及“物理学史”方面的知识，更不妥当。在 1976 年的再版中，这句话被删去了，但仍保留着“反共哲学家胡克引用过爱因斯坦的话”这种政治性暗示。此外，在第二卷编选说明中对宇宙学的批判，也是帽子式的。当然，由于本书出版于“文化大革命”的晚期，这种状况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若从爱因斯坦的“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上来衡量，也许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建议再有机会新版《爱集》的时候，彻底清除掉这种反科学时代的污染。

（原载于《科技日报》1988 年 8 月 7 日）

[\(返回目录\)](#)

对谈民主与改革

——接受叶知秋采访，结果发表在香港《信报》^[1]

能与方励之教授一叙，无疑是一大乐事。与大陆一些人物见面，我（编者注：叶知秋）颇有些体会。有一种是只听不讲的；有一种是只讲不听的，无法交流，与此等人见面只会浪费时间，别无益处。还有一种人是将所有话题，先经大脑过滤，再到喉头滚几滚，使之变得圆圆滑滑后，才小心吐出来，听这种话，也不是味道。

现在从上到下都没理想

方励之的话是装在弹簧上的，使人听来痛快。可惜时间不足，使我想谈的问题，只谈了一半。话题是从民主开始。我认为中国人从“五四”以来争民主，70年来所得无多，似乎还不是镇压民主的势力太强大，而是民主正气未树立起来之故。民主也跟社会风气一样。得把正气树起来，把邪气压下去。

我7月底在广州，见到四个青年坐在单车上大叫大笑，不时跳下来随街侮辱少女，满街的人没一个加以阻止。香港最近有位青年在车上非礼一名16岁少女，他下车后，乘客追上去捉住了他，可见香港的正气已树立起来了。毛泽东虽有极大权力，但如有多些人支持彭德怀、梁漱溟，毛泽东将无奈其何。我昨天与翁松燃教授谈及这一点，他同意我的看法，但问题是如何才能将民主正气树立起来？以下是笔者与方励之的对谈。

方：基本是教育，对下面是教育。上面首先是党风不正，就会影响到社会的中层。中层会影响到下层，使人没有信仰。没信仰的人，就变成动物。

现在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没有理想。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破了，上面不正之风很厉害。这样就使人变得动物化；人的动物化，就只有本能的吃喝玩乐，缺乏了精神上的东西。人类社会没有精神，不可能维持一切。作为一个社会，西方是靠宗教，中国原来是靠孔子、儒家、伦理，现在都没有什么思想了，领导人身上也没有，所以当然影响到整个社会，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靠马列主义控制得很紧的国家，没有了精神支柱，对整个社会影响很大。

叶：中国人没有独立的个性，把人分成了革命分子、黑五类分子，我粗略数过就有 30 种“分子”，中国人就那么一堆“分子”，使“文革”成了一个动物园，人都不像人了。

方：对！对！是这样。是呀，这是毛泽东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说人是社会关系的“组合”，这“组合”是机械的组合。

叶：人没有个性则无法建立民主。

方：是呀，现在就是人的价值如何建立的问题。人活着首先是要对自己负责。中国目前是这样，人说话没有用，确实，你说话没有用，我说话没多少用，社会仍是这个样子。我力量很小，只有十亿分之一。但这说话对我可有用，话我是说了，只要我认为对自己有价值，我觉得如果每人都这样想就有用了。不是说你有没有价值，而是说你首先要明白你自己活着有没有价值存在。不要把问题推到社会身上，好像社会不好，我就是这样的了。关键在于不是说整个中国不好，不能说中国等于你，你就是你自己，这种意识在中国文化里头是很缺乏的。我跟一些西方人见面，见了面他们就告诉我，到中国就很不舒服。我说怎么办呢？一位德国朋友说，碰杯时你们总说“为中德友谊干杯”，他说，我没有这个责任。虽然我是德国人，我也愿意碰杯，但我是

为我所认识的朋友，为你，为他而干杯。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事情，一个人如果对自己负责，这才是一个象样的社会。中国人常说“没有用”，在“没有用”幌子之下，任何人都可以利用这个借口，可以不做事情，不负责任。

叶：我提过这么一句，就是作为一个人，在当时社会要尽当时的责任。好像“文革”，每个人都有责任，不光是“四人帮”的事。

方：当然是这样，先要自我检讨。

叶：当时社会环境是怎么样，你自己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要对自己负责，先是你自己不尽到责任，你怪谁呢？光怪别人没有用。

方：这当然是的，先要尽到个人责任。

叶：民主似乎也应这样，我昨天跟翁松燃教授谈过这一点，不能靠方励之一个人叫民主、讲民主。大家都要出声，都要写，都要谈。

方：那当然。

叶：民主与法治似乎是不能分开的，去年九月我提到对你的批判，我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是一场反宪法的行为，它反对的是法律允许下的公民的权利。资产阶级享受更充分的“自由化”，是享受到更充分的法律允许下的生活方式而已。总统也不能享受超越法律的生活方式。

方：哈哈！对！对！

叶：是不是可以说，所谓民主国家，称为法治国家更恰当一点？

方：法治是规矩、规则，民主在中国的含义则更广泛，包括人权等很多内容，简化为民主这个名词去代替。当然与你所说没有矛盾，只是传统上喜欢用这个词。

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

叶：萨特说“民主不单单是一种政府形式或授予权力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方：对，是生活方式。

叶：所谓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也是在法律允许下的生活方式。

方：对！生活方式也是代表规矩、习惯、或规则，是大家默认的一种方式。

叶：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是谁都得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生活。

方：是呀，昨天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说要民主，现在马上要做的，就是要建立法治。好像建立新闻法、教育法。选举法现在有了，有的法要改进，没有法的要建立起来。现在应当按说能够做，马上要做。因为宪法上有自由，问题是如何保证它能实现，用法来保证的问题。

叶：所谓法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东西，中国人最忌男女关系，谈恋爱也受干涉，但结了婚你就不能干涉了，就不能管我是怎样生活的了。

方：那当然。

叶：游行自由是宪法规定的，但学生参加了游行受到压制，要学生写检讨；要学生写检讨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是不尊重宪法的。

方：那是对宪法的不敬。至于法在现在领导人眼里，只是一种形式的东西，彭真答复“法大还是政策大”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他答半天答不出来。当然按理论上说来，肯定是法大，但他不愿意说这句话，绕来绕去。

叶：至于无产阶级专政，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中共原先是尊崇马、恩、列、斯的，马克思强调斗争哲学是事实，但恩格斯则在《反杜林论》中说过，

当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之后，国家机构对人的统治，将改由对物的统治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中共执政后，生产资料已国有化，为什么中共仍醉心于对人的统治，而不想想恩格斯这句话，去从事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呢？

我就是反对邓小平

方：我想中共是从列宁开始的。无产阶级专政含义是什么？当然马克思是谈到阶级斗争，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如何实现、如何执行，我想是列宁做的。后来斯大林发展了，毛泽东是重复他的，波尔布特又重复毛泽东，完全是共产党专政哲学的发展。

叶：你在澳洲说，中共搞阶级斗争，目的是维护它手中的权力，但这也不是维护中共权力的良方。

方：我想，权力就是镇压，镇压的理论就是阶级斗争。中共自命为代表无产阶级，自命代表人民，它讲话都是说人民不要我下台。人民什么时候表示不让它下台？它有什么证据？所以它就自命为代表无产阶级，所以它的所谓阶级斗争，就是谁反对它就是反对人民，它这做法就这么简单。

叶：搞了几十年阶级斗争，实际上只是保护了毛泽东一个皇帝的权力而已，并没有保护领导层的权力。领导层就是在“文革”整人、关人、杀人最多时垮掉的。

方：那也是最下级的阶级斗争办法，他们之间亦是用阶级斗争口号去进行权力斗争，用阶级斗争的东西去掩盖权力斗争。对下面是用阶级斗争去掩盖他们的镇压。如果按阶级划分，我们怎么算资产阶级呢？我们有哪一条是

资产阶级呢？马克思主义没有说按思想去划分。如按思想划分，有哪一条马克思主义是按思想划分阶级的呢？按思想划分是太危险了。今天想什么就变成资产阶级，明天想什么就变成无产阶级，这不很危险？如果要划分资产阶级，我看邓小平就是皇帝阶级，你看他的生活，跟一般老百姓相差太远了。

叶：昨天有一位听众说你反对邓小平，你并没有就此发表意见，会不会有人说你默认了！

方：就是反对他也没关系嘛！这我早就说过了，是反对他，那就反对他，没有关系。宪法上没有规定不能反对邓小平，宪法上只是规定共产党是领导。

叶：因阶级斗争的心态作祟，现在物价改革也有利用专政力量去“闯关”的意图，这是很明显的。

叶：现在政治体制根本没有改革，所以政治体制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阶级斗争。这话是绝对没有错的。我跟一些党的干部经常辩论，他们就说，实际上他们没放弃阶级斗争，表面上说少一点而已。

叶：公安部部长王芳最近在人大常委会上，就说阶级斗争还是存在，在某个时期还会很激烈。

方：什么阶级？这是原始的理论，是乱说。怎么定义阶级，他都没有概念。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初，他还很清楚定义什么叫贫农，什么叫中农，什么叫下中农。交租多少、收租多少、土地多少，凭此去判定“成份”，还有很定量的定义。现在很难划阶级，他们就说是“存在阶级”。那好，你先跟我说，如何划分阶级，这是最基本的问题。所以说现在完全乱套了。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这是怎么划的？资产阶级本身就不存在，知识分子怎么会属于资产阶级？

叶：这观念很危险，它使经济运动变成了政治运动。

中共也是“资产阶级”

方：就是！共产党几十年，它就懂阶级斗争。如果是在夺取政权以前的农村，我认为还有一点根据，那时按照什么经济地位去划分有点根据。夺取政权以后就没有意义了。如果硬说有意义，就是中共变成“资产阶级”了。中共现在掌握所有生产资料，掌握了所有的东西，那中共是什么阶级？

叶：我担心物价改革碰到的问题越大，中共动用专政力量的范围就更广。

方：它当然可这样做，不过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反抗。

叶：李鹏提出所谓从重从快打击破坏开放、改革，破坏新商品经济秩序的人，这“破坏”两字跟以往“破坏农业学大寨”一样，是乱套的罪名。所谓“从重从快”，实际是否定原来的宪法规定，是一种违宪的行为。

方：对！

叶：所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李铁映果真“宣布”你是“反革命”，你也可以“宣布”他是“反革命”，对不对呀？

方：哈哈！

叶：没经过法律程序，一个人怎能擅自“宣布”另一个人为“反革命”？

方：对！哈哈！对！

叶：这种专政心态，也反映在香港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上，草案第 32 条这样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以法律禁止任何破坏国家统一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的行为。”

方：这个提法太宽了。这在宪法中是“反革命”罪，这一条是最不明确

的。“反革命”罪从判一两年到无期徒刑都有。

叶：香港人能看出这条问题所在的，不会太多。

方：香港人没有尝过阶级斗争，他们不了解阶级斗争的残酷性，所以对共产党很多手法都不了了之。

叶：改革问题你怎么看，改革已碰到很多问题。

方：经济改革碰到所有制问题。物价改革不能孤立于所有制之外，实际是要靠所有制保证物价改革的有效性，于是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难题。

叶：我以为在所有制不变之下的改革，改来改去会有一点变化，但最终则难说会有什么大前途。

方：有很多根本还没有改，很多还是所谓的“公有制”。（方认为“公有制”实际是中央所有。）

叶：中国改革的目标，也不过是强调 2000 年后达到小康而已，小康以后就没有目标了。

方：谁知道以后是什么目标，目标从来没有。中共改革完全没有理论。

叶：我们现在都为改革感到喜气洋洋，但几十年后回头看，可能发觉不过如此。公有制不改变，只是在一些环节上有所改变，似乎难以变出什么大名堂。

方：是！形式而已。现在的改革当然很不彻底，经济改革也到头了，而且走下坡路了。物价要改革，但工资跟不上，问题严重得很。

叶：这似乎是所有制不变，意识形态不变，权力结构不变，制度不变导致必然的困难。

方：现在中国一切都是中央控制，政治中央控制，经济中央计划，意识

形态是中央权威，社会主义所有制是中央所有，这几方面是连在一起的。在那一方面被打破，其他的环节就会失效。中共不改公有制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叶：所谓党政分家，是分居容易分家难。

方：党政分家有的已经分了，分也是行政性的，不是政治性的。我曾与台湾的学者谈到这个问题，建议共产党应当从大学撤走。

不改所有制就无动力

叶：从地方基层到中央，党与政是一种权力交叉格局。在业务方面是经理为大，但回到支部生活则以书记为大。你在业务上给我颜色，我则在党内给你颜色。据说，姚依林批评赵紫阳不尊重国务院，也有人批评赵不该过份插手经济，只管党务就成。但党实际上还是“领导一切”。“物价、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先得在政治局讨论，再放到十三届三中全会通过。国务院不过是执行而已。

方：对！原则上并没有改变党政不分，因为宪法规定共产党是领导。既然党是领导，党政怎么分开呢？

叶：你看企业改革有什么出路？

方：企业改革也是所有制问题。所有制不改革，只是企业内部行政性改革，所以也改不彻底。没有一种机制保证经营者，经营者便失去开发的动力，亦无法促使其对企业有长期负责的行为。如改变体制，经营者最少会有一种明显的动机，从而形成企业发展的动力。

叶：企业的问题不少，光冗员就有 2,000 万，浪费掉 600 亿元。我是反对全面增加工资的，城市懒汉对浪费不须负责，反而要不断津贴他们，对勤

劳者不公平，对四亿农民不公平。

方：这是大锅饭造成的恶果，中共又只能以大锅饭去解决，他们没有办法了。

叶：有很多问题是发展的衍生物，这是中共以前未有遇到过的，所以常常显得束手无策。如官商勾结，中共非但无法解决，其本身也卷了进去。中国人要为此付出一个较长时期的痛苦代价。

方：官商勾结我看也是法律问题，要进行法治。中国实行两种经济体制，便易被人从中做手脚。中共的权力又跟做生意连在一起，这就提出了一个怎样以法律去保证清廉的问题。现在实际上商不是商。既称之为商，生意做成功了，则允许你赚钱；失败了，则要赔本，要倒闭。现在不是，谁赚钱是谁的，赔本则是国家的。这不是商，不能称之为商。

叶：这是利用特权的一种形式。

不可能放弃公有制

方：对！这是特权！刚才所说的法律，还不完全是法律问题。从商要有一定的规则，打输了牌就要输。但“官商”却不会输，他写个什么报告也就算了。牌不是这样打法的。“官商”到输的时候，用的是另一个规则，另外还有不是正常商业行为的规则。所以，这就不能叫商。我看过一篇文章，说不管用什么方法赚到钱都是对的。这句话不对！竟然有人说，香港人的钱都是非法赚来的。我知道在大陆有这么一种论调。这论调当然不对，香港当然也有非法的，但都是非法就讲不通，也不能繁荣起来。

叶：中国很多事情还只是一个口号或一堆没内容的概念。所谓“中国式

的社会主义”，从字面看没有任何意义，深究却有危险性。

方：这是没有内涵的。有这帽子以后，中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然它也会做一些好事，不违反正统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事它可以做，但同时也会做镇压这样的事情。

叶：我在一篇长文中分析过这个口号，认为它是一个口号两顶帽子。如果有人说明中共在进行资本主义，它就给社会主义的一面你看；如说它是社会主义，也可以给资本主义一面你看。如此一来，“中国式”就能随政治气候不同化为两顶帽子随时戴上。

方：对，我觉得也是这样。也就是说，没有一个规则不成。有规则以后，可以让人判断可行不可行，正确不正确。中共的规则总是让人捉摸不定，使人无所适从。

叶：中国是什么制度，目前未定型。所以发展常会与不定型的制度发生冲突。为此将会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制度控制发展，将发展局限在一个水平上。

方：我想，要共产党放弃政权，这是不可能的。

叶：如不放弃，发展到一个程度，则制度会本能地控制着发展。

方：对！那当然是啦！现在就是控制，中共派一个党支书进基层单位就可以控制。

叶：我曾提过一个方案，建议将 500 人以下的小企业私有化，由民间去经营小企业。目前私人企业已发展到 1,000 名员工，为什么不可以把 1,000 名员工以下的小企业卖给私人经营？

方：私营化不是理论问题，中共深知这是权力问题，实行中央计划是一

种权力的保证，中共是为了保护手中的权力。

叶：那么发展还是受到权力的阻碍？

方：对！

叶：中共想发展，却又不能发展，这是矛盾所在。是其本身的制度，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

方：对。中共领导层最早的改革动机，就是要挽救领导层的跨台。那时“四人帮”刚跨台，信仰危机、经济崩溃，毛泽东死掉，在这种情形下你说怎么办？中共权力集团知道如何做，所以最早的动机主要是为中共自己。

叶：真正的改革，却是由安徽的农民自发搞起来的，农民也没路走了，必需要改革，开始了联产承包。远在 1957 年，广东佛山及浙江温州的农村就开始了包产到户，但遭受《南方日报》和《人民日报》的猛烈批判，说这是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20 年后安徽农村再次自发改革，只是中共没有批判，先是默许，后是支持而已，直至改革发展到了城市，中共才真正加入领导。

方：对。最初他们和老百姓的利益是一致的。老百姓也太苦了，什么都要票。老百姓已处挣扎状态，不得不求生。但到一定时间之后，中共与老百姓则不一致了，“官商”一张批文足等于老百姓十年粮，怎么算是一致？

叶：如真正开放，任由发展，中国也是有点能力的。

方：只有大港口的设施等属国家所有，其他东西都放掉！

叶：有人说中国现在已是走资本主义了，但这样子的资本主义，实在难以发展。

方：中国的资本主义，关键在于政策要改。中国人经营资本主义还是很有经验的。至少小商小贩就很有办法。问题是理论没有保证，没有市场机制。

现在讲“一国两制”，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共产主义。人家就怕总有一天会被“共产”，所以有的人有钱不敢讲，也不敢用。

叶：现在回复了中共执政前的情况，有点钞票的，从黑市收购黄金，然后埋在地下。

方：对！将黄金埋在地下，不投资这东西就死掉了，社会财富永远积汇不起来。

叶：1985 年以前，国家对黄金的收购价是 600 元一两，广东黑市价为 1,900 元，都是个体户抢购埋到地下去。

老百姓看不见远景

方：埋黄金的心理是等待变天，一变天就值钱了。如是人民币，一变天就完了。而且，这些人认为，一旦共产党变了，我还有黄金。现在的情形，就是老百姓对共产党缺乏最基本的信任。

叶：中国的问题是没有长远的制度，就让人揣摩。邓小平似乎也看不到长远，老百姓更看不到。

方：邓小平并不是想走到多远的改革者。

叶：那么，中国的出路是什么？

方：资本主义化！

叶：这一代做不了。

方：对！邓小平做不了。

叶：待到下一代，社会本身的发展再也没有人可以阻止的时候，那时候才有希望。

方：整个的改弦更张。

叶：如果中国每一步都能纳入自然发展现象，没有人的阻碍，不把希望寄托于某一个领导，中国也会发展得很好。

方：那是肯定的，寄托是没有办法的，寄托来的都是坏的，这是我的观点。

叶：我去年在反“反自由化”的一篇文章说过，邓小平的肩担不起十亿人的头颅，还得靠法治。

当然邓小平是有贡献的，但这是自然的，应当的。他坐在这个位置上，是必须要作出的贡献。谁坐在这个位置上，都有可能作出某种贡献。

莫过份寄望邓小平

方：对！他有贡献，但他的贡献是很平常的。因为打倒“四人帮”以后，谁拿到政权，谁都一定要改革。这是有点基本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的，不需要太聪明的人才可以看出来。很多人都可以做出这样的贡献。

叶：现在的人把改革的希望看得太大，是很危险的。

方：如把希望都寄托在邓小平身上，是绝对要失败的。寄托邓小平绝对没有保障。

叶：有很多人担心没人能担得起邓小平那样的重任。

方：没有的事，中国那么多人！

叶：一个领导人的智慧，事实是整个社会智慧的结晶，谁都不可以有什么智慧。

方：对！邓小平干的事情，又不是他一个人发明的。现状摆在那里，那

么多人告诉他该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而已。不要过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

叶：东方领袖的智慧不比西方领袖的智慧低。一个西方总统的智慧不是很高，是制度化帮了他的忙。除了制度外还有各方面的专家顾问，总统不过是将事情公布而已，且还要国会审批。中国没有制度，领导层的智慧多用于保护自己的权利上。谁斗赢了，老百姓都觉得他了不起。

方：对！是这样，西方有制度的保证。

叶：第三代可能会奉行资本主义。

方：可能会。

叶：从中共执政算起，应不用 100 年。

方：如果实行资本主义，我看最多两代人。

叶：邓小平说中国以后还是共产主义，这提法不现实。作为学术讨论是可以的，但作为领导人，现代的领导人不可能预定 100 年之后的社会制度。

方：他那个主意就是乌托邦。

叶：邓对目前都定不了，他怎能定 100 年后的事情？

方：这是赫鲁晓夫留给共产党人的后遗症。赫鲁晓夫说几十年后就是“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说他就是共产主义的领导人。究竟几十年后会怎么样，反正他管不了。

叶：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评论说，共产党的绝对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化。共产阵营于 1956 年全力批判他。现在看他的话，仍是真理。中国再走共产主义，再行一党专政，应是此路不通了。

方：对！

（原载香港《信报》1988 年 9 月）

编者注释

[1] 本文由叶知秋署名，此处原文照录。

[\(返回目录\)](#)

比较邓小平与毛泽东

——在澳大利亚接受前澳洲广播公司记者钟海伦采访^[1]

记：中国有多少政治犯？

方：这很难估计，因为很难知道谁在监狱里。当人们因政治问题入狱时，新闻界并不报导，只有他们的亲属知道，但也不敢说。我至少知道这样一件事：两年前北京大学两个学生因要独立地讨论马克思主义而被判监禁。我们甚至还没有迈出走向自由的第一步。

记：你认为应该完全否定毛泽东吗？

方：对 1949 年后的毛我认为应该。毛只做了一件事：挑起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只要整人关人，不管国家建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死了。要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话，中共领导既不信，也不懂。年轻的一代完全不信马克思主义，中共领导也明白马克思主义在今日之中国没有用处，他们的目的只是保住手中的权力。

记：《时代》杂志评选中国强人邓小平为 1985 年风云人物，你认为邓实际上并不像西方所想象的那样自由化吗？

方：如将邓与毛比，邓比毛好，在经济政策上他是好的，但在政治上，他与毛一样，他仍然使用阶级斗争理论。邓监禁了魏京生，1983 年发起了反精神污染运动，去年又发起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这证明邓仍然遵循毛的阶级斗争理论。

记：你认为可能会有共产党与别的党派进行竞争的时候吗？

方：如果中共衰落而同时私人经济变为优势，如果中共失去了政治和经

济的权力及人民的信任，其唯一出路是让别的组织上台。现在中共已经无力控制一切了。

（原载 1988 年 8 月《周末澳洲人报》）

编者注释

[1] 本文由钟海伦署名，此处原文照录。

[\(返回目录\)](#)

我不再入党了

——在澳大利亚接受香港《争鸣》记者澳华的采访^[1]

著名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教授偕夫人李淑娴今年 8 月上旬到澳大利亚，参与主持“西澳大学”举办的第五届“宇宙起源理论”国际大会。9 月 1 日将到香港。

方励之这次出国，是他被中共开除出党后的第二次。第一次是去年到意大利。当时，他先后接受《争鸣》和西德《明镜周刊》记者的访问。他那大胆、精辟的言论，像一颗核弹爆炸，震惊中外。

8 月 20 日，方励之接受澳华的访问，就中苏改革的反差、中共的虚弱、大陆人权情况、学生运动、多党政治、知识分子入党、两岸统一等问题阐述了他的观点，其中不少具有新意，特将这篇独家访问介绍给读者。“记”代表记者，“方”代表方励之。

苏联政治先改革，中国政治没改革

记：中国和苏联的改革受到世界各国普遍的注意。您认为到现在为止，中国和苏联的改革哪一个更彻底或更好一些？

方：（笑）苏联和中国的改革有一种很强的反差。苏联在政治上首先做，但他们经济上确实也没太多的动。我们经济上做一些，我觉得有些地方还是成功的，譬如农业（一部份农业，不是全部）。工业上不成。但我们没有政治上的什么改革。

记：苏联在政治改革方面走在我们前面，这是否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有所

影响？

方：当然有影响。因为中苏基本上是一个体系，你的动必然影响他的动，他的动也影响我们的动，至少在观念上有很大的冲击，不像美国的一个变化，当然对中国影响也很大，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苏联的变化影响强得多。

记：现在台湾有反对党，苏联也有一些反对党性质的组织出现，您认为在中国组织新党的障碍是什么？

方：第一与意识形态有关，另外中国目前的宪法规定共产党是领导。所以这个问题很难。

记：不是也有其他如“民盟”、“民革”这些其他党派存在吗？

中国的“多党”不是独立的政党

方：虽然原则上说是多党，但那些我觉得还不是独立的政党，要有独立的政党是很困难的事，主要在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另外中国现在还没有独立的经济成份；还有，中国知识份子的心态还没有到很多人处在独立的状态，只有很少，较少数人在概念上处于多元化（状态）。

记：但是没有其他政党，很难与旧政治体制抗衡。

方：是的。但我认为中国最后一定走向政治上的多元化。

记：西方的舆论往往对苏联和中国的人权问题采双重标准。这是为什么？

中国人权问题绝不比苏联好

方：现在我觉得就是要说清楚：中国的事情许多是“不透明”的，所谓

“不透明”就是看不见。外面看不见中国的人权情况。中国人权问题的情况绝不比苏联好。

记：为什么西方就能看见苏联在人权方面的问题？

方：第一是文化的原因。苏联文化与西方文化很接近，许多是一样的。还有犹太人的问题。美国的犹太人对在苏联的犹太人处境当然很关心。中国没有犹太人的问题，他们关心的程度当然就低。

另外一个原因是政治上的利害关系。美国与苏联比较对抗，就比较关心对方的人权问题。

中国学生越来越表现出主动精神

记：目前中国学生运动发展如何？是否与政府呈对抗？

方：我觉得不要叫“对抗”，我觉得目前学生越来越表现出自己主动的精神，就是独立的精神，这样说比较准确。并不是所有的事都对抗，有的事情政府做得对当然我们可以表示接受。问题是做得不对的，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应采取独立的判断其价值（的态度）。

记：现在有许多中国学生来澳洲学习，有些只是学语言，他（她）们是否应对中国负有一种责任？

方：对。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表示自己对社会有义务，有责任。

有什么样人民就有什么样政府

记：西方人认为，“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方：对。这个话我原则上同意，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所以目前我们做的事情的确需要更多一般人来表示关心，这样才可能有好的政府。否则你依赖，你盼望，一个好的政府是不可能来的，是绝不可能的。就是一个好人当了权，他也会变化。

记：因为民主的时代就是这样，是要求多数人来参与？！

现代化和民主化绝对不可分

方：对，我想中国也是这样。就是说，大家都希望现代化，希望民主化，才可能保证现代化和民主化，否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我）现在的观点。

记：现在中国出现信仰危机。教育危机，很多人感到不知怎么办，您觉得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思想武器（或主义）来把中国搞好？

方：（笑）这个问题太大了。首先我还没有达到用什么“主义”（的地步）。我认为只要现代化，都是一样的。

记：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

撤掉不清楚的主义

方：就是一种现代化，至少要撤掉那些不清楚的“主义”。我觉得至少“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就不是很清楚的。邓小平说的“社会主义”和毛泽东说的“社会主义”就不一样。所以这可能是一种很混乱的概念，我们现在更重要的是判断我们怎样一步步去做。

记：方教授，中共开除您及刘宾雁等人的党籍是做错了，世界上正直的人都这样看。中共大概也有所悔悟，如果中共今后表示您还可以入党，您会

不会……？

方：（笑）我不会再入党了。我没有这个兴趣。现在党这个样子，我绝没有兴趣。

记：这样的党入不入也无所谓？

中国应有各种各样的政党

方：无所谓，而且中国一定需要多元化，一定要有各种各样的政党。哪怕好的政党也需要人去监督，或说，实际上只有受监督的党才能变得比较适合人民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现在一部份知识分子应当不入党。

记：但是不久前在中国流行一个观点，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入党，以便更好地从内部来改变这个党。

有的知识分子应入党，有的则不应

方：（大笑）那是我号召的。那时我请许多学生入党，现在我认为这个观点有点变化。现在我认为有的知识份子还是应该入党，因为现在党无论如何还是个领导。另一部份人最好不入党，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相互监督的局面。

记：方教授，在天体物理学一些领域，您是国际上的权威。您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长，多年从事教育又推动民主。您觉得从事何者对社会贡献更大？或说如果让您选择，您更愿意做哪方面的工作？

方：这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况。社会当然需要做自然科学，也需要教育、推动民主的人，不能说大家都去做一件事。而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可

能某方面更好些。我自己之所以能讲一些民主或社会方面的话，能起一定作用，与我做自然科学很有关系。或更直截了当地说，我之所以能出国，又回来，还在讲，与我做自然科学很有关系。如果我不做，我很快就没有了，这是现实。必须同时做这些方面的事。

记：否则您也许和魏京生一样了。您被撤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职务后，虽有更多精力致力研究科学，但在中国的教育和民主方面损失更大，对此您怎样看？

中共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党

方：首先这不是由我个人决定的。如果我不做那些事（教育、推动民主），必然对社会没有推动，如果我做了那些事，必定不可能做校长太久，这也是一个“悖论”。

记：过去中共开除您的党籍，整您时，您做过检查，会认为自己错了，现在被开除党籍，您却不再认错，是什么使您有这个转变？因为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想探讨这个原因。

方：认识是一步步来的，我想我们那时对毛是一种迷信，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理论抱着一种宗教性的信仰。这不是说共产党没有做事，当然共产党也做了些事，毛也做了事，正因为他做了事，反而（使人）更容易相信他。我想我们这些人都是受了整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才慢慢发现（事实）的。实际上我最早发现毛本人做的一些事，并不按他本人说的话去做，这给人一大刺激。就等于说，我们学科学的人，教师讲的，也按这个做，最使人感到表里一致。特别文化大革命，有许多（事实）证明他（毛）本身并没有任何他

所说的那种大公无私或什么的；完全没有，完全是权力斗争的东西。所以这当然就令人丧失信心。除了对毛丧失信心，进一步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或至少对毛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现在的党，至少在目前状况，实际上说不上（是实施）马克思主义，什么也说不上。它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集团。所以（我）当然也就完全没必要加入这样的党派。

中共比台湾国民党还差

我想只要是做科学的人，至少基本事实他会看的。苏联 70 年的社会主义，我们 40 年的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都是不成功的。这是任何一个睁开眼睛的人都能看到的。比如，澳洲这样，发展了 200 年是什么样子？苏联说的是怎样、怎样；但实际上怎样大家是看见的，中国，实际上仍然是在贫困国家的行列中。哪怕对比台湾——国民党也并不是愿意民主的；但对比起来，你比他还差。所以大家感到这个理论普遍都有问题。不是单独在中国有问题，不是在哪一个省有问题。你所有的结果都是不成功的，那怎么能说你的理论就一点问题也没有呢？所以大家就怀疑。而且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体系，它认为所有东西都能管，所以只要作一点突破，就可以相信它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管用的。

记：您上述思想变化是否与您出国，特别是在美国工作时期所受到的影响有关？

方：我在美国工作是前两年的事。我出国十多年了，欧洲去了十多次，出来看看很有好处，因为可以对比情况。不过我讲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时，可能在国内是最早的一批人之一——1979、1980 年就开始讲。在看到西方社会

之前，我对毛的信仰就已经过去了。

中共坚持马列是为了保住权力

记：事实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行不通，现在中共仍死抱着不放又是为何？

方：这很明显，共产党要保住他的权力。没有马克思，一定要让共产党领导就没有根据。

记：据报道，中共首脑不久前会见非洲国家领导人时，也劝对方不要搞社会主义，而自己仍择“恶”而固执。

方：那就是（涉及）他的权力问题，否则，就没有担任最高领导的任何根据。

记：那不是很虚弱吗？

现在的中共非常虚弱

方：现在的中共是很虚弱，以至于很少数的学生有时说一点话，他们就非常震惊。我想这就表明他们的虚弱。因为一个有信心的人不怕你去议论。如果我是对的，我就有力量。他感到自己没道理，也感到自己的力量不是那么绝对，所以就非常虚弱，非常虚弱。

记：那么现在中国进行的改革前途如何？

方：我觉得这确实还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如果用暴力，结果中国仍然是封建，恶性循环。一定要痛苦地经过从非民主到民主国家，从非现代化到现代化国家的过程。当然现在很困难，有人说找不到路，这个路确实不清楚。但慢慢地，从看得到的方面还是有好的变化。譬如知识分子觉悟高起

来，学生觉悟高起来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因素，这些因素到后来不能不影响到整个社会结构。尽管有少数人不愿改变这个结构，但到最后也没办法不改变。

不开放很困难，一开放必冲击专制

记：不少人把目前中国的“留学潮”与历史上满清政府的“放洋”相比。满清政府的“放洋”后来加速了满清的灭亡——您的看法如何？

方：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开放了总是对社会进步有好处。满清也不是不知道开放后会对他有影响。他知道。第一批留学生是撤回来的。你可能知道这段历史——是命令很多人硬撤回来。但那时的经济情况也不能不开放。现在很难完全对比。

如果不开放，中国经济改革很困难，当然一开放后必定受到潮流的影响，对专制体制会有冲击，这叫“悖论”，不得不做，但做了之后必定发生一些并不是你原来希望的事情。

记：有关中国大陆与台湾统一的问题——可能性及前景，可否谈谈您的看法？

如果统一不是促进就不要急

方：中国的统一不是一句话可以说完，也不是绝对没有可能。目前到这一步大概还不可能，现在要统一，概念有很多不同。统一的含意是什么？如果统一为一个政府，这是一种含意。还有一种——大家基本为同一民族、同一文化等等。我们要进行这种交流，经济交流，或本身就有亲友关系，在这

种意义上，我们已达到一些。只有在这种统一上，才能有正确的统一，因为统一并不是简单的唯一目的。

关键是，统一不是唯一目标，如果统一的效果不是促进，就不要那么着急，两方面——中共和台湾都需要进一步民主化。

欧洲多元化文明，先发达后反而建立“共同体”。如果大家都不发达，统一亦是非常困难的事。我觉得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欧洲语言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都能建立起“共同体”。一定意义上，统一不是国家的统一，但还是比较统一的。

记：如果中国能多出几个像方教授这样敢想敢说的人，中国的情况可能会好一些（外国人认为我们很神秘）……

方：关心的人越多，总是越有好处。

（原载《争鸣》1988年9月）

编者注释

[1] 本文由澳华署名，此处原文照录。

[\(返回目录\)](#)

在香港中文大学新生辅导营与学生对话

以敢言见称的中国大陆合肥科技大学前任副校长方励之访港，掀起一阵旋风，在进行为期七天的访问活动中，最主要一次——与本港大学生进行对话。

下述便是方励之抵港当日晚上，在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新生辅导营上，与学生们的一段对话。

问：想问方教授，中国大陆现在的官僚主义还是相当厉害，你自己期望在未来，在什么时候，这个制度才会改呢？而我们身为香港的大学生，应做些什么呢？

方：第一个问题是改革什么时候才会得到真正的成功。这个问题当然是一个不能做预言的问题。什么时候可以成功？我应当说对中国的社会作预言很困难：到 1997 年能成功，还是 2000 年能成功？很困难，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来看这个问题：如果在什么条件，什么状况出现以后，中国的成功就有希望。今天我下飞机，也有记者问我这个问题说：现在中共这样的领导是否可以成功？我觉得就是只靠一方面，是不可能……中国是不可能成功的。我认为中国的成功，改革的成功，一定要是更多人结合起来，更多人了解到中国应如何做，更多人关心这个社会，而且是直接的关心，而愈来愈强烈的关心，愈来愈多，这样才有可能成功。或者更明确一点说，如果中国的成功寄托在少数人身上，绝对成功不了，而要靠每个人的贡献，我想这是个总的原则。

港人对待九七问题 应该积极不是回避

第二个问题，我想跟上一个问题也是类似的。这第二个问题说，香港现在的学生应当做些什么事情？我觉得这种问题往往是由青年导师来讲，来告诉大家应做些什么。我自己很愿意跟年轻人在一起，但我从来不认为我是这一类的导师。这一类导师在大陆里面有两位，一位是曲啸，但我认为他们是不成功的，我不赞成他们的做法。我觉得自己怎么做，同样是要自己去发现。因为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无法说大家都一定要做一种事情，做很多不同的事情都是可以达到一个目标，而且社会上正是需要各种样的人共同努力。譬如现在海外的学生，也是问我这个问题。有的想回“国”，有的暂时不想，有些想长期也不回来，他们说哪个是对？怎么样对“国内”才有贡献？我觉得不能说哪一种方式就可以对“国家”有用，都一定要怎么做。譬如说，是不是一定要回国？还是都不回？不可能都一样，一定要有些人回来，有些人不回来，有的是暂时不回来等等，因为条件不同，环境不同，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这件事情我想主要还是要保持一个刚才说的关切的态度。最近大家关心“九七”的问题，当然是从不同角度去关心“九七”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九七”怎么对待？这“九七”后到底要保持一个怎么样的香港？这个问题刚下机场已碰到记者问这个问题，这大概是所有在香港生活的人都会发问的。我想我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是需要思考。我想，每人有每人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方式有一共同点，我想是采取积极而不是回避的态度，而积极态度的方式。我想有很多，渠道很多的。譬如说，我只用了言论的方式，可能还有其他方式，今天我不能马上就说得清楚，因为我今天刚刚第一天到这里，所以，我还是认为，所有事

情都有价值标准，自己的道路都是自己给自己找到的，主要是自己给自己找到的。

大学以后，任何一条道路都是靠自己来选择道路，找到自己的道路。当然需要与别人交流，我想这个交流只能是启发自己来分析，主要自己去寻找自己的道路……，找到正确的原则后，要自己寻找自己的道路。

问：中国大陆目前搞对外开放政策，政治改革也随之而行，人民要求民主的意愿日渐高涨，你认为可不可以用学生运动去推动政改？而效果不会发生类似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下场呢？

前年学生民主运动 在大陆起推动作用

方：这个问题我的答复是肯定的，我认为学生的确是要参与推动政治改革这样的一个活动，但参与的方式可以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方式。关于不会发生类似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下场，这个问题可能的含意是认为 1986 年的这个学生的游行是没有收到效果。我觉得不是这样，虽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把学生的运动压下去了，但是，1986 年的学生运动，已经在社会上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已经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虽然在游行的时候，没有直接看到这个直接的成果。但是大家知道，学生的运动把要求民主，要求人权的这种问题，在中国人的社会上提出来，至少是……可以说是政治体制改革以来，甚至是“解放”后以来，第一次明确提出这种要求。这种要求在社会上起了很大的震动，这种震动以致于全“国”上下，不能不考虑是不是要考虑学生提出的问题。

大家可能看到，就是在学生运动以后，中共的十三大，今年开的两会，

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至少都比以前的会议，在民主上是走了一步。为什么会这样走了一步？譬如说选举，有很多人投反对票，几乎没有在选举中没有反对票，或没有弃权票，几乎无一例外，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我想是直接跟学生的运动有关系，就是学生的运动震动了社会，带来全国思考，认真的实行自己的权利，投赞成票、反对票或弃权票；还有在选举的时候，出现了差额选举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在大陆生活，就会直接感觉到就是由于学生运动引起震动大家，以致于即使有人不赞成，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进步，这是我的答复。

问：对于中国大陆现在民主化的前景，你乐不乐观？

大陆政改困难重重 长远观察仍是乐观

答：关于中国的前景这问题……我如果简短的说只有两句话，这两句话就是在短期之内，短期内……有 30 年光景这样的环境，不是十分的乐观；长期来讲，就是 100 年的光景，我还是比较乐观。这两句话表面上是有一点矛盾，不过，我觉得还是可以解释……我稍为解释一下：我认为中共现在目前的政治改革碰到很多困难，这困难可以说……比较根本的就是一个政治体制的改革，或者就是民主化的问题，这种问题就是目前碰到有些政治体制受制于一些比较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愿不愿意改革。

毛泽东时期最失败 中共现应彻底检讨

我想有一部份在中国存在的，是不愿意改革的，或是不愿意实施改革，所以，不是十分乐观。譬如我至少觉得，你要是做到比较根本性的一点，至

少有一件事情要做的，现在还没有做，现在还不如苏联，这个中国大陆在解放以来的 40 年，在毛泽东作为领导的时候，那 30 年的社会主义是不成功的，完全不成功的，或者说完全失败。这样的事实，我想是公认的事，这个事实更不如苏联的 70 年。现在苏联已经开始承认他们是不成功的。苏联已经开始在彻底的来从意识形态，从理论上，以及从当时的政治角度，来清理在斯大林时推行的所谓的社会主义，从意识形态，原则，从理论去清理，而且是公开……在报纸上公开谈这个事情。最近还在真理报上说过：斯大林在那段时期是……由于政治而死的人；直接杀死的人，有 2,500 万之多，这已公开出来。

实际中国大陆在毛泽东作为“最高领导”的 30 多年，是完全类似于斯大林的时期。但是中共到现在并没有公开的来把那 30 年来的问题，清理一下。这没公开做的原因，就是现在有人仍然是属于那一代的人，所以，不愿意来说，这是很清楚的事情，以致于现在好像表面上要说毛的一些错误，好像是北京大学在今年五四前夕，把两个“毛主席”的雕像给拿走，但是也是在晚上偷偷的拿走。所以，实际上在心态不是很开放的，不是很开放的讨论事情，所以我觉得这至少是一个标志的问题。

中国文化圈“相变” 迈向民主化现代化

长期来讲，我觉得是有希望，这有希望就是眼光要大一点。我自己是做宇宙学的，总是喜欢从所谓大角度来看问题的发展。如果你眼光放大一点，不要只限在 1997 怎么样，不要集中在这里，也不要只限于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虽然很大，但是从宇宙的眼光来看，实在太小（哄堂大笑）。如果眼光大一

点，大家会看到现在世界上有一种趋势，特别是亚洲有这样的趋势，都是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大家现在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几乎亚洲国家都在发生这种事情，南韩发生这种事情，台湾在发生这种事情，菲律宾在发生这种事情，泰国在发生这种事情。

我刚从新加坡来，新加坡正好在大选辩论，公开的在电视上辩论，那个辩论的问题，也不是关于经济，不是关于教育，而是关于新加坡的民主，所以，大家的要求其实是一致的，在亚洲都有这个趋势。用物理的语言来说，亚洲这个地区，特别是中国文化这个圈子，在发生“相变”，从一个状态变到另一个状态，从一个不够民主、专制的状态，变到民主状态，从不发达变到发达，从发展中变到现代化，这是个总的趋势，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当然，在“相变”里面，也不是完全同步的“相变”。大家看水变成冰，亦并不是一起变，都是一块块先变，有的地方是很久以后还不会变，相当长时间不会变。这种不会变的区域，我们称之为“过冷区”。现在中国大陆就是在这样的“过冷区”。但是这种“过冷区”并不稳定，一定要变化，一定要走到民主化现代化的路。

我曾经在“五四”……在北大说过这样一句话……，实现现代化并不是很难的，已经觉得不是很难的事情，只要你是“随大流”，就可以走到现代化，走到民主化去。随大流……不知大家懂不懂这句北京话……就是随着潮流走……。好像不要什么特别的努力，只要跟着大家一起走，就可以走到了，不是太困难的事情。但中国大陆就是有一种相当高的技巧，可以保持不跟这个潮流走……很高的技术（大笑），但是这种技巧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长久以来，一定要跟着世界潮流，从整个世界、宇宙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避免

的事情，中国一定会走到民主化和现代化去。

问：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可以达到你刚才所说的那种的民主化呢？

方：我想你是说只靠共产党，是不是可以达到那种地步，刚才我已经明确的答了，电视上就是播了这个问题……如果只靠共产党，我觉得是绝不可能的。只有靠整个中华民族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人，不同的共同努力，才可能使这个社会达到繁荣，达到现代化、民主化。

问：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在几十年来都不能成功，那你理想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

列斯毛的社会主义 就是阶级斗争 结果失败

方：你问什么是理想的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难答复。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如果说一般的原则，可能不只是社会主义，可以说所有人类的理想都是差不多的。譬如说：期望大家比较平等，没有太大的悬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美好的。当然是有些社会主义的理论是这样说的，但是这也不一定只是社会主义里面是这样说，很多人的理想可能都这样说，所以如果说这样是社会主义，那当然还可以，这当然也是我们所希望能达到的。现在我想刚才特别说到的不成功，是因为有明确的含义的。因为现在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别是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来的时间，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里面的关键点就是阶级斗争，或者说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理论实现下来是……得到的结果是错误，得到的结果是失败，这是明确的。

问：现在中国很贫穷，要向西方引先进的东西，到底应先引进西方的技

术来解决经济问题，还是应引进西方的一点观念？

应当用科学方法观察事物

方：我自己是做科学的。科学本身当然是跟经济有密切的关系，科学的发展，促进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发展，促进生产的发展，我想这是大家都熟知的关系。但是，我要同时说，科学本身也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因为科学的意思，不是说只是两个定理或几个公式，问题是你怎么样去发现这个定理，你怎样建立你的公式，你什么态度去应用，以什么方法去应用……这些才是科学里面的一些内容。所以，学科学绝不是靠背书。如果你把爱因斯坦与牛顿的话背下来，也不会懂科学。你必需懂科学是怎样建立，是怎样发展，以至今天还在完善，还在怎么样创新，这种知道才算叫做懂得科学。所以，科学本身就是一种概念、观念，而这种观念的引进，才叫引进科学。你只引进几个公式，不叫引进科学，对吧！还可以进一步说科学与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只要引进一些新的文化上的因素，才能够谈科学……不要谈这些，已经可以很强烈的说明这一点，科学本身就是一种有系统的东西，这种东西实际和非科学东西有明显不同的。

我觉得在中国大陆现在就应引进科学的观念，西方的之可以发展，其中重要的是把科学，在社会上愈来愈多的人懂得什么叫科学，而用科学的方法来观察这种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引进科学来讲，也需要这样讲，中国大陆很缺乏科学这一点。譬如说，科学就是要用逻辑，基本的逻辑，说话要有一定的根据，一定要有前因后果，这是起码的，而且要经过验证。

所以，从这样来判断，中国大陆相当缺乏科学最基本的东西。这种例子

很多，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它直接关系到大家的事情。香港 1997 年以后，保持 50 年不变。这个时间就是一个定量的东西，对吧？50 年不变当然有一定的思考，一定的根据。经过 50 年以后，可能不需要“一国两制”，有可能就变成差不多了，50 年当然可以有误差，这是科学可以允许的。但是不允许没有根据乱讲，没有根据，你就把 50 年不变改成 100 年不变，大家都知道这样是毫无科学的思想，变到什么事没有根据，一下子就可以变成 100 年了，那明天就可以变成 5 年了，对吧！这就是完全不懂科学的说法，完全不懂（掌声）。所以，引进科学必然就要求真正理解科学，自然就引进了一些现代的观念。

1988 年 9 月 1 日

[\(返回目录\)](#)

不能只看领导层的变化

——在香港与《争鸣》编辑部人员座谈^[1]

9月7日下午，方励之、李淑娴教授伉俪在郭博士陪同下，与《争鸣》编辑部同人会面，《争鸣》总编辑温焯先生及编辑部其他工作人员与方励之伉俪进行了无拘无束的交谈。

温焯先生先赠送方励之教授两幅照片，一幅是方教授去年在罗马时的个人留影，一幅是方教授与温先生在罗马的合照。

我是被卷进政治去

温：你敢不敢带回去？

方：当然敢带。这没问题，这没问题（笑）。

温：你自己没问题，但是你旁边的那个人……

方：没问题，没问题（大家哄堂大笑）。

（温还拿了译载西德《明镜周刊》记者访问方励之文章的《动向》给方）

温：这是译载西德《明镜周刊》的文章的《动向》。

方：我看了，在北京有了。

温：好像《明镜周刊》那篇文章震撼性最大。

方：对，《明镜周刊》那篇访问记，国内要组织批判，后来又收回了（笑）。

温：要批？批什么？

方：没法批！没法批！

李：学生拚命拿去复印。

方：赶快说不批了。

李：快点收回去，不许外传。

温：我们杂志《访问你》的那篇有没有麻烦？

方：没有，没有。

温：你在罗马头一次向世界说话，这一次到澳洲、香港是第二次，你觉得你自己的言论哪一次更放？是不是胆子越来越大？

方：胆子没有太大的变化，我发现，越来越多人关心了。当然有的关心过份了，刚才我跟她（指李淑娴教授）说：他们以为我是万能的，什么都要问。真对不起，我连物理都不能说是全懂，不要说是社会问题。我经常要先说一句，我不是研究政治的，也不是研究经济的，我是被卷进政治去。

温：那比原来研究政治经济的更好，更难得。你的可贵之一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科学家被卷进了政治，过去爱因斯坦也被卷进了。

方：爱因斯坦也被卷进了。

温：想问你一个问题。中国现在是走资（方插话：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资本主义是不是官僚资本主义？我们在罗马谈过，中国的希望在于老人都去世。老人走了，他们的下一代来接班。但他们接了班之后，官僚的体制、特权的体制，是不是更加……

对大陆不能单看领导层的变化

方：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从时间来说，要等老一代过去。另外现在观察中国的问题，不能单看领导层的变化，要看现在农民、工人、学生、知识分子这几界的变化，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前进的力量，这些人的力量显得越

来越大，决定的成份也越来越大，有些事情，有的领导层不一定愿意这样做，但他们不能不这样做，他们被推着要这样做。所以不能只“寄托”在下一代领导人，只是“寄托”没有希望，应该放弃“寄托”。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知识分子，包括工人、农民都懂得自己的权利，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有权去争取自己应当有的东西，这是中国社会往前走的重要动力。

温：过去鲁迅先生来过香港大学演讲，题目是：“无声的中国”。现在你不光是去了港大，对你的反应来讲，比鲁迅当年热烈……你觉得中国的无声时代过去了没有？是不是中国现在有声了？

方：我觉得，现在开始可以听到声音，从无声过渡到有声。在过渡时期，声音不是很大，但是趋势还是很不错的，至少，两年前学生的大字报、批评，也算有声音吧，不过那声音比较弱一点。又譬如说，原来很少指名道姓批评领导人的言论，两年以来，到今天指名道姓批评领导人的言论，有的公开在大字报，不是少见，已经觉得可以（批评）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温：现在的大字报真厉害。

方：真厉害，你们也觉得厉害？

温：下一期的《动向》，把北大大字报被批判的那一些拿出来，好厉害，骂共产党，骂邓小平，昨天我见了一个上海的朋友，说现在上海人骂邓小平骂得好厉害。

方：这已经不是……

温：不是新闻了？

方：不是新闻。

温：但是从有声音到有组织的行动……

方：还有一段相当的时间。

温：你估计要不要 30 年？

方：二三十年还是需要的。因为真正走到多元化，除了言论以外，还有经济多元、教育的基础，我想要一代人时间才有基础。

大陆的信仰也开始多元化

温：今天电视台广播邓小平，他跟美国国防部长讲了一句话，我希望副总统布什能够获选，当总统。有人就评论，他不应该这样没外交礼貌（笑）。假如人家说，我们希望邓小平退休，他一定恼火（大家哈哈大笑）。

方：外交场合，要礼貌。

温：你现在觉得马克思主义已过时了？

方：是，是。

温：有人说现在是理论真空，你认为要用来填补什么？

方：我估计中国在思想观念方面，慢慢会走向多元。中国传统有一个正统的观念，譬如说某个时期是儒教，后来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正统非常强，我想，中国现在已经没有正统，年轻一代追求各种各样思想，也有追求宗教，也有追求存在主义、弗洛伊德，都很不成熟。这趋势形成中国信仰也开始多元化。

温：政治多元化就意味着多党制，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关键。

方：这当然是。

刘（连文）：中国有没有可能实行多党制？

方：现在没有可能，因为现在还不具备这种社会基础，多党是最后的一

个标志。社会上形成了一些相当多元的成份，然后标志出来是多党，现在社会上还没有形成多元经济。

温：从这个角度看，你觉得台湾是不是比大陆进步？

方：台湾经济上当然是先走了一步，政治上也是从形式上……我不敢说他的实质上怎么样，形式上也多走一点。

温：台湾不是邀请你去？

方：实际上台湾当局也是很紧张的，并没有批准的（笑）。因为我这种言论并不是普遍受欢迎（哈哈大笑）。

温：这次延期留港不成，没得到批准，是不是北京……

方：北京没有批准。

刘：为什么要那里批准？

方：我们的规矩当然是要北京批准。

刘：很多来访问的学者并不需要北京批准。

方：可能我的情况也特别吧！

刘：方教授，现在宪法不是说有结社的自由吗？在多党制之前有一个结社的自由，可以成立社团嘛。波兰的团结工会，台湾的民进党，原来也是不准成立的，民进党成立了，国民党修改法律来适应它。

方：情况不一样。北京大学抓了两个历史系学生，他们只是说要组织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会。所以中国现在第一步就是要争取基本人权，这个我们可以说，也可以呼吁。

你组织团体一晚会有百万人参加

刘：很多人跟你一样，说了，就倒霉了。好像魏京生说了跟你差不多的一些话，他就被抓了。

温：他比魏京生厉害。

刘：魏京生说得比较早。

温：方教授有一个观点，就是你在科学上……

刘：要有成就。

温：对了。

方：这个当然是利用中国的情况，中国实际上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按法治，你说的跟魏京生说的一样，应当一样，按法治办。可是按人治，这个人有点什么，就是另一种处理。

刘：方教授讲话讲得那么激烈，不怕他（中共）对你使软刀子吗？

方：当然也不是不怕，现在怕也没用，中国说法，过河卒子，只有拚命向前。

温：你来香港观察了，你有一个观点，香港人应当自己起来救自己。那么，照你现在的观察结果，香港人争气不争气？

方：观察还很少，特别是和香港的民主派，从事政治的，还没有正面的接触，也还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事情，我确实很难判断。这里比大陆来说，应当说条件好些，可以说话，组织一些什么当然很难，但比大陆好。

温：你这次来，在这方面作了很大的贡献，一定对香港的民主运动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不过，香港也有它的困难，相信政治的事情很难搞。你看，在促进民主方面，香港和大陆是不是应该交流交流？

方：我想，大家至少应该相互了解，1997年不到十年，九年后是一国的

人，两边的情形应当相互沟通。现在是经济已经沟通，但文化也应沟通，政治上自然也应当沟通，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中国好起来，我们并不是说，哪怕是一国两制或者什么制，关键是要整个中国好起来。也不可能将来只是香港自己好，哪怕是经济角度，或是什么角度，都需要共同的交流。

温：我有一位朋友，他今天不在座，建议你在国内组织一个不是政党的政党，有什么意见？

方：我没有仔细考虑过。

温：有人告诉我一个消息，东北一个大学有好多应届毕业生说要当研究生，去什么地方当研究生？他们都说，去当方励之的研究生。

方：哈哈（大笑）！

温：学校当局说，你又不是搞天体物理的，学生说，这个我不管，总之是当方励之的研究生。所以我估计，假如你组织一个什么团体，一个晚上，我相信起码有 100 万人参加（方：大笑），你相信不相信？香港有人提出这个理论（估计大陆也有这个理论），你们老是说多党制，多党制，现在哪有一个政治力量可以跟共产党抗衡？我说，不对。为什么不对？假如把魏京生放出来，假如魏京生精神还是正常的，又假如他组党，一个晚上会有很多党员。当然，论组织团体（哪怕是学术一点的团体），更有号召力的是方励之教授。不过我觉得，今天可能还不是时候。

方：我还是认为多党制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当然个人可能有特别的作用，还是要考虑政治条件、经济条件、教育条件，中国现在还不具备多元化。

温：还不够成熟。

刘：组党一定要有经费。

方：对，经费就得有比较独立的经济。

刘：就要有企业家，现在的企业家。

方：条件很多，现在还还不成熟。所以这不是任何个人所能很快改变这个局面，大家都很想……

刘：台湾民进党就是有把握，它有许多中产阶级。

方：它中产阶级很多。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尽管我也知道很多人同意我的观点。

温：所以，你认为要二三十年后，才能够办成。

李：我觉得，他这个人是思想类型的，组织一个反对党，是权的问题。他既无权，又无官，他不太善于去推动这些，他是比较思想类型的人，想得更深刻一些。

华人、华族既多元又要相容

温：另外，我想听听你们对《争鸣》杂志的意见。好多读者都对我们杂志寄予期望。这个杂志还有很多缺点，我估计方教授、李教授有时也看到我们杂志吧，为了使这个杂志能够更好地走上另一个高度，我们就希望你们提提意见。

方：我也很难一下说清楚。你们杂志也看过不少期，但不是每期都看到，因为进不了大陆。我想你们的杂志的确影响不小，我在欧洲和澳洲都看到了。当然像刚才说，大陆内部没有多元化成份，还没有具备这种条件，但是我最近经欧洲、澳洲、新加坡也好，很多都是华人，有的是华族，从世界角度来看，华人、华族已经多元化，在整个世界来讲已经多元化，而你们是处在这

种比较自由的地方，倒是可以比较深入地研究一下中华民族这样一种发展，从多元化的角度来研究如何发展这个意识，我觉得，有的不是民主意识，而是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应当是兼容的，而现在有相互冲突。怎样形成一个既多元又兼容这样的状态，中国才能有希望。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在这方面做点工作，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喉舌。我就随便谈这么一点。

温：谢谢，你的意见是很宝贵的。我们很希望能经常把北京知识分子的声音，传达到海外。现在从海内到海外，大家都关心大陆的改革。我有一个观点，希望你批评一下。我认为要搞好改革，必须批列宁斯大林(中国还加一个毛泽东)，斯大林本来基本倒了，但还有人要保。毛泽东也在修修补补，在民间却已经倒了。不过，列宁和列宁主义还没人碰它，我觉得，一定要碰碰，一定要碰，因为斯、毛的东西，“左”的东西，主要是从列宁那里来的。

方：无产阶级专政的做法，列宁就开始实践了。譬如镇压知识分子，列宁就开始做了，他死得比较早，做得还比较少，比较弱，斯大林发展了。

温：一方面是列宁的一些观点错了，譬如专政。另一方面是搞世界革命，特别是派了那么多俄国人来中国，进行组织共产党的活动，把十月革命模式强加于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危害。我觉得要把这些事情讲清楚，这样才能破除对列宁的迷信，才能真正反掉“左”的东西。

方：关于这段历史，我不大清楚。不过关于列宁我早就批评了。最近我有本书出版，我批评 1908 年写的哲学《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是第一个所谓用马列主义来批判自然科学的最坏的典型。

海外华人应克服分裂状态

温：我看他讲的是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主观主义。而且往往非常（不能不加“非常”两个字）主观，非常唯心，非批不可。

方：实际我们所批的应是列宁、斯大林、毛，列、斯、毛。

温：那么在这个观点上，我想跟你吵架也吵不起来（大笑）。

刘：会不会有人说方教授是研究物理学的，来到香港却只谈政治？

方：今天在崇基学院基本上是讲物理的，昨天一天也是讲物理。

金：已经讲了两三次。

方：星期一是讲物理，等一下在浸会学院也要讲物理。

温：你有没有想过，海外的这些华人，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去影响国内。

方：当然，能够影响是好的。我发现海外的华人之间有共同性，都希望中华民族好些，但里面的矛盾还很多。我也不客气地说，中国人在外面应该完全可以兼容，但事实还是处于比较分裂的状态。有这种情况，我至少感到这样。

温：我也感到，我觉得，应该克服，应该相容。

方：我觉得应该克服。要是大家的观点一样，不要有其他的利害，观点可以不一样，但有一个目标，就是中华民族应该发达，应该现代化，应该民主，有这一个目标，其他观点可以不同，但可以“兼容”。我这一次在澳洲有一次演讲，是在悉尼，是华人华侨办的，不是学生办的。他们说，你这一次来，左中右几派都来了。我说，我是最没有背景的了。我希望，大家有相当共同的东西。

当然，从孙中山开始，华侨对国内影响很大，大家在发达社会生活，希

望有更大的影响。如果更一致起来，这种影响就更大。

金：方教授，你来香港这么多天以后，你总的感到香港人对国内的事情和对香港的问题，和你 1982、1983 年来港时，比较起来，有什么不同？

方：有很大差别，应该说，香港和大陆现在的关系更密切了。我上次来，在港大，只有说英语，普通话很少。现在普通话到处都可以讲，跟 1982 年有很大的不同，说明关系密切了，关心的程度也就高了。

我发现，那时候（1982 年），还没有中英谈判的结果，对大陆的内部情况不太关心，现在就比较地关心。

金：还要请问你，邓小平是目前这样的状态好，还是退休下来比较好？

方：我看，当然邓小平是退休好。但是如果说让他死吧，这不人道，我不能赞成（大家哄堂大笑）。谢谢大家。

温：谢谢你们！

（原载《争鸣》1988 年 10 月）

[\(返回目录\)](#)

大专会堂座谈会答学生问

大学生提许多有意义问题

本港中文大学国是学会，浸会学院国是学会，理工学院学生会中国事务委员会，树仁学院国是学会，香港大学学生会国是学会于本月 7 日在大专会堂联合举办“方励之座谈会”，以“科学研究与中国民运”为主题，有关情况业志本报。是次座谈会为方励之教授在本港最后一次座谈会，方氏答复了大专学生提出许多有意义的问题，兹续之于后：

问：方教授，假如你没有被中共开除党籍，你能想象今天座谈会的情形会怎样？（会众笑声）

答：前几年我就会批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有人说方励之是唯一批评马克思主义错误的人，这是不正确的，在大陆上还有许多这样的人。

问：近年亚洲地区各国学生民主运动蓬勃，大陆学生民主运动的趋势怎样？

答：这是一个潮流问题，民主是当代的潮流，不可以遏阻。亚洲地区相互之间的民主观念是有影响的，五洲地区的学生民主运动，在一定的程度上要影响到大陆的民主运动。

问：香港的民主运动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地位与价值怎样？

答：香港与大陆关系日趋密切，彼此有相互的影响。香港经济、教育发展均较高，民主发展与教育、经济均有密切关系。就今日情况言，香港的民主思想较大陆走前了一步，香港是属于中国的一部份，香港的民主运动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地位与价值应被肯定。

问：中国大陆民运与“波兰团结工会”的民运有无类似之处？

答：波共、苏共、中共均奉行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的本质基本上相同。

问：在中共“无产阶级专政”统治下，许多生长在大陆的人是不幸的，你却特别幸运。世界闻名，其原因何在？

答：对今日中国大陆问题持与我相同看法的知识分子，决不只我一个人。我被国人及国际上重视，也许是机运，如果说是所谓“幸运”，那要感谢国家最高领导人。（热烈掌声）

胡菊人回应：方励之获得海内外中国人和国际人士的重视，这不是“幸运”，这是方励之教授的正气获得人类良知的共鸣。方教授在科学上有卓越的成就而闻名世界，方教授基于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直言不讳的果敢行动，他们夫妇已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现在还处在危险边缘，决不能视方教授为“幸运者”。（掌声）

台湾民主开放是一个进步

问：你对台湾民主开放政策的看法如何？对陈立夫及熊玠有关海峡两岸接触的建议看法怎样？

答：台湾民主开放是一个进步，台湾与大陆双方所存在的问题很多，很复杂，双方关系的发展，是会互相影响的。至于陈立夫与熊玠的建议内容如何，本人并不清楚，未便作答。

问：你对中国实行联邦制的可行性看法怎样？

答：这个问题目前看来尚难。

全方位开放在解决问题

问：你所主张的全方位开放与胡适之的全盘西化，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李泽厚的西体中用有无不同？

答：我所主张的全方位开放，关键在解决问题，没有先什么为体；凡是好的东西应留下，不好的要摒弃。不是主观地坚持什么东西，凡是能解决中国问题走向现代化的，各种有效有用的东西，都可以接纳采用。

问：大陆学生民主运动发展，是否会像缅甸一样？

答：目前不可能出现相同的情况。

问：你对大陆学生热衷出国留学的看法怎样？

答：大陆学生出国各人情形不一样，有人学成后归国，有人出国后不回国。但他们在国外接受了现代民主思想，见到了现代民主国家进步的事实，他们在国外做了许多事情，对中国民主运动有益。

大陆上民主运动有响应

问：大陆教育落后，民主可能吗？大陆知识分子待遇低中共不重视教育，多数人抱着当顺民的态度，这要多少年才能实现民主化？

答：大陆学生的民主运动，已提高了群众对社会、对改革的认识。虽然有人消沉，但也有人对于民主运动有回应。从长远看，中国民主化是要实现的。

问：你对大陆“一胎化”问题看法怎样？

答：这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为了解决人口问题所制定的政策。这一政策实行的结果，许多人已发现会形成人口不平衡的问题了。

问：中共领导人决定国家的重大决策，有无征求专家意见？

答：像 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并没有征求专家的意见，只是凭最高

领导人的意志行事，结果带来一场灾难。

问：少数服从多数，是不是最合理的准则。

答：这是规则问题，在科学领域内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以真理为依归。民主政治领域运作，有时应该如此。

问：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有没有矛盾？

答：人民民主专政是意义不清楚的口号。

问：中国一党专政什么时候才能消灭？

答：民主是潮流，一党专政何时消灭难以预测。

民主化现代化是个潮流

问：中国民主前途有没有希望？

答：从长远来看是有希望的，因为民主化、现代化是一个潮流。今日中共虽坚持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已在变化，例如中共提出所谓“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概念，这就是变的趋势。今日大陆正处在过渡时期，在变的过程中有快有慢，有困难，也会有不稳定的现象发生，但最终一定会变。

问：没有民主的独裁国家，岂不是同样发展科学吗？

答：科学与民主是相依相成的。德国在希特勒当权以前，是世界科学的中心，自从希特勒当权实行独裁统治，采取迫害犹太人等专横行径以后，德国的科学就落后了。因此，中国要实现科学化，必须实现民主化。

知识分子支持大是大非

李怡先生总结：

方励之教授是正直有是非之心的知识分子，在大陆民主运动中表现出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在专制主义的体制下，人们的衣食住行控制在当权者的手中，谁不依附当权者，谁就有被饿死的危险，方教授在大陆上的生活来源是不能独立的，但他为了坚持科学与民主的精神，直言无忌的发言，表现其独立的人格，是要冒很大的风险，这就是令人敬佩之处。海外的一些知识分子，在大陆民主运动期间，有人签名支持方教授，有人不签名，这就显出有两种不同的人格分野。直至今日，仍有一些知识分子存在着依附当权者的思想，找个绝对的权力来依靠，而失去了独立的精神，这是知识分子的可悲之处。方励之教授是坚持大是大非的知识分子，我们希望中国知识分子能步方教授的后尘。（热烈经久不息的掌声）

（原载《中国时报》1988年9月12日）

[\(返回目录\)](#)

中国要解散？

——在香港接受《九十年代》月刊社李怡采访^[1]

去年初被中共开除出党并撤销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职务的方励之教授，于今年八月往澳洲参加学术会议，回程时于9月1日至8日在香港停留一周，并给香港传播媒介带来一次继“刘宾雁旋风”之后的“方励之旋风”。

在香港期间，方励之参加了文化、教育界人士的欢迎宴会，作了多次演讲，接受了各个传播媒介的访问，主要谈的是中国的民主与科学的问题。9月8日，在他离开香港那一天的上午，方教授接受了《九十年代》月刊的专访，谈的是他在其他的访问中较少谈到的问题——他去年初出党前后的有关事实，他对中国前途的看法，有关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意见，以及他对香港1997年后形势的估计。

方励之谈话明快直率，对一些敏感问题也全无顾忌，虽然只谈了一个多小时，但也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访问。

访问时间是9月8日上午11时至12时30分，地点在《九十年代》月刊社。

李怡：原来希望能较为从容地给你作一个访问的，但你突然不获准延期，变成今晚就要离开香港了，所以我们的访问就得紧凑些。你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突然不被批准延期吗？

方励之：我估计是本工作单位北京天文台没有人敢批。来香港第二天去新华社提出想延期两天时，他们是说一定帮忙的。按手续延期需要中国科学院来一个文件，但新华社说我情况特殊，他们照会一下科学院就可以了。后

来突然又说要本单位的信。也许，天文台的级别太低了，没有人敢批。

1985 年就听说要我退党

李：为了节省时间，许多你谈过的问题，今天就不问了。首先想问你一些有关事实，就是去年，你被开除出党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因为你在 1985 年公开批评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有人说是因为你在 1986 年公开批评了胡乔木。这些是开除你出党的真正原因吗？

方：那只是导火线。我 1984 年开始当副校长（合肥中国科技大学），这之前我的不少言论已经受注意了。1981 年时，我就讲过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话。上面震动很大。当局对我的观点早就不太满意。这种话在全国性的大会上当时还没有人那样讲过。

李：张百发的事，由于牵涉到人，可能比发表不同意见更惹祸。有报导说，当时科大要你向张百发道歉。

方：那是 1985 年的事。我批评张百发之后，有人对科学院说要方励之向北京市道歉。当时管惟炎（科大校长）知道这事，但没有处理，因此事情没有到我那儿。物理学界都知道张百发的事（按：1985 年在美国召开一个国际辐射会议，中国有 24 个名额，竟有 14 个名额被非专业的党政官僚占用，其中一个是北京副市长张百发），而且我的消息是从物理学会来的，是在开会时有人公开讲的。

李：出国名额被行政干部占用的事本来很多，你不过是第一个公开说出来罢了。

方：因为我和学生讲，而且说得比较厉害，我说他应当辞职。

李：是不是 1985 年时，邓小平就说要开除你呢？

方：没有。1985 年时，听说有人建议要我退党，很可能就是胡乔木。所以 1985 年底时就很紧张，安徽省委也找我谈话，他们说（我的言论）影响不好。其实他们没有和我提批评张百发的事，而是把账算到 1985 年初我在浙江大学的讲话。因为就张百发的事，他们要批我也批不出什么东西，我可以拿出证据。

李：根据刘宾雁的讲法，反自由化不是因为意识形态上有什么争论，而是因为牵涉到人。你们被开除都是这原因吗？

方：是这样。很多人都跟我说，你讲可以，不过不要点名。

李：但你现在还是点名。另一个说法是，对你与王若望，早就说要劝退。你自己有没有听说过？

方：我当然听到消息，那也是 1985 年。王若望可能还比我早一些。后来大概是胡耀邦批了。说劝人要劝三次。原来说中纪委的王鹤寿要找我谈。当时我正要到北京，安徽省委要我迟一天走，王鹤寿要来找我。我改期一天，王鹤寿也来了，却没有找我。

李：结果劝了你多少次呢？是不是胡启立也找你谈话了？那算不算一次？

方：胡启立是跟科学院副院长严东生一起找我谈的，他谈话时根本没有什么劝退的意思……也没有正面反对我的观点。他自己说当时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其实这话是胡耀邦说的，还说现在有很多困难。所以，并没有劝过三次。

副校长当不稳已有预感

李：当时你的副校长的职位，是不是也有些不稳？

方：副校长当不稳，我早有预感。其实 1981 年我就被提名当副校长了，上面就是不批。一直到 1984 年才批。我当时就知道原因是我讲的话。我在 1981 年之前就开始讲了很多话，他们控制不住我，所以就不批我当副校长。到 1984 年才批也有个原因。因为当时南大（南京大学）学生把党委给轰了，那还是中国第一次，学生的口号是要赶走党委书记。终于南大换了班子。那次事件影响很大，外面知道这事的不太多。批准我当校长可能与这件事也有关系。他们怕学生，想换一些形象可以让学生接受的人当校长。而且科大的学生也多次说，为什么方励之不能当校长？因为从各种条件来讲，我都超过其他人。学术上不用说，年龄上也符合，党龄也长。

李：换你当校长的原因，是想安抚一下学生，避免他们闹事？

方：当然是，原来的校长严济慈也极力推荐我。

李：实际上这里有个矛盾：一方面为了安定学生，要你当校长，另一方面又对你不放心。

方：对，结果给我当个第一副校长。本来的方案是周光召、管惟炎、方励之，都是物理学的。后来，决定由管惟炎当正的。管惟炎的许多观点倒跟我一样，但他的党性还是很强的，从来不乱说话，只是在内部批评还是很严，也批评张百发，但没对学生说。

李：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制止你。

方：没有制止我。我当第一副校长的时候对学生讲这些话，他也不管。

李：所以他也为此付出代价？

方：第二批开除的名单上是有他的，那份名单上共有几十人，包括许良英、管惟炎等等。后来只劝退和处理了五个，就是“五君子”那次事件。

李：那天文教界的欢迎会上有人向你提了个问题，你并没有正面回答，那个问题是说，既然你早就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共产党，那你为什么不早些自动退党呢？

方：我觉得，其实共产党内部自己也没有正统地信过马列主义，我在当时相信还可以在党内做些事情，所以，我跟学生说要入党去改变它，不少人入党也有这种看法。我觉得，特别是毛死以后，没有一种很正统的东西。就说四个坚持吧，其实也没有坚持，那只是一张皮……。

李：用来维护它的合法性，关键还是权。

方：因为它要掌握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内容要由它来解释。

科大学生都听我劝

李：你被开除的另一个原因是不是学生运动？

方：当然跟学生运动很有关系，另外是他们觉得我不好管。

李：那么把你调走，不让你和学生接触，不就解决了吗？

方：还不行，你是党员还有点不同。但如果你不是党员了，你就不可能进入权力机构。即使民主党派，也是形式的，只是花瓶。

李：其实，我们从一些报导或资料上看，学生运动并没有采取什么激烈的手段。

方：没有。学生第一次游行前夕，就是12月4日晚，我讲话时赞成学生的观点，但没有鼓励他们游行。实际上我是全国第一个有校长副校长职位的

人劝阻他们的，其他人都没有。我跟学生的关系很好，好到他们不会反对我，更不会轰我。我实际上拉住了一半学生，后来去游行的不到 1,000 人。我把一半学生带到礼堂去讨论，另一半人也只说要去试试。

李：你当时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呢？

方：我是怕学生出去后有人借机破坏，造成镇压的借口。我是副校长，我有一个责任，就是保护学生，我说你们在校园里面我绝对保护你们。他们来抓也不敢抓；但你出去以后我就无权保护你们。你说你守规矩，但有的人不守规矩，撞你一下，烧一下车，说是你干的，你也没有办法。中央也知道我拉住学生。这是第一次。极为平静，一点事都没有。当时有人提到要不要告诉公安局，我说告诉一下公安局有好处。公安局还好，相当配合，维持秩序。学生派传单给警察，警察还敬个礼。

李：那不是很好吗？

方：很好，省委的答复也相当好。学生问游行可不可以，省委说按宪法规定当然可以；选举嘛按选举法办。还有学生说我们游行不能受迫害，教委说按宪法办事，当然不受迫害，整件事很圆满。之后，合肥其他学校也去游行，人更多。12 月 9 日，李洪林找我说，你们学生游行了，我说那天没有我们学生。到 12 月 16 日上海游行就乱了，（警察）打了人。合肥的学生火了，到 12 月 24 日，科大的学生又去游行，支持上海，那次比较激烈，学生坐在省委门前要求安徽向上海转达，要上海公开道歉。这个要求，当然安徽不好回答，就僵住了，学生不回去。我和管惟炎亲自去了现场斡旋，一边跟学生谈，一边跟省委谈，后来达成协议，省委愿意说打人是不对的。当时已是夜里 12 点多，如果学生再不走，省委可能采取行动。我对学生说，你们的游行

实际上已经成功了，不可能一次游行就把什么都解决了，要上海马上答复是不可能的。学生很听话，一下就散了。那次省委是满意的，省委第二天还表扬了我们，建议以后其他学校发生问题，应有校长亲自处理。

李：问题就是因为学生很听你的，所以要把你开除掉。

方：也可能。学生当时确实非常听话，一下子就退潮了。教委早就想整我们。

李：怎么会把你叫到北京去呢？

方：到北京去是因为有一个会议。另一个原因是我当时就听到北京的风声越来越紧，我在合肥苦口婆心劝学生，李淑娴在北京打电话来说北京正在准备整你，她听到不少风声。

李：中央是不是对整个事件了解呢？

方：我看不是完全了解。邓小平最后拍板，但起了比较坏的作用的是教委。教委对我和管惟炎早有看法。科大不属于教委管，属科学院管。我们的学校已上升为全国第二名，从论文、从学生素质，仅次于北大。教委很眼红，早就想整我们，所以每次我们学校一动，就发文件。但清华也游行了，教委却装作不知道。

李：科学院呢？是不是站在你们那边？

方：科学院也不完全是，因为我们得罪了张百发，张百发（出国）是谷羽让他去的，谷羽是胡乔木老婆。谷羽在科学院，所以科学院也恼火。一大堆人事纠葛包括在里面。

李：这跟胡耀邦有没有关系呢？

方：胡耀邦的问题是上层的纠葛。

李：看来是利用了你们几个，把他搞下来。邓的讲话实际上针对学生运动。“反自由化”的逻辑是：学生运动受自由化思潮影响，而自由化思潮又是胡耀邦鼓励的，你们是自由化思潮的代表人物，于是就连在一起处理了。你到北京之后，有没有哪一个领导人跟你谈过反自由化的问题？

方：只是开除出党的时候宣读一下开除的决定。

李：开除有没有经党支部讨论？是否合法？

方：没有。我的党支部在合肥，我人在北京。至于合不合法，党章也有一条：特殊情况可由上级开除党籍。

李：1986年时，一方面上面有劝你退党的消息，另一方面也有人写了文章肯定科大，包括《人民日报》。

方：对。不过据说那是为开十三大做舆论准备。有小道消息说，有人要提名让我当中央委员。这也不是第一次，十二大时就派人到科大来调查，想找我当一个典型，年纪轻，挨过整，学生关系又不错，党龄也比较长，我家的历史很干净，地、富、反、坏、右一点不沾，成份很好。但即使当上党代表或更高，我想他们也只是要把我当做一种工具。

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张皮

李：李淑娴还在党内，而你已肯定不会再加入党了。你们夫妇之间有什么不同看法吗？

方：这倒不会。实际上她比我讲得还厉害，了解我们的人都知道。现在，共产党内非常复杂，有些人还是挺好的，不管是思想还是人品。刘宾雁人品就很好。还有许良英（与方励之、刘宾雁一起发起纪念反右运动的），他就叹

惜没有被开除。原来他是搞马克思主义的，我跟他讲不能老提马克思主义。现在他觉得是一场梦。所以，现在党内什么人都有。

李：那天晚宴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说你跟刘宾雁是两大思潮：一个是希望从党内的自我完善去改造党，立足点是“进言”、是劝，让他们改好；另一个是建立外部制衡的力量，来促进变化。这两种想法，在你们这一代人当中，哪一种更多人接受？

方：我个人认为两种都需要，必须内外一齐做。外界的人把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作为（中国共产党里面的）一个非常强的判据，而实际上不是那种情况。实际上对马列主义理论，邓本人就破坏了很多，他本人都把马克思主义给否定了。

李：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共党内只不过是一张皮。

方：一张皮。跟他附和的时候，他可以不需要这张皮；不附和的时候， he 可以用这张皮来整一整你。

接近高层的人最悲观

李：你对一党专政有什么看法呢？

方：在 1985、1986 年时，国内讨论多党制已相当公开。那时我从国外回去，连中央党校都在讨论。

李：一党专政与利益有关，看来不那么容易改变。

方：可以用“多派制”，以一党多派作过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演变，就是共产党改变颜色。它现在是执政党，现在要完全甩开它不可能，如果没有在内部做点事相呼应，只是一味在外部反对它，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李：刘宾雁的希望是党内有好人，还可以做点事。

方：我想现在不是要有好人，而是要党改变。

李：但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还是有一个绝对权力的话，还是会腐化。

方：是的，我们希望它内部也民主化。我认为，有的党是专制的党，像新加坡，但它内部还是比较干净，它是专制而不腐化。现在它（中共）内部也很不干净，不但专制而且腐化。腐化影响到整个社会生活。

李：你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特权阶层吗？他们腐化到什么程度呢？

方：我觉得问题是权力加腐化。至于程度，我没有定量，至少听人说的是越说越多，消息可怕极了。比如说军队也走私，甚至到毒品走私，这已经腐化到了极点。一切目的都是权和钱。

得到一个相关的曲线：越不了解中国的人，如外国人，他们最乐观；什么中国现在房子那么多了，很乐观；外国的华侨，就不那么乐观，他们听到的东西比较多；外国的中国留学生是更悲观一点，他们出国不那么容易，体会更多；在国内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乐观程度更差；还有一种人比我们还悲观，什么人呢？就是接近领导层的人，如为他们服务的，当秘书的，他们说没法相信任何话。

李：最近大陆有一种说法，是认为自从“四人帮”下台以后，尽管社会上不时有些问题，但大家一般都认为总的趋向是会慢慢好起来。自从开放物价把特权问题更突出以后，社会上许多人就认为不见得总的趋向是好起来，因为人们无法看到可以由特权阶层自己去消除特权。情况可能越来越坏。于是有些地方就发生了暴动和骚乱。现在年轻人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呢？

方：年轻人一般都相当悲观，第一是想出国，第二是想法赚点钱。

我不赞成爱国主义的口号

李：对出国的事，你怎么看？昨天在你的演讲会上，有人问你关于民族意识的问题，你的回答很简短。我想他的问题是，香港人面对 1997，很多人办移民，但也有人觉得应加强民族意识来迎接 1997。你对所谓民族大义，有什么看法？

方：如果要我彻底说，我不赞成爱国主义的口号，至少不是完全赞成。

李：你是否同意爱因斯坦的说法——民族主义是一种婴儿病？

方：我想，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升起衰落。如果一个文化的确要面临彻底的完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赞成爱因斯坦的“世界公民”的观点。他说，你不必太在意你是哪一国，要从整个世界来看。世界要往前走，中间可能有很多文化都要淘汰掉，彻底湮没，因为它不能适应新的发展。古时的两河流域现在就没有了，玛雅文化也没有了。所以文化灭亡不一定是坏事，不需要太介意。一般科学家到后来都采取这观点，科学是无国界的。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否定好的民族文化。如果真正好的，你不怕人家来冲击你。

李：对中国民族文化的优劣，还是有争论的。但许多人对之持批判态度的，则是中国是“政治文化”，包括专制主义、血缘政治的传统等等。现在值得讨论的是“爱国主义”，因为“爱国主义”这东西，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最保守、最反动的那些人提倡的。

方：确是层次比较低，所以我不大讲这东西。让中国人抱一种沉重的心情，何必呢？我认为要找新的文化，要创新。科学就是追求真理，除此没有别的。没有必要说一定要保存中国特色或中国传统。我不是公开去反对中国特色的东西，但我不介意失去这些东西。

李：刘宾雁在香港，也有人问过他移民的问题，他说如果有条件使国家变得可爱，能给大家多一点自由，社会的不公平逐渐减少，那么不选择移民留下来，即使物质条件差又有什么关系？但现在要他说服一个中国人不要出去，他是不愿意这样做的。

方：他的出发点很沉重。但我觉得，一种文化若真的不行的话，它要衰落的时候就该让它衰落，这样可能更好。因为把世界往前推了。你不必保，保就是保落后的东西。在国内，很多年轻人都有这种观点。我们要寻找真理，但不必说专为中国作贡献。

没有民族意识的包袱是好的

李：你认为他们往外跑也不必要劝他们？

方：我觉得没有必要劝，而且他们要回来之前，我还说你要真正找到发挥你才能的地方才好回来，否则最好不要回来。因为科学是一个世界角度，贡献是对人类整体的，没有必要保住一个圈子。在科学领域从来不讲保持传统，从来没有这个问题。哪个民族都有贡献，中国也有贡献，如天体物理。但贡献不能说是哪个民族的，因为它是统一的东西，科学家跟很多人不一样，他们对文化的感觉是共同的。从没有感到你是美国人、他是犹太人。比如在我们领域，审稿从来不去看你是什么民族写的，只看你的文章对不对，不对就不接受，对就接受，没有民族主义的包袱。

李：如果现在中国的年轻人没有这种国家民族的观念，你认为是好的吗？

方：如果没有刚才说的那种包袱，我心里认为是好的。

李：昨天提问的那个人代表了一种想法，就是他本来并没有这种包袱，

现在因 1997 年临近却觉得应该有包袱。你说香港的民族意识很弱。是的，它本来很弱。但有人觉得香港要回归中国了，所以应该加强自己的民族意识。

方：实际上外国人很讨厌这种意识。我很多外国同行从不把我当外国人，美国人很少有这种“外国人”的概念。但中国人，即使不是民族歧视，但民族意识却常常很刺激人，比如对外国人称“老外”。外国人的护照不过相当于户口簿，但中国人拿了外国护照还是中国人走在一堆。外国没有这种民族意识，但他们的民族传统却能自然地留下来。所以，一种好的传统，不必死死抱住，死抱住说明它经不起冲击。这一种观点国内很多年轻人都同意。现在，“爱国主义”成了共产党最后的一个口号，但连这个口号也错了。

不是要解放，而是要解散

李：大陆年轻人一般的想法是否走向虚无？

方：我觉得是无所适从，大家看不到国家的前途。在中国，个人前途与国家前途联系非常密切，个人的生活方式跟政治联系很紧密。不像这里，不像美国，美国换一个总统对人们没什么影响。但中国就不同。现在虽然比毛的时候松一点，或者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松了一点，但在北京至少不是。现在的情况，的确有时使人感到中国不是要解放，而是要解散、要解体，没有凝聚力。许多人确实有这种想法：一种文化不行了，干脆散了算了。

李：但你们这一辈人呢？

方：我们这一辈人当然不愿意就此“散”了，但如果年轻人散了而能找到更好的东西，倒也无所谓。

李：可是有些人很执着这一点——中国不能散，中国一定要强。

方：现在这种想法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前几年，在体育比赛得冠军，还能给人刺激，实际上是狭隘的“爱国主义”。但现在大家对得胜也不怎么兴奋了，甚至有人公开说：“就应该失败”。南京大学一个物理系教授就说，最好打输，什么排球五连冠！

李：为什么呢？

方：因为这个不标志中国的现状。这只是一种兴奋剂、一种吗啡，不是真正的药，不是真正的营养使你好起来。现在体育的经费特别高，很多人有看法。所以有人公开希望它失败，因为它确实不代表整体的进步，不是因为整体好而出现特别好的运动员，只是硬拔尖，硬弄出来，这并不表示中国人有多棒。

普遍心态是先捞一笔

李：如果中国的文化解体，之后会是怎么样的情形？

方：那也很难说。

李：现在据说不少地方出现了暴动，会不会最后又产生以暴易暴的情况？

方：我觉得是教育的问题。以暴易暴是其中一种解体的方式，但最后还是暴。中国因为确实太大，很难让其他民族来冲击而完结。

李：中国的教育现状很糟糕，听说连你的研究生都不愿意当。

方：确实很糟糕。我的研究生当然觉得跟我学到东西，将来可能有出国机会。但他们现在养不活自己，工资只有七八十块钱，加上奖金绝对不超过一百块。我现在还有六名研究生，有的人退了要出国。因为留学生出国按规定先要退学。现在一位要退学的学生是要到普林斯顿大学，已被录取了。其

他有些研究生谈论退学是要去经商赚钱。但我的研究生中还没有这种情况。

李：中学的问题看来就更大了。

方：中小学因为教师待遇很低，所以质量就差。另外，中小学教师都要赚钱，结果是乱收钱。我的一个孩子，现在是大学三年级了。他在中学最后一年考得不特别好，我就让他再念一年，这要交两千块。我还能交，我还有点稿费，就把稿费全交了。其他人有睁一眼闭一眼的，就是公家给交钱办这种事，算是福利。我在科大是管钱的，所以我不能这样做。科大有一笔经费，叫福利费，可以拿来这样用。一般的做法是整个学校算，我给你几万块钱，你收我一批学生。这是极不正常的事。

李：现在中国是不是有点山雨欲来的形势，大家都不知怎么办才好？

方：像是无头苍蝇，来回乱撞。中央也是这样。当然只有权不乱撞，要把握住。其实他们自己也没有信心。你看很多人的儿子都在美国。他们的子女拿绿卡的比一般人多。很多人说，如果现在一垮，他们很多人全都跑。现在他们也讲得很实际，谈话中哪里还有什么马列主义？你们外面看到的是要建设社会主义、要改革、要四化，里面都是只顾个人问题，就是一种要解散的心态！这个大厦要垮了，耗子都出来了。先捞点钱，把钱存到瑞士银行。香港来不了到深圳也好，深圳离香港近嘛。

李：这样看来，你很难怪香港人没有信心了。香港很多跟大陆做生意的人都很清楚，如果跟你做生意的人有好处，那你这生意大部份会成功；如果他没有好处……

方：那就绝对不会成功。这恐怕不是一般的贪污腐化，而是已形成了一种想法：赶快捞，抓住就捞一笔。也没有什么长期观点，只是要先捞一笔，

你给我钱，给我办出国，等等。很多生意就因为这样先捞一笔而做不成的。因为他心里也没有底，明天可能他就不在位了。

让他们恼火有好处

李：你为什么老是要点领导人的名字呢？

方：我就是想刺激一下他们。反过来说，为什么不能点名呢？

李：在外面无所谓，但在中国是很危险的，这是很犯忌讳的事。你这次出来在大会小会都点邓小平。回去不会有什么事吧？

方：我想没什么。

李：或者会不让你出国，听说去年五月让你到意大利还是赵紫阳批的。这次你出来是谁批的呢？

方：这次大概是胡启立吧，肯定是经过中央批准的，不是科学院。至于以后能不能出来，主要还是看国内的局势。

李：听说去年你在意大利时，邓天诺那个访问使上头很恼火。

方：现在我跟邓天诺说的话国内许多人都说啦。每次让他们恼火一次也有好处，就往前走一点。现在很多人说马列主义过时，已没有人认为是忌讳了。

李：你在邓天诺的访问中说的话，用他们的观点看，可能你方励之越走越远，而实际上可能越走越“近”，离现代化越走越近。因为现代化的观念，人是平等的。没有肯定每一个人的个人价值的观念，就没法现代化。

方：对，人是平等的，邓小平跟我也一样。我批评不对，你可以反批。这个观念其实学生早就有大字报写过了。

李：你说中国的多党制是个长期目标。在短期来看，你觉得是否要争取人权？

方：我觉得应该要做这种工作，虽然很困难，起码调查违反人权的案件就很难进行，但我觉得应该做。大陆的人权案件很多很多，如良心囚犯，其他还有妇女所受的非人待遇等。这些事情绝对不比苏联少，而苏联还有个名单，在中国就没有名单，甚至有些人连名字都没有。像魏京生算大的，名字还有人知道。在农村，你说过一句什么，人就没了，也没人知道。

香港印象与九七后估计

李：你今天晚上就要走了。你能不能谈谈这一段时间对香港的印象，包括香港人向你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你所接触的人……

方：整个表面现象跟我 1982 年来是一致的，但今天我也有新的感受，就是香港人的寄人篱下，一边是中共，一边是英国，生活、心情极为紧张。现在又遇到一个政治上的 1997 问题，感觉很强烈。我这次见到的记者很多，他们都问我 1997 问题。其实我应该不能答，因为我没有特别了解，没有在这儿生过根，不了解香港人的感情。我只感到香港人心情紧张，想知道该怎么办。好像就要地震了，尽管我不是地震学家，人们还是问我什么时候有地震，但我又不能告诉你什么时候会有地震。反正抓住一个人就问一下。

李：你觉得香港回归中国，对香港有利还是不利呢？

方：从经济上看肯定会有影响的。这次我在澳洲看到不少“航天员”，他们说得很干脆：不相信大陆。他们都是有点钱的人，一年买得起 52 张飞机票（每个周末飞澳洲看太太）。

李：你认为一国两制行得通吗？

方：要看一国两制是什么含意。

李：就是由中央承诺在香港保持资本主义。

方：我看，由于国际环境，我觉得可能是行得通的，但会是“芬兰化”。芬兰是资本主义，但它在政治上受制于苏联。

李：芬兰有独立治权的，但香港没有独立治权的。

方：这要看到底什么叫“两制”。他可以说，我保存你这儿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改变。

李：但是，对香港的立法、司法、行政和终审权，中央还是强调要掌握最后的发言权。会不会因为人事问题，如邓小平的健康问题，就改变这种政策？

方：这就如昨天我在答问时说的，有人问建党行不行，我说要看情况，如果你的意见符合他们的想法，你还是可以做的。比如说，你要建党，只要你答应接受共产党领导，我估计就可以了。这其实也是一个办法。

李：香港回归中国之后，对中国本身好还是不好？

方：如果搞不成功，保不住香港的繁荣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中国会有很大影响。

李：几十年来，香港发挥了对中国的言论监督和批评的作用。比如天安门事件，我们这里许多报纸报导很大，这种作用到九七之后就很难说。所以大陆有人甚至说要感谢鸦片战争，使大陆发生的事外面还能知道，当权者还有点顾忌，否则就是关起门来打狗了。去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也是如此，外国的报纸多数是登小小的一段，只有香港的报刊大版大版的登。所以

我们对香港的忧虑，不仅是对香港本身，也是对中国的忧虑。你估计中国会不会给香港民主呢？

方：那要看是什么样的层次。如果加一条“党的领导”，我想是没有问题。只要你称臣、进贡，其他的事你自己去做，这也许可以。但像天安门事件和反资，你要那样登，看来是不可能的。那是不给最高领导面子。所以，“一国两制”之后，香港对中央最高层的监督的作用确实会削弱，其他监督大概可以。这要看到哪一级。到副职一级也许可以，最高一级就有点问题了。

李：谢谢你接受访问，希望你多多保重。

（原载《九十年代》1988年10月）

编者注释

[1] 本文只将“本刊”二字改为“《九十年代》月刊”，其余照录。

[\(返回目录\)](#)

多党制可能在大陆出现

——在香港接受中华电视公司陈月卿电视采访的报道^[1]

被誉为“中国的萨哈罗夫”的方励之，具体而简要地告诉中华电视公司记者陈月卿，大陆的缺失，以及他以科学家的观察方式，来预测中国未来之演变。这位令邓小平头痛的“民主斗士”，就大陆的经济、政治、马克思主义、以及海峡两岸统一等现实问题，提出了他个人的看法。

访问方励之的这个节目，被安排在八日晚上的《华视新闻杂志》中播出，超过 1,000 万人在电视机前，欣赏了方励之的风范，以及他除了科学家以外的历史与哲学家的神采。

微笑于沉稳中，在他近视镜片的里面，透露了他的智慧，诚恳，以及作为一个中国人，所期盼的未来希望。

物价暴涨造成社会不安

当前大陆最严重的，当然是经济问题，方励之告诉华视记者说：严重的经济问题，影响了各个人的生活，物价暴涨，不是一个经济变革后的正常状态，大陆上的公务人员，学生，教职工等，一直都是接受固定工资的。方励之指出，就拿他的研究生来说，每人月收入 70 元左右，在大陆物价暴涨的情况下，七八十元只够一个人吃饭。因此，人人对这种只够勉强养活自己的状况当然感到很紧张，其后果必然会产生社会的不安和动荡。

造成物价暴涨的原因，包括了经济体制的不协调，管理问题，以及贪污，腐化之风。中共现在实施大力经济改革，所遭遇的阻力，这就涉及到所有制

问题。因为从公有制改成私有制，就碰到了难以推展的阻力，中共的公有制实际上就是领导人的所有制。

方励之从大陆经济变改的途程，引伸到政治的改革，他坚决地认为：“势必要改，不改革不行。这就是量变所引起的质变道理”。

中共领导层永远不放弃权力

这位不畏暴政的思想家，谦虚地认为他既不是学政治的，也不是研究经济的，他仅以一个自然科学者的角度来看，他对大陆未来抱有一些乐观，虽然中共领导层永远不会放弃他们的权力，放弃他们的控制权和特权。

方励之这次应邀赴澳洲，新加坡访问，顺道也经过一些亚洲国家。他以这个地区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与背景来看，这些地区正在走向现代化与民主化，而现代化要强调经济，民主化则指的是政治。在这个四周已经发生了这种现象，这现象也就是世界性的潮流和趋势。再看另外一个圈子，那就是中国大陆，它既属于亚洲，当然也具有中国文化背景。另外，我们再看看属于社会主义的这个圈子，苏俄和东欧现在也正在作不同程度的改革，而改革的方向也是求经济上的发达和政治上的民主，所以中国大陆和这个圈子来比较，发展得不是快的，确实不快，而与亚洲这个圈子来比较，中国大陆就显得落后了。

方励之说，我们物理上有种理论，用这种理论来说说这个社会，亚洲地区正在发生“相变”。我们之所谓“相变”，即从一个不够民主，不够现代化的状态，发展到民主与现代的状态。因为世界潮流在变，谁也逃不出这“相变”的潮流，虽然有的暂时不发生变化，就像“相变”里面，水变成冰的时

候，并非马上会结冰，而是缓慢一点，这种区域，我叫做“超冷”[SUPERCOOLING]。中国大陆现在就在超冷区，内部很不稳定，却有很强的动力往前发展，所以从总的宏观来看，中国大陆是逃不过这种趋势的。

工人知识分子思想日趋独立

从经济发展的延伸到政治改革，方励之认为：需从几个条件慢慢发展，才会改变政治上的这种状况。在经济上，如果私人经济成份越来越多，就出现一些独立的经济成份，或者叫做中产阶级，诸如个体户或乡镇企业什么的。在另一方面，如知识分子，或者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说也开始走上多元化，不只在经济方面。这就构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形态，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工人，都采取了独立的态度而且跟经济发展并行，因而构成了政治改革的一个社会条件，到了那个时候，即使有人不想改（当然有人不想改）也就不能不改了。

对于中国大陆未来出现多党制的可能性有多少，方励之认为会有可能做到的，因为这也是趋势，如果说什么叫现代化，发展发达国家，那么在政治方面来说，就是一种多元化，或者用多党，多派表现出来，或是用等价诸形式表现出来，这种状况，经济或政治上出现了独立成份，这就产生了必然的结果。

长期以来，知识分子在大陆，被要求做党的工具，不是一般工具，而是驯服工具，这种心态，长期以来，在知识分子里也是很流行的，现在大家都认为那是不对的，都要求成为独立价值的知识分子，于是这样发展下去，最终，是会有多党制的政治多元化社会。

到下一代社会才能多元化

方励之虽不能预言那样一个社会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他说，他初步估计所设的下限，大概需要一代的时间。他根据今天中国大陆人民的教育水平，文盲约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或者更高，以这种水平，当然很难实现这个理想。所以他认为用一代人的时间，应该是乐观的看法。他说，他没有永恒这个概念，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是改不了的。

分列三个部份的马克思主义是：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方励之认为这三部份都已过时，而且错误。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根据上个世纪自然科学联系比较密切的部份总结出来的总规律，也许适应于上个世纪，但今天自然科学概念已经变化很多，有的是相当根本性的变，比方说相对论，量子论这种发展；有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断，已经完全过时了，譬如说剩余价值这种概念，现在证明是不对的；至于科学社会主义这种理论，已经事实证明，它的结果都不能成功。根据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路线建立出来的国家，现在都已先后承认并不成功，于是苏俄要改革，东欧要改革。过去 40 年来，中国大陆现在已全部失败，这就证明其原则的错误；而逼使中共政权要改，在时间上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整个社会纪律，到了崩溃的地步，如果不改，就不能继续生存了。

现在未有统一条件

对于中国统一问题，他从更大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喜欢大家庭。但是依目前形势来看，可能性不大。因为海峡两岸改善问题上，包括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所以就难统一了，但是文化上，经济上的合作，则可以作进一步的

发展。方励之认为目前主要的任务，双方都应各自发展自己的社会，到了进入民主与现代化的状态，才是统一的阶段。

不温不火，缓慢有力的语气和声调，方励之坦然地答复了华视记者所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些问题，蕴藏着所有中国人的希望，导引那些犯了错误的人，如何去为中国人谋求幸福。

（原载香港《中国时报》1988年9月9日）

编者注释

[1] 本文由苏玉珍署名，此处原文照录。

[\(返回目录\)](#)

我为我说过的每一句话负责

——在北京家中接受台湾《联合报》驻美国记者电话采访^[1]

据外电报导，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认为方励之月前在澳洲和香港问时，提到大陆内部盛传中共领袖及其子女在国外银行有存款，是“毫无根据的侮辱”，已指示公安系统首脑乔石以诽谤罪检控他。

方励之在北平家中接受《联合报》驻美国记者电话访问时指出，在国内外银行有存款应该不是犯法的事，即使他说了这样的话，又触犯了什么法？何况他从未在公开场合说过。

他猜测，中共当局不高兴他在海外对中共的批评，所以才有这样节外生枝的事。这位有“中国萨哈罗夫”之称的民主斗士充满信心地说，在中国，短程来看，个人的命运也许不可知，但长程来看，中国民主的前途是一定乐观的。

以下是记者和方励之教授的问答摘要：

问：邓小平会以诽谤罪控告您，这件事情您的看法如何？

答：我为我说过的每一句话负责任。

问：您说若干中共领袖及其子女在外国银行有存款，这话有根据吗？

答：我把我在澳洲演讲的录音又重听了一遍，从来未在公开场合说过这样的话……。

问：在私人聊天场合呢？

答：在私人聊天场合有人问起过，我说国内有这种传言，而且很普遍。有存款，不管在国内或国外，应该都不是犯法的事，即使我说了，又触犯了

什么法呢？

问：既然这种传言很普遍，邓小平这回为什么这么在意呢？

答：（笑）也许他们对我在澳洲讲的话不太高兴。（按：方励之在澳洲曾经公开表示，不相信中国大陆能自动改革成民主国家，而且也批评邓小平式的共产主义，以及怀疑赵紫阳有没有经济战略。）

问：邓说要法办，是一时气话，还是真的要诉之以法？

答：我没有具体资料可以判断。

问：大陆的刑法对这种问题有些什么规定？

答：规定当然不可能这么详尽清楚。事实上，自开放改革之后，一般人收入增加，有点存款不算什么了不得了的事。尤其是国外留学生，能不在银行里有个户头吗？

问：您觉得这件事对您今后的研究、教学、演讲和出国会有影响吗？

答：很难说。不过几十年来我们生活在这种反复的环境里，已经习惯了，也能适应了。譬如说，你打电话来时，我正在评阅一位学生的论文…….

问：也就是说，对您的心境并没有什么影响？

答：（笑）

问：有关控告的事，你有没有接到官方的通知？

答：没有！

问：那么您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答：朋友打电话告诉我的。

问：在大陆，中共领导人要以诽谤罪控诉一位知识分子，恐怕还是第一次吧？

答：（笑）

问：如果当局这么做的目的是针对大陆的民主运动，您觉得会产生何种影响？

答：还是我常说的话，短程来看个人的命运很难说，但这不重要；但从长远的发展观察，中国一定要走民主的道路。

问：在海外的人都知道，您是大陆上推展民主运动最力的人，您觉得您多年来努力的效果如何？

答：对大陆内部很有影响。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是很多人的努力。现在有愈来愈多的人，了解民主化的重要，而且愿意作出贡献。整个社会的发展，令人乐观。

问：大陆派出来的留学生，将来对国内会有何种影响？

答：会有相当影响，他们既知道大陆内部的问题和困难，也知道外面的事，对世界的了解更全面。

问：您在国外有很多朋友和敬重您的人，如果您真的有了麻烦，这些人能给您帮忙吗？

答：谢谢。如果有需要，我会提出来。

问：您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可以跟您自由地通电话吗？

答：应该没有问题。

问：听说您 12 月要到美国来访问？

答：12 月初要来。先到达拉斯参加一项天体物理学会议，然后到科罗拉多和柏克莱加大演讲。哈佛大学也邀请我演讲，还没安排时间。

问：这件事不会影响您 12 月出国吧？

答：就不知道了。

问：这件事对您一点压力都没有吗？

答：我不讳言是有点压力——我们有责任，多做一点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

（原载台湾《联合报》美国版 1988 年 10 月）

编者注释

[1] 本文原文照录。

[\(返回目录\)](#)

以小诗明志：悠闲自在地磨吧！

1961 年我同李淑娴结婚前数小时，我匆忙刻了一方图章，其中只有我们俩人的名字，即“淑娴励之”。最近被一位爱好金石的楚辞权威看到，告我，这图章实为一句话，即“悠闲自在地磨（刀）啊！”顿时觉得，这句话不正就是我们 30 多年来的生活吗？因之写出了如下几句。



图 1 图章

其中，‘教皇’一句，指我们于 1983 年小住于保罗二世的夏宫岗多夫堡，以及 1986 年逗留于另一‘教皇’爱因斯坦的最后住地普林斯顿。克、哲分别为长幼二子之名。此注。

悠闲自在的磨吧！

磨我们的爱情，

在燕园的塔影下磨，

在鄱阳湖畔的晨曦中磨，

在十八年的两地相思中磨，

在教皇的圣殿中磨，

磨出克，崎岖磨成了道路，

磨出哲，顽愚磨成了智慧果。

年轻的恋人，只懂得在美酒般的陶醉中消磨，

只有磨到今天的爱情，才真正尝到醇浆一般的缠绵，无尽的香波。

悠闲自在地磨吧！

磨我们的宇宙，

没有太阳，磨出一个太阳，

没有元素，磨出九十二种元素，

没有空间，就磨出一个六合，

没有时间，那就再到无中去磨。

世人总是期待着，

有、有、有、更多的有，

大千的宇宙却只期待着“无”的抚摸，

她的一切都是来自无啊，

来自无的抚摸。

悠闲自在的磨吧！

磨我们的自由，

磨去原罪，我们更自由，

磨去心中的怯懦，我们更自由，

磨去生来的视界，我们看到无边的世界。

磨去太阳的光辉，

我们看到更和谐的光辉，

为自由而磨吧！

魔鬼惧怕的就是这种磨啊！

它们越是狰狞，越是恐吓，

我们愈是要更悠闲，更自在的磨啊！

悠闲自在地磨啊！

磨我们的生命，

生命时时在磨，

但我们不象磨铁杵的老太婆，

什么叫做铁杵磨成针，

实在是无知的认真，

眼光缩小十倍，针仍然是铁杵啊，

眼光放大十倍，铁杵本以是针，

生命本不在得到什么是铁杵，什么是针，

她的价值，她的乐趣，

就是在悠闲而又悠闲地磨啊！

自在而又自在地砧！

（作于 1988 年 12 月 11 日，后登载于“华夏诗苑”和“纵览中国”网站）

编者注释

[1] 本文由李淑娴亲校。

[\(返回目录\)](#)

爱国主义不应放在第一位

——接受《九十年代》记者采访^[1]

问：方教授，你好。首先想知道你最近的情况，你被禁去美国访问的事情怎样了？

答：到现在还没有回答。

问：台湾请你去访问的事情呢？

答：也没有回答。我上个星期去问了，说是现在不能回答。

任何东西都有生有灭

问：现在谈彭培根先生和你的通信。他给你的信，主要是针对你在《九十年代》^[2] 的访问和对《争鸣》的谈话，这两篇东西你都看过了？访问的记录是否有歪曲你的原意？

答：看过了，那些话都是我原来的意思。

问：你看了彭先生给你的信，可以简单讲一讲你们两人的观点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吗？

答：简单地说，我觉得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中西的问题，而是新旧的问题，是先进和落后的问题。这是我和他的不同之处。有人认为这主要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这就好像变成了一个地域问题。我的观点是，中国现在的文化，整体来说是落后的，要吸收先进的东西。

问：你说的文化是指什么东西？

答：我是指广义的文化，科学也在其中。

问：彭先生说中国文化有包容性，是个大熔炉，可以把其他文化包容进去，因此不会衰亡。你怎样看？

答：怎么不会衰亡呢？任何事物都是有生和有灭的，而且不断在变化。特别是因为我是研究宇宙学的，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不变或永恒的，这是不可能的。在变的意义上，“中国文化”一词本身的涵意就不很确切。中国从原始母系社会到现在，已经变化了不知多少。

问：彭先生认为中华文化正在复兴、再起，你的意见怎样？

答：中国文化是什么，他没有具体说。如果说就是孔儒那些东西，我认为不对。

问：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呢？

答：那就更加不对了。

问：他可能是指台湾经济的高速发展而言，因为那里的文化不就是中国文化吗？

答：我想台湾也有人明确地反对这种说法。像吴大猷这些我们物理学的前辈，我想他一定反对台湾的经济复兴是因为儒教或儒学。

爱国主义有政治含意

问：彭先生提到你在《九十年代》的访问中谈过爱因斯坦“世界公民”的讲法，你认为要讲得更清楚吗？

答：爱因斯坦的观点已经很清楚了。我认为“爱国主义”一词是有政治含意的，和乡土感情是两回事。讲爱国主义，从来就是问你爱的是什么国，还要把它放在第一位。最早提出爱国主义这个概念不是第一位的，是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时。关于第一位的问题，就是在一个争论中，你把爱国立场还是把正确与错误放在第一位。我当然认为应该把正确与错误放在第一位。正如我们有一句简单的话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爱师是一种很好的感情，但这不应是第一位。

问：彭先生认为爱因斯坦讲“世界公民”时，是基于那时犹太人的处境。你是否同意呢？

答：我可以说，他这样说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爱因斯坦在死前最后的一篇文章，那是 1955 年 4 月 11 日写的，他 4 月 18 日去世，而且是对以色列写的文章，他在文章中仍然说：他对以色列写这篇文章，并不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写，也不是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写的，而是再次强调要采取超国家的观点去看问题。他的观点很清楚，狭隘的民族观点是不正确的。他对犹太人的态度是一贯的。犹太人受到迫害，他反对。但是对以色列和埃及之战，他说那是一种老式的争夺势力的战争。所以，首先应该是正确与错误问题，然后才是民族的问题。这是他的基本想法。我们从事自然科学的工作，很容易接受这种想法，因为正确与错误在自然科学是有共同标准的。在自然科学中，民族标准并不是第一位。

问：你过去是不是也有比较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想法？

答：我想是的，主要是受传统教育的影响。

问：什么时候开始有现在你说的那种想法？

答：我想爱国主义有时是和正确与错误的结论一致的。如果不一致，还把爱国主义这个口号放在第一位，我们就要怀疑它了。譬如说，对于抗日战争，爱国和正确的结论是一致的，抵抗侵略是正确的。但是现在强调爱国主

义，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是要人具体爱这个国。我还可以说一个例子，就是大陆和台湾两边都批评胡适的西化论，而且两边都是从爱国主义的角度去批评，但目的却不一样。台湾有人说，胡适的西化论实际上是给中共开门；大陆的批评是，胡适的西化论要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的什么东西。两者听来完全不一样，却都是说爱国。这种爱国不是指乡土、人民，而是指组织，亦即忧国家机器的那个国。

出国热反映了解散的心态

问：那么，你觉得民族主义也是同样的东西吗？亦即爱因斯坦说的“婴儿病”？

答：我想是类似的。像刚才所说的，第一是要分开乡土感情和政治含意，第二是这一定不是放在第一位的东西。

问：关于“中国要解散”的提法，彭先生认为在香港、台湾、海外，没有一个人同意要解散。

答：我在访问中说，这是目前中国的一种心态。我可以告诉你，我回来北京之后，对这种心态的感受更加深。我今天看到《科学报》的一篇文章谈出国热。本来有出国热的是年轻人，但现在连中年人和年纪相当及已有成就的人也掀起了出国热。哪怕出去做比自己能力低一档的工作，人们也要出去。这种状况说起来很辛酸，但却是现实。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 50 年代初时，哪怕很穷，大家还是要回来，而现在情况却相反呢？这就是一种要解散的心态。还有，最近在北大传闻，美国的中学数学、物理教师短缺，希望有些中国的大学教师去讲中学的数学和物理，消息传开，很多人，哪怕是有正教授

头衔的人，都非常向往，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中国有很多事要做，但现在的情况又很难做事。

问：彭先生的信有一段讲到香港回归的问题。他说香港的协议出来时，他喝得大醉。但在香港却没有一个人对此表示兴奋。这里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答：差别就是对前途的看法。

问：你是不是觉得，彭先生对中国的前途仍抱有希望？

答：对于中国的前途，我在香港也说过，从长期来说是乐观的。

问：但很多人是觉得没有希望，才自己找出路。你觉得这个想法对不对？

答：我没法说什么话要这些人一定留下来，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去说服那些人。

赞成邓小平死掉？

问：彭先生还批评你提到邓小平的一段话。

答：那段话可能有一点误会。当时我说我赞成邓退休，然后有人问我是不是赞成他死掉，我说这个我不赞成，因为这不人道。

问：彭先生提到，如果在毛的时代，你能这样说吗？

答：他可能不知道，毛在的时候，我已经开除过党籍了。

问：也许批评的程度不一样？

答：我也不知道。

问：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地方吗？

答：我还想再谈一点，最近日本的《产经新闻》请我写篇文章，我谈了这样的看法：我觉得在现今的世界，非地域性的文化越来越发展。这是人类

面临的新情况，世界性的文化在我们生活中占越来越大的成份。譬如科学本身已经国际化，无所谓属于那个国家，而科学在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无论你接受还是不接受，它还要继续发展，包括科学的内容以至科学的精神。本来世界各地的语言不一样，但现在已经发展出一种共同的语言，就是计算机语言。还有，世界各地所有机场都是差不多的，符号都一样，这是科学发达的结果。同时，现在人类面临的社会危机也是全球性的。例如能源、环境、人口、生态，等等，都是全球性的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封闭起来或者躲开。怎样解决危机呢？要创造全球的文化，包括科学方面的创造。这些问题涉及我们的生活各个部份，不局限于任何一个民族。我想爱因斯坦强调“世界公民”，在这个意义上是积极的，他注意到世界性的问题。

问：这样传统的东西是否比较不易保留呢？

答：传统的东西还是会保留的，问题是我们目前已面临这样的现状了。对于我们做科学工作的人来说，我们的目的是要解决当前的问题，要往前发展。我们碰到问题就去解决，至于解决过程中有多少东西要保留或要丢掉，或是要坚持什么东西，这不是我们事先要想到的。科学的特点就是往前看。所以，我还是认为原来那句话没有错：如果一个东西要灭亡，你救它也没用。

海外和国内想法上的差距

问：最后，对彭先生的想法，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呢？

答：有他这种想法的人我也碰到过，特别是海外的人。正如海外和国内对《河殤》的看法也不一样，我想这是大家生活的环境不一样造成的。《河殤》在大陆得到很多支持，有些海外的人就不太理解。海外对爱国主义的理解也

如是，但在我们这里，政治含意是非常清楚的。

问：谢谢你接受我们访问，以后有机会再联络。

（原载《九十年代》1989年1月）

编者注释

[1] 《九十年代》为香港杂志，主编李怡。

[2] 见本卷《中国要解散？（在香港接受《九十年代》月刊社李怡采访）》。

[\(返回目录\)](#)

方励之给邓小平的信^[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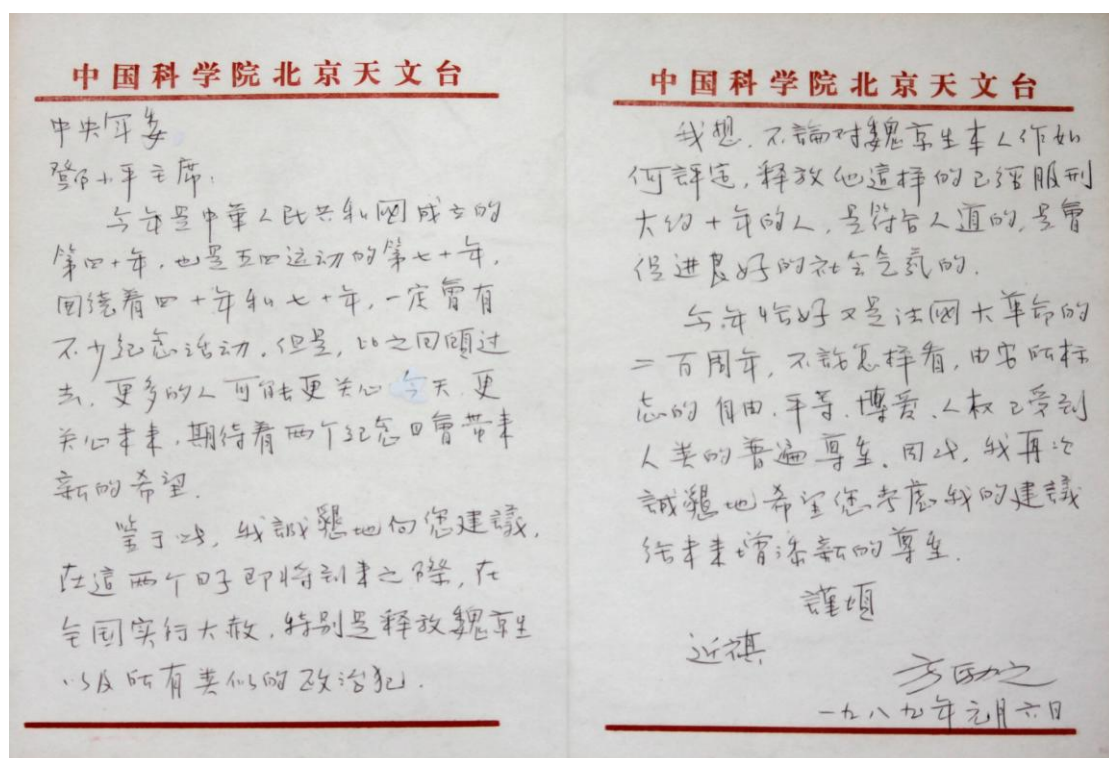


图 1 方励之给邓小平的信

中央军委

邓小平主席：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 40 年，也是五四运动的第 70 年，围绕着 40 年和 70 年，一定会有不少纪念活动，但是比之回顾过去，更多的人可能更关心今天，更关心未来，期待着两个纪念日会带来新的希望。

鉴于此，我诚恳地向您建议，在这两个日子即将到来之际，在全国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以及所有类似的政治犯。

我想，无论对魏京生本人如何评定，释放他这样的已经服刑大约十年的人，是符合人道的，是会促进良好的社会气氛的。

今年恰好又是法国大革命 200 周年，不论怎样看由它所标志的自由、平

等、博爱、人权已受到人类的普遍尊重。因此，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给未来增添新的希望。

谨颂

近祺

方励之

一九八九年元月六日

编者注释

[1] 方励之给邓小平的信是经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刘达（后担任过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1994 年逝世）转递的。另外一封内容全同的致邓小平的信，是贴上邮票从邮局投递的。

[\(返回目录\)](#)

《方励之自选集》(四)前言^[1]

这一集所包括的主要是访谈录，特别是近两年的访谈。因此，严格说其中只有一半的内容是属于我的，另一半则属于访问者及记录的整理者。

所有这些访谈，我自己也大都有原始的录音。本想自己动手整理这些录音，然后再发表。但是，实在挤不出时间，只好直接取用各访问者所整理并发表过的记录。除了对极少数明显的错误加以改正之外，保留了各访谈录的原样。也许以后有时间，再重新整理。

很容易看到，不同的访问者所记录的“我”并不完全一样。从语言到内容，都有一些差别。这当然不奇怪，对同一物体进行同样的测量时，每次结果尚且会不完全相同，而会有弥散，起伏或误差，更何况不同访问者本身之间倒是十分不同的。但总的说，第一，这些访谈录之间的弥散不算太大；第二，把所有这些访谈录加以平均，其结果还是很近于真实的我的。

第一篇《中国的失望和希望》，是唯一的全属于我的文章，它是我的今天的“平均值”。

方励之

1989年1月20日 北京保福寺

编者注释

[1] 这是方励之为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1989年4月出版的《方励之自选集》第四集写的前言。

[\(返回目录\)](#)

“第一推动”丛书总序

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追寻科学本身的原动力，或曰追寻其第一推动。同时，科学的这种追求精神本身，又成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一种最基本推动。

科学总是寻求发现和了解客观世界的新现象，研究和掌握新规律，总是在不懈地追求真理。科学是认真的、严谨的、实事求是的，同时，科学又是创造的。科学的最基本态度之一就是疑问，科学的最基本精神之一就是批判。

的确，科学活动，特别是自然科学活动，比较起其他的人类活动来，其最基本特征就是不断进步。哪怕在其他方面倒退的时候，科学却总是进步着，即使是缓慢而艰难的进步。这表明，自然科学活动中包含着人类的最进步因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堪称为人类进步的“第一推动”。

科学教育，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教育，是提高人们素质的重要因素，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核心。科学教育不仅使人获得生活和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使人获得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以及科学方法的熏陶和培养，使人获得非生物本能的智慧，获得非与生俱来的灵魂。可以这样说，没有科学的“教育”，只是培养信仰，而不是教育。没有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只能称为受过训练，而非受过教育。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堪称为使人进化为现代人的“第一推动”。

近百年来，无数仁人智士意识到，强国富民再造中国离不开科学技术，他们为摆脱愚昧与无知作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的科学先贤们代代相传，

不遗余力地为中国的进步献身于科学启蒙运动，以图完成国人的强国梦。然而应该说，这个目标远未达到。今日的中国需要新的科学启蒙，需要现代科学教育。只有全社会的人具备较高的科学素质，以科学的精神和思想、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作为探讨和解决各类问题的共同基础和出发点，社会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和进步。因此，中国的进步离不开科学，是毋庸置疑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科学已被公认是中国进步所必不可少的推动。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的精神也同样地被公认和接受。虽然，科学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科学的价值和地位也更高了。但是，毋庸讳言，在一定的范围内，或某些特定的时候，人们只是承认“科学是有用的”，只停留在对科学所带来的后果的接受和承认，而不是对科学的原动力，科学的精神的接受和承认。此种现象的存在也是不能忽视的。

科学的精神之一，是它自身就是自身的“第一推动”。也就是说，科学活动在原则上是不隶属于服务于神学的，不隶属于服务于儒学的，科学活动在原则上也不隶属于服务于任何哲学的。科学是超越宗教差别的，超越民族差别的，超越党派差别的，超越文化的地域差别的，科学是普适的、独立的，它自身就是自身的主宰。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精选了一批关于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世界名著，请有关学者译成中文出版，其目的就是为了传播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思想，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精神和思想，从而起到倡导科学精神，推动科技发展，对全民进行新的科学启蒙和科学教育的作用，为中国的进步作一点推动。丛书定名为“第一推动”，当然并非说其中每一册都是第一推动，但是可以肯定，

蕴含在每一册中的科学的内容、观点、思想和精神，都会使你或多或少地更接近第一推动，或多或少地发现，自身如何成为自身的主宰。

“第一推动”丛书编委会[1]

编者注释

[1] “第一推动”丛书是方励之在 1989 年之前选定,组织翻译,于 1989 年 1~2 月写了序。“第一推动”丛书由湖南科技出版社于 1992 年出版。为了能出版,将方励之名字隐去。出版后,该丛书责任编辑将丛书带到图桑方励之家,特别指出:为了能出版,隐去方励之的名字,方励之所写的序作为“总序”放在该丛书每一本的卷首,不署名,只署“第一推动”丛书编委会。方励之对他们的做法很赞许,认为能出就好,这套书对启发民智有益,对于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感到欣慰。故此,“第一推动”丛书从 1992 年的第一辑至 2007 年的第 4 辑、精选本(2012 年)和 20 周年合集典藏版(2012 年)均采用,署名为“‘第一推动’丛书编委会”。)

[\(返回目录\)](#)

中国的失望和希望

1989 年，是中国的蛇年，它是不是一条富有诱惑力的蛇，难以预测。可以预测的是，这一年会引起人们对历史的更多的审视，对现状的更多的思考。因为，1989 年是社会主义中国成立的第 40 年，同时它又是五四运动的 70 年。这两个纪念日，可能正好象征着中国的失望和希望。

40 年的社会主义岁月，是令人失望的。在 50 年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好像物理定律那样被人们接受。然而，看看今天的“新”中国，只能感到那时的虔诚被玩弄了，那时的热情被欺骗了。

诚然，40 年的中国并不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和进步。但是，测量一个社会成功与失败的最基本的参考系是：它与世界上的发达社会之间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增大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 40 年，不但毛泽东时代是不成功的，就是改革以来的 10 年，也还没有足够的根据去唱颂歌。

40 年的不成功，不能委罪于，至少不能主要委罪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事实上，原来与中国具有相同起点、并具有类似文化背景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几乎都已走进、或正在走进发达的行列。

40 年的不成功，也不能单纯地归咎于中国的人口太多。事实上，人口过多本身就是几十年来的政绩之一。其次，谁都知道，阻碍、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是连年不断的大尺度的阶级斗争、大范围的政治迫害。难道，凡是一个人口多的社会就必定会发生那样的斗争和迫害吗？这显然是缺乏逻辑的论断。

逻辑的结论只能是：40 年的失望，根源就在 40 年的社会制度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在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代替了对主义的信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已经相当彻底地丧失了吸引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五四运动时的口号“民主和科学”又重新流行，又重新变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希望。

中国的改革就是在这种背景上开始的。应当肯定，改革十年来的中国，与毛泽东时期相比，的确有不少变化，特别，开始重视经济，放弃输出革命的对外政策等等，都是进步。但是，从十年前镇压西单民主墙开始，就令人预感到，当局可能并不准备在政治体制方面做多少改革。后来的发展果然证明了这一点。

譬如，改革以来虽然也承认，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是错误的。但同时又提出了四项基本政治原则。就内容而言，四项基本政治原则与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几乎完全一样。而后者正是 30 年里指导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政治原则。

又如，中国宪法上也包含有言论自由等人权条款，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至今还没有完全接受联合国人权宣言[The UN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事实上，就连学术自由这种与政治关系很少的基本人权，也还常常受到侵犯。直到最近，大学里还发生一些自然科学演讲由于政治干预而被禁的事。

再之，中国的教育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反知识反文化的政治原则的摧残，以致文盲在人口中的比例与 40 年前相比较，并无大的变化。今天的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产值中的比例，与毛泽东时期完全一样，它比同等经济水平国家的平均比例要低 30%~50%。愚昧有利于专制的政体。所以，摧残教育的真

正目的是不言自明的。

还有，近几年，当局经常宣传要安定团结，特别当社会上有不稳定迹象时，安定团结似乎成了最高原则。可是，对于中国社会中的最不安定的因素之一——内战，却并没有用这个原则去处理。至今，至少在原则上仍然没有接受“放弃使用武力”，以求结束已历时 42 年的内战状态。

围绕着上述种种问题，社会里一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1986 年的学生游行把冲突公开化了。由于学生明确地提出了社会的民主和自由。这就逼使当局在处治学生游行的影响时，采用了以下的两种理论：

一、中国文化中没有民主传统，也不会接受民主政体。老百姓对民主没有兴趣，给了民主也不会用，没有民主的承受力等等。

二，经济发达并不一定要民主政体。专制政体可能对发展经济更有效，适合于中国的正是政治上的专制和经济上的自由。

采用这些说法响应学生的民主自由要求，首先等价于公开承认现行的是专制政体，公开承认所谓“社会主义是人类最民主的社会”不过是一种欺骗。至此，马克思主义怎么还能维持它在中国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呢？至于上述的第一种说法，可以简称为“民主守恒律”，即一个社会的民主含量是不变的，如果原来没有民主，它就不可能变得民主。显然，谁也没有证明过这种守恒律，因为它的反例太多了。这种说法拯救不了中国的专制，只能令人一笑。

第二种说法，确实好像有些事实根据，似乎有些政治专制、经济自由的国家是取得了成功。然而，相反的例子也是有的。所以，问题不在于列举例证，而是应当回答，维持中国目前的专制政体不改，它是不是就能走上自由经济的路？1988 年的事态，进一步证明，答案多半是否定的。

首先，中国的专制政体，与其他政治专制，经济自由的国家不同，它似乎很难完全接受自由经济体制。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专制政体，是与所谓公有制，即官有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正统意识形态，原则上不与自由经济所必需的产权私有体制兼容。尽管 1988 年的强烈通货膨胀已经证明，只进行价格体制改革，不进行产权体制改革，是行不通的。但当局所采取的对策反而是“利用政治优势”，就是又退到毛时代的“政治挂帅”的老路上去。

其次，中国的专制政体已经一再被证明是缺乏效能的。只要看一下共产党本身的腐败就够了。经过十年的整顿党风，其结果却是“不正之风”年年高，原来还只是党员领导以“不正”的手段多占住房，如今已是大规模的“官”倒了。至少没有理由再令人相信，这样的专制政体会有能力治理它自身滋生的腐败。至少就这一点说，也需要更有效的舆论监督，更独立的司法系统，即需要更多的民主。

中国的希望正在于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对当局的盲目希望，开始意识到只有对当局采取公开的批判、监督立场，才是推促社会进步的有效方式。最近，广州一家报纸的副主编明确地说，他办报的目的，不是当共产党的喉舌，而是要成为广州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的喉舌。前不久，当局会严厉地追查有关“领导人及其子女在外国银行有户头”的消息，藉以压制广泛流传的对领导人的议论。然而，其结果反而是使得以下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公民有权评论领导人，对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所有高级公职人员，也无权不受公民的监督。“不能犯上”的老观念，正在瓦解，民主的意识正在扩散。

随着民主意识的扩散，必定会形成对当局有越来越强的制衡力的集团。事实上，一些雏型已经出现。目前，各种行业各种社会阶层中的非官方活动，

如联谊会、讨论会、俱乐部等等，都开始起着不同程度的压力集团的作用。民主不再只是一个口号，已经对当局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的目的就是要用非暴力的方法促使当局逐步接受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改革。目前，议论得较多的改革课题有以下几点。

一、保障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释放魏京生等所有政治犯。

二、实行自由经济体制，逐步实施包括产权改革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

三、发展教育。放弃愚民政策，推行与中国经济水平相称的、必要而且可能的基础教育。保障大学的学术自由，学术多元化。

四、监督公职人员。利用公开化、透明化的方法铲除腐败。

五、结束内战状态，实现海峡和平。海峡两岸宣布互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从相互敌对变成相互和平竞争。

六、实行法治，修改宪法。取消一切以阶级斗争为原则以实行专制的内容，制定一部实现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中国的宪法。

中国的民主已走过很长的艰难的路，看来还将走相当长的艰难的路，也许要十年，也许要一代人，或更长。但是，无论如何，民主的趋势在中国已经形成，很难再完全逆转了。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恩赐的。这是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这也是四十年来的历史，这也一定会是今后几十年中的历史。正因此，我在被许多失望所困扰的今天，对未来仍然抱定了希望。

（作于 1989 年 2 月，曾在当月香港报刊上登载；2012 年 4 月 10 日重载于《多维新闻》）

[\(返回目录\)](#)

论中国人权

非常高兴有机会通过电话谈谈我对中国人权问题的看法。很长时间以来，在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人权这两个字眼似乎很少有人问津。在国际上中国人权问题的命运也是如此。这就似乎形成了一种人权不适合中国的印象。有人甚至说人权的提法只适合于其他不同的文化背景。

以我所见，近来的趋势证明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人权的概念是个很简单的概念。正如世界人权宣言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人，不论他(或她)的肤色、种族、语言、宗教和政治信仰，都应该享受这种权利。这种人权的概念不应有任何西方与东方的区别，人权在任何地方都应该一样，尽管这种人权概念在中国很少涉及，但问题是一模一样的。

毛泽东时代人权在中国的情况和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是非常相似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都鼓吹同一种阶级斗争思想，其结果也都是一样的。例如，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约有50万人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惩罚，有些人丢掉了工作，有些人被送去劳动改造。我承认，经过十年来的改革，人权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有了改善，但问题仍然存在。许多严重违反或侵犯人权的事件在中国仍然不断发生。在过去十年里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79年对民主墙的镇压，接着就是1983年的反对精神污染运动，1986至1987年对学生游行的镇压，以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这些运动表明阶级斗争的思想仍然被利用来侵犯人们的基本权利。

至今，尽管中国宪法的某些条例规定了一些诸如言论自由的人权，而这些权利实际上并没有付之于行。例如，中国政府仍然没有亲口肯定对世界人

权宣言的赞同，也没有完全接受宣言的条件。某些与政治毫无关系的人权，如国际学术交流自由，也常常遭到干涉，这样，一个人就不能在正常的条件下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在国内，有时自然科学或技术性的学术报告因为政治原因而被取消或删除。这些事例都表明在中国许多违反人权标准的事件仍不断发生。所以在我看来当前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改善和保护知识分子和一般人的基本权利。对我来说，当前最重要的是言论、新闻、集会结社以及信仰自由。

近来我看到国内很多人对要求释放政治犯的问题反应强烈。这将对尊重人权问题的又一个考验。特别在今年社会主义中国成立 40 周年之际，人们感到这是促使政府做出些行动的好时机。但到目前为止政府还未做出任何行动。为此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努力。

这里我想说明的一点是，要求人权并不是与改革相违背的东西，而是与改革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对人权的保护将是进行经济改革的必要条件。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同样要求人们在经济和经济体制中享有平等的权利。这两种平等权利是不可分离的。在我看近来腐败现象的恶化，特别是某些领导机构内部的腐化证明，没有民主人权，将不可能开创一个对发展经济有利的环境。所以，经济发展和人权是不能分开的。

另外一点，对人权的保护也是建立一个稳定社会所必须的。近来有人说要求人权民主将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而事实并不如此。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而很多人遭到了不同程度上的人权侵犯。每个人都会记得这些的，就像昨天刚刚发生一样。这并不是由于民主和人权造成的，而是由反民主反人权所造成的。这表明民主人权正是促使一个社会稳定的因素。

还有一点，我认为，无论在区域或全球事务中，人权是很关键的因素，它直接关系到维持一个和平的环境。如果一个政府在内部事务中不能尊重人权，人们很难相信它在国际事务中能够尊重和平原则。国内与国际事务是联系在一起的。今天在中国要求人权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人权不得到改善，中国将不可能现代化。

当代国际环境是相对乐观的，对人权的关注已成为世界潮流。这是我们在亚洲及其他地方所听到的最大呼吁。在这点上，中国的人权问题已加入了这个潮流。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大陆内为人权的奋斗并不是孤立的，它是符合世界人权运动潮流的。如果我们做好了，我们将会做出很大贡献。同时，我们也将受益于世界范围内的进展，因为我们已成为这个潮流中的一大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今晚我敢说，我对中国人权的发展充满信心。

我就讲这几点。谢谢你们。

（王新年根据 1989 年 3 月 22 日电话录音整理，刊载于 1989 年《中国之春文选》。）

[\(返回目录\)](#)

从北京天文台看中国民主进程

——纪念“五四”70年

中国的改革正陷入困境，这是目前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现代化和民主化，进不得进，退亦无路。眼睁睁看着周围具有相同民族或类似文化的国家或地区正纷纷向发达行列迅速走去，眼睁睁看着时间在大陆正白白地流逝。从五四到如今已经流逝了70年，还要再流逝多少年，中国才会有转机？每想起这个问题就不禁令人焦急、痛心、失望。

为了不使这篇纪念文章显得过分悲观，我不准备再多谈中国的民主，而是回顾一下300多年来与北京天文台有关的历史。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最有价值的作用是倡导将民主和科学注入中国文化。这二者正是中国传统中所缺少的，或不足的。然而，就民主和科学二者在中国的注入进程来看，五四大体正好分别是它们的起始期和完成期。意思是，1919年，中国刚刚开始她的民主政治的进程，而那时，中国已开始全面地接受现代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冲突过程已近结束。

300多年的科学注入史，许多都与北京天文台有关。公元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是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之始（利氏的墓地现仍位于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内）。现代科学一开始就遭到抵制，明末冷守中等反对用“西法”制历，认为只有宋代理学的“皇极经世”才适用于中国历法。这是首版的“中国特色”论。所以，当时仍沿用陈旧的大统历和回回历。

1610年的一次日蚀，用传统方法预报错误；1629年的日蚀再次预报错误。而徐光启用西法预测则十分准确。这才迫使崇祯皇帝接受西法，编出《崇祯

历书》。不过，由于守旧派的反对，“崇祯历”实际并未使用。直到明亡清兴，顺治时期才将该书改名为“西洋历法新书”刊行，并用以制历，名为时宪历。这可能是“西洋”近代科学第一次进入中国社会生活。

好景不长，顺治一死，反对现代科学的势力再度得势。大儒杨光先上疏朝廷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既反对西洋人，又反对西法，可称为第二种“中国特色”论。在这种特色论下，以西法制历的李祖白等五人被处死。他们是北京天文台第一批为中国的现代化献身的人（研究天文的人由于不见容于统治者而被整肃以至处死，中外历史中均不罕见）。

康熙亲政后，情况有好转，再度使用以西法为基础的时宪历。康熙是历史上最喜好科学的皇帝，他早年直接向传教士南怀仁学过西方天文学。《历象考成》和《康熙永年历》两本大体还具有当时西法的水平，是那一时期的代表。

自雍正上台始，又开始了一个长达百余年的排斥科学的时期。闭关锁国，科学交流被切断了。占据学界主流的干嘉学派，只事考据经典，无兴趣于观测科学。直到 19 世纪，该学派大师之一阮元还不接受日心地动说，写道：“至于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这又是一种以“经”“道”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中国特色”论。

鸦片战争后，上述意识形态才失去威力。天文学家李善兰驳斥阮元说：“尝精心考察，而苟牵经义，妄生义论，甚无谓也”。李善兰于 1868 年到北京任同文馆天文总教习，从此中国再度系统地引入西方天文学。而真正再度使用西法制历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了。民国成立，改钦天监为中央观象台，主持制历。

由于时间紧迫，民国元年及二年的历书还是用旧法计算的。《三年历书》才完全依据现代天文学而制。从此再没有反复过。就是当文化大革命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时，所用的历法却还是“资产阶级科学”的。

《三年历书》的编制者高鲁和常福元在“凡例”中写道：“本年历书系用东西各国通行之法推算”。“东西通行之法”一语极为重要，它标志着中国社会终于认识了科学规律（推算之法）的普适性，而无所谓“中国特色”的科学规律。这就是为什么五四大体可以看作中国传统与现代科学冲突的终点。起点和终点都发生在北京天文台。

这一段科学注入史也许有助于我们从更长的历史背景上来理解今天的民主困境。第一，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似还可以不必太悲观，与 300 年的科学注入史相比，70 年的民主注入时间虽已不短，但还不致令我们完全气馁；第二，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标准，像科学的原则和标准一样，是普适的，无所谓“东法”或“西法”之分，只有落后与先进之分，正确与错误之分；第三，阻碍现代化和民主化注入中国文化的错误观念，与阻碍科学注入中国文化的错误观念是相似的，即各种版本的“中国特色”论。

北京天文台今年将纪念建台 710 周年。自古以来，中国的皇帝往往要祈天断事。自从元朝建都北京之后，北京天文台一直为历代皇帝充任这类探察天意的角色。五四之后，天文台就没有这种功能了。不过，天文台的漫长历史仍可为许多人，特别是今日之断事者，提供借鉴。勿师西法论、上下易位论、离经叛道论等不都有其“先驱者”吗？愿这些历史能为今日的断事者鉴。

天文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背倚宇宙俯视人间的观察点，由这里看去，星移斗进，“法轮”常转，万物概莫能外。科学的“法轮”已转进了中国，民主

的“法轮”也在转了，今天的困境不过是它启动时的嘎嘎之声而已。这就是我的信心和力量之所在。

（本文作于 1989 年 4 月 4 日，最初发表在《北京之春》2009 年 04 期）

[\(返回目录\)](#)

离 家

李淑娴



1989 北京我们的新家，是倾两人各 37 年工龄积余收拾好的，第一个像家一样的家。大约 3 个月后就被迫、不能带出任何地离开，至今也回不去。

（相片中方、哲和我）。——李淑娴

我没有料到，我们那样匆匆地离开家，就很难再回去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有的一个像个家样的家；这是我们婚后长达 18 年分离之后才建起的家；这是为庆祝我们终于团圆，我不惜倾全部积蓄而装修好的家。

1987 年，励之“罢官”彻底回家，孩子长大了，励之母亲年老也来同住。这几年，我们都进入科研教学。励之任国内外好几家杂志的编辑尚未被“罢”，大批书籍杂志源源而来。原已拥挤的北大蔚秀园住房就凌乱不堪。中国大学的教授、讲师没有办公室，都是在家里备课。我只能在老人、孩子都入睡后的夜间，准备我的讲稿。

与十三结下不解之缘

适逢 1987 年春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刚被开除、革职的励之变成中外记者采访的对象；虽然按上级“打招呼”的要求，我多次婉拒他们于门外，但机灵的香港记者却往往以学生样的身份挤进门来；我们有一些全国人大代表的朋友，其中有的仍然趁便来看我们。

不知道在什么机遇之下，我们家住房的问题竟然受到关注。在我们不存奢望的时候，科学院院长亲自过问此事。按照励之的级别，根据科学院正在分的几种可选择条件，稍经协商，我作了选定。这就是我们离家出走时的住房。

它座落在科学院南小区，地址房号是：保福寺 916 楼 1101 号和 1102 号。这是一个新建区，据说，原来向上级呈报的计划是为“博士后”的年轻人建的，所以建材因陋就简，每户住房面积都不大，全楼只有为数极少的几户是三室一厅，位于最抢手的楼层。这极少的几户当然是为领导或老干部准备的。因此，分给我家的是两个房号。本楼像我们这种情况的不只一家。

916 楼是一座 12 层高的楼，我家住第 11 层最顶头两号。“顶头”是我选的，为了清静。这次总算没住顶层，1101 恰恰又是“13”（按二进位表达式），看来，我们的命运和 13 这个“不吉利数”结下不解之缘。

我并不太喜欢这个新家的环境。统一格式的几栋高楼，比肩站立在马路两边，已经太挤的楼间，

还有尘土飞扬的工地和拥挤的利伯维尔场，这里除了买菜方便，别无优点。不久知道，916 楼正南不出 500 米处就是公安局海淀分局。这点我毫不在意，只是处处感到从地面到天空，连同空气都不能与北大相比。

在北大我住过的几处，室内虽然拥挤，但时时能听到北大的声息。北大那种特有的时而宁静，时而喧嚣，时而松散，时而激荡的呼吸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再有，北大无处不在的绿荫，北大的湖光塔影，未名湖畔的晨读，大饭厅里的鼓噪，都点点滴滴洒在我的心里。

向北大问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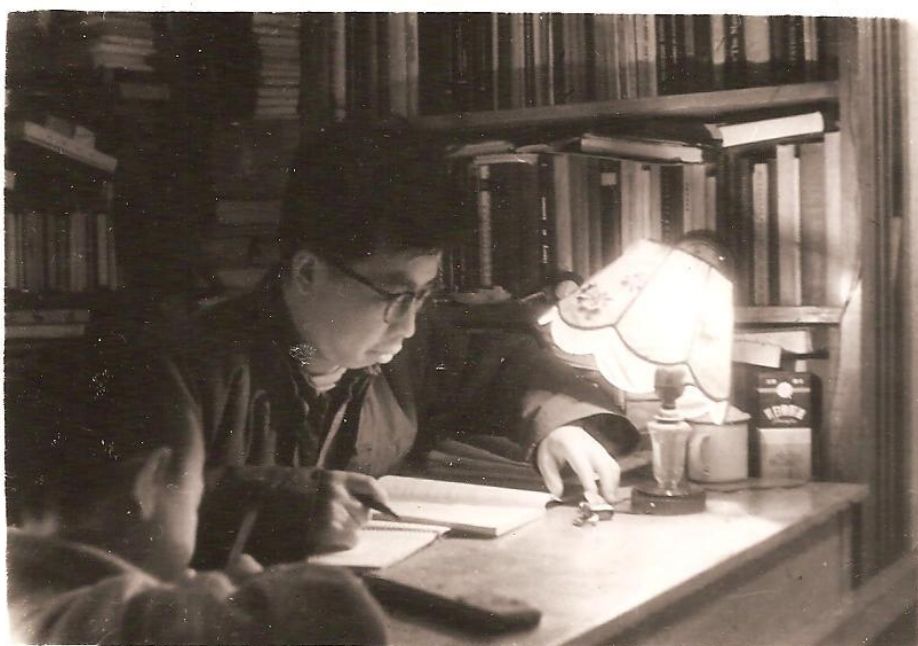


图1 在北大16楼（我在1968年3月25所摄），他和大儿子晚上伏案读书和做功课，这是一张向北大再借的一张“二屉桌”。屋内除了床就是书，书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李淑娴

不管是春、是秋，也不管是冬、是夏，每天大清早，我从睡梦中醒来，套上一双球鞋，穿过迷蒙的晨曦，大步跑一程燕园的小路，或是留神快走在沿湖的积雪大道上，然后爬上北大钟亭的小土坡，深深地吸进湖水滋润着的校园空气，向我们的北大问好，向每一棵树问好，向鲜花，向小草问好。有时，我再下到土坡旁的草地上，做几段体操；有时，我信步走到湖边的花神

庙，就近看看湖水下的游鱼。等我快步往家里跑时，正是吱吱喳喳的孩子们穿过校园上学的时候了。这样，我夜读的疲乏、住室内混浊的空气，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北大不管是我处于顺境，被选作“模范生”和“三好学生”的时候，也不管是我被标为“右派”，沦为北大贱民的时候，我都会把我的欢乐、我的自豪、我的不解、我的担忧、我的悲伤、甚至我一时的绝望，向北大倾诉。每当我高兴得或忧伤得坐不下来时，会推上破旧的自行车，或漫不经心地骑上去，在北大游荡。

我熟悉学生区那有规律的或挤或松；也知道年青人阵发性的调皮捣蛋，众多人聚在一起的热烈争议，双双情侣排他性的在一角细语。校内小商店购物，新华书店来了哪种新书？北大小小邮电所工作人员的埋怨，埋怨这里实在比海淀正式邮局的工作量都大得多，信箱有时满得往外冒，……这就是北大的学生活动聚集处——“三角地”。

我熟悉北大，北大也熟悉我。在北大从做学生到做老师，一住 35 个年头（1952 年～1987 年）。本系、外系不少长辈和同辈人认识我，图书馆的人认识，就连门卫也认识，近来保卫科的人想必是认得更清楚的了。我只要在北大转一圈，北大人心里的温度，北大人都在想什么？北大的情绪，北大的喜、怒、哀、乐都会和我交流。更有时被人拉住，站在路边，三言两语，尽诉所想。我的精神在北大这个大的包容量之内，得到更深的陶冶，一次次达到新的宁静。

好在，保福寺离北大不远，我又在北大讲课。所以，搬家没有使我离开北大校园的生灵，以清新明丽之气注入我的胸怀，我得到新的平衡。

都说中国的事运转得很慢，也不尽然。1987 年 3 月开全国人大，4 月我

家就分到新房。5 月，我盘算着，怎样按我们的可能，把新房子安排得最合用。我取出所有的存款，预计可能再有的收入，挖空心思，寻找财源，有生第一次试图打扮一下新分到的住房。

在励之被“罢官”、被“批判”之后，我竟然有这样的兴致，使有的人惊奇；也有人说我傻，因为房子是公家的，何必作这样的投资。但此事却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赏识。这说明，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重视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又是什么。

说来也可怜，两个受过良好教育、有教授头衔（其中，励之还是学部委员，有长长一串学术职务），有多本著述问世、合起来已有六十六年工龄的人，总共积蓄不足五千元人民币。还好，有兄弟姐妹的帮助、朋友的借款，我在装修的期间凑足了一万元人民币（以 1988 年我们两人的月收入计，这相当于政府付给的实际月收入的 25~29 倍）。这刚刚够付装修的首次必须费用。就这样，一年多，再用我的讲课附加费，我们的年终奖金，主要是稿费额外收入，才如期还清了债。

这个新家既没有地板，也没有像样的卫生间和厨房，更没有任何一件稍稍华贵的家具，但在同辈身处中国大陆境内、又不为官的知识分子中，它不仅显得很好，大概可以称为是绝无仅有的了。

1988 年 8 月，我们双双去了一趟澳大利亚。经过香港时，励之又完成欠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黄林秀莲学人”的邀请计划。用这些收入，我们买了计算机；热情的澳门银行家，为酬谢我们在澳门的访问、演讲，给计算机配齐了打印设备。

这样，如我们所期，这个家也是我们的工作室。我布置了书房，有围在

墙壁、顶天立地的书橱，有研究生讨论的地方，有较多人聚会的场所。我们原打算在这里好好做一些教学和科学研究。励之不只一次向他的研究生和同事说：“等中国的计算机系统可以和世界联网之后，出国不出国就没有差别了，我还不愿意把时间化在路程上呢！”

建家等了十八年

1988 年底，我以超工作量完成教学；励之的论文数量、质量在天文台都位居第一。我们拿到一笔年终奖金。用这笔钱，买了中等的化纤地毯，只够铺一半房间的地面。那天，正逢几位年轻人来，看我们在冷风里忙上忙下就七手八脚帮忙铺好。这样，客厅立即显得明亮而雅致了

的确，作这样的投资，我们是想找回那些失去的时间，延伸我们的工作时限和工作领域。

因为，自从我们在风雨飘摇中，在北大校园学生区 16 楼建立了那小小的家之后，算是安安顿顿地在一起过了整整八年。此后就劳燕分飞，天各一方。每年的“探亲假”12 天，有时还要分头去看孩子，再相会。近几年，他因开会、因事回家，相聚的时间多一些；我们又尽量把讲学、出国的机会安排在一起，朋友们也帮忙促成。但是，总不像有个家。这次我们算真有一个可以工作、倾谈、可以无言相对的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了。

等了 18 年，重建这个家，18 年后的时间分外可贵。我们几乎每天工作到深夜。埋头工作的同时，我们有自己生活的原则，我们有自己作为人的尊严。这促使 1989 年初，在大雪纷纷的年假日，励之起草了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公开信，呼吁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期望以此使中国迎来一个和谐、

繁荣的 40 周年。这也促使我们在接到美国总统 布什(Bush) 2 月 26 日晚宴的正式请帖之后，欣然前往。

看来，这样的生活也是不允许的。1989 年 2 月 26 日，布什晚宴我们受阻，就是一个讯号。之后，出现了更多的异样：

比如，不止一次有陌生人打电话到我家，说找派出所或公安分局；也有我们的朋友从飞机场向我家打电话，却由派出所或陌生人接了去。有时，突然电话铃响，只要我们两人之一去接，报了名字，对方马上就挂断。

监听、跟踪不断

又比如，我习惯清晨锻炼身体，在新居附近清冷而光秃的马路上，人们此时总是行色匆忙，但多次有一位壮实的男子守在楼角正对的街口了望，眼光随着我穿过横街。电话被窃听，我们早就知道，作得如此露骨，则是近来的变化。干事人的笨拙和疏忽，想来不至如此；这已超出特工的需要，只能解释为有意恫吓。

在清冷而冷清的街角伫立、观察如我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教师，只能解释为认人。

再有一件事，当时引得我大笑不止。本区居民委员会在楼口守候我好几天，问开电梯的小姑娘、问我的儿子。终于在 4 月 11 日晚，几位自称居委会的家庭妇女样的人找到我家，一定要开门进来。

晚上，我们需要安静地工作，少有不速之客。在她们大声申明“有公事”情形下，只好请进。进门之后，仔细看了我的家和我，问明我的确是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说是来要我“作计划生育计划”的，叫我填表。我听了大笑

说：“不用作什么计划，我有两个大大的儿子，我已经 50 多岁了，你们可以放心！”她们还盘问我另一个儿子的去向，我一一回答，笑着把她们送走。

这个当时被认为笑话的事，其实已经露出破绽，只不过没有引起注意。因为，我家的户口没有迁到这个区，还在北大。共产党统治下的户口管理严格，城市居民紧紧地束缚在户口本上，愈是切身不可缺的东西，就愈密切地联系于户口之上。我每月只能到北大领取各种必须的票证，要在北大买米、买粮、买各种定量的供应品。

好我在北大工作，而所有的商店几乎像学生一样上、下班，我从北大回来，不一定能赶上本区的供应时间。一切“公务”在北大办不会给我带来不便。但是，本区居委会的名单上绝不会有我家，结论只能是，她们是受命来对我进行核对，并近距离仔细认人的。

事实愈来愈明显，我们在中国政府的“另册”中，已经又“升级”了。为了不使 1989 年 4 月中旬开始的、以学生为主的中国民主运动，背上我们的“黑锅”，我们自始至终都小心地避开。

毋庸讳言，我们是支持学生的民主、自由要求的。长期以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一言一行，对学生是有影响的。我们所说，既有逻辑，也合乎情理；我们所做，既不是为了狭隘的私利，更没有超出宪法允许的范围。

但是，中国共产党要是想整人，有时不直接言明真正的原因，而会不顾事实、或编造出“真相”来为所谓的“阶级斗争”服务。正因为中国政府否认中国有政治犯，就不得不掩饰、歪曲、编造；即使被称为“刑事犯”，也得不到公正的公开审判。40 年来，无一政治运动例外。仅一次“反右”，就有约 50 万名戴上“右派”帽子的标准政治犯，被默默无闻地残害，劳改，发

配，…… 如今，对我们如此，对广大的学生、市民也是如此。

上了黑名单

所以，运动刚刚开始不久，当局在新华门打了人，就按“既定方针”毫无逻辑地编造小字报，嫁祸于我。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的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府的各级系统，层层传达，点我们的名，称之为“黑手”。

好心的、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有从中原大地、有从边远乡镇、有从海外，连续不断打来电话。有询问的、有出主意的、有愿意接我们去躲避的。本地的热心朋友，有登门看望的；有的干脆说，他已准备了车，请我们收拾必要用品，到一个地方暂避些时……。我们为这种患难中不避嫌的行为深深感动。

几十年来，人们都知道，大的运动卷来，最后都会按照当政者的意愿进行清算，更何况我们已经被点了名。我们把这些人和事一一记在心里，却仍旧在家内安心地作我们的工作。

5月3日，袁木、何东昌等，为当时天安门僵持的局面，主持记者招待会。明显安排好了的，由中国官办记协的人发难，点方励之的名，然后袁、何二人唱起双簧。对方励之或早、或近的有关报导，任意编排、歪曲、造谣；用说谎、愚民的方式掩盖方励之一再提到的人权原则；用狭隘、煽动的语言，断章取义、颠倒是非的方式，指方励之“没有爱国心”、“损害国家利益”。

这段相当长的双簧，已经是公开对我们进行恐吓了。有的记者在会议进行中就接通了我家的电话，担心我们已被逮捕，足可见当场的腾腾杀气。但是，我们还是安心地在家里，并且准备就有关我们的不实之辞进行答辩，或

诉诸宪法保证的法律。

戏剧性的一个起伏之后，形势更为紧张。更为紧迫的忠告，更急的邀请，……接踵而来。也有人用电话对我公然地威胁。但我们仍然在家里。

5月23日，励之要去大同开“宇宙学”的会，他是会议的主要被邀请人。前一天，一位好心的年轻人，满怀忧虑地找到我，悄悄地向我说：“李老师，我从高干亲友处，得到可靠消息，内部文件很厉害地点了你们的名，一再提‘方、李夫妇’，你难道不能劝劝方老师不去开会吗？别人不敢劝他。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危险中。这时候，只有家人在一起才好一点。”

我相信这位年轻朋友，但我知道，很难改变励之对人已作的承诺，何况会议主持人及承办单位已多次来电催促。我把消息转告励之，提醒他是非常时期，一到大同就给我电话，务必保持联系；又希望他注意北京的变化，回家时先看阳台上有没有我作的记号，也许我已被捕；再约定，假如我被迫出走，先到山西太原，去看正在他二妹家的婆母，我们将在那里相会，是福、是祸都在一起。

当天，他在车站等了半天，为了遣散外地学生，已售出票的车停发，却不断发出向南、不需验票的车。他又回到家来，继续写他的论文。

充满不安与恐怖

5月24日一早，励之又出发去车站等。临行，我一半认真、一半玩笑地向同去开会的年轻同事说：“我把他交给你了！到时候要原样交还。”

这一天，励之在拥挤的售票厅站了一天，北京火车站简直像战争期间逃难一样。他在下午给我打来电话，还没走掉，可望晚上有车。在车站，他遇

见已是海外某小国国家级高官的原中国人，问励之是否有意去南方，或任何时候到此小国，表示欢迎。励之谢了这一片盛意，说现在首要的是去大同，那里的会在等他。

这一天，家里也不平静。我的亲人，我们众多的各界朋友，都先后来到。大家感到北京的空气里充满了不安与恐怖，但不能预测究竟会发生什么？大家都感到，某种愚昧、顽固、贪婪、恐惧，聚集成一种没有理性的、充满丑恶报复心理的、仍然巨大的力量。我们家处在这强大力量的虎视眈眈之下。来一个人，几句话，都理解了，然后悄悄地匆匆走掉。平时爱问个没完的新闻界朋友，也沉默多了，并不坚持要采访。有的人，就是为看我们一眼；有的电话，就是为听见我们的声音；还有人特意送来一件纪念品；……我心力交瘁地守在家里，时时聆听着北京的声息，等着励之的电话。

5月25日一早，大儿子从美国打来电话，问我近来的身体。整个居民楼忧心忡忡，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人们在电梯中神情严肃，再无意于轻松闲聊。上午，某一西方记者来访，一定要我预测，中国当局会不会下毒手。我想了一下说：“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封闭时代，在全世界的密切关注下，我想他们不敢，总还不至于蠢到这种地步吧！”这与其说是我的回答，还不如说是一种希望。

要抓方励之夫妇

当天中午，大儿子第二次接通家里的电话，孩子急得走了调的声音从海外传来，他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我：中国当局已经把北京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说赵紫阳是叛徒，要清天安门广场，准备抓3~4千人，要抓40名知

识分子，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方、李二人。我不能相信这疯狂的决定。孩子苦苦说服我，这是好心朋友可靠的紧急劝告，命令式地求我快离开家，把爸爸找到，带上弟弟。

我收拾几件换洗衣服，带上中国内地旅行必须的粮票、现款，但找不到任何去火车站的交通工具。近来，为了阻止人们去天安门，当局已下令停驶多路公交车，中国人要叫出租车[Taxi]也很难。我只好求助于自布什晚宴事件后结成好友的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他迅速要了车到来。正在我将锁门离家的当儿，电话铃响，连接三通电话，一通是大儿子又来催的；一通是励之，他刚到大同宾馆；一通是意大利朋友，我告诉他，我即刻要外出，他将来可以从我们儿子处知道消息。

在火车站，我向林培瑞致谢道别。我说：“我不知道将要走到哪里，但首先要找到方励之。也许我们会在小地方走一走，把这股疯狂劲避过；也许这是一场虚惊，孩子听了谣言，我们去看看老人也不错。这样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回来我一定给你电话，把你的孩子带来我家玩。”

作为一个长期热爱中国，能说流利的中文（他甚至可以说中文相声），有很多中国朋友，又是中美文化使者的林培瑞教授，已经被 1989 年以来他遇见的种种事所苦恼。面对着莫明其妙被逼得弃家逃亡的我，他显得迷惘，带着几分忧虑地说：“我愿意提供一切我可能的对你们的帮助，祝你一路平安，希望能再见。”

不知会流落何方

在拥挤的售票口，小儿子想办法给我买到一张硬卧铺票，自己却突然决

定不跟我同行，要留下来。他的依据是，他不是政府要抓的人，他已经会照顾自己，而且，我们不知道会流落到哪里。北京是最了解全面情况的地方，也许，他在北京对我们更有帮助。我一下子发现，孩子长大了，懂事了。任何作母亲的，甘愿把欢乐、幸福和孩子共享，决不愿意让孩子分担不幸。我同意他的选择。

离开车还有两个钟头，我仔细审视我那长得高大、健美的孩子，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长大的。在我心里，他还是个大头大脑、厚敦敦的、不爱说话、很有自主性也很犟的男孩。

他出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励之家的这个大家庭中，是奶奶照顾下的第五个孩子，也就不那么“金贵”了。他出生前一天，励之被抓走，接着我因产褥感染再进医院，他没有母乳吃；又正值大暑季节，没有人有心思去抱他。等他睁眼看世界的时候，他不爱哭，总是自己躺在小车上玩，有时半天看不见人，他会努力欠起头和脚，弯成一个元宝样，一见到人，就笑了。天太热，有时因为着急，他头上的痱子痒起来，他还没学会抓痒，就把胖胖的小手放在头上，五指一起伸开，再一同收拢。他这种抓痒的方式，一直维持到他懂得大人笑他的时候。出生在困难中，他从小就比较有独立性。但我一直不知道，他心里有委屈。

母子连心

我永远记得一件事。那还是在他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他带了一串男孩到家里来玩，不知怎么起了纠纷，他们像开了锅一样在那里闹；我一个人在北京带孩子过日子就够心烦的了，又是刚刚“右派改正”、刚刚允许我上

台讲课，我恨不能一天当作两天用。当时，我没有问清原因，大声责备了他，可能还打了他屁股，说了他什么我已记不清了。但后来，在另一件我办他的“公案”时，他仰起挂满泪珠的小胖脸，愤愤地说：“你们（指爸、妈）都不喜欢我，连我的小朋友都说没有哥哥的好，你把他们赶走了！小朋友怎么想呢？”

孩子的话像灼热的针，扎在我的心里。比他大五岁半的哥哥，已经懂得父母的难处；而他正是淘气、也更需要爱抚的时候。我把精神的压力、烦恼和苦闷，无意地漏洒在他身上，是不公平的。

他在我不知不觉中长大，渐渐理解我们了，但我们也更忙了。“反自由化”运动之后，我们的家经常处在政治旋涡中。1988年临近暑期考试，有一天，孩子悄悄走到我备课的桌边，看我埋头工作，犹豫了一下，终于说：“妈妈，我给你说句话行吗？”得到我的同意，他接着说：“你这几天忙学生迎考，家也没回。你知道，爸爸在家里只有他的正经事，和我说话也少，简直没有话。有时候我真恨不得有人骂我、打我一顿，像小时候那样。我难受！妈妈你知道吗？”

听了这个安静的孩子难得吐露的话，我像被火烧了一样，站起来，抬起头凝视着孩子的眼睛，那是一双很像我的眼睛，此时它充满爱意和矛盾。没等我开口，他继续说：“我知道你们的处境，我只要你知道我的感觉，我明白你们没办法，还是应当由我自己在心理上来克服，我愿意长得精神方面更强些。但是，我想让你知道，让你懂得你的儿子。”

我深深地内疚，我欠这孩子太多的爱；不是不爱，而总是各种事阻挡我表达爱，而爱是要通过表达才能相互感知，达到交流，得到美的享受，得到

心灵的滋润，建立起人间和谐的关系的。

与爱子话别

我还没有机会弥补过去的损失，就要和孩子分手了。我贪婪地看着他那近1米87高而匀称的身材，圆圆的、仍然孩子气的脸。这嘈杂的北京站，竟成了我们母子话别之地。孩子迅速给我买来饮料和一点简单的饭食，代我找到一个座位，说一路很挤，十多小时可能吃不上也喝不上，要我一定吃下这餐饭。万般牵挂、万般无奈，几多离愁、几多歉疚，化成最简单的几句交待，不管将来活得多么艰难，也要作个正直的人，努力成为有知识、有本领、有独立人格的人。你的父母无罪，对自己的生活无愧，你会理解，将来会更理解，假如说我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欠下对你的爱，和欠下对我的妈妈的恩情。

孩子把我送上车，找到我的卧铺位置，放好我简单的小包。一向不会抽烟的孩子，拿出一包准备好的“洋烟”，一支支分送给我的邻座，含笑和他们搭讪说：“这是我的母亲，她身体不好，第一次去太原，请多照顾！”火车要开的铃声响了，孩子转身塞给我几包“洋烟”说：“你不知道会走到哪里，你们一点不会应酬，这也许有用。”又顺手把我刚才多给他的钱迅速塞在我的手中，喃喃地、有点突兀地说：“你们会比我还难。……其实，真要想抓你们，亲戚家早就监视上了。要说安全，倒是北京反而最安全。这里有那么多你们的朋友，你们在这里被抓的话，全世界都知道。这里有许多国家的使馆……”接着，他匆匆下车，在车窗外，一直看着我的眼睛，直到火车把我带走。

我等他们来逮捕

我到太原的第二天中午，资助大同会议的工厂厂长，亲自开车把励之送来，一同陪来的同事笑着说：“李老师！我完璧归赵了，请验收！”我把我知道的紧急消息说了，励之哈哈一笑，坦然地说：“他们‘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帮我作宣传，让我出名；假如他们真要逮捕我，一定是让我出更大的名，我等着他们来逮捕。”这话一半是说笑，一半是不相信，不相信当局会如此之蠢，同时也想让老人放心。但那位厂长想起，在整个开会期间，在行车途中，都有人紧紧相随。此时我发现，在楼外正对房间的几个窗口，都有小汽车。这种小城，在工厂宿舍区，难得小汽车长时间停靠，更何况同时有几辆。

励之是不信邪的，但就在当天下午，楼下的住户来敲门。平时为了安全，婆母一人在家时不开门，但邻居说一定要进来，因为他家厕所漏水，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楼上的原因。

太原是工厂城市，水不够用，居民楼只有一早和深夜才有水，家家都是凌晨上班之前，把一天的用水接在大的容器内。这个要进来的理由虽然不足，但邻居大声要求非进来不可，中国人是不允许有隐私权的，老人只好开门。邻居家老太太进来之后就不准备走，坐下来东家长、西家短说个没完。

一直等到励之妹妹下班回来，认真和她一同下去，查看她家并没有漏水的厕所，她也不以为不好意思。显然，她是奉命来的，虽然没看见我们，她可以在汇报中说：“方家老太太开门不痛快，他家一个小房间的门始终关着。”以此表示她的“尽职尽责”。

第三天是星期日，我们去不远的古迹——晋祠游玩。为了让我们安心休

息，励之妹妹夜间几次下楼作侦察，记下了车号。当我们一出院门，几辆性能很好的小车，始终轮流尾随；我们坐上去晋祠的专线旅游汽车，小车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我们进了晋祠，其中一辆白色小汽车也停在附近，开着引擎待命，有另外的人紧跟我们左右。回程前，我们戏谑地查看开着引擎的车号，恰是励之妹妹记下的之一：山西 01-17340 。

为了开个玩笑，我们改乘普通郊区班车。这种车，站站都停靠，郊区农民或携家带口、或肩挑背扛地上上下下，每站都很戏剧化。果然，破旧的郊区车已开出一段，转了弯，小白车才跟上。前面就是一个圆的叉路口，小车惟恐迷失，快速紧跟，但大车却呼哧着停在一个不起眼的路边树下。几个小车上的人跳下车，在几个路口都布署了人。忙乱一阵，才发现大车又歪歪斜斜地上路了。再到没有多远的下一站，小车差一点撞在大车直冒烟的屁股上，在大车尾又吃油烟又吃灰。

不能连累亲人

进入市区，这几个追踪者在路口下车，截住一辆黑色的出租车样的车，其中一人跳进车内；原来的白车用报话器说了几句话，然后开走。我们饶有兴味地在公共汽车上，看着这场不高明的把戏。到了励之妹妹的家门口，那辆一直追踪我们的白车和另一辆黑车，已一南、一北停在家门口。这辆黑车的车号不是本市的，看来为了对付两个手无寸铁的书生，真用了大力气！

1989 年 2 月 26 日的夜里，因布什晚宴，我们已领教过更大的场面，对太原的表演并不害怕。不过，看来大儿子的消息不是谣言；小儿子的判断也属正确。我们不能让亲人受连累，更不能让老人受惊，因此决定回北京。

几天的奔波，加上水土不服，我躺了一天。第五天一早我们道别了亲人，准备去火车站。刚开门，楼下一个中年妇女堵住门口正要进来。可能是楼下几辆车苦守一天一夜，未见任何动静，所以又派人来查看。送我们的孩子奚落地说：“不用你来监视了，人家走了！”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们也是在两辆车的伴送之下：一辆是白色面包车，一辆是白色小汽车。一到车站，那车上的人直接进了站长室。我们上了火车，那车上也有人上了火车。火车到丰台，已经是北京郊区了，突然有三个彪形大汉来到我们的卧铺边座上，坐着不动。一直看着我们在北京下车，他们混在下车的人流中，消失了。我想，大约是把我们交给北京的监视者了。

烧励之的模拟像

离家整整五天，香港和国内各地寄来一小叠汇条，都是请我转交天安门学生的，其中还有边防战士的。多么可敬、可爱的年轻人啊！信走得太慢，形势险恶，我已无法完成这些比钱本身重得多的嘱托，我也不愿取出这些钱。按照中国邮政惯例，无人取的钱，应退还寄钱者；我不放心，一一给他们写了信，告诉他们，若需原汇条，我立即寄去。

除了汇条，还有更多的信。我一一给了简单的回信。当时我没料到，这是我在此后一段时期中，能直接发出的，给中国大陆上不相识的青年朋友的最后一批信了。我也不能预测，这些信会不会给他们带来灾祸。

回家的第三天，六月一日，清晨刚起身，我们的记者朋友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柯达德先生，登门告急，不久，美国之音[V. O. A.]的潘海蒂小姐，也打来电话。他们说的都是，昨天在北京几个郊区县，如大兴、顺义等，

由政府组织的农民游行中，焚烧了方励之的模拟像。他们担心方已被捕，也想了解方本人的感受。

励之泰然地说：“我们前天晚才到家，我完全不知道发生的事，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在政府的眼目之下，他们是清楚的。烧模拟像，在国际上或中国历史上，我记得，只有国家级或领袖级的人享用过。我今天竟有此殊荣？他们要这样作，我不介意。”励之照样去天文台上班、答研究生问。

在天文台，有人相告，送励之的那位厂长离开太原后，被公安车紧紧追踪，直到中途停车休息，公安车才发现有误而放弃。这使我想到，为什么他们要反复核对，真也笨得可以！

干脆英勇就义

6月2日，在美国的大儿子来电话，我简述了一切，我认为当局有意逼我们，作出错误的决定，他们好利用。我们离开北京一共五天，关于我们的谣言已经满天飞，诸如，已经出国，已经到了香港，逃命去了，……最后我说：“我们等他们来抓，要出国，也等将来光明正大地走！”孩子在电话里大叫：“妈妈！你们千万千万不要作这样的‘英雄’！为什么要以这样‘英勇就义’的语气说话？妈妈呀！你快答应我，不要作无谓的牺牲！”我安慰他，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中国不至于如此黑暗。

也许，国外得到的消息更多、更正确，国外打来的不只一个电话，有外国朋友，有出访的中国朋友，都担心我们生命的安危。也不断有记者来，有的是看看我们是否还在，有的一定要摄下照片。气氛急迫而紧张。

上午，励之照常去天文台；下午，我如约接通林培瑞教授家的电话；他

和夫人琴（Jean）带着两个可爱的孩子来我家玩。朋友相聚，也提不起精神，更无玩兴，谈话离不开天安门。只有他那淘气的小儿子弥敦道（Nathan），看上了大客厅墙壁上挂着的一柄宝剑，那是 1988 年的最后一天，一位病重的老人，专门托人登门送来的礼物，这是他家祖传的纪念品，愿送励之保存。

这两天，北京人是数着钟点过日子的。一辆吉普压死市民的事，在人们心上投下浓重的阴影。6 月 3 日晚间的新闻联播，已经杀气腾腾，人们不能入睡。在这西郊的科学院宿舍区，住得较近的邻居，悄悄地交换看到、听来的消息。人们的心，密切关注着天安门，但愿快快天亮。

他们真的杀人了

半夜，电话铃可怕地响起来，一个稚嫩的、似乎存在我记忆里的、南方口音男孩子的声音急促地说：“李老师，不要问我是谁，我是北大的学生，同学们叫我一定要打通这个电话。我好不容易、冒着火光和枪声来打这个电话，就是要告诉你，我们亲眼见到，军队和武警已经杀人了！他们杀人了！这是真的！在我边上一位清华的学生，被打碎肩胛骨；另一同学颈部中弹，被打穿大动脉，血流如注，马上就要不行了。”我被这消息弄懵了，一再问：“是真的吗？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对方的孩子似乎着急起来，更快的说：“是真的！我亲眼看见的！你那里能听见枪声吗？现在仍然在放枪。我们什么事也不要你做。只希望，你和方老师平安。杀人之后，他们不会放过你们的。……”孩子哽咽着：“老师，多保重，再见了！……”放下电话，他又忙着救人去了。

这时，我才听见，在北京深深的夏夜，远远地传来一种沉闷声，伴着断

续的、似爆竹的声响。我觉得，要做点什么，一阵揪心的胸痛使我浑身冰凉。楼道里，虽然家家都不开灯，但家家都没有睡。

接着，第二通电话又响了，是一个更成熟的声音，简单的通报，在他所在的地方，可靠的统计：有 20 人被打死，有两百人受伤。第三通，是一个东北的、似曾相识的口音，向我通报：在他附近的统计：50 人被打死，几百人受伤。……。快天亮了，又有人报：死 100，伤 1,000……。每一个电话的最后，都是忧虑而深情地说：“不要问我是谁，希望你和方老师珍重，平安。”

我觉得，天也变了，地也变了，这是不是一场梦？一场恶梦？一场该死的、罪恶的梦？！电话发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是来自那罪恶的屠杀场。也许，这是某个年轻人最后一次和人世间通话。他们报出的每一个数字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啊！是一个年轻人的心啊！。

盼来 6 月 4 日的黎明，楼道里出奇地安静。既没有平时孩子们每逢星期日在电梯里的喧闹，也没有大人相约买菜，和为假日烹饪的忙碌。彻夜不眠的人们，在楼道相遇，不打招呼，只睁着干涩的双眼望着前方。

中国大陆的人很熟悉这样的表情，那是当大难袭来，人们掌握不了自己命运时，常有的表情。为了包裹起自己的感情，不让它流露到不能自禁；也为了防止有一类人，用任何一句话编造是非。

一个我很熟的北大学生，打来电话。他是听了 6 月 3 日晚杀气腾腾的广播后，想去找同学回校的。走到六部口附近，无法前进，亲眼目睹杀人的惨剧。他边说、边哭，声泪俱下：“你知道吗，阿姨！我到了那里，我亲眼见到，坦克和装甲车开过来，横冲直闯，他们从车上无节制地向人群开枪。路边的人，站得好好的，也没叫口号，也没唱歌，军车上的人就向人群扫射。

我亲眼看见，同学们就这样倒下去，脑浆迸裂……。我们回到学校，不少同学身上，还留着死去同学的血和脑浆。太惨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向人群开枪？”孩子说不下去，而且颠三倒四。显然，他拂不去这血淋淋的惨像，他的心还在那可怕的屠杀场上。抽泣一阵之后，他说：“北大的老师彻夜等在校门口，现在他们去学生宿舍查看，不知道我们会失去多少同学？……”

一定要保重

快到中午时分，北大一位教师打来电话：“李淑娴，我告诉你，据红十字会确切通报，昨夜、今晨，学生和市民共死亡 2,600 人，伤 60,000 人。这是官方承认的红十字会报的，不是谣言。今晨，全体在校的教员，列队迎接能回来的学生，学生们回来都是歪歪斜斜，人数不多，太惨了！我们和学生，抱头大哭。听说，清华大学这次牺牲最惨重。北大究竟牺牲多少，还没统计出来。我只想提醒你，那些人已完全失去理性了，什么事都可能做出来。希望你们要多保重。”这声音已经收拾起巨大的悲伤，充满了憎恨和愤怒。我明白，这时候给我打电话，又是经常上了我家公安局录音带的声音，对他们危险的。这样冒险通报，就是告诉我实情，你们要多保重，这字字千金啊！

谁都无心吃饭，上午，励之仍然去天文台上班。中午，励之刚回家，林培瑞来了，他红着眼圈，戴着黑纱，两天不见，他好象瘦了、也苍老了。大概每人都是这样。他刚在中国人民大学门口，听学生诉说。他欲哭已无泪，伤心地站在那里，也站不住，直倒换着双脚。停了一会儿，他哑着嗓子说：“你们都知道了！真没想到……我见到很多现场实拍的照片，看见了学生

们……，太惨了……”他盯住我看了一下，大约我憔悴得十分难看。我指着
他臂上的黑纱，他黯然说：“是学生们给我戴上的，我就是要戴，我要有一
点表示。”我小声、愤怒地说：“谁也想不到，想不到他们竟这样凶残，这
样愚蠢！是愚蠢！……”这时，励之的学生送文章来了，又来了什么人。

为了不打搅励之和研究生交谈，我请林培瑞进了里屋。他从伤感中醒过
来，关切地说：“你们若有任何困难，需要我帮助，我一定尽力，你们不用
客气。”我说，在这时候，和我们太密切，可能会面临麻烦。他却提高了声
音，真诚而难过地说：“现在我什么也作不了，也坐不下来作事，中国人处
在这样的苦难中，我起不了作用。假如能为中国人作一点事，我心里会好过
一点。”我也告诉他，各方对我们善意的警告，我们的确是处在危险中。

哪有这么笨的政府

但偌大的中国，何处安全呢？我们已出走了一次，正如小儿子所说，当
局若想要抓，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对我们都不安全。我不愿意再给亲友制造
麻烦，我们太了解中国共产党了。上次的出走，是基于我不太相信当局真要
抓我们，太原之行打破了这种侥幸心理，更何况他们已经杀人了。也许，外
国人的家里安全一些；也许，外国大使馆更安全些。但这样一步是很难跨的，
我还希望，这种混乱局面只是一时的；也许，到一个隐蔽的地方住一、两天，
看一看，再回家来。

林培瑞作为一个很了解中国人的美国人，仍然很难理解中国人深层的心
理，他茫然地说：“外国人的家，现在也不安全，自从布什晚宴之后，我们
家受到密切注意……”他不愿说自己的难处，接着，他不解地说：“大使馆，

我没有问过，不过，美国大使馆接受避难，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我不知道，你们方面有什么障碍难于跨过？一切你们自己决定，我愿尽我可能的力量。”

我坦白地告诉他，最主要的，是怕由于我们的行为，影响中国的学生和学生运动，让中国当局有了借口，对学生不利；其次，励之是个十足理性的理想主义者，他视名誉比生命更重要。到现在，他还认为当局没有道理来逮捕他，因为，他完全没卷入天安门的事，不必躲避。再有，励之过于相信他自己的声望；他觉得，当局若无理地动了他的话，他们自己将来很难下台阶，哪里有这么笨的政府？

林培瑞一肚子的狐疑，不知道哪一种估计更正确，念叨着：“我不明白，老方的事怎么影响学生？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冒着坐中国共产党监狱的危险？在监狱里，什么也做不了，怎么对学生有好处？怎么对中国将来有好处？谣言尽管他们造，实际怎样最有作为，最能发挥自己作用，才是重要的。当然，什么都由你们自己决定。”这充分表达一个正直的美国人的心；也显示出两种文化背景衡量事物的不同角度。中国的知识分子，“西化”如励之那样，在心底里，仍然有些许“中国士大夫”的气质。

今夜不能在家住

经过“八九民运”，更多人在自己的经历中，接受了新的价值观；人民把能有一批人逃出生天的消息，当作喜讯，到处传播，不介意官方宣传中所称的“叛逃”。林培瑞临走一再说：“我再想想，有没有安全的地方，我随时准备帮助你们。让我们保持联系。”

下午，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急急地打来电话，直愣愣地说：“要不要我帮你们离开家？换个地方？”我们谢了他的关心，表示我们哪里也不去。

下午四点多，林培瑞和一位他的记者朋友来了，这大概是他想到的一个折中的办法，记者朋友请我们到他所包的饭店房间，那里平时是安全的，中国官方一般不会来打扰。励之仍旧不动声色，他说还要看一看，明天他还有一个约会，完了再说。两位外国朋友担心地走了。走前，我说，我们家的电话用起来要倍加小心，我和林培瑞约定，假如情况紧急，需要他的帮助，我在电话中就说，要他把孩子带来玩。

快到晚间中央电视台联播节目时间了，人们憎恨这几天的节目，但一定要看，看究竟说什么。就在这时，楼下忽然聚了一堆堆的人，原来，有人把一个被枪杀的七岁（或九岁）孩子的遗体，送来让大家看。无言的抗议，大人低下头，小孩紧紧拉着妈妈的手。

我们的挚友，前两天还说去太原是多此一举，当晚派他的妻子来，告诉我们，军内上层已正式传达，要抓方、李夫妇俩，他替我们找到一间空房，可以蛰居一些时间，他的妻子等我们决定，好立即带我们走。她警告我们，今夜不能在这个家住了，抓人一般都在夜里。

我们的邻居，悄悄地来了。他紧张地说：“老方一定要躲一躲，今夜不能在家住。你们要是信任我，今夜，无论什么时间，来我家住，我们把床给你们留着。用坦克、自动步枪对着手无寸铁的人民，不能再相信他们了！我们真可怜，真是手无寸铁啊！科学院这个区，他们最恨，这是知识分子聚集地，将来整起来，一定是不会轻的……”我迅速把他送走，不要让别人看见。

情况危急

门铃又响了，进来我认不出来的一位盛装女子，原来是我们青年朋友的妻子，刻意打扮了一下。她心慌意乱地拿着丈夫的字条，大意是：“我想法弄到一辆车，今晚八点出发。两位老师今晚一定不要在家住。假如你们同意，八点以前在路口等或到我这里来。我把二位老师送到×××先生那里，先住一阵。”我知道，她既担心丈夫，又担心家里一个幼子，就请她快回家；告诉她丈夫，不管我们去不去，都永远记得在这危急时刻他为我们作的一切。我们七点半不去的话，就是不去了。他们有什么安排，不要耽误。

电话铃响，送来一个土气十足的声音，励之拿着电话，愣了一下，好像在回想什么，突然他笑了，接着说：“我明白了，谢谢你，我明白了，明白了！”这一连串的“明白了”，原来是对于电话“哑迷”的回答。放下电话，励之向我解释。这是一位十分“正统”的朋友打来的，情况的险恶，使这位朋友用改变了的声音和腔调说话。这位朋友说：“老方，厄（我）从山东老家来，咋这里叨脏，你咋不换个干净地方待着？看！电视上都演的啥？”这时电视正在说“平定反革命暴乱”的事。

这个电话使励之比较相信情况的紧急，因为，别的好友对我们钟爱，反而使励之认为他们过于担心。“正统”的、不过于激进的人都认为危险，那就更有客观性。这时，他才同意我给林培瑞打电话。一接通，我一一谢了所有在我家等我们决定的朋友，请他们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我双手拉着他们的手，用力地用双目盯视着他们，我要永远在心上刻下这一张张纯朴、善良的脸。

就这样离开家

这是林培瑞这一天第三次来到。励之还想着明天就回来，这时，他的研究生来了，励之交给他要办的事，应该寄出的文章、书信。我收拾几件最简单的漱洗用具，向小儿子说：“一起走吧！”他显出不情愿的样子，我劝说：“妈妈不放心你！你就算先送送我们，明天再回家，好吗？”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家。六月的夜晚来得很迟，黄昏的斜阳下，我回头再望一眼我们住房的阳台。阳台上，我专门请人做的晒衣架，还有打通两个阳台之间的拱形门洞。这都是请人装修房子时我得意的设计，准备在家里不定期地请朋友们、学生们来进行学术讨论，或举办“自由沙龙[Liberty Salon]”。为此，当大儿子要用他的助学金送我们一件礼物时，我指定，要一座自由女神像。

阳台上，还没来得及种上一点我希望有的绿色植物；阳台上，还放着一位朋友特地送来的防火索；室内放下的落地窗帘隐约可见……。我转身又看一眼楼前的场地，一楼住户的铁栅栏，栅栏上不整齐的绿色枝叶。猛然，在楼的转角，靠着栅栏，站着一位中年人，他含笑看着我们进了汽车。他是谁呢？

林培瑞替我拉开车门，再一次催我上车。一向行动急促的我，还在发愣，我好像预感到什么，又回头看看我的家，才低头进入车里。车座的布罩上，点点血迹；司机座边，另有一人。司机急忙解释：“我们不敢一人开车，不知道会撞上什么。这一夜，我们都在自愿免费冒险拉学生，你看这布罩上的血……，唉，太惨了！学生们真是可怜！……。”我才明白，林培瑞没有用他的长期包车，而是为我们特地叫了一辆出租车。

车行到海淀大路上，一群群的人，聚集着；有人围着持枪的军人，连问、

带说理、兼责备。北京人没有怕，北京人睡不着，都上街来了。天暗下来了，我们决定去就近的香格里拉[Shangrila]大酒店，等明天再作决定。找到房间，天已全黑了，路上有持枪的人，我们不放心林培瑞一个人回友谊宾馆，但他不放心夫人琴一个人带两个幼小的孩子；我也想起，琴最近私下告诉过我，布什宴会之后，常有无聊的骚扰，甚至有人往她那里打下流的电话。无奈，我怀着担心，目送他在黑暗的夜色中，一个人走了。

一夜不眠，听着杀人之后北京的声音。深夜，越洋电话接通。清晨，林培瑞来到。励之要回去参加约会，我想知道确实的消息才放他走。

只有一条路

我接通一个我信得过的家，告诉他们，我在一个新的地方，想知道真情。孩子抢过电话，急急地说：“李阿姨，北大很多同学至今不知去向，学校一片肃杀之气。学生领袖都不见了，也许被杀害了，也许躲起来了……”我急得说：“你不要叫我，也许我不再给任何人打电话了，但我不能判断，情况究竟怎样；假如可以，我们想回家，他还有事……”孩子听到这里，急起来，大声说：“阿姨！我告诉你，学生领袖都躲了，当局不会放过你们，这是真的！还有，据可靠消息，在各海关、各口岸早已有你们的照片，你们不可能通过那些地方。但是，同学们都盼望你们安全，这件事很重要！很重要！大家要知道你们安全！这消息对学生太重要了！我只能说这些，你和叔叔要多保重，再见！”这是我向外打的最后一个电话。

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先到大使馆，要签证(visa) 一试闯关，与其在家中或在街上不明不白的“失踪”，不如在公共场所被捕；同时

也试问一下有关的条例。林培瑞来时已发现，路上更紧张了，为了保险，他找来一位年轻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工作人员，拿着可通全世界的报话机，挤在一个小车上，出发了。沿途，经常走不通，改道再绕；沿途，在高校附近，学生设的简单路障上，缀满了纸作的白花；沿途，人们悲凄而胆小地弯腰低头，匆匆的行人像幽灵一样；……这就是我离家的路上。

患难与共

都说中国人很爱家，中国古、今有多少怀乡、思家的名诗、名歌；但是，这几十年来，在中国大陆的国土上，既没有战争，也没有分裂，而可怜的中国人，却经常被弄得家破人亡；中国知识分子，却经常是夫妻分离、遣送边疆、扫地出门的命运。

我告别了多年来盼望的、唯一的一个像个家样的家。这也许是我告别了某种更深层的东西，告别了某种思想模式，告别了某种价值观念，告别了某种心理状态；这也要求我寻找一种新的心理平衡，要求我开始走生命的又一章。这需要勇气。

和每次劫难不同的是，这次巨大的劫难，我和励之在一起。也许，我们可以得到相互的精神补充；以我们已不算年轻的生命，有相知，相爱，相补，来谱写这对中国人来说，是精神的、生命的、新生的一章。

本稿成文于 1989 年，最初发表在《远见》杂志 1992 年第 2 期。

[\(返回目录\)](#)

附录 第三卷文章的写作与发表时间及出处

73. 《我的祝贺——为王淦昌先生八十寿辰而作》，1987年5月。原载《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胡济民、许良英、汪容、范岱年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

74. 《“现在还是主张科学和民主”》(1987年5月23日在罗马接受香港《百姓》陆铿电话采访)，原载香港半月刊《百姓》1987年6月。

75. 《方励之和温辉、明蕾的对话》(1987年6月18日在罗马大学接受香港《争鸣》温、明采访)，原载《争鸣》1987年7月。

76. 《重访卡普里》，1987年6月21日。原载1988年5月《英语世界》第3期。1988年10月《读者文摘》第10期摘载中文全文。

77. 《马克思主义已过时了》(1987年6月21~25日中的3天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接受西德《明镜周刊》记者邓天诺采访)，原载西德《明镜周刊》1987年7月27日第31期。

78. 《民主改革和开放》(1987年6月25日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接受香港《百姓》陆铿电话采访)，原载于香港《信报》1987年6月25日。

79. 《我的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一日》，1987年7月5日。

80. 《对民主和安定的理解》，原载1987年9月1日出版的《我们正在写历史——方励之自选集》。

81. 《让中共、台湾、香港三家来竞争》(1987年9月14日后，9月19日前在北京接受台湾《自立晚报》李、徐采访)，原载台湾《自立晚报》1987年10月。

82. 《天文学思想史片断》，原载《科学史论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

83. 《宇宙为何不热死》，1988年1月10日，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88年第1期。

84. 《两岸竞争有好处》（在北京接受台湾《联合报》社长张作锦从美国电话采访），1988年1月15日，原载台湾《联合报》1988年1月16日。

85. 《知识分子是受剥削最重的阶层》（1988年1月20日在北京中科院新居接受香港《镜报月刊》沈琦采访），原载香港《镜报月刊》1988年3月号。

86. 《“阶级斗争”是谁先提出来的？》（1988年春，2月4日立春，在北京中科院新居接受西德作家关愚谦采访），原载香港《信报》1988年6月3日。

87. 《暴力革命必会带来暴力统治》（1988年春，2月4日立春，在北京中科院新居接受西德作家关愚谦采访），原载香港《信报》1988年6月4日。

88. 《给黄雨川先生的一封信》，1988年2月17日。

89. 《我对美术的感受》，1988年2月21日前，原载《中国美术报》周刊，1988年第8期。

90. 《〈方励之自选集〉序》，1988年3月2日，1988年3月2日。

91. 《〈天体物理学前沿鸟瞰〉序》，1988年3月17日，《天体物理学前沿鸟瞰》，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出版。

92. 《对统一的想法》，1988年5月22日。

93. 《两岸应先实行现代化再谈统一》（1988年5月在香港与台湾大学王作荣教授座谈），原载香港《中国时报》1988年5月。

94. 《现代化的问题与出路》（1988年6月1日在北京中科院新居中接受梁

硕华采访)，原载香港《明报月刊》1988年7月号。

95. 《风雨中的励之和我》，李淑娴，1988年6月5日

96. 《中国应当先有常识性的民主》（1988年7月在北京中科院新居接受香港《镜报》林文采访），原载香港《镜报》1988年9月。

97. 《评〈爱因斯坦文集〉》，1988年8月7日，原载《科技日报》1988年8月7日。

98. 《对谈民主与改革》（1988年8月接受叶知秋采访，发表在香港《信报》），原载香港《信报》1988年9月。

99. 《比较邓小平与毛泽东》（1988年8月在澳大利亚接受前澳洲广播公司记者钟海伦采访），原载1988年8月《周末澳洲人报》。

100. 《我不再入党了》（1988年8月20日在澳大利亚接受香港《争鸣》记者澳华的采访），原载《争鸣》1988年9月。

101. 《在香港中文大学新生辅导营与学生对话》，1988年9月1日。

102. 《不能只看领导层的变化》（1988年9月7日在香港与《争鸣》编辑部人员座谈），原载《争鸣》1988年10月。

103. 《大专会堂座谈会答学生问》（1988年9月7日在香港与学生座谈），原载《中国时报》1988年9月12日。

104. 《中国要解散？》，1988年9月8日，原载《九十年代》，1988年10月。

105. 《多党制可能在大陆出现》（1988年9月8日在香港接受中华电视公司记者陈月卿的电视采访，苏玉珍据此成文），原载香港《中国时报》1988年9月9日。

106. 《我为我说过的每一句话负责》（1988年10月在北京家中接受台湾《联

合报》驻美国记者电话采访)，原载《联合报》美国版 1988 年 10 月。

107. 《悠闲自在地磨吧!》，1988 年 12 月 11 日。

108. 《爱国主义不应放在第一位》(1989 年 1 月接受《九十年代》记者采访)，原载《九十年代》1989 年 1 月。

109. 《给邓小平的信》，1989 年 1 月 6 日。

110. 《〈方励之自选集〉(四)前言》，1989 年 1 月 20 日。

111. 《“第一推动”丛书总序》，1989 年 1 月~2 月。

112. 《中国的失望和希望》，1989 年 2 月。

113. 《论中国人权》，1989 年 3 月 22 日，王新年根据 1989 年 3 月 22 日电话录音整理，原载 1989 年《中国之春文选》。

114. 《从北京天文台看中国民主进程——纪念“五四”七十年》，1989 年 4 月 4 日。

115. 《李淑娴：离家》，1989 年 6 月 4 日后，原载《远见》杂志 1992 年第 2 期。

[\(返回目录\)](#)